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四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二年六月

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

杜　正　勝

從太平洋西岸往西直到地中海，歐亞大陸的中、南部是古代文明蘊育之地，而在這些文明古國北邊的草原地帶也產生畜牧或游牧的社會、國家與文化。各地的北方游牧部落分別與其南方的文明古國發生頻繁交往，如斯基泰人 (Scythians) 之與希臘、波斯，鬼方、土方、嚴允、戎狄和匈奴之於中國。同時，在不同時期，草原地帶東西方的民族與文化也有不同程度的來往，促使歐亞文明古國產生間接的文化交流。

本文以中國北方所見歐亞草原共通的裝飾藝術動物文爲基礎，劃分類型，區別時代，一方面檢討中國北方民族與華夏國家的關係，分析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內中國北方之經濟社會與國家的轉變，並且論證各類動物文與域外（如外貝加爾湖、南西伯利亞、黑海北岸）文、化的異同。

歐亞草原游牧民的藝術創作主要表現在武器、馬具和裝飾品三類物件之上。而所取文樣則以動物形象最爲突出，自本世紀初以來，歐洲學者研究斯基泰人和希臘的藝術關係，注意到動物文飾 (animal style)，此一課題便引發極大的注意。由於中國北方及南西伯利亞也相繼發現動物文的藝術創作，所以長期以來對於動物文的起源地存在著極大的爭議。

中國北方的考古工作近年來有大量屬於動物文飾的工藝品出土，對於歷來的爭論可能提供新的論證依據，也可以深入探索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本文整理從殷商到西漢初期，環繞著燕山南北以及長城內外地帶出土的北方民族文物，以動物文飾爲中心，按時間分殷商——西周，春秋——戰國早期，戰國中期——漢初三大段落；又按動物文飾分獸頭刀劍、獸形柄刀劍和飾牌三大類別，以討論中國北方民族藝術的特色，並且結合史料說明戎狄到匈奴不同族群與不同文化的演變。本文認爲古代中國北方是一個多民族、多文化的地區，傳統史觀及近代某些考古學強調鬼方、戎狄、胡人和匈奴是一脈相傳的看法，本文覺得需要適度修正，這是一點。

其次，藉中國與域外動物文飾母題之比較研究，本文認爲古代中國，尤其北方地帶，與外貝加爾湖、南西伯利亞以至中亞、黑海北岸草原，在不同時期皆有過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

杜　正　勝

一、序

在燕山南北、長城內外地帶，從商周至秦漢的考古出土文物中，有獸頭或鳥首，及其變形的青銅刀和短劍，也有青銅或金、銀的動物形象圓雕和透雕，皆屬於所謂「動物文飾」(Animal Style) 的藝術風格。在西方一般稱作「斯基泰・西伯利亞式」(Scythio-Siberian) 藝術，在中國，因本世紀初期，此類遺物多傳出自鄂爾多斯，明斯 (E. H. Minns) 建議安特生 (J. G. Andersson) 命名爲「鄂爾多斯式」(Ordos) (*BFEA* 4 p.224)，遂爲通稱。然而來源比較清楚的資料證實，不論採集或科學發掘，這類文物出土地點散佈遼遠，並不限於鄂爾多斯，但大體集中在內蒙古和晉陝冀北邊，故近年學者多稱作「北方式青銅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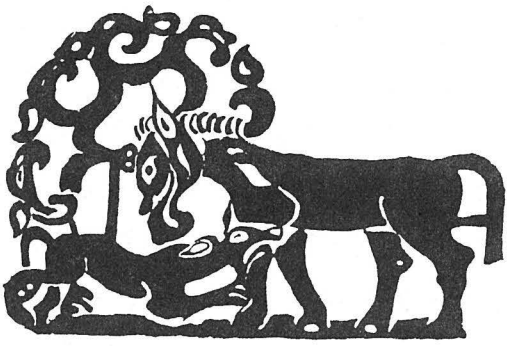
引用資料簡稱

《山西》	《山西出土文物》
《文參》	《文物參考資料》
《文叢》	《文物資料叢刊》
《考文》	《考古與文物》
《陝銅》	《陝西省出土青銅器》
《河北》	《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
《新疆》	《新疆古代民族文物》
《藁城》	《藁城台西商代遺址》
《澧西》	《澧西發掘報告》
《內蒙古》	《內蒙古出土文物選集》
《婦好墓》	《殷虛婦好墓》
《內蒙文考》	《內蒙古文物考古》
《內蒙長城》	《內蒙古・長城地帶》
《鄂爾多斯》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
ACOB	*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 (Jessica Rawson and Emma Bunker 1990)
ASA	*"Animal Style" Art* (Bunker, Chetwin, and Farkas 1970)
BFEA4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Andersson 1932)
BFEA5	"Selected Ordos Bronzes"(Andersson 1933)
OSR	*The Oasis and Steppe Routes* (奈良縣立美術館)
SGH	*The Scythian Gold from the Hermitag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SSA	*Sino-Siberian Art - in the collection of C.T.Loo* (A. Salmony 1933)
TNSR	*The Treasures of Nomadic Tribes in South Russia* (朝日新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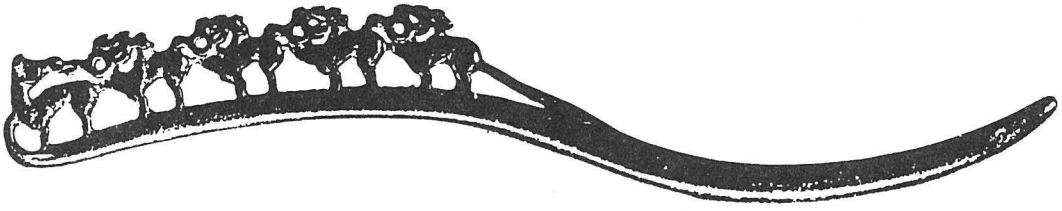
關於北方式青銅器文化意義的探索至少包含兩個課題，一、它基本上屬於橫亙歐亞草原之「動物文飾」藝術風格的範疇，頗能顯示中國與域外諸民族文化的交流很早就存在；二、它的使用者是中國史書上的北方或西北民族，自殷商以下到兩漢之際將近一千四、五百年間最爲突顯，動物文飾的複雜風格可以反映這些民族之文化的傳承或變異關係。以過去累積的學術成果而言，前一課題辯駁數十年，仍未有定論；後一課題則方興未艾，值得繼續追究。

歐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從青銅時代開始以自然或變形之動物形象裝飾武器、工具、服飾和馬具，本世紀初 E.H.Minns 注意到南俄斯基泰人 (Scythians) 使用這種藝術風格 (1913)，M. Rostovzeff 進而比較南俄與中國的藝術，企圖找尋「動物文飾」的根源 (1929)。這個問題上推到 Rostovzeff，已超過六十年，追溯於 Minns 有八十年。如果再上溯俄國人對西伯利亞這類文物的收集，則可推早一百多年 (Boris Piotrovsky, Liudmila Galanina, Norna Grach 1986, p.5)。關於游牧民族動物文飾藝術品之收集和研究，中國是比較後進的，前清道光年間馮雲鵬出版的《金石索》，〈金索四〉著錄一件北方鬥獸飾牌，卻誤列於錢幣類。直到本世紀二〇年代，連大收藏家羅振玉對於北方動物文飾的藝術品也幾乎無所知 (*BFEA* 4 pp.287-288)。〔插圖一〕所以就學術史而言，研究這個問題自然不能不涉及西方學者的論難。

數十年來，關於「動物文飾」的研究，分區分期，日益細密，因其涵蓋的時間、地域、民族和文化極其複雜，這個名詞未免暴露出籠統含糊的缺點 (*ASA* p.13)。然而從宏觀的角度來考察，相對於中國本部、南亞、西亞和巴爾幹半島之各種古代文明，北緯 30 度草原帶之「動物文飾」藝術風格的確有其獨特性；而在此東西長條地帶內，雖然它們的象徵意義不同，藝術表現方式仍有其普遍性 (參 Dagry Carter 1957, p.17)。所以「動物文飾」這個名詞仍然可以作爲考察這地帶民族文化的重要指標。在中國方面，本文採用的「動物文飾」比較嚴格，不當作人類最普遍之藝術形式，所以它和商周銅器主流的動物花文不但不能等同或混淆 (如 Roztovzeff 1929, Yetts 1939, 或 Cheng Te-k'un 1963)，而且應該對立成兩種不同藝術系統來研究。因此對古代青銅禮器上的動物花文以及動物形的青銅容器，本文皆存而不論。



1



2

插圖一　中國傳統對北方文物之認識

1.馮雲鵬所謂的「馬幣」　2.羅振玉定為宋代文物

(1.《金石索》　2.BFEA4)

「動物文飾」的起源地，有人主張在中國，有人主張在南西伯利亞，長期以來爭議不休。由於近年中國大量的考古發掘，比較精確的年代學得以建立，而當資料豐富之後，形制風格的發展系列也逐漸可以理出頭緒，動物文飾在中國北方起源和發展的命題，中國學者不論田野經驗或理論辯駁都有一定的貢獻，雖然不一定能折服「南西伯利亞論者」。不過根據本文的研究，我們須分疏北方動物文飾的類別，才容易看出那些是土生土長，那些才是外來的養分。我個人的看法認

爲中國的動物文飾須按其時序分別看待，以解答上述二個課題，對所謂起源之爭，也許也會有一些釐清作用。

中國境內動物文飾青銅器的使用者應是生活在北方的民族。古代中國北方或西北存在著衆多民族，不論政治制度、社會組織、產業結構以及文化特徵皆與中原的華夏民族明顯差異。古書因時因地，賦予不同的名稱，大抵殷商謂之鬼方，西周謂之玁狁，春秋謂之戎狄，戰國秦漢則通稱曰胡或匈奴。這些先後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相互之間的淵源和關連，傳統中國人一般認爲他們不但同種，而且一脈相承，從司馬遷的《史記・匈奴列傳》到王國維的〈鬼方昆夷玁狁考〉都抱持這種見解。近代中外學者一反舊說，不但懷疑他們的傳承，而且推測他們的族源，分別有蒙古、突厥、通古斯與藏族之擬測，不像《史記》匯於一宗，通謂「夏后氏之苗裔」。然而近年卻有一股復古的新趨勢，考古家建立考古學譜系時，往往將不同時空的文化與中國古代北方之不同族群對應，有意無意間，所謂北方民族一脈相傳的傳統史觀似乎得到新的佐證。這種看法是否合理，實在值得仔細推敲。

這麼說來，「北方民族」一詞的複雜性並不亞於「動物文飾」，也同樣難有一致的結論，主要困難在於論證此一問題的信實資料，不論體質人類學家憑藉的遺骸，語言學根據的語料，或歷史學家徵引的文獻，皆太殘闕，族源問題是不解之謎 。 然而考古人類學家李濟之先生說過，「民族的結合大半是文化性的」(1965)；北方民族不論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物皆相對地缺乏，作爲文化具體證據的「動物文飾」乃成爲探索他們民族與文化不可或缺的憑藉。此一研究取向，考古與歷史學者已有一些成績，尤其近來考古學體系日益細密，考古學文化和歷史記載之族屬的對照已經成爲研究北方文化之考古學者關注的課題。

本文基於「動物文飾」的藝術風格，結合考古出土的文化群相，檢視殷商以下一千多年北方民族的文化面貌，辨析其間之異同，注意可能加入的外來成分，並且嘗試從生活型態的轉變對文物資料提出一些說明，以增益我們對古代北方民族的認識。茲先根據考古出土資料，參照著錄的收藏品，建立中國古代北方動物文飾發展的基本架構，以觀察不同時間與空間的特質與流變，並且進一步由論上

述的課題。至於動物文飾可能隱含象徵意義，本文存而不論。

二、中國古代北方動物文飾之類組與分析

中國古代北方之動物文一般表現在武器及佩飾上，可以分作四個類組：刀劍柄端之獸頭文飾、柄上獸形飾與「觸角式」動物文飾、透雕動物形牌飾以及圓雕動物。它們的時代頗有先後，但也有部分重疊。

（一）刀劍柄端獸頭之動物文飾

1935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侯家莊西北岡第三次發掘，M1001大墓旁的小墓M1311出土一把駱駝頭的青銅曲背彎刀。這是中國動物文飾獸頭武器第一次科學出土的記錄，以前有些著錄，如瑞典東方博物館(*BFEA* 4, Pl. V：1-2)巴黎盧芹齋(*SSA*, Pl. XXXVI：1-5)和懷履光(White 1956, Pl. XXIV)的收藏都是採集品。翌年，小屯乙區M20出土三把裝飾馬、牛、羊的曲背獸首青銅刀（石璋如1970, p.130）。這些發掘對於學界流行的看法——獸頭刀劍「動物文飾」起源於更遠的北方——投下新的變數。

最近數十年來獸頭刀劍相繼出土，河南如殷墟婦好墓（《婦好墓》p.103，圖版66：1）、殷墟西區M1713（《考古》1986：8），河北如藁城台西村（《藁城》p.135）、青龍抄道溝（《考古》1962：12, pp.644-645）、懷安獅子口（《考古》1988：10, p.941）和張北縣（鄭紹宗1984, p.37），陝西則陝北綏德墕頭村（《文物》1975：2, p.82），山西如靈石旌介村（《文物》1986：11, p.14），以及遼寧西部建平二十家子（《考古》1983：8, p.683）皆有發現，大抵不出燕山南北、長城內外一帶。

這些獸頭武器或工具的形制基本上包含刃、柄、本（柄端）三部分，全長大約30公分；獸頭裝飾於柄端，柄身一般裝飾幾何文，刃部絕少花文。獸頭刀曲背凹刃，柄微弓，往往帶陰刻短淺文，刃柄接界處有下闌。劍則曲柄，刃部中脊突顯，呈三角形，刃柄交界上下皆有闌。刀、劍的柄端皆裝飾不同種類的圓雕獸頭，大抵是寫實的，有些獸頭和柄部花文鑲嵌松綠石。不論考古發掘或傳世著錄，這

類獸頭刀比獸頭劍更加普遍。

此類刀劍之獸頭所屬何種動物基本上可以分辨，但有的也不易判定的，茲依動物之母題分別討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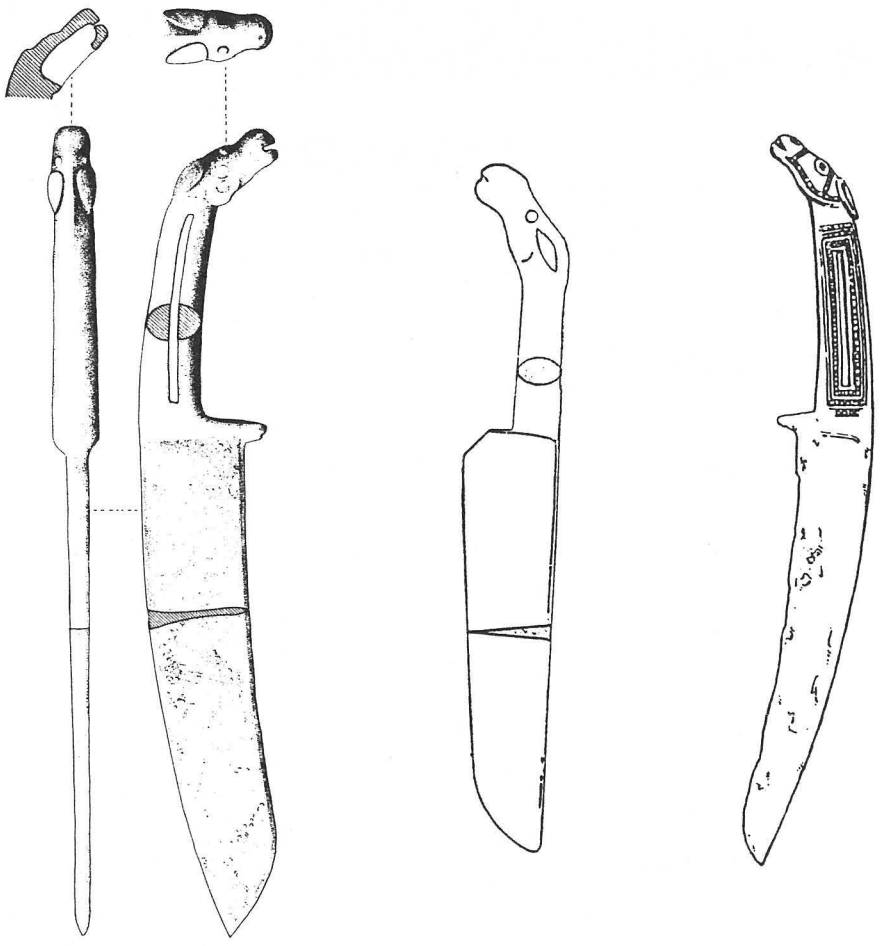
1. 馬頭

今日考古發掘可以確定爲馬頭刀者多出於殷墟，依其形制可以劃分成貼耳和豎耳兩類，都可在殷墟見到。

關於貼耳類的馬頭刀，小屯乙七基址之南的M20車坑出土的馬頭刀即是屬於貼耳一類的典型，兩耳向後平貼，圓目鼓起，頷肥口張。小屯灰坑H181出土的一把馬頭刀形制相似，雖然氧化極重，馬頭造形仍然清晰可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李濟1949）。近年殷墟西區隨葬品甚爲豐富的M1713亦出一件馬頭刀，雙耳平貼（《考古》1986：8, p.709）。參證以前的著錄，懷履光（White 1956, Pl. XXIV, Pl.XXVIII, No.15）所謂殷墟「象墓」也有一把馬頭刀，形制與小屯M20所出相似，雖增加馬絡頭之文飾；楊寧史（Werner Jannings）收藏之兵器和工具，有一件馬頭刀，尖耳平貼（Max Loehr 1956, p.142, Pl.XIX, No.40），和日本京都清野氏所藏之刀（《內蒙長城》利器集成三：17）亦皆屬於此類。〔插圖二〕

另外一類豎耳以西北岡M1537爲代表，鼓目突吻，雙耳聳立（高去尋1967, Pl. VII:2），近來考古發掘如陝西綏德墕頭村的「馬頭刀」（《文物》1975：2, p.83），省略上下環，二者造型便相當接近內蒙古東部奈曼旗白音昌東犁村發現的馬頭刀（李殿福1983）。短豎耳馬頭刀，高本漢發表過一件，今存於瑞典東方博物館（Karlgren 1945, Pl.37：229）亦巨目長吻，雙耳雖小，顯然是豎立的。盧芹齋舊藏有一把殘刀，馬頭造型肥頷豎耳（*SSA*, Pl.XXXVI：3）。羅越著錄楊寧史的收藏也有兩件豎耳的馬頭刀，頷下有一小環（Loehr 1956, Pl.XVII, Nos.33、34）。〔插圖三〕

至於馬頭劍，不論考古發掘或傳世著錄，至今似乎只有北京昌平白浮村M3出土一把，豎耳，馬首形象逼眞，握柄與刃身垂直，與上述諸件柄與刃背呈弧形者不同。參證其他隨葬品，此墓年代較晚，可能屬於西周早期（《考古》1976：4, p.253；參下節插圖一三）。



插圖二　貼耳馬頭刀

1.小屯M20　2.殷墟西區M1713　3.安陽「象墓」

(1.石璋如1970　2.《考古》1986:8　3.White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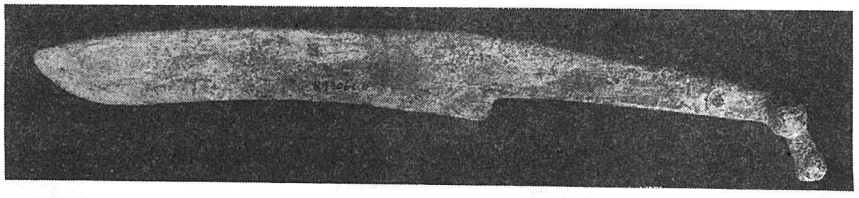
插圖三　豎耳馬頭刀

1.西北岡M1537　2.綏德墕頭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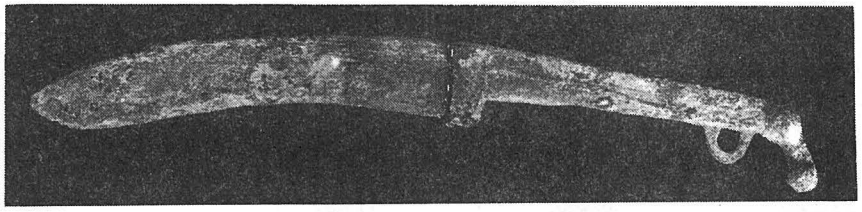
3.奈曼白音昌東犁　4.盧芹齋舊莊

(1.高去尋1967　2.《文物》1975:2　3.李殿福1983　4.Karlgren1945)

大體上今日所見的馬頭刀貼耳者刃身多寬厚，豎耳者從界欄以下逐漸尖銳。前者是中原傳統，後者乃北方舊風。不過在殷墟頗有中和的現象，譬如西北岡刀斧葬墓M1693和M1008所出之獸頭刀（高去尋1967）〔插圖四〕，獸頭雖極簡化，



1



2

插圖四　簡化馬頭刀
1.西北岡M1693
2.西北岡M1008
(1-2 高去尋1967)

仍依稀可以判斷是馬頭，雙耳省略，從頭的造形來推測，應該豎耳，而M1008出土的那件，頷下有小環，可資旁證，但這兩件的刀刃卻都是中原寬厚的風格，這個問題下文還會討論。

殷墟武器或工具的馬頭文飾亦裝飾在弓形器上，此類器物尚無定說，或以爲與弓有關（石璋如1970, p.132，高去尋1973，唐蘭1973），西北岡M2020出土一件，馬頭裝飾於臂端，貼耳短吻（高去尋1973，圖版壹：1），婦好墓出土馬頭弓形器有四件之多（《婦好墓》p.110，圖版七五：2-5），可見殷都以馬頭裝飾武器的風氣相當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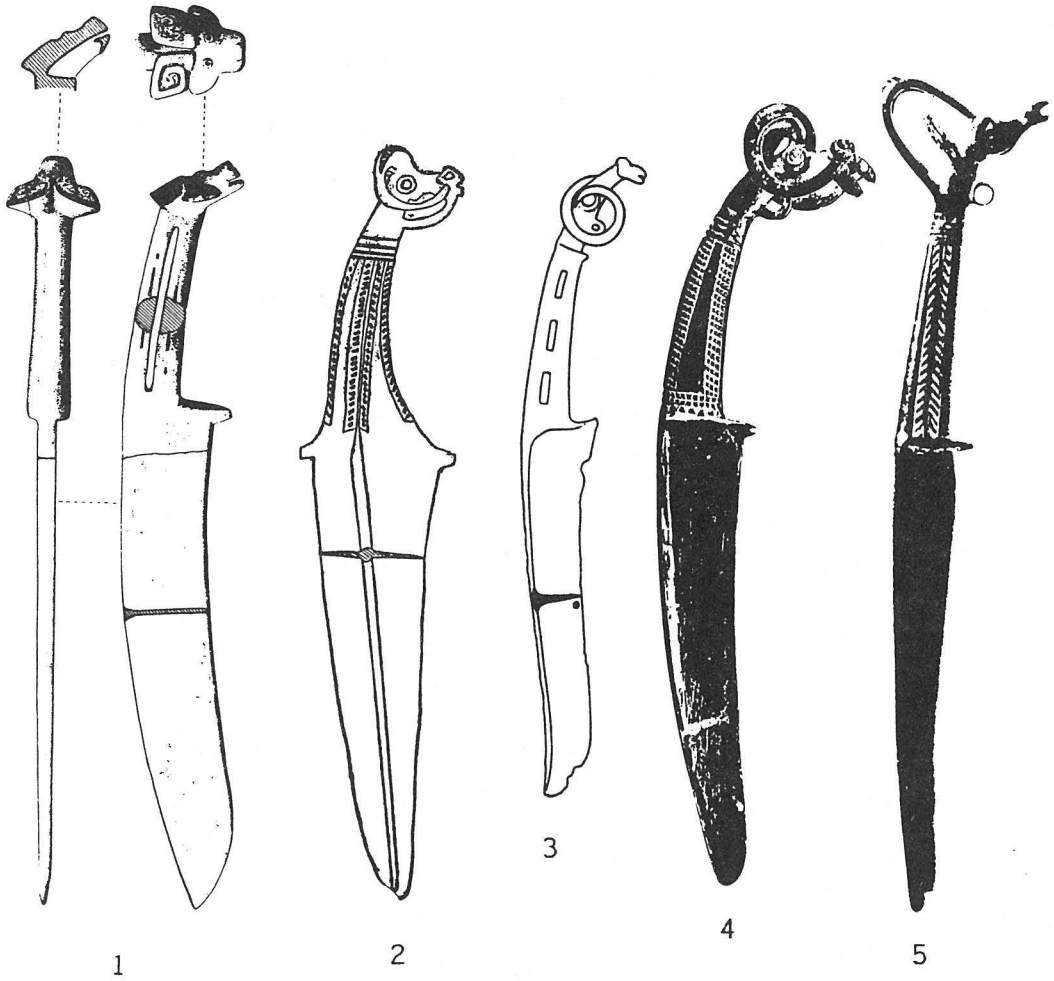
2. 羊頭

藁城台西村商代墓葬M112出土一件羊首匕，器身柳葉形，兩側各飾一半環狀鈕，鈕上繫一環，柄端作羊首形（《藁城》pp.124、135），屬於匕首短劍一類的兵器。這件羊首匕可能是中國今日所見北方動物文飾用獸頭裝飾武器或工具的最早標本。上述小屯M20的羊頭刀，大角外盤，角尖居中，角下雙耳外張、臣字形眼、張口，額作菱形飾，眼眶、鼻頭、鼻孔原來鑲嵌松綠石。台西的羊首造形

因資料不足，暫時存而不論，至若小屯的羊頭刀，在今日所見標本中，並不是最寫實的。寫實的典型如青龍抄道溝的羊首曲柄短劍（《河北》No.84），羊首下垂，頷下長髯後捲，直連于彎柄下端。長角自頭後側前捲，眼鼻圓孔及角上縱溝原應嵌滿松綠石（《考古》1962：12, p.644）。靈石旌介村獸首刀雙角盤卷成環形，目在環中，鼻前突，原報告只稱獸首（《文物》1986：11, p.14），按該造形顯示盤羊的特色，當是羊頭刀無疑。按，盤羊頭刀之精品首推安特生的著錄（*BFEA 4*, Pl.V:1）。著錄有不少羊頭刀或劍，有的顯然屬於盤羊（如*BFEA* 4, Pl. V: 1, *SSA*, Pl.XXXVI：2, *ASA*, No.61），有的可能是綿羊（*SSA*, Pl.XXXVI：1）。高本漢著錄一件羊首短劍（Karlgren 1945, No.227），形制與抄道溝者相似，劍刃形制和北京市徵集的鹿首曲柄劍也很接近（參下節）。羅越（M.Loehr）著錄的羊首刀造像逼眞，雙角向後捲曲成一鉤環（1956, Pl.XVIII, No.35）。邦克（*ASA*, No.54）和羅森（J. Rawson 1987, No.12）的圖錄也收集有羊頭刀的資料。〔插圖五〕

3. 鹿頭

有明確出土地點的鹿頭刀多偏於北方，河北青龍抄道溝所出者，鹿角後彎成扁環形，雙耳聳立在環內，突目巨吻，項下鑄一環鈕（《河北》No.83）。懷安獅子口鹿首刀，鹿角向上豎起，剖面呈橢圓形，上端前後開叉，頸下有一環形鼻鈕（《考古》1988：10, p.941）。遼寧建平二十家子朝陽山的獸頭刀，獸角殘缺不全，眼眶外凸，眼球凹入，吻部前突作張口狀，雙耳聳起，項下亦有一小環（《考古》1983：8, p.690，圖一三：1），其造型近似鹿。北京市文物管理處曾徵集到一批商周青銅器，其中有一把鹿首曲柄劍（《文叢》2, p.20，圖一三），柄端鑄一下垂之鹿首，鹿角後背成扁環形，雙耳向前直立，頷下有環，可以繫繩。新疆哈密花園公社採集到柄端雕鹿首的銅刀（《新疆》No.59）。陸懋德舊藏一件獸頭刀（《內蒙長城》利器集成三：1）及盧芹齋藏件（*SSA*, Pl.XXXVI：55）也屬於這一類。至於河北張家口市和張北縣採集得到的獸首劍（《河北》No.87、《文物》1984：2, p.38，圖版伍：1）之獸首則相當幾何化，與高本漢著錄傳安陽出土的兩把（Karlgren 1945, Nos. 182、183）相似。公私收藏此類型的獸頭刀，有的稱作羊（ibex）頭刀（*ASA*, No.54；Rawson 1987, No.12）。鹿頭或羊頭最明顯的差別當然



插圖五　羊頭刀劍

1.小屯M20　2.青龍抄道溝　3.靈石旌介村M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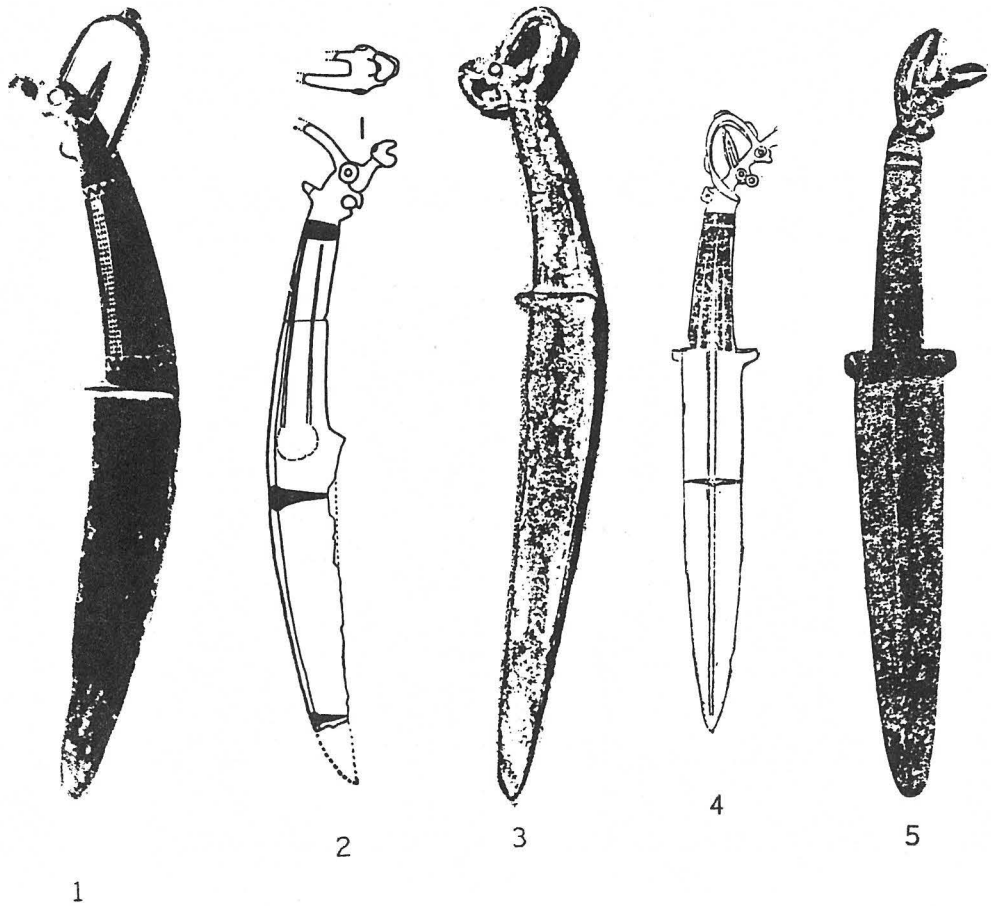
4.Östasiatiska Museet藏　5.British Museum藏

(1.石璋如1970　2.鄭紹宗1984　3.《文物》1986:11　4.BFEA4　5.Rawson1987)

於雙角，但銅器鑄品，角折爲環，以便攜帶使用，便無法求其神似，鹿角歧枝，羊角彎盤往往只能做成環形，所以鹿羊便不易分辨。〔插圖六〕

獸頭文飾雖然寫實，但要肯定屬於何種動物，往往難以保證確然無誤。譬如塢頭村的「馬頭刀」，原報告無描述，根據圖版（《陝銅》一，No.90），馬頭額

上有扁形環，環中雙耳尖豎，從其他標本來看，扁環也可能代表雙角，那麼稱作「馬頭刀」似乎還有斟酌的餘地。此刀獸頭額上吻下之環、雙耳造形，以及刀柄上下的兩排短斜線平行文，皆和盧芹齋舊藏的一件（*SSA*, Pl.XXXVI：4）近似，與抄道溝（《河北》No.83）或二十家子朝陽山的「鹿首刀」也有很多雷同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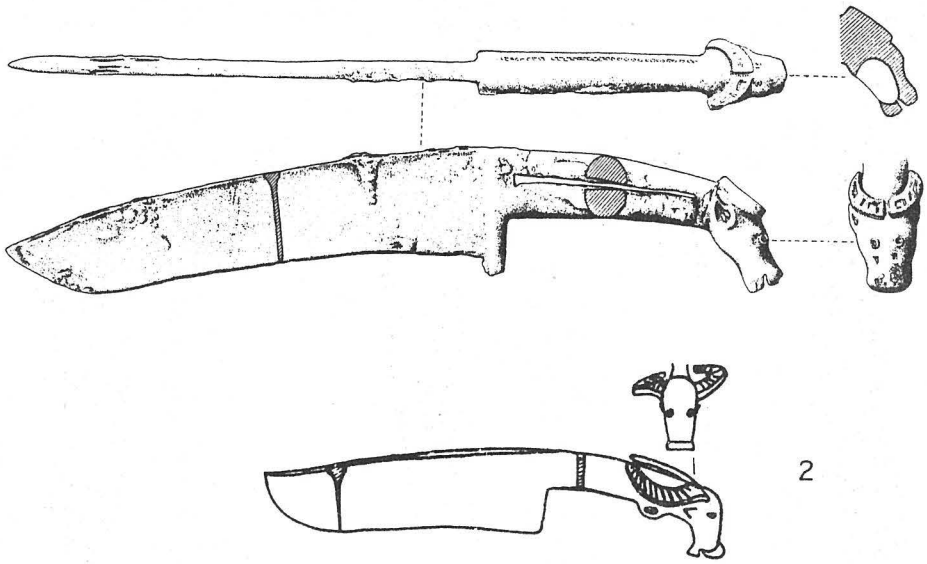


插圖六　鹿頭刀劍

1.青龍抄道溝　2.建平二十家子朝陽山
3.哈密花園公社　4.張北
5.高本漢著錄傳安陽出土
（1.《河北》　2.《考古》1983:8　3.《新疆》
4.鄭紹宗1984　5.Karlgren1945）

4. 其他

獸頭刀劍採用的動物文飾還有牛、駱駝、龍和鷹，但資料較少。小屯M20的牛頭刀，兩角微曲後彎，雙耳平貼上聳，兩目作「臣」字形，鼻開兩孔，口大張。牛頭造形的獸首刀亦見於河北興隆縣河南村之窖藏，弧背，凹弧刃，牛頭亦雙角張開而後彎，頷下一鈕（王峰1990）。〔插圖七〕西北岡M1311出土一把非常別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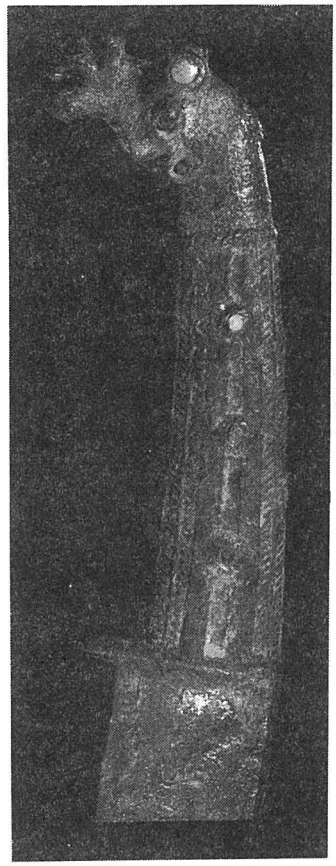


插圖七　牛頭刀

1.小屯M20　2.興隆河南村

（1.石璋如1970　2.王峰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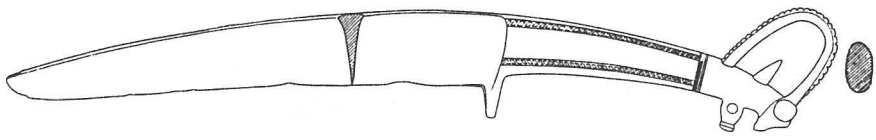
的駱駝刀，柄端裝飾駱駝頭，圓目凸出、鼻吻高突，有大小四孔，張口朝下，口內含舌、雙耳繫環，形似鑣，一存一佚（根據檔案）〔插圖八〕。殷墟婦好墓第四型銅刃（《婦好墓》圖版66：1）原報告謂似龍形，不正確，其獸角卷曲成環，應如上文討論的某一種動物。〔插圖九〕不過，商代確實有龍頭刀，羅越著錄一件，突眼、張耳、開口、角如立杆，柄背鈍齒突起當作龍之項脊，喉下一小環（Loehr 1956, pp.137-138, Fig.81, Pl.XVII, No.32）。近年西安市亦收集得一件，形制雷同，刀



插圖八　駱駝刀

西北岡M1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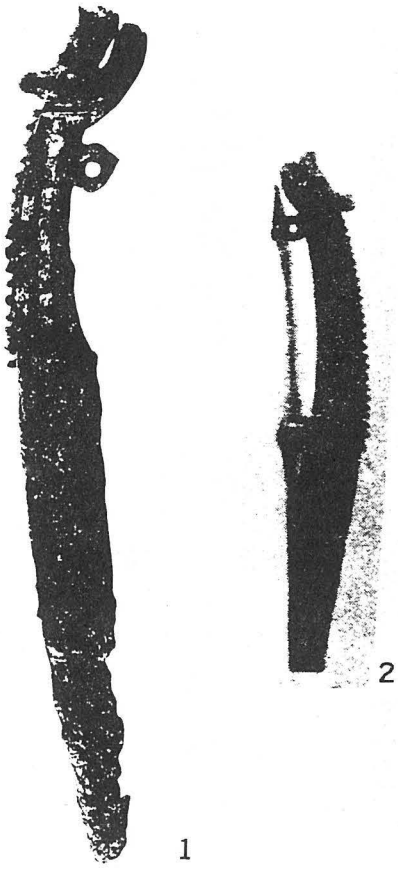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插圖九　小屯婦好墓獸頭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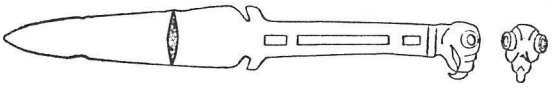
（鄭振香先生提供）

身更近於北方形式（王長啓 1991）。〔插圖一〇〕鷹首劍見於昌平白浮M3，老鷹勾鼻巨目，與上述馬頭劍同出，柄中間亦有三節空隙（《考古》1976:4, p.253）。〔插圖一一〕北京市徵集的螭虎彎刀，柄首鑄一下垂螭虎，頸下一小圓環，可以繫繩，柄身上下兩端起稜，鑄鋸齒文（《文叢》2, p.17）。所謂螭虎之獸首，頭上亦有一



插圖一〇　龍首刀

1.Werner Jannings舊藏
2.西安市採集
(1.Loehr1956　2.王長啓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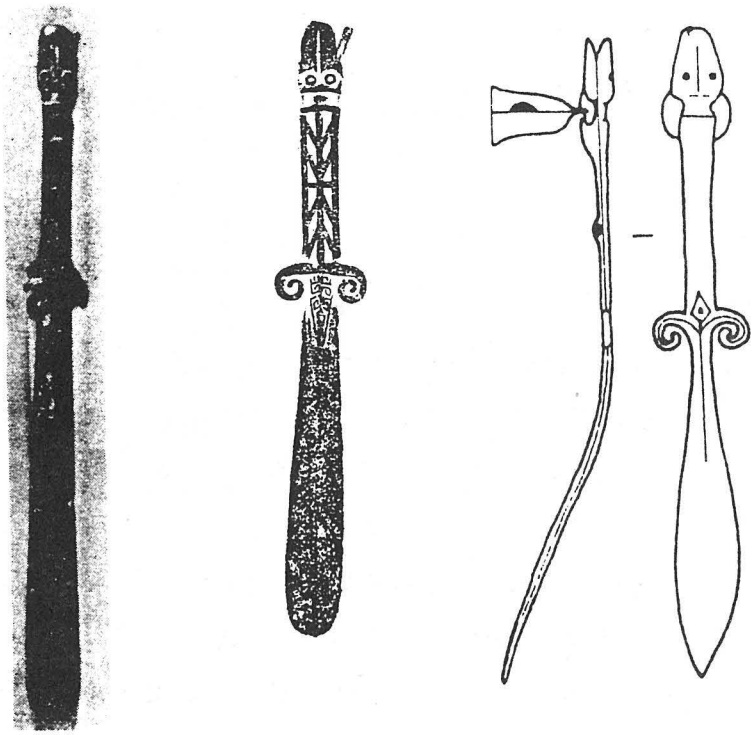
插圖一一　鷹首劍

昌平白浮M3
(《考古》1976:4)

扁形環，如上述馬頭刀、鹿首劍的裝飾。因爲報告描述太簡單，照片不清楚，所謂螭虎獸頭的說法暫時保留。

還有所謂的「蛇首匕」，或稱作「蛇頭劍」，綏德墕頭村出土一把（《陝銅》一，No.89），身扁長，中有脊，前端圓首，兩面刃，刃與柄接界之處有欄，柄端是鏤空的蛇頭，蛇舌可以左右活動。綏德之南的清澗解家溝（《考古》1984：

8），黃河東岸的山西石樓義牒（《考古》1972：4, p.30），同隸屬於石樓縣的後蘭家溝（《文物》1962：4/5, p.33；《山西》No.47）與褚家峪（楊紹舜1981），也都發現蛇首匕。塢頭村、解家溝與義牒所出之形制一模一樣，唯義牒略短而已；後蘭家溝、褚家峪的柄上下兩側各有兩排菱形或梯形鏤孔。西安市北郊大白楊物資回收倉庫收購一把「蛇頭劍」，「劍」身呈葉形而尖，蛇首下有一小鈕，鈕下帶鈴（王長啓1991）〔插圖一二〕。盧芹齋收藏兩件蛇首匕，其握柄一填實，一鏤空



插圖一二　蛇首匕

1.綏德塢頭村　2.石樓褚家峪　3.西安市採集
(1.《文物》1975:2)　2.楊紹舜1981　3.王長啓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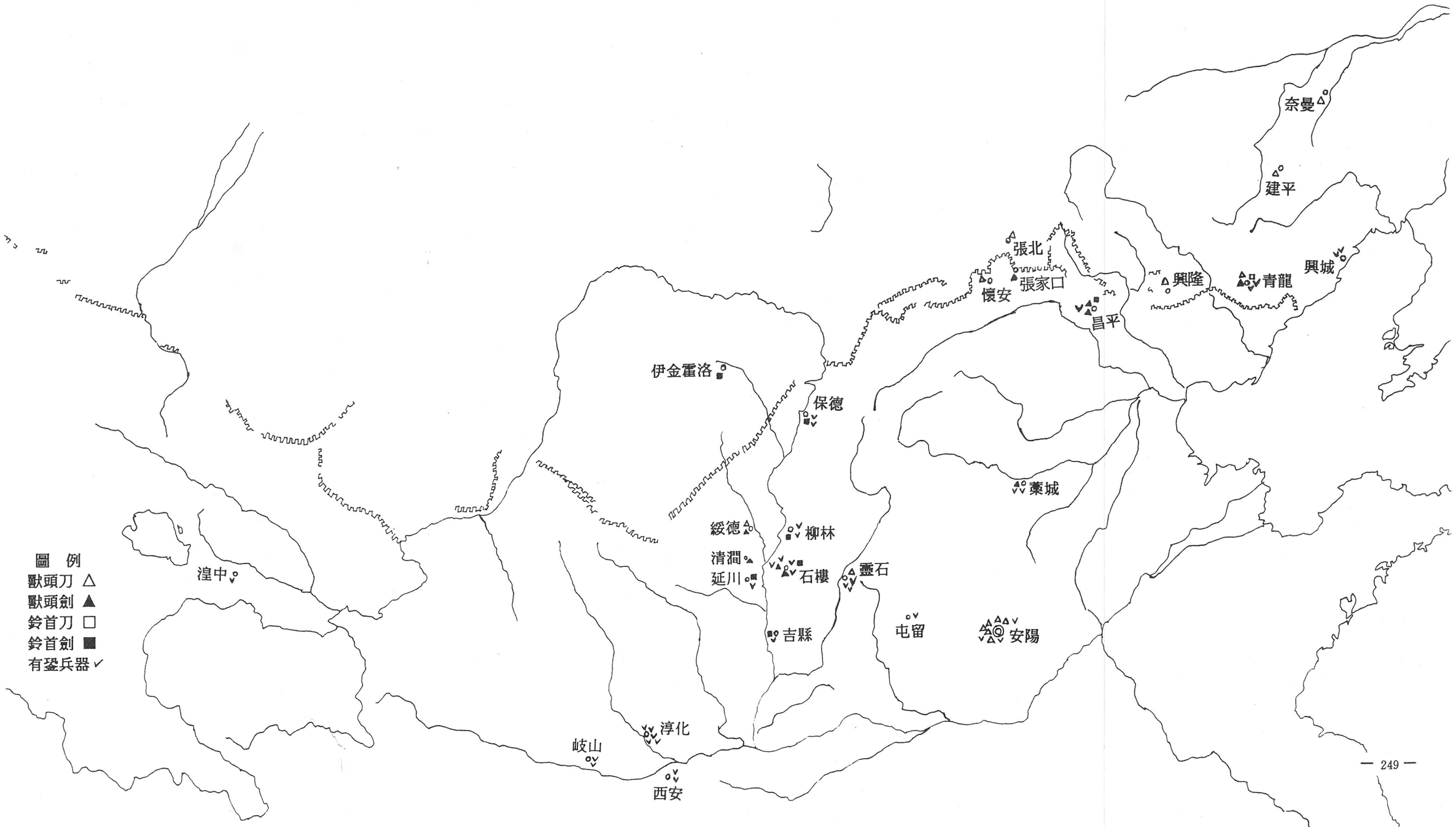
（SSA, Pl.XIV：2、3），完全可以從考古得到證實。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收藏一件，柄無鏤孔，傳出自中國北疆，曾經有人定在漢代（*ASA*, No.132），顯然太晚。所謂蛇首匕或蛇頭劍，刃端圓鈍無鋒，只

宜割，不宜刺，和一般獸頭刀、劍不同，稱作匕首或劍，頗爲勉強，可能更近於匙之類。不過據褚家峪出土的情形來看，同出有人頭骨，應屬於墓葬隨葬品。此蛇首匕之背殘留織物遺痕，報告推測可能用織物包裹，或靠近死者衣物留下的印痕。如果後者，那麼蛇首匕也是一種隨身攜帶的工具。

武器、工具之外，早期北方民族偶爾也用動物裝飾其他日用器皿，就今日考古所知，飲食用的杓最爲常見。陝西清澗解家溝出土一把羊首杓，柄端裝飾一個羊頭，羊角由後向前勾彎（其一殘斷），圓睜雙目，作張口嘶叫狀。柄體正中有一長方形鏤孔，前立一犬，直豎雙耳，隨後一虎，張口捲尾作捕攫狀（《陝銅》一，No.78，《考古學集刊》2, p.42）。陝西延川出土「羊首匕」，柄端鑄一對向後彎曲的羊角，象徵羊首；柄上鑄一虎站立，一人跽坐（《中國文物精華》1992, No.96）。此匕意匠與解家溝羊首杓雷同。石樓後蘭家溝出土一把雙蛇蛙首銅杓，柄端鑄一隻青蛙，左右有蛇對面戲弄，形態逼眞（郭勇 1962，《山西》No.44）。石樓曹家垣發現蛇首帶環杓，柄端作下垂蛇頭形（《文物》1976：2, p.94；楊紹舜 1981）。石樓之南臨近黃河的吉縣上東村商墓出土兩件獸頭形銅杓（《考古》1985：9, p.845），也是屬於同一類型的文化。

上述獸頭刀劍年代，根據其他出土資料推斷（參附表一），藁城台西 M112，報告列入該地商代遺址第一期，大體相當于二里岡上層或稍晚（《藁城》p.11）。西北岡 M1311 在 M1001 大墓附近，是陪葬墓，所出駱駝刀應不晚於殷墟一或二期。婦好墓那把獸頭刀當然也不會晚於該墓的年代，即殷墟二期。清澗解家溝的聯珠目雷文鼎（《陝銅》一，No.71）猶存二里岡之遺風，石樓後蘭家溝的饕餮文見於斝，花文見於藁城台西三角援戈（《藁城》p.133，圖 110：4），它們的年代或不晚於殷墟早期階段。小屯 M20 可能是乙七基址的祭奠坑，所出馬羊牛獸頭刀當屬於殷墟第四期（石璋如 1959，p.332）。綏德墕頭村隨出的青銅禮器，係商代後期，靈石旌介村 M2 據同出器物推比，最遲不晚於商周之際。以這些標準衡量青龍抄道溝、建平二十家子和張北的年代，大體上也應該屬於商代後期。昌平白浮 M3 出土的馬頭劍和鷹頭劍，據同出器物及木槨的碳十四測年（1120 ± 90 B.C.），應在西周早期。白昌音東犁附近出土的彩繪陶器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此文化年代

地圖一　獸頭刀劍、鈴首刀劍及有銎兵器出土分布圖



延續較久，最遲可到西周。可見從二里岡上層到西周早期，三四百年內，東起遼西，沿燕山南北，長城內外，經山西北中部、到陝西北部，最南抵達安陽〔地圖一〕，這地帶出土柄端裝飾獸頭的武器和工具，最具文化特色。獸頭的動物文飾以馬羊或鹿以及蛇較常見，偶而採取駱駝、牛、龍、虎和鷹做題材。這是中國北方動物文飾第一類組的時空分佈和主要母題。

（二）柄上獸形及「觸角式」的動物文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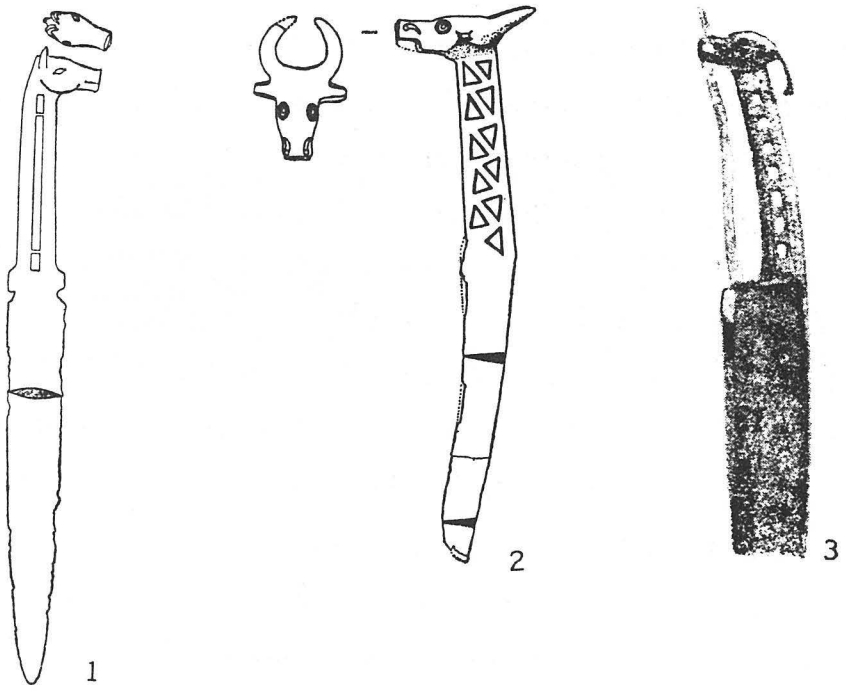
上述昌平白浮M3的馬頭劍和鷹頭劍，獸首與握柄垂直，整隻劍身成一直線，就形制而言，和第一類獸頭刀的弓背或獸頭劍柄與獸首連成弧形者不同，反而與江上波夫、水野清一所著錄的馬頭刀（《內蒙長城》利器集成三：14、17）比較接近。遼寧建平老南船石碰山M741石槨墓出土一把牛首刀（《考古》1983：8, p.683），折背凹刃，牛首中空，犄角實心，鼻孔鏤成月牙形，牛頭延長而爲刀柄、柄兩側陰刻三角文兩兩相對。柄身刻文的風格已顯現第二類組動物文飾的特徵。西安市收購一把羊首刀，雙角略彎曲，柄稍具弧度，羊首與柄之銜接近乎垂直角度，柄上七個長方形透孔一字排開（王長啓1991）。就這些特徵來看，時代當與老南船的牛首刀相近。〔插圖一三〕

第二類組的刀劍和第一類組一樣，全長大約只有30公分，但劍多於刀，野生猛獸略多於家畜；不只裝飾柄端柄身，劍格或刃身亦有動物文。從形制來看，第二類組動物文飾的特徵是：(1)柄端雕鑄動物全形，或立，或蹲，或臥；(2)柄身浮雕動物，上下排列；(3)柄、刃和劍格諸多部位分別裝飾動物文；(4)柄身與柄端合具成一對深浮雕動物；(5)有的柄端雕鑄動物前半身相向成環，謂之「觸角式」，這裡只討論其早期仍保留動物形象的資料，至於後來演化而成雙環的「觸角式」便存而不論。

以上所舉的特徵並不互相排斥，有的刀劍往往同時具備數項，茲分別說明於下：

1. 柄端雕鑄全形動物之文飾

劍柄首端鑄有全形動物者，如河北隆化三道營駱駝梁M8出土之劍是一立體



插圖一三　柄端獸首呈近垂直的兵器或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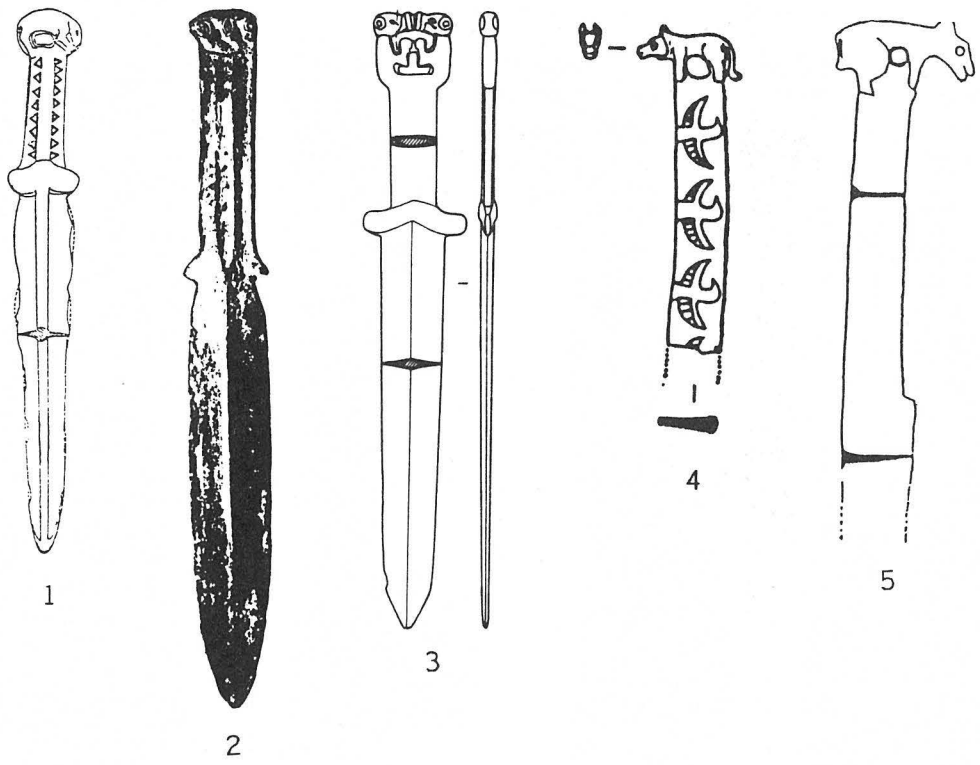
1.昌平白浮　2.建平老南船石砬山M741

3.西安市採集

(1.《考古》1976:4　2.《考古》1983:8　3.王長啓1991)

的熊，熊腹下穿（鄭紹宗1984，圖一：14）。遼寧寧城南山根1958年發現的一批銅器，有兩把青銅短劍，各鑄一動物立於柄端，其中之一可能是熊（李逸友1959a, 圖二：5、6；《內蒙古》No.39），佇立姿態基本上與駱駝梁M8相似。寧城小黑石溝發現的銅刀，柄端裝飾一頭立獸（項春松1984，圖三：2），可能也是熊。北京延慶軍都山玉皇廟YYM95出土的銅劍，柄端鑄一對幼熊，相向而立，嘴吻接觸，前肢作互相拱揖狀，腿下延而成柄身（《文物》1989：8, pp.27-28，圖一七：5）。宣化小白陽M44所出的短劍，劍首似鑄一蛇，蛇頭在中間，蛇身分爲二，向外構成兩個半圓形（《文物》1987：5, p.46，圖一三：1）。河北建平縣採集得到一把殘銅刀，只存柄的一部分，柄端有一全形立獸，柄身一排鴻雁（《考古》1983：8, p.690，圖一三：8）。立獸，報告說是馬，但也可能是狼。另有柄端鑄立式捲角

山羊的青銅刀，北京市揀選一件，其柄一面平素無文，另面突起兩排平行串珠文（程長新 1984）。隆化下甸子墓出土的青銅劍（鄭紹宗 1984，圖一：10）柄端作蹲踞虎形，雖只鑄出虎身前半部，雙足前屈，中部鏤孔，其以踞虎作劍首是很明顯的。〔插圖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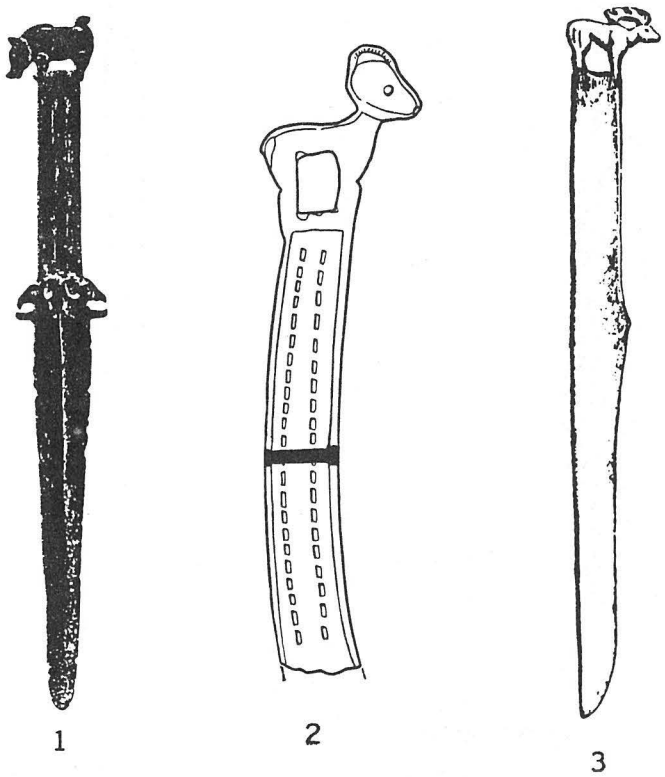


插圖一四　柄端全形動物刀劍之一（考古出土）

1.隆化駱駝梁M8　2.寧城南山根　3.延慶軍都山M129
4.建平縣採集　5.寧城小黑石溝
（1.鄭紹宗1984　2.《內蒙古》　3.《文物》　1989:8
4.《考古》1983:8　5.項春松1984）

這類立獸文飾傳世器物多有之，安特生著錄三件 1926-27 年購於北平的短劍，其一柄首的動物可能是豬，劍格鑄一對開口獸頭；第二件柄端雙馬卷曲，首足相靠，劍格是相背的一對羊頭；第三件柄首佇立一頭貓科動物，劍格二個動物

頭，巨目鉤喙，可能是鷹（*BFEA* 4, Pl.IX：1、2; Pl.VIII：1）。內蒙古博物館收藏有類似的小山羊青銅刀，刃部殘，柄部裝飾兩排長方點花文，據說出於東勝（《鄂爾多斯》p.21，圖一二：1）。這種山羊銅刀，捷克國家博物館東方部（在布拉格）收藏有完整的一件，如出一笵。今日考古資料顯示柄端鑄立獸者劍多於刀，唯羅越著錄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刀有不少係屬於此一形式，全形之立獸有麋鹿、熊與山羊（Loehr 1951，Nos.45、46、49），題材相當多樣化。〔插圖一五〕



插圖一五　柄端全形動物之二（傳世著錄）

1.Östasiatiska Museet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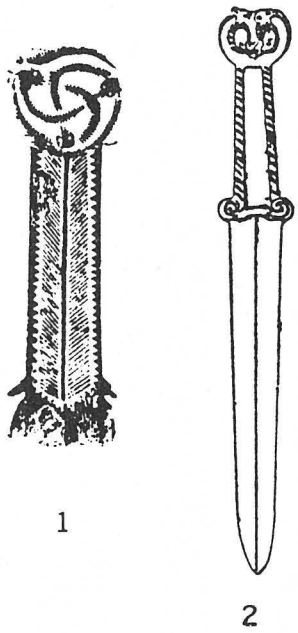
2.傳內蒙古東勝出土

3.Max Loehr著錄

（1.BFEA4　2.《鄂爾多斯》　3.Loehr1951）

南山根M101石槨墓有一銅劍，柄端轉折呈鉤狀，上有三蛇糾結之文飾（《考

古學報》1973：2, pp.32-33，圖五：3）；承德市出土一劍，劍首由三個素體蟠蛇文構成扁圓環，其中一蛇首伸入環中（鄭紹宗1984，圖三：5）；其意匠和柄頂立獸應該是一樣的。〔插圖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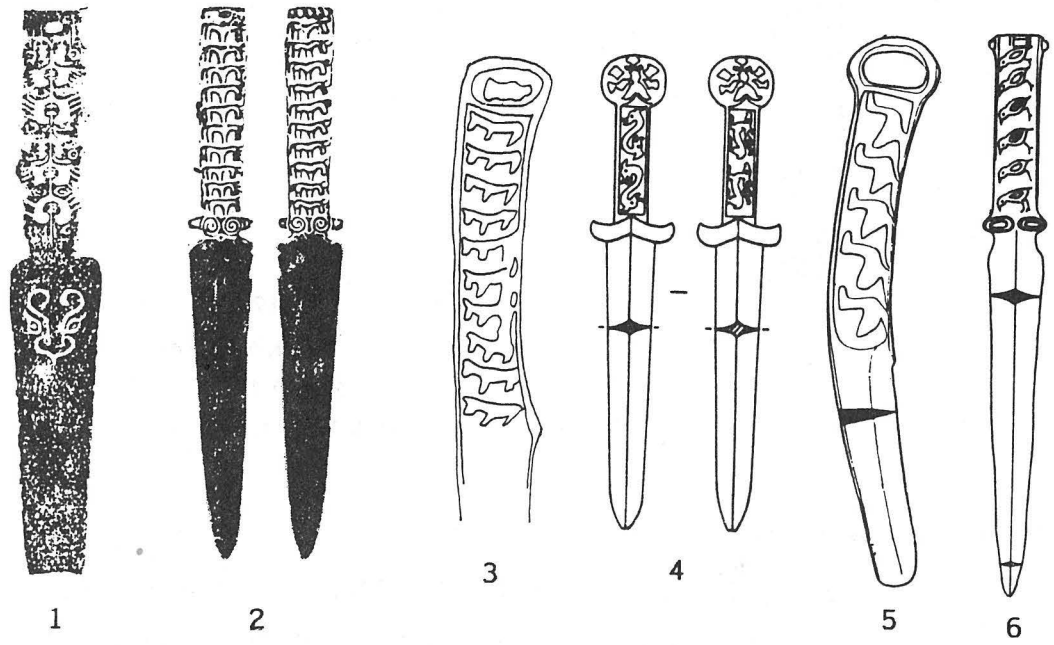


插圖一六　柄端蟠蛇劍
1.寧城南山根M101
2.承德市出土
（1.《考古學報》1973:2　2.鄭紹宗1983）

2. 柄身浮雕動物之文飾

刀、劍等武器柄上裝飾動物文，寶雞西高泉村M1出土一把短劍，殘長22.5公分，依劍刃弧度估計，全長約26或27公分，符合短劍的尺度。劍刃上部有單線勾勒的獸面（？），柄部鏤空，係虎形動物，每邊兩隻，前後相隨左右相對（原報告誤作四個人面）（《文物》1980：9, p.3，圖五）。1958年寧城南山根出土一把銅戈，一節殘刀柄，戈內有四犬疊立之花文（李逸友1959a，圖一；《內蒙古》No. 32）；刀柄上四獸一字並排而立，作回顧狀（《考古學報》1975：1, p.138），有人以爲是馬，有人認爲是犬（靳楓毅1987），從回首側軀斜足的姿勢來看，後者的可能性頗大。河北平泉東南溝M6所出青銅短劍，扁柄，兩面皆鑄十個馬形圖案，由上而下排列（《考古》1977：1, p.53，圖六：1）。南山根M4所出的環首刀，柄部裝飾多達十一匹馬的圖案，馬作側面之形，兩腿一耳，有的腿前伸，尾下垂，

眼呈圓點狀，耳朵豎立（《考古學報》1975:1，圖版七：1、2；烏恩1981，圖二：1）。宣化小白陽M37的短劍，柄部一面夔龍文，一面鹿文，前後各有兩隻動物（《文物》1987：5, p.46，圖一三：7）。環首銅刀有的柄部飾鳥文，或五鴨(?)前後相隨，或一行雁陣（《鄂爾多斯》p. 23，圖一四：6，p.17，圖八：5）。寧城天巨泉M7301出土兩把鳥文短劍，柄鑄凸線鳥文，其一正面六隻背面五隻，另一件正背面皆五隻（《文叢》9，p.30, 圖一二：1）。〔插圖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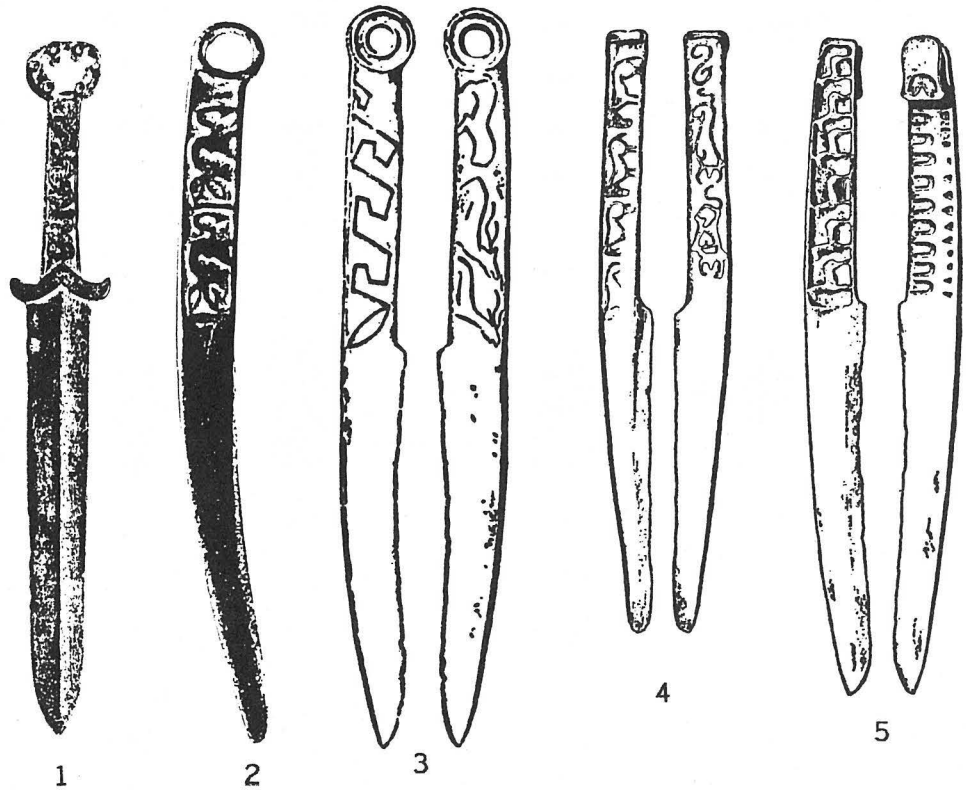


插圖一七　柄身浮雕動物文刀劍之一（考古出土）

1.寶雞西高泉村M1　2.平泉東南溝M6
3.寧城南山根M4　4.宣化小白陽M37
5.鄂爾多斯出土　6.寧城天巨泉M7301
（1.《文物》1980:9　2.《考古》1977:1　3.烏恩1981
4.《文物》1987:5　5.《鄂爾多斯》　6.《文叢》9）

北京市徵集的鳥首鏤空短劍（《文叢》2, p.20，圖一四、一六），柄首橢圓，半浮雕成對視雙鳥，柄身似鏤刻四隻動物，上下並列。陸懋德舊藏一銅刀，柄部一面鑄四隻不知名的野獸（《內蒙長城》利器集成三：22）。安特生著錄兩件短劍和

一把刀，劍之握柄分別鑄三隻哺乳動物的浮雕，推測是「虎」，其一柄端飾蛇，成雙環；另一件柄端由兩隻捲曲動物構成環形（*BFEA 4*, Pl.VIII：3、4）。刀之柄部浮雕四隻角獸，可能是鹿，柄端鑄一人面具，雙目與口穿孔（*BFEA 5*, Pl.I：3），安氏著錄的青銅短刀柄部鑄有動物文飾者，三件寫實，分別是六隻鴨、兩頭野驢和三隻犬（？），另一件文飾簡化，可能是鹿（*BFEA 4*, Pl.IV：1-4）。這種裝飾手法在羅越著錄的鄂爾多斯式之刀和劍皆有之，以馬（Loehr 1951, Nos.30、33、35、55）和狗（Nos.28、29、38）較常見，也有鳥類（Nos.46、47、38另一面）和其他四足獸（Nos.37、39）。江上波夫著錄的中國北方青銅短劍，其中兩把劍柄是「虎」文（《內蒙長城》利器集成二：12、13）。〔插圖一八〕



插圖一八　柄身浮雕動物文刀劍之二（傳世著錄）

1-2 Östasiatiska Museet收藏

3-5 Max Loehr著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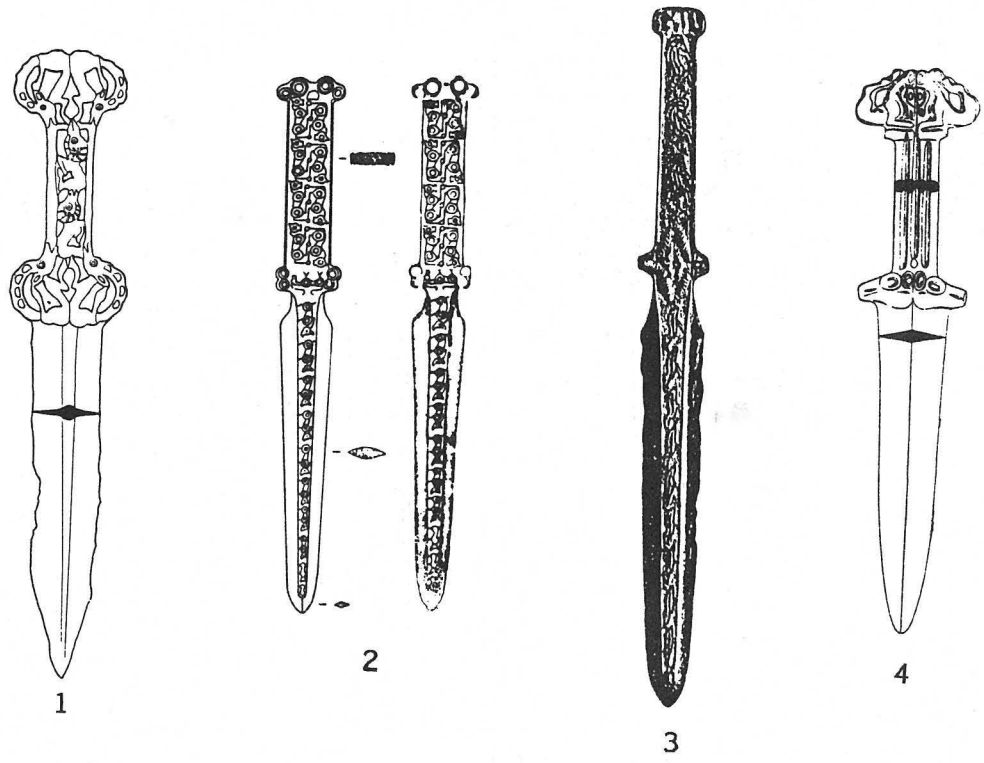
(1-2 BFEA4　3-5 Loehr1951)

3. 柄、刃和劍格多部位之動物文飾

有的北方短劍從柄端、柄身、劍刃以及劍格等部位皆鑄動物文。近年在鄂爾多斯採集的青銅短劍有一把劍首、劍柄及劍格鑄鏤空動物文，頂端兩隻臥鹿，前肢前屈，後肢緊靠頭部，朝下；柄有兩隻匍匐盤羊；劍格也是兩隻鹿，構圖與柄端相似，唯朝上（《鄂爾多斯》p.6，圖二：1）。江上波夫著錄一件短劍，首爲雙鳥頭，握柄可能是蛇，劍格爲一四足獸，似牛（《內蒙長城》利器集成二：15）。甚至有些標本連劍身也有動物文，1973年寧城縣甸子小黑石溝出土者即是典型的例子。該劍柄首可能是雙鳥頭相背，柄身四組八匹首尾對臥的馬文，劍格橫剖面四角爲重圈獸目文；格中鑄牛文，頭上有彎角，尾長而上捲，偶蹄；劍葉正背中脊鑄一列豬文，尾短而上卷，吻長而前撅，偶蹄足，由上而下共十頭（《文叢》9, p.37，圖三二：3、4），安特生著錄一把短劍，劍端兩邊分鑄兩種動物，一邊是鳥，一邊可能是熊；劍柄一邊裝飾四隻鳥，一邊裝飾三頭虎；刃部中間一列鳥，呈帶狀雕飾（*BFEA 5*, p.146, Pl.I:4）。江上波夫著錄的短劍，柄端兩匹後肢翻轉之馬，劍格兩個狼頭（《內蒙長城》利器集成二：14）。〔插圖一九〕兩年後小黑石溝也採集到一把類似的銅劍，唯對動物的認定略有差別，柄身的馬文，報告推測是食肉動物，似豹（項春松1984）。因爲這類短劍的動物文飾已經有點幾何化，不易明確地指認。

4. 柄身與柄端連鑄整體動物之文飾

北方式青銅兵器有一種動物文飾是以整個動物之形鑄成握柄和柄端，上下連成一氣，與前引諸例文飾分開者不同。寧城南山根M101原報告所謂I式之劍之劍柄，飾有對臥的雙虎，虎頭在柄端（《考古學報》1973：2, p.32，圖五：1），寧城汐子北山嘴M7501出土的虎柄劍，整把劍柄以一對臥虎文構成，虎頭在柄端，腹下鏤空，前後肢兩兩相對，虎尾翹捲搭連于劍葉之末（《文叢》9, p.25，圖四：1）。安特生著錄一劍，與寧城這兩件標本一模一樣（*BFEA 4*，Pl.IX：3）。內蒙古敖漢旗周家墓地M31出土一把殘銅刀，翹首，刀脊略凹，刃向外弧，柄作奔兔形狀（《考古》1984：5, p.421，圖九：16）。南山根東區石槨墓五十年代出土一把陰陽劍，劍柄兩面鑄一對男女裸體雕像背部相對，造形完整，體態逼眞（《文叢》



插圖一九　多部位動物文之短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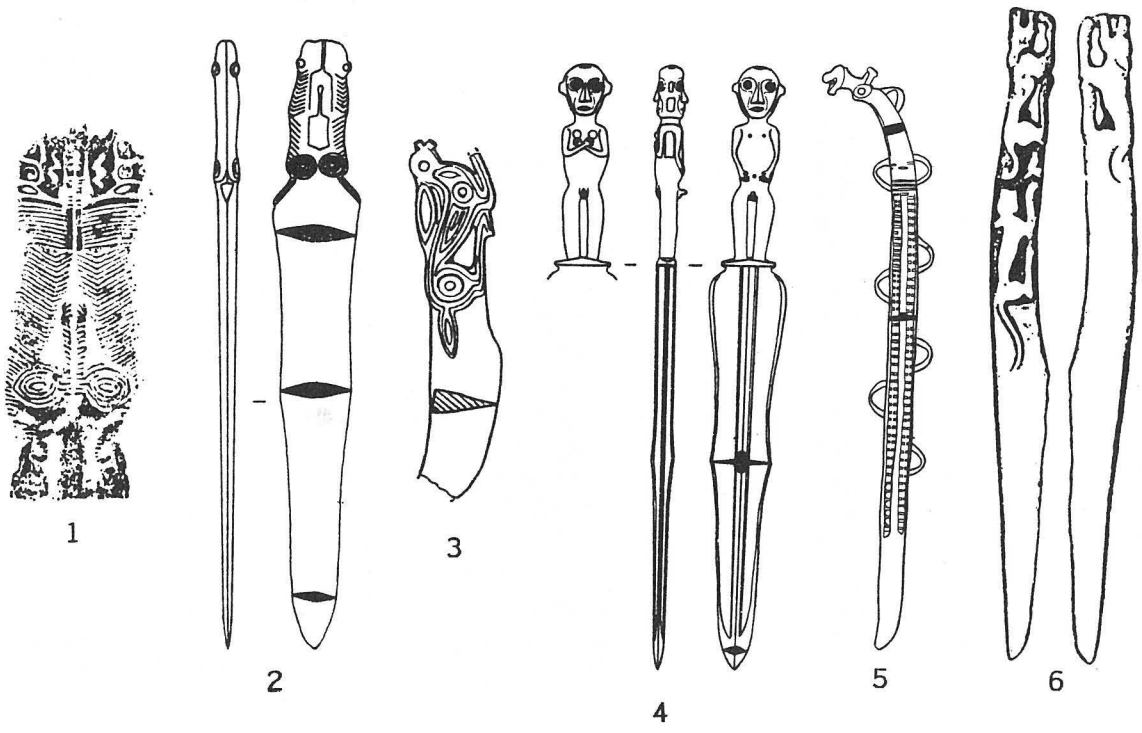
1.鄂爾多斯　　2.寧城甸子小黑石溝

3.Östasiatiska Museet收藏　　4.江上波夫等著錄

（1.《鄂爾多斯》　2.項春松1984　3.BFEA5　4.《內蒙長城》）

9, p.36，圖三一）。准格爾旗蓿亥樹灣採集到一把細長的「龍首匕」，龍首蛇身，兩側有環，匕身飾兩排長方點狀文（《鄂爾多斯》p.24, 圖一七：12），如果柄端認爲龍首不誤，柄亦可以當作龍蛇之身看待的。〔插圖二〇〕

刀劍之柄端與柄身以同一母題構圖者，傳世尚有多件。羅越所著錄「鄂爾多斯式」銅刀標本NO.52，柄鑄二虎，上面那隻頷與腹下鏤空，柄身與柄端的動物連成一體，這樣的造形亦見於標本NOS.42、43、44，動物形象是鹿，但柄身動物文的痕跡較淺；標本NOS.56、57是鷹鷲（Loehr 1951），基本上是獸首刀的造形，但從文飾看，與第一類型寫實圓雕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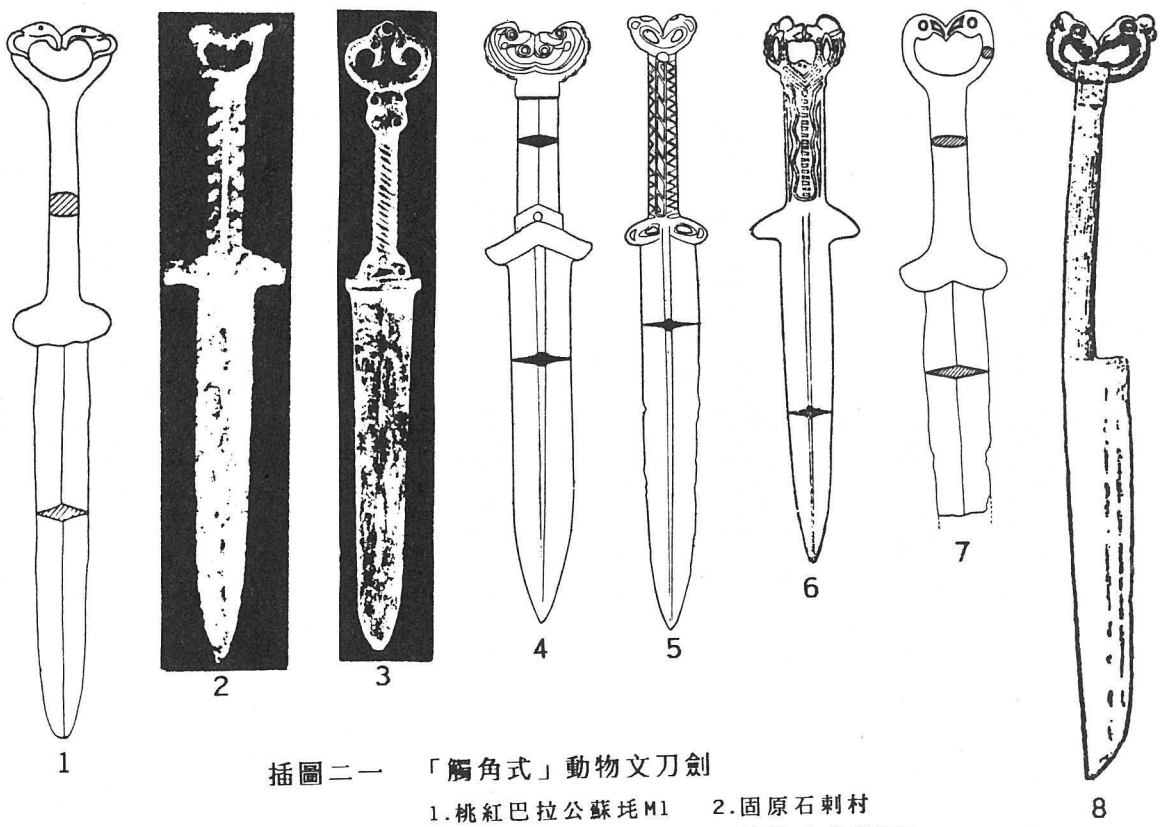
插圖二〇　柄部連鑄整體動物文之刀劍

1.寧城南山根M101　2.寧城汐子北山嘴M7501
3.敖漢旗周家墓地M31　4.寧城南山根東區石槨墓
5.准格爾旗碾房渠　6.Max Loehr著錄
（1.《考古學報》1973:2　2、4《文叢》9　3.《考古》1984:5
5.《鄂爾多斯》　6.Loehr1951）

5.「觸角式」動物文

本類型的獸首刀劍柄端裝飾多以兩個相向（或相背）的獸頭構成，一般呈環狀，通稱作「觸角式」（antennae-style）。河北赤城龍關1959年出土的殘劍，劍首是一變體狼頭（鄭紹宗1984，圖三：7）；內蒙古桃紅巴拉公蘇圪M1出土短劍一把，柄首作兩羊相向狀（田廣金1976, pp.134-135，圖五）。寧夏固原石喇村清理的青銅短劍柄端也是兩個相對連結的羊頭，呈環狀，劍格是兩背聯結的獸頭（羅豐1983，圖版伍：5）。

觸角式短劍的動物文飾多是兩個相對的鳥頭做成扁環，如1971年張家口市出土的標本（《河北》No.205）。內蒙古涼城毛慶溝M59的短劍，柄首鑄兩個寫實鳥頭，相對連結，巨目勾鼻，當屬鷹鷲之屬；同地M70、58、45皆出「觸角式」短劍，鳥頭造形多取尖喙長頸（《鄂爾多斯》p.258，圖三〇：1-4），應屬於鸛鶴之類。寧夏中寧縣倪丁村M1亦出鳥首「觸角式」青銅短劍（《考古》1987：9, p.773）；固原撒門村M3（《考古》1990：5, p.404，圖一：1）的「觸角式」短劍，劍首兩鳥相對聯結，鳥嘴微張，隆額細頸，與頭部構成環。此式短劍在甘肅秦安山王家（《文物》1986：2, p.40，圖一：1）亦皆有出土記錄。〔插圖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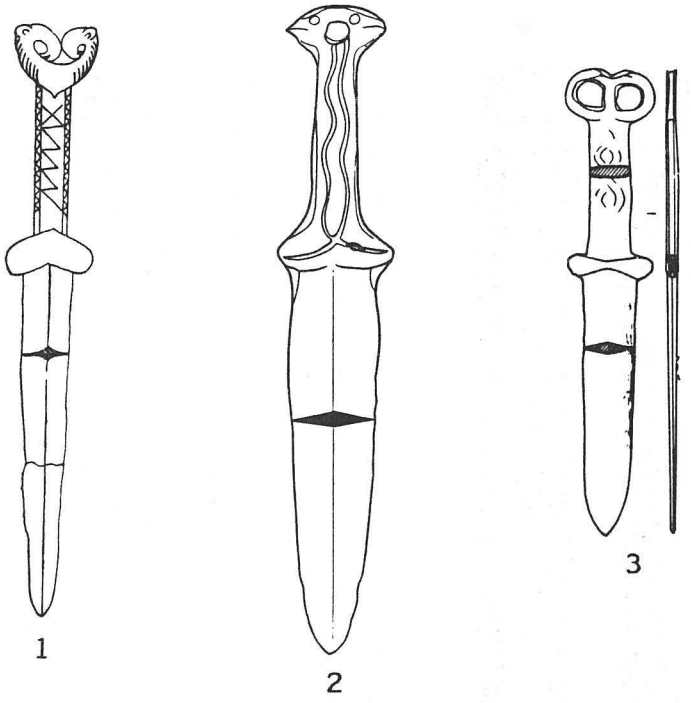


插圖二一　「觸角式」動物文刀劍

1.桃紅巴拉公蘇圪M1　2.固原石剌村
3.張家口市　4.涼城毛慶溝M59
5.涼城毛慶溝M70　6.固原撒門村M3
7.秦安山王家　8.Max Loehr著錄

（1.田廣金1976　2.羅豐1983　3.《河北》　4-5《鄂爾多斯》
6.《考古》1990:5　7.《文物》1986:2　8.Loehr1951）

「觸角式」雙鳥（獸）頭的柄首裝飾一般多見於短劍，羅越著錄一刀用此式題材（Loehr 1951, No.53）〔插圖二一：8〕，是比較稀罕的。而慶陽李溝（《考古》1988：5, p.422，圖一七：1），內蒙古准格爾旗西溝畔M3（《鄂爾多斯》p.360，圖八：2），和延慶軍都山M257（《文物》1989：8, p.28，圖一七：3）的短劍，鳥首或獸首距離寫實風格比較遠。有人認爲雙環首、一字式是「觸角式」的變形（《鄂爾多斯》pp.4-10、39、297），已簡化不成動物文飾，本文不具論。〔插圖二二〕



插圖二二　簡化之鳥獸頭「觸角式」短劍

1.慶陽李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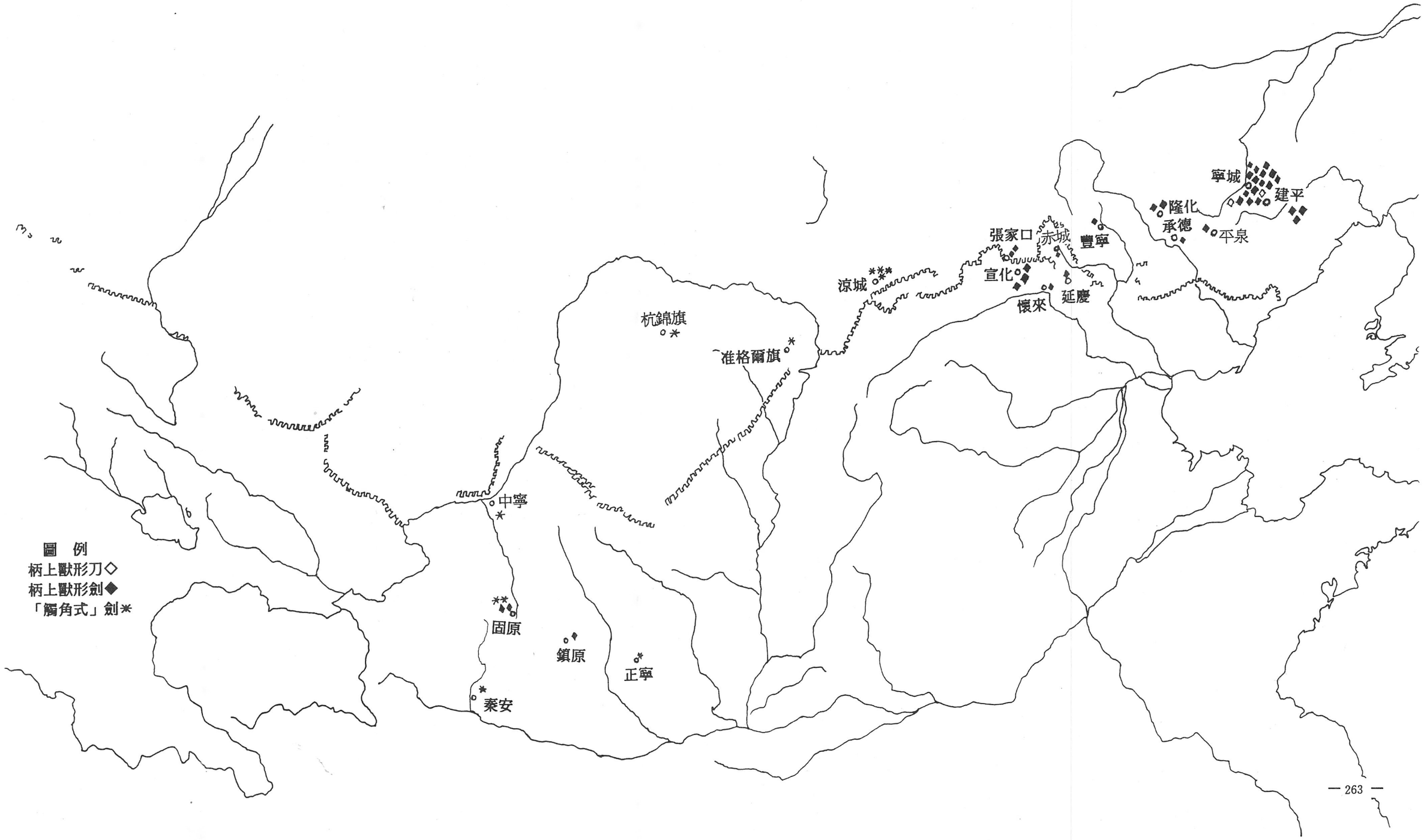
2.准格爾旗西溝畔M3

3.延慶軍都山M257

（1.《考古》1988:5　2.《鄂爾多斯》　3.《文物》1989:8）

第二類組的動物文飾（參附表二）分佈範圍，就今日考古出土的資料而言，東

地圖二　柄上獸形刀劍出土分布圖



起遼西寧城、建平一帶，往西經河北北部的平泉、隆化、豐寧、延慶、懷來、張家口，進入內蒙古涼城、鄂爾多斯，而到寧夏南部的固原和甘肅東部的秦安與鎮原，直到關中西部，從東北斜走向西南的地帶，但大體上落在燕山以北長城以外〔地圖二〕。

上述考古遺址，寶雞西高泉村M1原報告定爲春秋早期，但據同出青銅器，可以提早到西周晚期。寧城南山根M101出土文物相當豐富，報告者據以推斷此墓的年代。青銅禮器如鼎、簋、簠多見於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戈矛形制在虢國墓地也普遍存在。此墓之禮器和兵器亦可看到與洛陽中州路一、二期的特點。上村嶺虢國墓地當西周晚期到東周早期，約西元前九世紀中稍後到七世紀中，洛陽中州路一、二期墓定在春秋初、中葉，所以推測此墓的年代大約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之間（《考古學報》1973：2, pp.37-38）。寧城汐子北山嘴M7501文化性質與南山根M101雷同（《文叢》9, p.40）。南山根M4的銅刀與1958年發現者相似，後者銅戈形式屬於春秋時期，當知此墓與1958年那批動物文飾青銅兵器的時代相近（參《考古學報》1975：1, p.139）。寧城這些文物屬於「夏家店上層文化」，建平石碰山M741、平泉東石溝M6和延慶軍都山M95亦同，它們的年代當據以推斷。其他河北北部零星出土的動物文刀劍，春秋早期如隆化下甸子墓與三道營駱駝梁M8，春秋中晚期如懷來大古城，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如豐寧、張家口、赤城龍關和承德等地的出土（鄭紹宗1984）。內蒙古杭錦旗公蘇圪M1，或定在春秋晚期，毛慶溝墓葬群出土「觸角式」劍者，亦列入第一期，據銅器與陶器形制和碳十四年代推測，約值春秋晚期或稍早（《鄂爾多斯》pp.298-300）。寧夏固原彭堡撒門M3，定在戰國初期以前（羅豐1990），與固原石喇村的羊頭短劍墓時代相近（羅豐1983，原報告被編輯者擅改爲戰國中晚期）。所以動物文飾第二類組的年代大約從西周晚期到戰國中期，即西元前九世紀到三、四世紀之交，而以春秋時代爲主。有人把五鴨環首刀（參插圖一七：5）定在西周時期（《鄂爾多斯》p.35），可能失之過早。第二類組動物文飾就出土地點而言，似乎有從東逐漸往西發展的趨勢。論題材，野生動物不比同時期的家畜少，其中的虎、熊、狼則爲第一類組所罕見，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三）透雕牌飾（帶扣）

第三類組飾牌的動物文（參附表三）主要是平面透雕（間亦有浮雕），用於腰帶和其他披件之裝飾。茲據中國境內考古所出的藝術品，參證著錄收藏，分析它們的文飾，可以歸爲以下三類：

1. 動物形文飾

所謂動物形文飾是指以動物外形作飾牌的輪廓，一般是單體，少數雙體或多體。就中國考古所見，這是比較早的動物飾牌，集中在遼西和冀北，如凌源五道河子、灤平茜子溝、延慶軍都山和宣化小白陽；而內蒙中部的涼城毛慶溝亦有發現，南界可以達到河北中部的唐縣。這些地區所出飾牌多是單體動物形文，屈膝伏臥，正面微凸，動物身上有嵌孔或嵌窩，原來應該鑲嵌玉石片，背有穿紐以便繫帶，常見的動物題材則是虎和馬，也有鹿、羊，或驢、牛，大概多是游牧民族坐騎的佩飾。先說明單體的動物形體文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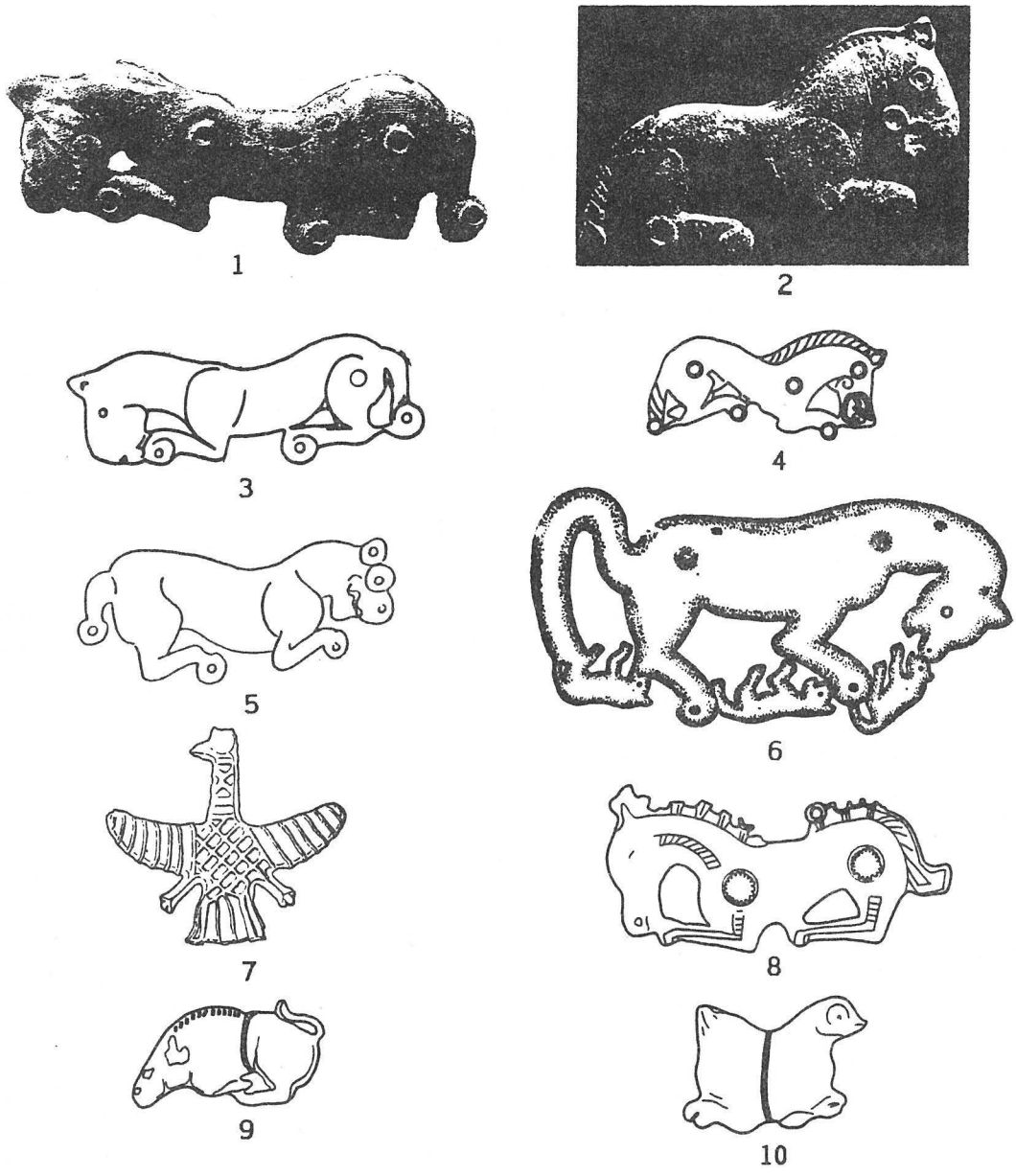
北京市延慶軍都山玉皇廟M129的牌飾鑄成臥虎形，身上、兩足及尾端共有五個嵌窩，背後兩個穿紐。同地M226鑄成臥馬形，頸上留鬃，頸側有轡，尾端挽髻，口角、腿關節、蹄和尾端有六個嵌窩，背面兩個穿紐（《文物》1989：8，p.30，圖版肆：1、2）。宣化小白陽墓葬群的動物形飾牌，形制與軍都山者雷同，發現的動物文有馬、虎、鹿、蛙、鳥五種，蛙飾外廓爲一環形圈，鳥飾可能是小件動物垂飾，茲不具論。虎和馬均是呈伏臥狀，眼、蹄、尾部留有圓形嵌孔。鹿昂首伏臥，長角連於尾，尾部有一嵌孔（《文物》1987：5, pp.47-48，圖一五：3、5-8、15）。灤平茜子溝M18和M16俱出土蹲踞虎形牌飾，耳、目、前後蹄與尾端皆有嵌窩（《文物》1984：2, pp.45-46，圖七：2、九：4）。新樂中同村戰國早期墓出土的虎形鎏金銅飾片，虎作立狀，俯首垂尾，口與前肢，尾與後肢以及兩肢之間連繫三隻小虎（《考古》1984：11, p.972）。唐縣釣魚台石槨墓出土的虎形金飾牌，眼、耳、肩、臀、蹄、尾皆有嵌孔，有些尚存留綠松石片（《河北》No.170），可以證明上述各件的嵌窩或嵌孔原來鑲有玉石。寧城南山根M4出土17件鳥形銅飾牌，雙翅展開，正面鑄線文以象羽毛，頭部背面有一鈕（《考古學報》1975：1, p.136，圖一九：5）。遼西凌源五道河子出土的單體動物文飾牌以馬形居

多數，見於M8、M9、M10，基本上作蹲伏姿勢，立耳垂尾，四蹄前伸，有的肩臀分別刻有圓形花文圖案。M8還出土雞形銅牌，昂首翹尾肥臀蹲踞，是寫實的母雞。M1出一金牛牌飾，長喙捲尾怒目，作低首前衝狀（《文物》1989：2, pp.53-60，圖八：17、21、24、13、16）。這裡所出飾牌皆無嵌孔，原來不鑲嵌玉石，但M8和M10馬牌肩臀部位的圓形花文圖案應是鑲嵌玉石的遺意。〔插圖二三〕

此類飾牌今日可以確定之地點，除西安市收集的一件「豹牌飾」（王長啓1991）（形制基本上與軍都山玉皇廟相似）外，大概多見於內蒙中部呼和浩特以東地區。五十年代以後在鄂爾多斯也採集到一些單體動物形飾牌，題材不外是鹿、虎和馬（《鄂爾多斯》p.89，圖五八），嵌窩安置的方法和軍都山YYM129完全一致，但一般而言內蒙所出單體動物形之飾牌不論取材或造形更透露草原游牧文化的氣息。呼和浩特市區曾出土一件鹿形銅飾，長角健肌，昂首屈足，若奔馳狀（《內蒙古》No.44，李逸友1957）。

T. J. Arne著錄一件馬形飾牌，目、肩、臀、蹄各有嵌窩，傳出自宣化（Arne 1933, Pl.X：10），與今日延慶、凌源所出者雷同；另外三件傳亦出於宣化（Pl.X：11、12、15）則與上舉宣化小白陽、灤平茜子溝和唐縣釣魚台相似。邦克著錄一件鎏錫虎文飾牌（*ACOB* No.199），佇立垂尾，與毛慶溝出土者絕類。盧芹齋收藏單體動物形飾，或蹲伏，或站立，或留嵌孔，或純素無鑲痕（*SSA*, Pl. IX-XIV）。傳世品題材的種類，虎形佔相當比例，其次是鹿與羊，也有驢和牛。瑞典東方博物館收藏此類飾牌之動物，亦不出馬羊鹿，其中一件回首臥馬，肩臀各有嵌窩（《內蒙長城》Fig. 73:1），鑲玉手法與軍都山出土者相似，眼睛部位留下嵌窩，原來也鑲有玉石。〔插圖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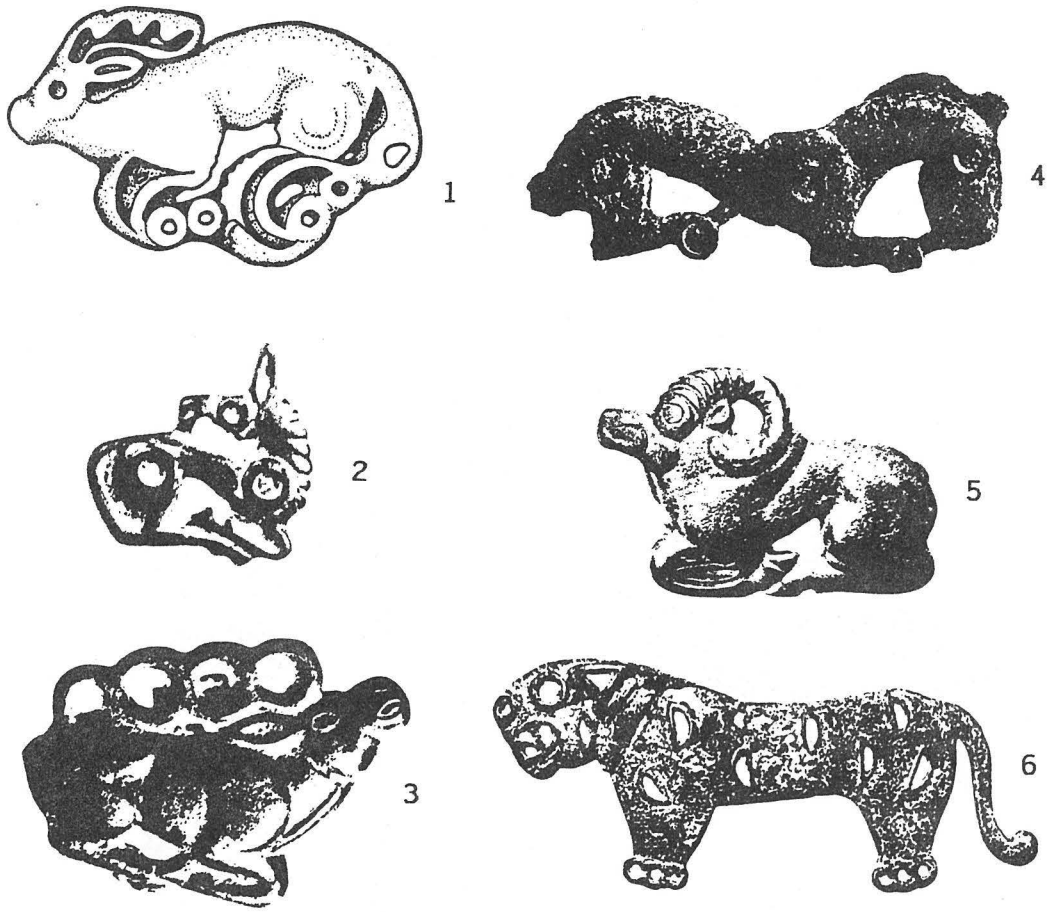
關於雙體或多體的動物形飾牌，遼寧朝陽十二台營子M1出土兩種飾牌，一種左右二狼，中間夾一狼頭，極其寫實；另外一種中間人面，周環二蛇（朱貴1960，圖四：6、2）。著錄所見二體動物形牌飾，或上下疊立之鹿或馬（*SSA*, Pl.IX：4、X：6），或前後交合之鹿（*ACOB*, No.210），以及小鹿吮乳（同上，No. 209），涼城蠻汗山亦出一件母子鹿牌（《鄂爾多斯》p.90，圖五九：4），內蒙博物館收藏一件雙豹奪鹿牌，二豹左右並列，中夾一長耳鹿（同上，圖五九：9）。這



插圖二三　單體動物形文飾牌之一（考古出土）

1.延慶軍都山M129　2.延慶軍都山M226
3.宣化小白陽M20　4.宣化小白陽M22
5.灤平茜子溝M18　6.新樂中同村
7.寧城南山根M4　8.凌源五道河子M8
9.凌源五道河子M1（金）　10.凌源五道河子M8

（1-2《文物》1989:8　3-4《文物》1987:5　5.《文物》1984:2
6.《考古》1984:11　7.《考古學報》1975:1　8-10《文物》1989:2）



插圖二四　單體動物形文飾牌之二（採集著錄）

1-2 《鄂爾多斯》P.89　3.呼和浩特採集

4. T. J. Arne著錄　5-6 盧芹齋舊藏

（1.《鄂爾多斯》　2.《內蒙長城》　3.《內蒙古》

4.BFEA5　5-6 SSA）

些飾牌之輪廓皆取象於動物眞形，和外加方框者不同。〔插圖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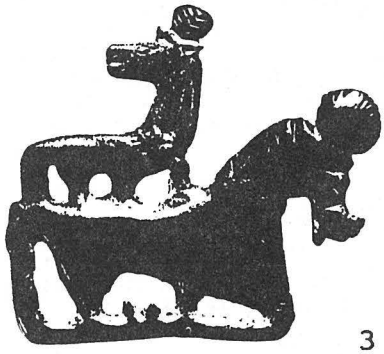
就飾牌形制而論，動物形和長方框這兩種飾牌間有過渡的形式。涼城毛慶溝M55出土一件虎形銅牌，背面有鈕，正面猛虎，四肢佇立，右前肢抬起，頭前伸，張嘴露齒，細腰肥臀豎耳，垂尾。前肩部位有一大圓孔，以便結於腰帶（《鄂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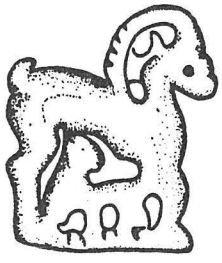
2



3



4



5



6

插圖二五　雙體或多體動物形飾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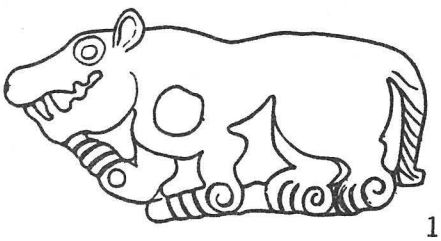
1-2 朝陽十二台營子M1　3-4 盧芹齋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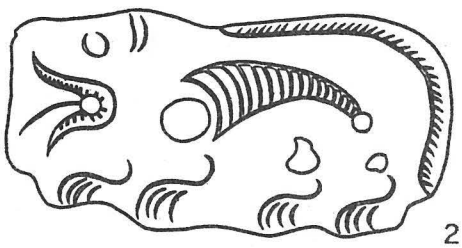
5.涼城蛮汗山　6.內蒙古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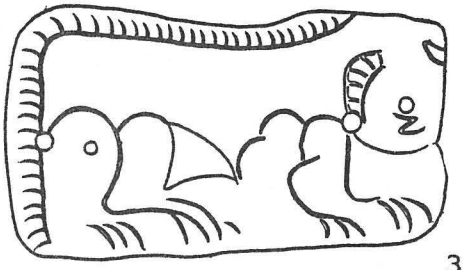
（1-2 朱貴1960　3-4 SSA　5-6《鄂爾多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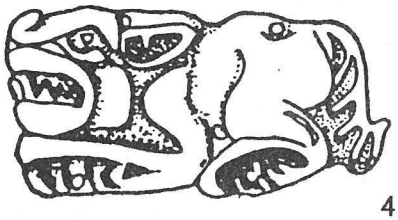
多斯》pp.280-281，圖四五：2）。M74的虎形牌作半蹲踞狀，張嘴露齒，尾上翹平貼於背，刻有成排的陰線文，腹部亦有刻文，前肩、虎口和臀部分別留有大小圓孔（同上，圖四五：3）。這個牌飾介乎虎形與虎文之間，老虎之口舌齒牙與耳朵皆以刻文表示，長尾上貼虎背，頭前尾後，上面的背部與下面的四肢和足爪構成長方形，外圍輪廓已看不出動物的形狀。這個標本若再規整化便是M5出土的兩件飾牌（同上，圖四五：1），呈長方形，正面以陰線文刻畫出虎的形象，虎作半蹲踞式，頭部近於正方，眼嘴皆不顯，僅具象徵意義，牙齒以鋸齒刻文表示之。這種飾牌是動物形體飾牌的簡化，和外加方框者（下詳）已經沒有太大差別。此外鄂爾多斯杭錦旗桃紅巴拉阿魯柴登發現的虎文與大角盤羊金飾片，虎伏伺，前後肢向前屈，張口露牙，尾下垂；羊首回顧，前後肢內屈臥伏（《鄂爾多斯》p.346，圖三：4、11）。這兩種飾片雖是單體動物，形象比毛慶溝M5的虎牌明晰，但造形長方，亦近於外框飾牌之類。〔插圖二六〕

上述濮平苘子溝出土的銅刀，鄭紹宗列作河北所出北方式銅刀劍第五期，約當春秋中晚葉，即西元前七至五世紀初（鄭紹宗1984），延慶軍都山玉皇廟M129同出雙環首青銅短劍，據田廣金、郭素新所論北方青銅短劍發展系列，屬於DⅢ式，定在戰國早期（《鄂爾多斯》pp.7、14）。宣化小白陽墓葬群的年代，原報告認爲上限可能早到春秋，下限不晚於戰國早期。新樂中同村出土的鼎、甑、豆，報告者以爲與洛陽中州路M2717和河北滿城戰國早期墓所出相似，故定在戰國早期。唐縣釣魚台石槨墓大約戰國時代，也可能早到春秋（《河北》p.46）。寧城南山根M4屬夏家店上層文化，報告者定在春秋時期（《考古學報》1975:1, p.139）。凌源五道河子M8所出戈的形制與喀左南洞溝石槨墓相似，後者年代爲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文物》1989：2, p.61），朝陽十二台營子墓的年代亦不出於此一階段（《考古學報》1960：1, p.70）。毛慶溝M55、M74、M5，原報告屬於第一期，年代相當於春秋晚期或稍早（《鄂爾多斯》p.300）。大體上單體動物形牌飾開始流行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使用地區從遼西向西，經燕山南北到鄂爾多斯，偏於燕山南北，內蒙中部以東〔地圖三〕。後來向西影響，如寧夏同心縣倒墩子M10的銅馬飾牌（《考古》1987：1，圖版參：3），彭陽溝口姚河村的獅飾牌


1


2


3


4


5

插圖二六　介乎動物形與方框之飾牌

1.涼城毛慶溝M55　2.涼城毛慶溝M74

3.涼城毛慶溝M5　4-5 桃紅巴拉阿魯柴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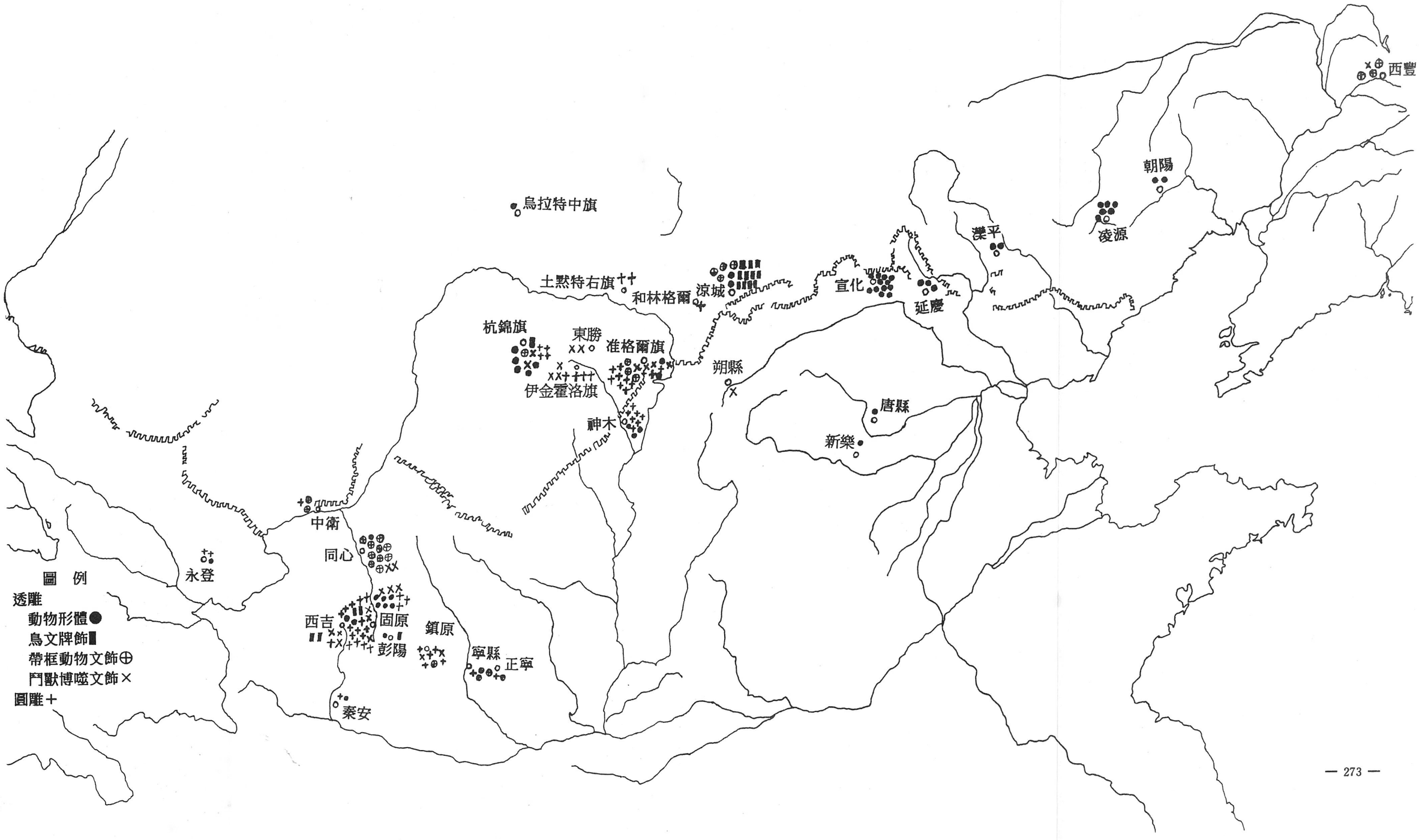
（《鄂爾多斯》）

（《考古》1990：5, p.413，圖一二：4）輪廓亦作馬、虎之形，姚河村的虎或許遲至西漢，而倒墩子的馬，蹄葉形，該墓出五銖錢（《考古學報》1988：3, p.354），時代可以晚到西漢中晚期。〔插圖二三：11-12〕所以動物形體的飾牌使用的時間頗長，地域亦廣，但據今日的考古資料，漢代比較零星。

2. 帶框之動物文飾

帶有外框之動物飾牌的特色，是動物形透雕的周圍係一長方形框，框內動物往採取左右（或上下）對稱之構圖，以兩個同種類同大小的動物爲主體。有的四個一組，上下左右皆對稱，似「田」字形；有的三個相同動物，左右或上下一字排開，據今日資料，後兩種比較少見。框內動物對稱並立，平和相處，但也有搏噬打鬥的畫面，將在下節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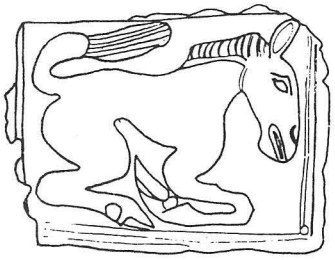
地圖三　透雕與圓雕動物文飾出土分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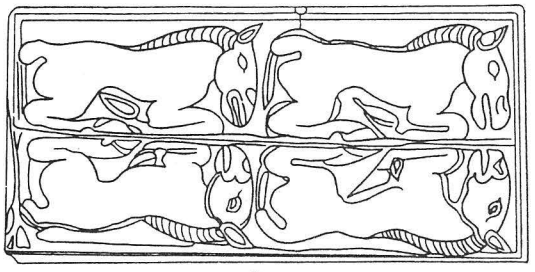
此類動物文飾經過科學發掘者不多，今日所見只有內蒙古准格爾旗西溝畔、察後旗二蘭虎溝、遼寧西豐縣西岔溝和寧夏同心縣倒墩子數處而已，西安亦有報告，屬於收購品；大體上從東到西，分佈地域相當遼闊，屬於中部地帶的是西溝畔和二蘭虎溝。西溝畔M2出土爲數不少的動物文飾牌，按動物之類別有鹿、馬和不知名的野獸（《鄂爾多斯》pp.354-357）。臥鹿文飾牌，長方形，框內鹿形圖案，四肢內屈，枝狀角從頭頂伸至尾部（同上，圖四：2）。此件標本雖然一框一鹿，因兩框合成一個單位，鹿背上下相對，可以算作外框雙獸飾牌。臥馬文飾牌，有一框一馬、雙馬和四馬三種（同上，圖四：5、圖五：5、圖四：6），後兩種皆四肢內屈，頭或身相向對稱。不知名雙獸文飾牌，方形框內一對臥獸，屈肢前伸，尾上捲（同上，圖三）。以上各種飾牌皆用薄金壓成，一般習知的帶框動物飾牌則多爲銅質。

二蘭虎溝發現雙鹿、三鹿和雙龍文飾牌，長方形框內透雕雙鹿，面面相對；三鹿一字排開，頭皆後顧；雙龍相背，頭朝外，身交叉（《內蒙古》Nos.53-55，《鄂爾多斯》p.84）。西岔溝出土帶框之動物文飾牌有雙牛、雙馬、雙駝和雙羊等題材（孫守道1957、1960）。倒墩子M1出土雙龍、雙羊和雙駝飾牌，雙龍昂首對峙，雙羊相背，雙駝頭吻朝下，相向佇立。M22也出土佇立雙駝透雕，唯殘缺一半（《考古學報》1988：3, p.344；《考古》1987：1, p.33，圖版參：1、4、6）。甘肅華池縣東華池豹子川王家街子發現一件透雕金飾牌（黃曉芬、梁曉青1985），四周有框，上下框內各有一行乳丁文。此牌之文飾大抵左右對稱，中間一個凸起的小鹿頭，左右各一隻四足獸，瞪目張口，面面相對，前肢交叉，後肢略曲，呈現動感，四足獸之背上各立一鳥，昂首翹尾。這些標本與西安收購的雙駝、雙羊及雙怪獸長方形牌飾（王長啓1991）相似，也都可以從傳世的收藏品得到印證。〔插圖二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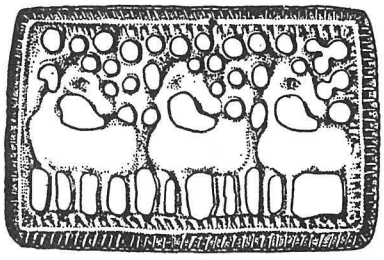
二蘭虎溝的雙鹿及三鹿飾牌，盧芹齋舊藏各一件（*SSA*, Pl.XXVIII：6、5）；後者瑞典東方博物館亦有收藏（參《內蒙長城》Fig. 73：19）。框沿陰刻短斜線文的作風，著錄也與考古發掘品大致一樣。盧氏有一件雙鹿飾牌，鹿尾相抵，側身正面，框沿裝飾凹葉文（*SSA*, Pl.XXVI：2），從動物造形和框治文飾看，與雙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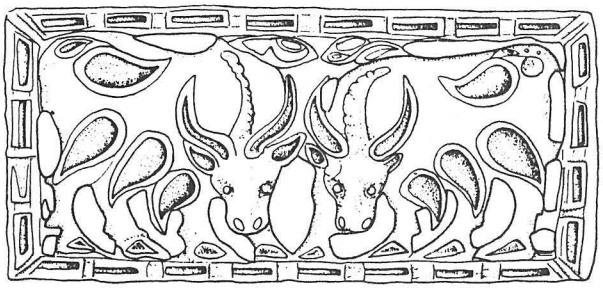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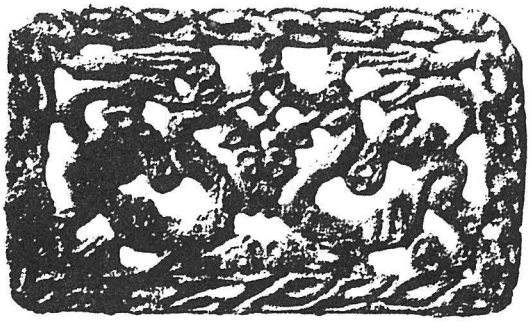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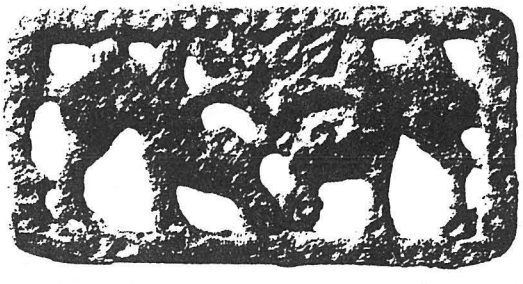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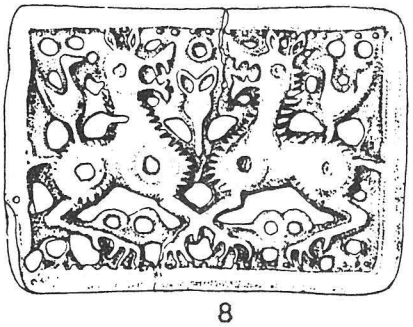
5



6



7



8

插圖二七　帶框動物文飾牌之一

1-2 准格爾旗西溝畔M2　3.察後旗二蘭虎溝

4.西豐西岔溝　5-6 同心倒墩子M1

7.同心倒墩子M22　8.華池豹子川王家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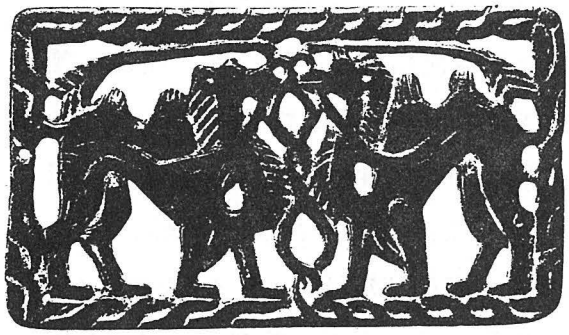
(1-4《鄂爾多斯》　5-7《考古》1987:1　8.黃曉芬、梁曉青1985)

飾牌極近似。二個牛頭正面並立，牛身則作側面，左右分開，蹄、腿、和腹背皆綴以對稱的凹葉文。盧芹齋舊藏一件（*SSA*, Pl. XXVI：3），邦克先後著錄過兩件這種飾牌（*ASA*, No.127; *ACOB*, No.222），與西岔溝所出幾乎一模一樣。雙馬、雙羊飾牌原報告未詳，前者盧氏收藏一件（*SSA*, Pl.XXV：6）邦克也著錄過一件（*ASA*, No.126），據傳出於鄂爾多斯，兩匹馬頭頂著頭作嚙草狀；後者盧氏舊藏兩件，一件相向，一件相背，皆大角盤羊。相向者眼睛留孔，原來可能鑲嵌玉石，框沿陰刻短線；相背者羊蹄及背上填補凹葉文，邊框作矩形（*SSA*, Pl.XXVIII：4、XXVI：1）。就西岔溝同出雙牛飾牌的風格推測，雙羊應該近於盧氏所藏相背的那件標本。雙駝飾牌西岔溝所出者駱駝仰頭相對，口銜長索，極盡飄逸之致（參《鄂爾多斯》p.77，圖四五：3）；倒墩子的標本則作俯首覓食狀，這兩種造形盧氏皆有之。至於倒墩子M22那件殘缺雙駝透雕飾牌，我們也可在盧芹齋的藏品中找到原貌（*SSA*, Pl.XXVIII：2）。安特生早年著錄過一件雙雁交頸銅飾牌，框沿矩文（*BFEA 5*, Pl.IX：1），考古則尚未發現。〔插圖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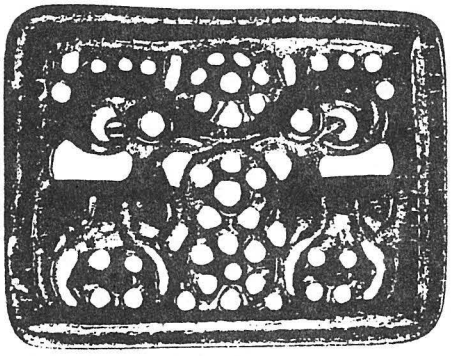
西溝畔M2出土的金銀器有漢字刻款，如重量單位「朱兩」，官司「少府」、「寺工」等字樣，其書法風格接近秦篆，報告者推測M2年代當在戰國晚期（《鄂爾多斯》p.364）。遼寧西岔溝墓葬群同出大批漢族文物，其中銅鏡以西漢初期鏡式最多，五銖錢沒有宣帝以後的款式，報告者估定此墓地的年代相當于漢武帝到昭帝時期（孫守道1960）。寧夏倒墩子出土的五銖錢形制接近滿城漢墓Ⅱ式五銖（《滿城漢墓發掘報告》p.210），故其年代約當武帝時期或稍後。大體上，帶框動物飾牌之流行時代不可能早於戰國中期以前，比上述第一類動物形體飾牌爲晚，二者也許有某些重疊時段，不過今日考古所見，這兩類並存的例子並不多。分佈範圍第二類比第一類遼闊，東起遼寧，西至寧夏，不再侷促於燕山南北地帶（參地圖三），這些現象都相當程度地反映北疆地區政治形態的轉變，下文將有所說明。

3. 鬥獸搏噬文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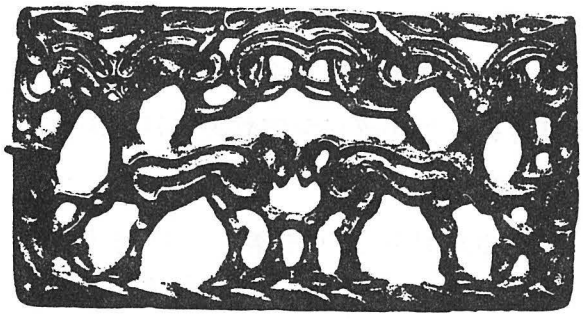
肉食猛獸攫噬草食動物，或猛獸互鬥是北方動物文飾牌最具特色的藝術，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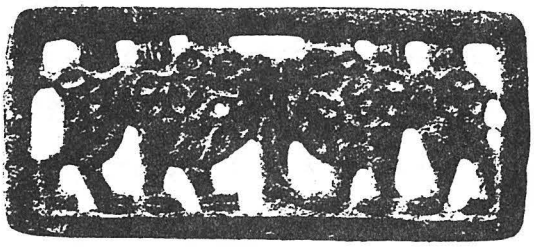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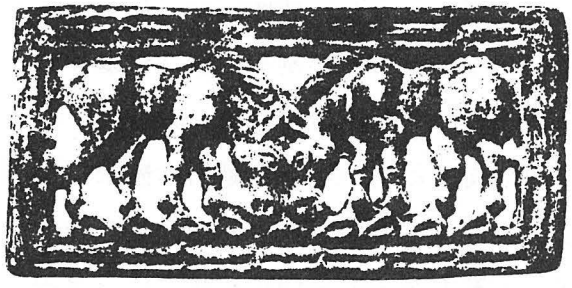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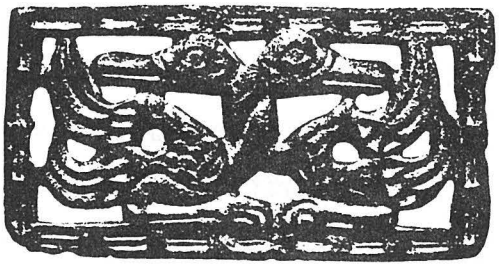
2



5



3



6

插圖二八　帶框動物文飾牌之二（傳世著錄）

1-5 盧芹齋舊藏　　6.Andersson著錄

(1-5 SSA　6.BFEA4)

其形制，可以分作三式討論。

（3.1）第一式：飾牌輪廓保持動物形狀

鬥噬文飾以猛獸吞食弱小動物的題材最爲常見，主要發現於內蒙古，即舊傳鄂爾多斯地區，近年寧夏也有頗多報導。伊金霍洛旗石灰溝（推測可能是墓葬）出土的虎咬鹿文銀飾牌，虎鬃長披，虎口大張，鋒利的虎爪踏住一鹿之背，鹿作掙扎逃脫狀（《內蒙文考》1992：1/2, p.91）。涼城崞縣窯子M12出土二件猛虎撕咬山羊飾牌，上端一虎低頭垂尾，後足踏住一頭山羊，前爪作撕裂狀（《考古學報》1989：1, p.67，圖一一：10）。准格爾旗瓦爾吐溝發現一個銀項圈，一端裝飾虎咬羊之動物文（《鄂爾多斯》p.66，圖版五五：1、2）。桃紅巴拉阿魯柴登的銀飾片，有一件野狼背鹿（《鄂爾多斯》p.346，圖三：2），鹿體委頓，頭頸垂掛在狼背上，蓋成爲野狼之獵獲物矣。寧夏彭陽新集鄉白楊林村出土虎噬羊牌，猛虎佇立，其背部加鑄一個鳥頭，虎張開巨口，銜住一頭曲體小羊，羊雖作奔躍狀，終難逃虎口（《考古》1990：5, p.412，圖一二：1）。西吉新營陳陽川村亦出類似銅牌，唯羊之造形較爲模糊（《考古》1990：5, p.411，圖一二：2、3）。這裡一座出土馬、牛、羊頭骨的豎穴墓也發現一件猛虎噬鹿銅飾牌，虎作站立狀，左前爪搭於鹿肩，張口咬鹿背，右前爪踩另一幼鹿（延世忠、李懷仁1992）。虎加飾怪獸母題，下文將有所討論。甘肅慶陽吳家溝圈採集的浮雕猛虎食羊飾牌，羊四肢屈跪在地、頭上仰，正在虎口下；老虎意態悠閒，食羊若探囊中物，不費吹灰之力（《考古》1988：5, p.419，圖一四），刻劃比西吉新營陳陽川的虎噬羊飾牌清晰。相似題材亦見於西安市西郊西電公司出土的虎咬馬飾牌，虎巨目大耳，長尾捲至項背，口銜馬頸，馬之頭耳四腿下垂成死狀（王長啓1991）。盧芹齋舊藏類似題材的飾牌數件，除虎噬羊外，有虎噬牛（*SSA*, Pl. XXIV：3-5），而虎背鑄鳥頭的作風與白楊林那件標本一致；也有老虎搏噬偶蹄動物的母題（*SSA*, Pl. XXIII:7）。邦克著錄的飾牌和帶扣，動物題材有虎噬鹿、虎攫羊、狼噬鹿、狼噬羊（*ACOB*, Nos. 150、197、198、206、207、208）數件。

鬥獸文飾亦常見兩雄相爭的場面，上述伊金霍洛旗石灰溝的墓葬也出土雙虎

咬鬥銀扣飾及銀飾牌，基本上維持動物外形之輪廓。扣飾近圓形，雙虎屈身相向，左右對稱；飾牌呈長形，雙虎前爪互抱，口咬對方肩部。甘肅慶陽塌頭出土一件飾牌，雕刻龍虎搏鬥文，主體是猛虎，虎口叼一龍蛇，尾捲貼背，虎身爲四條龍蛇所盤繞（《考古》1988：5, p.422，圖一七：3）。類似題材與構圖，邦克著錄過一件（*ASA*, No.105），據傳出於榆林府。榆林地區收藏的「匈奴文物」有刺蝟與蛇咬鬥之銅帶扣，蛇身前部從刺蝟身下尾部伸出，繞成半環形勾，頭咬住刺蝟右後腿。蛇尾纏彎于刺蝟之前，刺蝟弓身，前爪掀住蛇身，張口咬蛇。這些都是爬蟲類與四足動物搏鬥的題材（盧桂蘭1988）。〔插圖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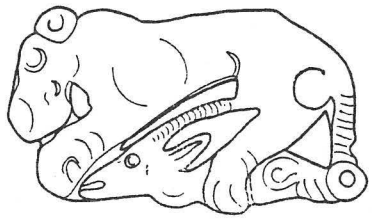
（3.2）第二式：橫B字形

攫噬或搏鬥的飾牌，主體動物之四足一般皆站立，構成底邊。如果加重底邊，四趾連成一線，便造成邊框的效果，而在垂直方向設計成半圓形，上面和另一邊維持動物身體之形狀，就成爲第二式的鬥獸搏噬文飾，通常稱作橫B式、Rho式或P式，這名稱是從飾牌輪廓的外形得來的。橫B式造形的來源雖不可考，恐怕和鷹鷲與四足獸的搏擊有關，飛禽展翅的形狀很容易成爲半圓形的靈感。遼寧西豐縣西岔溝發現的鷹虎搏鬥飾牌（《鄂爾多斯》p.94，圖六三：1），大鷹展翅，即占據橫B形的半圓空間。後來沒有鷹鷲的搏噬也採用此形，如寧夏固原楊郎蔣河之墓葬出土兩件此式帶扣，作猛虎搏噬野驢之圖案，虎佇立，咬住驢頸，驢首下垂，前肢微屈，後肢彎曲搭在虎頸上，形成一個半圓（《文物》1978：12, p.86，圖一；《鄂爾多斯》p.94, 圖六二：1）。涼城崞縣窯子亦出一帶扣，虎露出兩顆利牙，張口叼住驢的脖子，驢身拳曲，硬被弔起作半圓狀（《鄂爾多斯》p.94，圖六二：3）。西岔溝的獸咬怪馬飾牌，一獸從前撲來，咬住怪馬前膝，怪馬則以尖喙咬獸之頸，自鬃至額散射出樹狀鳥頭，構成半圓形（孫守道1960；《鄂爾多斯》p.96，圖六四：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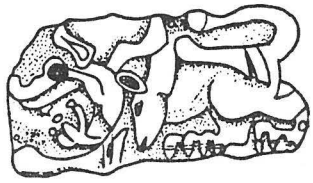
此式文飾著錄經常可見，瑞典東方博物館藏猛虎噬羊帶扣（《內蒙長城》Fig. 74：2）、盧氏舊藏猛虎噬驢牌和獅噬羊牌（*SSA*, Pl. XXIV：1、2），雖然輪廓維持動物眞形，但已趨向橫B字形發展，可以列入第一式與第二式的中介，邦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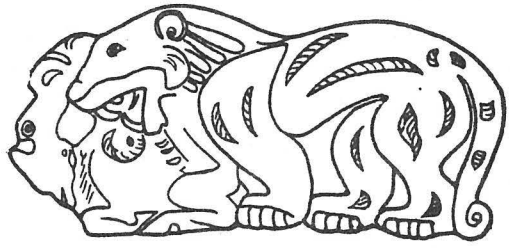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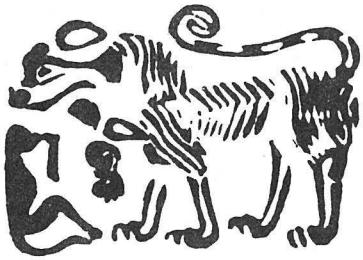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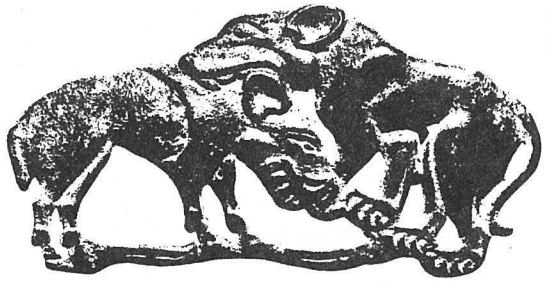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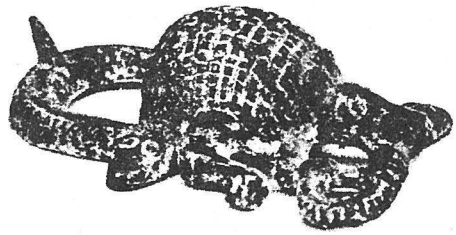
5



6



7



8

插圖二九　鬥獸搏噬文飾牌(或扣帶)之一(飾牌輪廓保持動物形狀)

1.伊金霍洛旗石灰溝　　2.涼城崞縣天子M12

3.桃紅巴拉阿魯柴登（銀）　　4.西吉新營陳陽川

5.西安市西郊西電公司　　6.盧芹齋舊藏

7.慶陽塌頭　　8.榆林地區

(1.《內蒙文考》1992:1、2　2-4《鄂爾多斯》　5.王長啓1991

6.SSA　7.《考古》1988:5　8.盧桂蘭1988)

錄的虎叼驢牌（*ASA*, No.123）亦屬之。而她另外著錄的虎噬驢帶扣（*ACOB*, No. 216）、獸咬怪馬牌（*ASA*, No.124），瑞典東方博物館的鷹啄馬或虎（《內蒙長城》Fig.74：4、5）以及盧氏虎鷹相搏牌（*SSA*, Pl.XXII：1）則是典型的第二式。安特生著錄的虎噬駱駝飾牌（*BFEA 5*, Pl.IX：2），雖構成兩個大小不等的半圓形，亦屬於橫B式飾牌的構圖。此式文飾還有禿鷹、猛獸和弱小動物三者互鬥的畫面，其構圖格式往往是猛獸咬住屈服在地的弱小動物的頸項，禿鷹利喙又扣住猛獸之頸，老鷹展翅搏擊，足踏弱小動物之脊背，以鷹翅構成橫B字的上端弧線。科學發掘者陝西銅川棗廟M25出一件（《考文》1986：2, pp.9-10，圖四：17），傳世品則頗不少（*ASA*, No.125; *ACOB*, Nos.216、217；《內蒙長城》Fig.74：5）。〔插圖三〇〕

有一種橫B字形飾牌以人物車馬爲母題，西岔溝出土一件驅車飾牌，林蔭下立一披髮車夫，杖劍在前，頭回顧，後有三馬拉一篷車，車內坐二人，似經林下而過。同出還有一件武士擒俘飾牌，樹下一輛馬車，一披髮武士騎馬，右手持劍，左手抓住散髮之俘虜。一犬作人立狀，撲向俘虜；另外一犬跳到篷車頂上（《鄂爾多斯》pp.96-97，圖六四：4、6；孫守道1960）。武士擒俘牌在寧夏同心倒墩子M10也發現二件（《考古》1987：1, p.35，圖版參：2），雖然原物損殘，但基本構圖與西岔溝沒有區別。這兩種牌飾的樹林部分正好組成橫B的半圓形。盧芹齋舊藏也分別有西岔溝和倒墩子這兩類標本（*SSA*, Pl.XXI：3、4），它們的內容雖非鬥獸搏噬，但屬於橫B形構圖，故一併論述。〔插圖三一〕

（3.3）第三式：長方形框

這種飾牌如同上文說過的第二類，從形制來看，飾牌輪廓保持動物形體和外加方框者之間，也有中介的形制，內蒙古東勝市碾房渠發現的虎狼咬鬥金飾牌即是一例。虎狼咬鬥之造形以佇立猛虎爲主體，其前足踏住狼身，口咬狼之上顎，狼亦咬住虎之下顎。狼口下有一蜷縮小動物；整個飾牌以黃金鑄成，浮雕鏤空。（《考古》1991：5, p.405，圖二）。帶框野獸搏噬的圖象，今日中國考古發掘的精品當推阿魯柴登和西溝畔的金飾牌。杭錦旗桃紅巴拉阿魯柴登發現大批精美金器，有四件猛虎噬牛牌，黃金鑄成，牛居其中，四肢平伸，軀體平臥，四頭猛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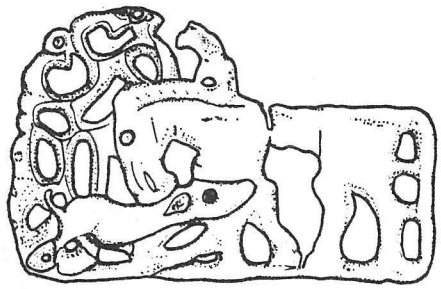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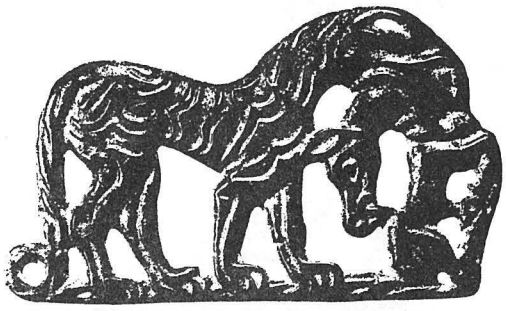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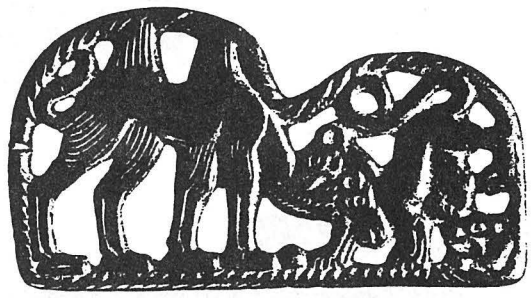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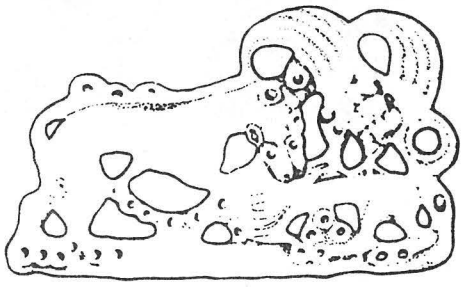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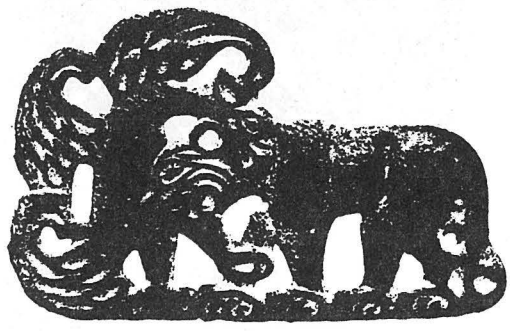
5



6



7



8

插圖三〇　鬥獸搏噬文飾牌之二（橫B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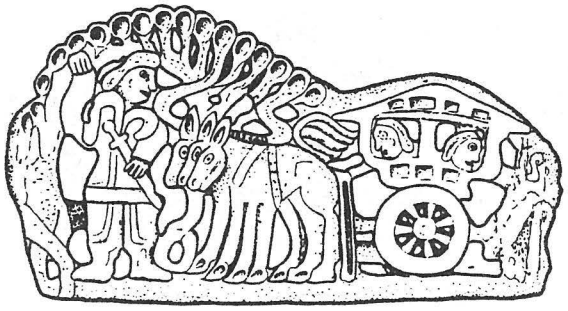
1.西岔溝　　2.固原楊郎蔣河

3.涼城崞縣天子　　4.西岔溝

5、8盧芹齋舊藏　　6.Andersson著錄

7.銅川棗廟M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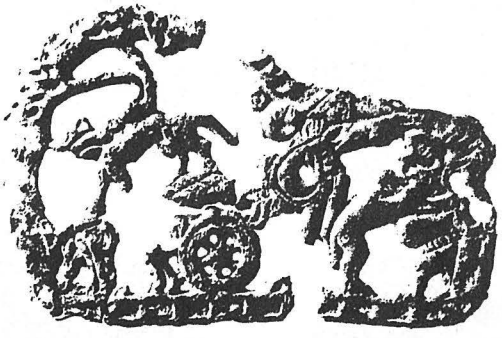
（1-4《鄂爾多斯》　5、8 SSA　6.BFEA5　7.《考文》198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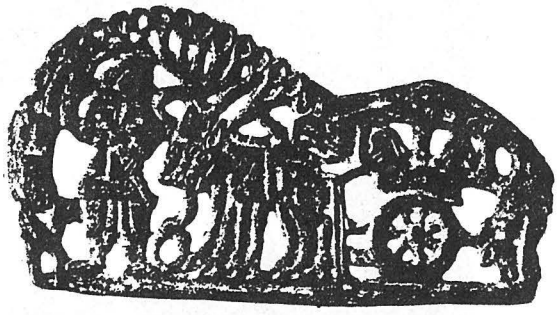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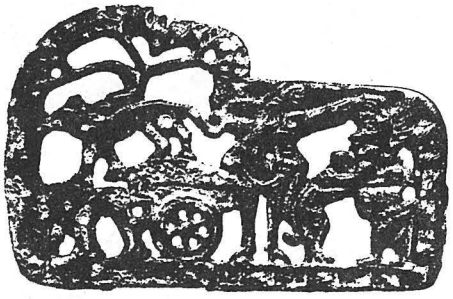
2



3



4



5

插圖三一　人物車馬文橫B字形飾牌

1-2 西岔溝　　3.同心倒墩子M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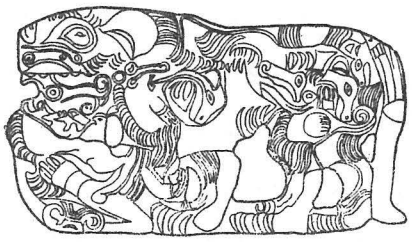
4-5 盧芹齋舊藏

(1-2 《鄂爾多斯》　3.《考古》1987:1　4-5 S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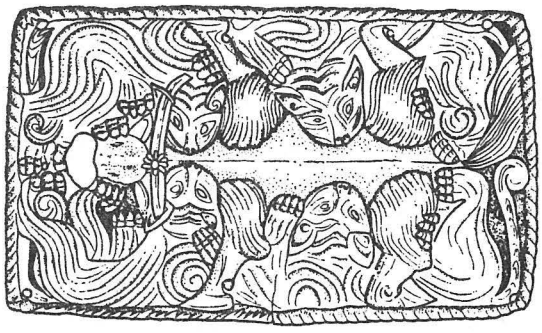
兩兩相對，從兩側咬住牛之頸、腹，牛角刺穿虎耳，造形生動逼眞（《鄂爾多斯》p.345，圖二：4）。西溝畔M2出土二件虎豕搏噬牌，亦黃金鑄成，猛虎前肢撲地，張開大口咬住野豬後腿，野豬雖然也咬住虎的後腿，但有氣無力，勝負截然可判。這些金飾牌皆長方形，外框加飾繩索文。同墓還出較小飾片，作虎獸咬鬥和三獸互鬥之情狀（《鄂爾多斯》pp.352-357，圖二、圖五：2、圖四：4）。西安東郊三村店王許墓出土二件鬥獸長方形銅牌，報告稱作雙熊噬馬，馬首低垂，四足曲跪，一熊咬其頸脊，一熊咬其尾（《考文》1983：2, pp.23-24，圖一：1）。此牌文飾有怪獸母題，詳見本文第四章。西安北郊漢城鄉出土有虎牛鬥飾牌，老虎寬耳大嘴，長尾上捲，粗腿大爪，通身斑紋，口咬牛頸，長方形框裝飾一周圓珠文（王長啓1991）。

此一題材邦克著錄兩件（*ASA*, Nos.114-115），熊或稱爲虎，馬稱爲不知名怪獸。鬥獸方框飾牌的傳世品甚多，內蒙古博物館收藏二螭咬二鹿飾牌，構圖左右對稱（《鄂爾多斯》p.80，圖四七：3），兩頭鹿的背部分被兩條螭龍咬住，鹿口張開，極盡驚惶之狀。瑞典東方博物館和盧芹齋分別收藏二馬咬鬥牌，左馬咬右馬之肩背，右馬趨下咬住左馬之前肢，構圖雷同，只是框沿文飾略有差別而已（參《內蒙長城》Fig.74：1; *SSA*, Pl.XXVII：1）。西安北郊大村堡徵集一件虎咬鹿飾牌，鹿長嘴圓目，左右一對大耳，頭頂枝狀大角伸向兩邊，前肢曲跪，虎在鹿右，歪首橫咬鹿頸，長方形框裝飾鴨蛋梨文（王長啓1991）。此類鬥獸長方形飾牌亦見戴甫列特（間接自《鄂爾多斯》p.83）及Salmony（*SSA*, Pl.XXII：2）之著錄。盧氏舊藏兩虎相鬥圖（*SSA*, Pl.XXII：5），左邊黑虎咬右邊花虎之頸項，花虎亦咬住黑虎前肢，匠意與二馬咬鬥如出一轍。二虎鬥單龍牌，虎口扣住龍的上身，但背部已被青龍利牙刺入，瞪目張口，力竭氣衰，另外一虎從背後咬住龍下身，用力雖猛，是否能解同伴之危，則不可預卜(*SSA*, Pl. XXII: 3)。虎囓馬圖，二虎仰身分別咬住兩匹馬的腹部，構成左右對稱的圖案，和內蒙古博物館那件二螭咬二鹿飾牌相似(*SSA*, Pl. XXII: 4)。這三件的框沿，前兩件飾凹葉文，後一件飾繩文。〔插圖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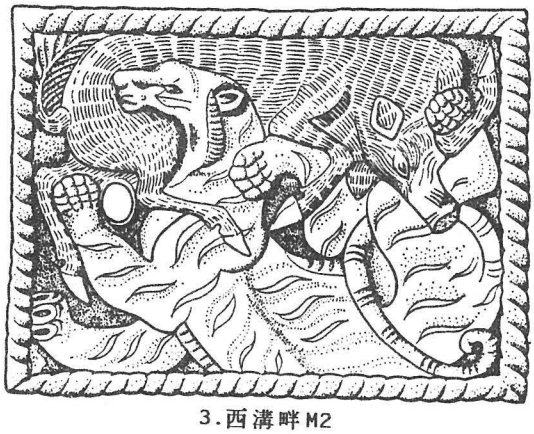
北方牌飾和帶扣之中和帶框鬥獸文彷彿者是武士摔角文的帶扣，長安客省莊K140出土兩件，二人披髮穿長筒褲，赤裸上身，在林下相撲，背後各有一匹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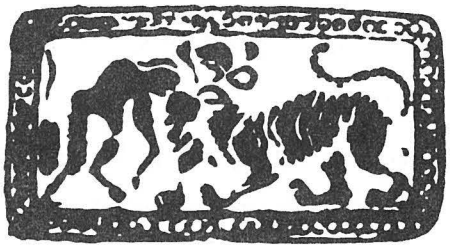
1.東勝碾房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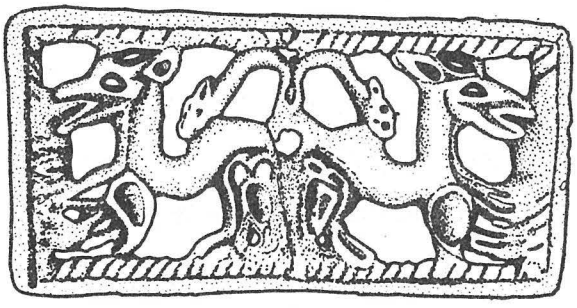
2.桃紅巴拉阿魯柴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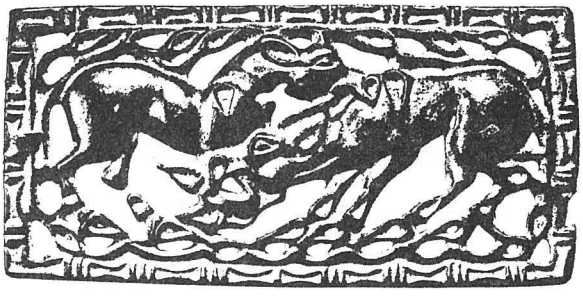
3.西溝畔M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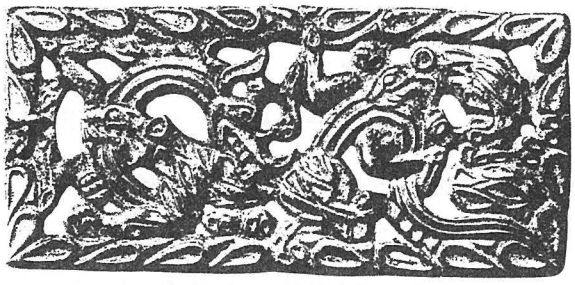
4.西安漢城村



5.內蒙古博物館



6　盧芹齋舊藏



7 盧芹齋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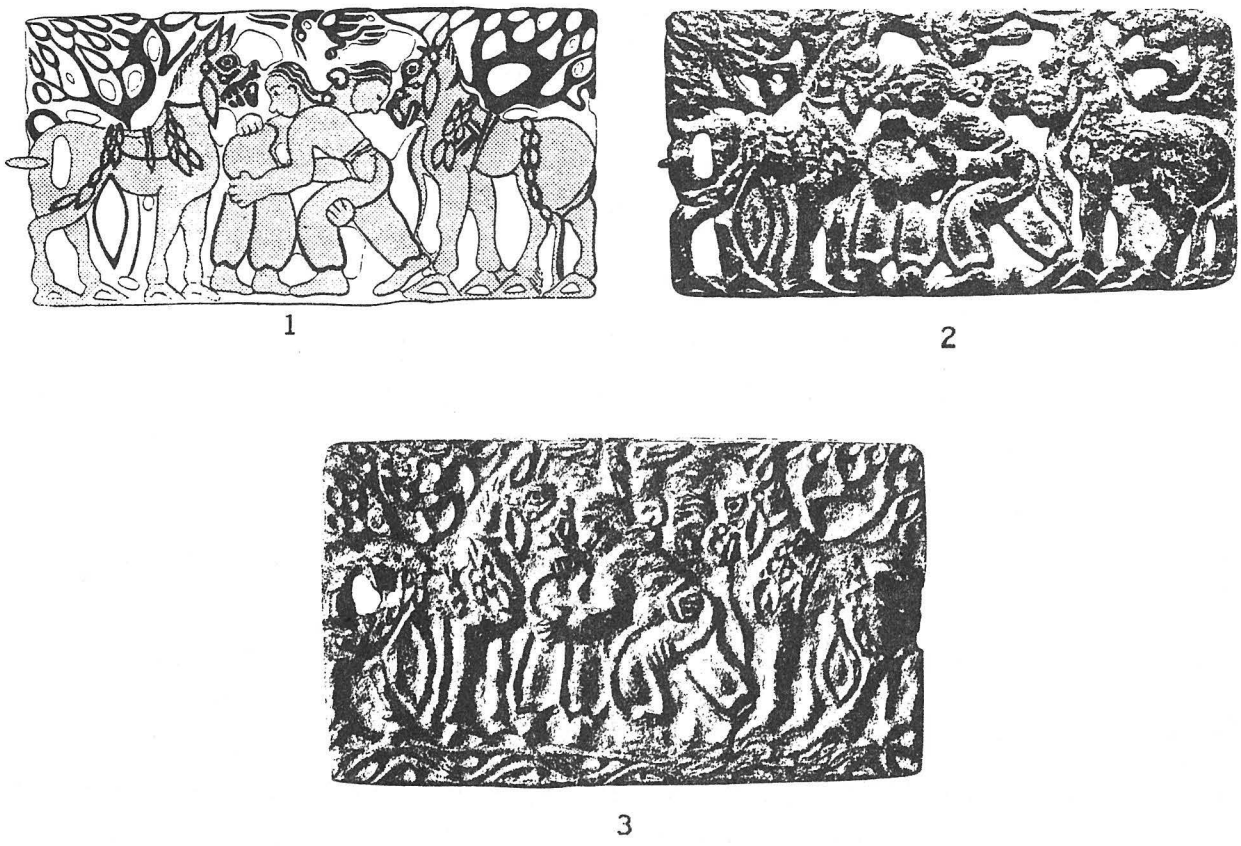


8 盧芹齋舊藏

插圖三二　鬥獸搏噬文飾牌之三（長方形框）

（1.《考古》1990:5　2-3、5《鄂爾多斯》　4.王長啓1991　6-8 SSA）

鞍的坐騎（《澧西》p.139，圖九三：1）。這種帶扣盧芹齋舊藏兩件（*SSA*, Pl.XXI：1、2），邦克亦著錄一件（*ACOB*, No.221），佈局皆同，唯透雕部分有別，客省莊發掘品的方框則不太明顯。〔插圖三三〕



插圖三三　武士摔角文飾帶扣

1.長安客省莊K140　2-3 盧芹齋舊藏

（1.《澧西》　2-3 SSA）

涼城崞縣窯子M12屬於該墓葬群之第二期，約值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考古學報》1989：1, p.76），彭陽白楊林村墓報告者定在戰國中晚期，西吉陳陽川墓可能晚到西漢早期（《考古》1990：5, p.416），固原楊郎蔣沙墓葬大約屬戰國晚期（羅豐1990）。銅川棗縣M25報告未說明共出器物，但定在當地墓群第四期，

時代可能晚到西漢（《考文》1986：2, p.16）。西安王許墓出土器物甚夥，原報告定在昭宣時代（《考文》1983：2, p.25）。客省莊K140打破戰國地層，附近發現有上林苑的建築遺址，報告推測應在戰國末年到漢武帝建上林苑（建元三年，138 B.C.）以前（《澧西》p.140）。西溝畔、西岔溝、倒墩子的年代上文已經推定在戰國晚期以下至西漢中晚期之間。所以整體看來，中國北方鬥獸搏噬文飾第一式與第一類動物形體文飾相當，大概興起於春秋晚期。第三式和第二類帶框動物文並行，它與第二式（橫B形）飾牌大概皆起於戰國中晚期以後。其下限約在西漢中晚期，流行地區甚廣，基本上和第二類帶框動物文飾重疊（參地圖三）。

（四）圓雕動物文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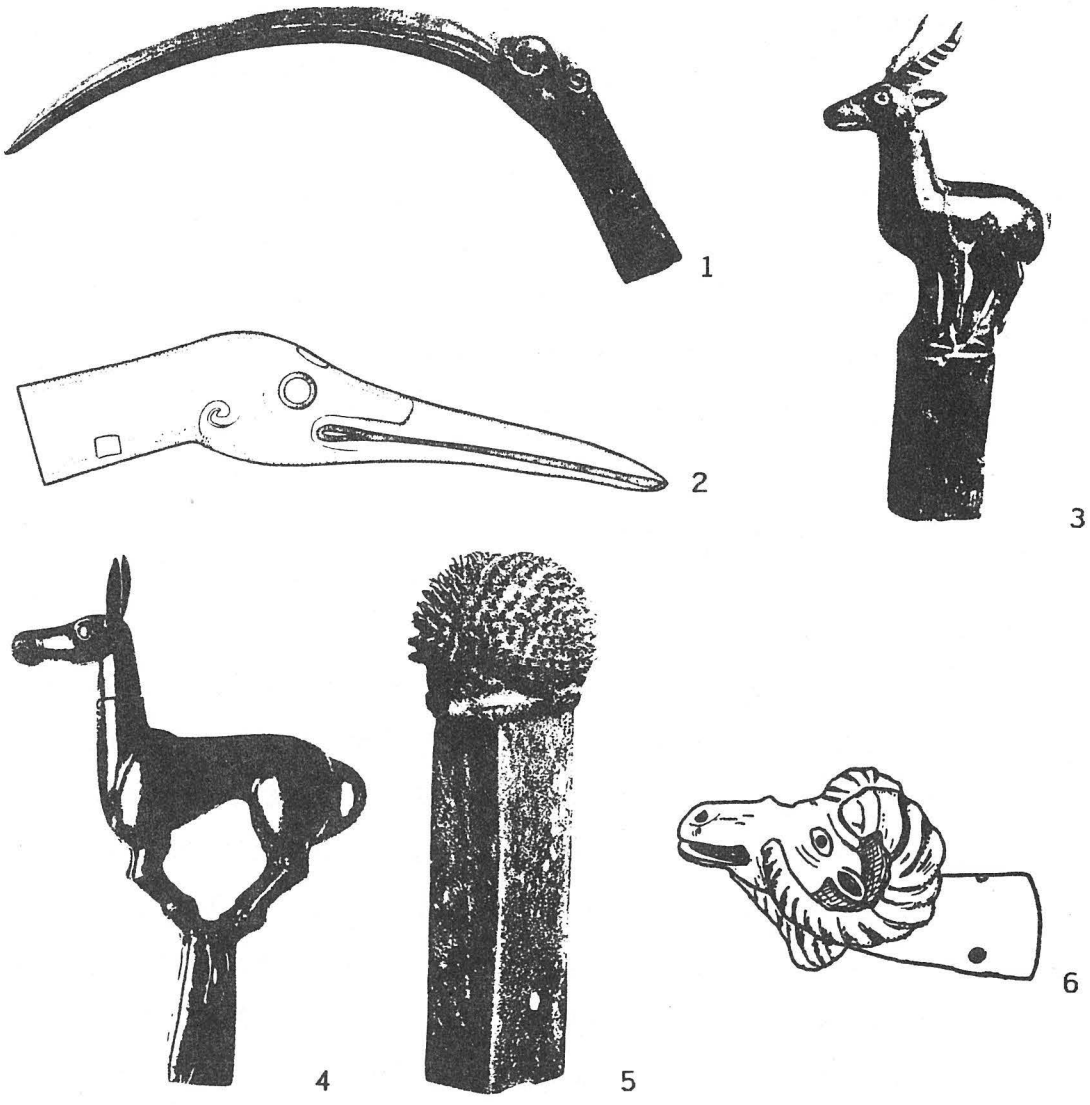
第四類組圓雕動物（參附表三），普通以兩種方式表現，一種是動物形體站在座上，座下有銎，續以木棍，一般稱作「竿頭飾」；另一種只是單純的立體雕飾。

准格爾旗玉隆太徵集的銅器，有圓雕盤羊、羚羊、馬及不知名獸（《鄂爾多斯》pp.366-371，圖版一〇二：1，一〇五：1，一〇六）。盤羊雙角向前盤卷，兩目直視，頸後延伸成銎，銎側有兩個方形釘孔，銎下側有磨損痕跡，推斷當是轅飾。佇立之羚羊，昂首伸頸，角後斜、體中空、四足立於方形銎之上。馬佇立，低首下視，四腿稍內收，圓腹中空，足下踏長方形銎，銎側有圓形釘孔。不知名獸，頭微仰、四足立於圓形銎上，銎側有孔。獸頭戴一長方形管，有孔，可以插物。銎管穿柲，以銎孔固定之，這些工藝品應該是招搖於原野的竿頭飾。速機溝的鶴頭、羊頭、狼頭、狻猊和屈肢馬也是竿頭飾（《鄂爾多斯》pp.372-373，圖版一〇三：1、2，一〇四，一〇二：2）。鶴頭碩大，微昂揚，耳目喙鼻清晰、頸前伸，中空成銎以納柲。另一個鶴頭喙長而曲，尖端張開，頸中空成銎，銎口圓形，可以納柲，頸側有一圓孔以固定木柲。羊頭、狼頭皆殘，但頸部都有銎及銎孔。狻猊四足立於銅銎頂部，大嘴、寬鼻、小耳、雙目前視、前腿直立、後腿彎曲前伸作猛撲狀，銎有側孔。馬屈蹲伺於銎上、腹中空。西溝畔M2出土的鶴，形制與速機溝基本一致（《鄂爾多斯》pp.359-360，圖一〇三：2）。甘肅慶陽吳家溝圈出土鴨頭竿頭飾，鴨頭造形簡單，頸爲銎管，下有對稱釘孔（《考古》1988：5,

pp.419、421，圖一三）。永登楡樹溝沙井的鷹頭飾，短嘴彎喙巨目，頸下作成圓銎，有的銎貫頭頂，有的銎側有釘孔（《考文》1981：4, p.34，圖版伍：4）。速機溝還出土一件立於銎上的刺蝟，低頭縮頸，軀體隆起如球，滿身飾錐形棘刺。吻尖耳短、四肢短小。立於銎之上方，銎下端旁出一個圓銎。陝西神木納林高兔也發掘到刺蝟，立於扁圓銎上，銎側有方孔（《文物》1983：12, p.24，圖版肆：2；《鄂爾多斯》圖版一〇五：2）。

考古所見竿頭飾從鄂爾多斯，南下陝西神木，西南到甘肅的慶陽、永登，分佈範圍極廣。傳世採集品，盧芹齋舊藏多件，有盤角羊頭、盤角羊、山羊、禿鷹頭，野驢、野驢頭、麋鹿、野豬，尤其刺蝟造形與納林高兔所出一模一樣（*SSA*, Pl.V-VIII）。安特生著錄過山羊與鵝雁（*BFEA 5*, Pl.X-XII），後者邦克亦收一件（*ASA*, No.93）。邦克著錄的長喙鶴頭（同上，No.98）與速機溝所出相似，而蹲鹿之下的銎管刻鑄交虺花文（*ACOB*, No.230），應屬於竿頭飾一類的設計。〔插圖三四〕

立體動物雕件，以阿魯柴登金冠飾頂的老鷹最華麗，准格爾旗之玉隆太、速機溝和神木納林高兔的蹲踞鹿群最傳神。金冠冠頂用厚金片錘打成半球面體，四等分，飾以狼咬羊浮雕圖案，半球體上，傲立一隻雄鷹（《鄂爾多斯》p.344，圖一：1-3）。鷹體由金片作成，中空，身及雙翅有羽狀文飾。鷹頭與頸是綠松石，可以左右轉動。整個造形，雄鷹凌空獨立，威武逼人。鹿群，或大角分叉、或無角，昂首睨目，豎耳曲肢，臀部微抬，似若警戒，隨時準備逃奔（《鄂爾多斯》圖版一〇八、一〇九）。納林高兔之鹿乃銀質，玉隆太和速機溝乃銅質。瓦爾吐溝也出土佇立形和蹲踞形鹿及盤角羊（《鄂爾多斯》圖版一一〇、一一一）。其他如西溝畔M2的佇立鹿形飾件、土默特旗水澗溝門的驢（《文物》1965：2, pp.50-51），永登沙井的鹿（《考文》1981：12，圖版伍：1、2），納林高兔的銀虎與中溝的狗（《文物》1983：12, p.29，圖版伍：5），呼魯斯太的鹿（《鄂爾多斯》p.224，圖6），固原彭堡撒門村的鹿、羊與驢（《考古》1990：5, p.414，圖一三：2-4），秦安的立羊（《文物》1986：2, p.41，圖二：2）等等，最常見的圓雕動物大概是鹿和驢，這兩種動物在著錄也比其他動物更常當作爲圓雕的題材（*SSA*, Pl. XXXIII、XXXIV; *ASA*,



插圖三四　圓雕動物文之一（竿頭飾等）

1.准格爾旗速機溝　　2.西溝畔M2

3.玉隆太　　4-5 盧芹齋舊藏

6.玉隆太

（1-3、6《鄂爾多斯》　4-5 SSA）

Nos.96、99-102；1990, No.205）。〔插圖三五〕

納林高兔出土的圓雕動物形象有一件鹿形怪獸，金質，鷹喙獸身，頭生雙角如鹿，偶蹄，侷立於一個四瓣花形托座上。怪獸眼球突出，大耳直立，雙角內彎，角分四叉，叉端各有一個浮雕怪獸頭象。獸尾上捲，亦作怪獸頭象（《文物》1983：12，圖版肆：1）。這個母題本文第四章將有所討論。

納林高兔的一對金虎屬於圓浮雕，四肢前後交叉，低頭若行走狀，頭顱圓雕，暴眼圓睛，小耳扇形，緊貼腦際。軀幹與四肢浮雕，頸部和右後腿下各有銎圓孔，尾上部內側有兩小圓孔，當供釘綴之用（同上，p.25，圖版肆：3）。圓浮雕的工藝術技法亦見於西溝畔M4的包金臥羊帶飾，以金片包鐵心錘疊而成，羊頭圓雕，角盤捲于頭側，抬頭前視，身軀四肢浮雕，周圍亦浮雕花草，帶飾之背有鈕，已殘（《鄂爾多斯》p.383，圖版六、七）。這兩個地方的圓浮雕動物皆圓雕頭，浮雕軀幹四肢，應是同一系統的工藝。

固原撒門村墓地上限不晚於戰國早期（《考古》1990：5, p.416），玉隆太、速機溝與西溝畔M2的年代約當戰國晚期，納林高兔根據共出的青銅短劍比對，也大約同時（《文物》1983：12, pp.27-28）。西溝畔M4據同出漢族風格玉石器推測，可能屬於西漢初期（《鄂爾多斯》pp.390-391）這些圓雕工藝互有粗細，總體看來，北方的圓雕動物文飾大概不早於春秋戰國之際，而以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最盛行（參地圖三）。

※　　※　　※

中國北方動物文飾按上文分成四個類組，第一類組(A)刀劍柄端獸頭的動物文飾，出現的時間早到二里岡上層時代，據比較保守的年代估計（武王伐紂取較晚的西元前1027之說），大概可以早到將近西元前1400年，至西周早期，即十世紀末而止。流行地區從遼西沿燕山南北，長城內外，到晉陝中北部。

第二類組(B)柄上獸形及「觸角式」的動物文飾約見於西周晚期到戰國中期，即西元前800年以後到350年，一般而言，柄上獸形的文飾年代偏早，多集中在燕山以北；至於「觸角式」動物文飾大概從春秋晚期才出現，分佈地點集中於鄂爾多斯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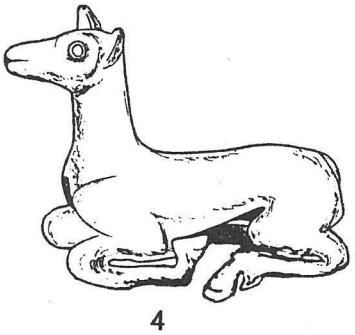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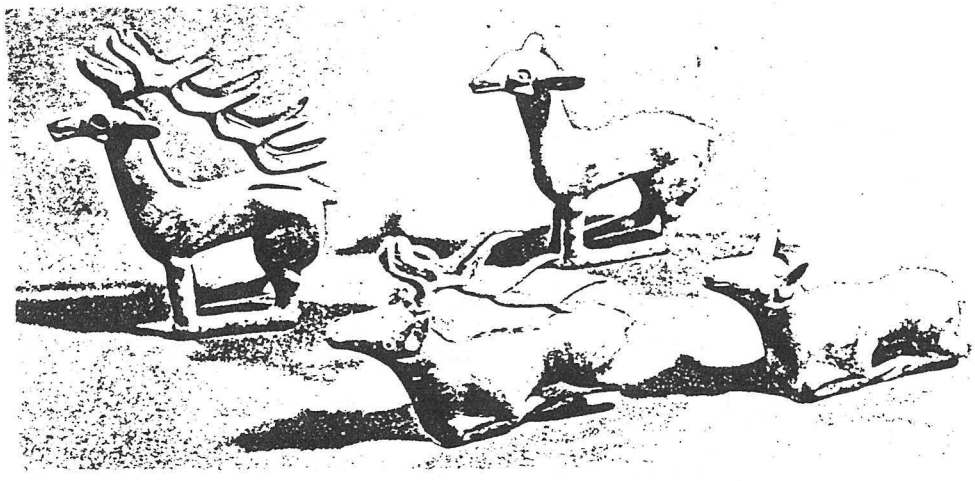
2



3



4



5

插圖三五　圓雕動物文之二（立體雕件）

1.桃紅巴拉阿魯柴登　　2.瓦爾吐溝

3.神木柳林高兔　　4.玉隆太

5.速機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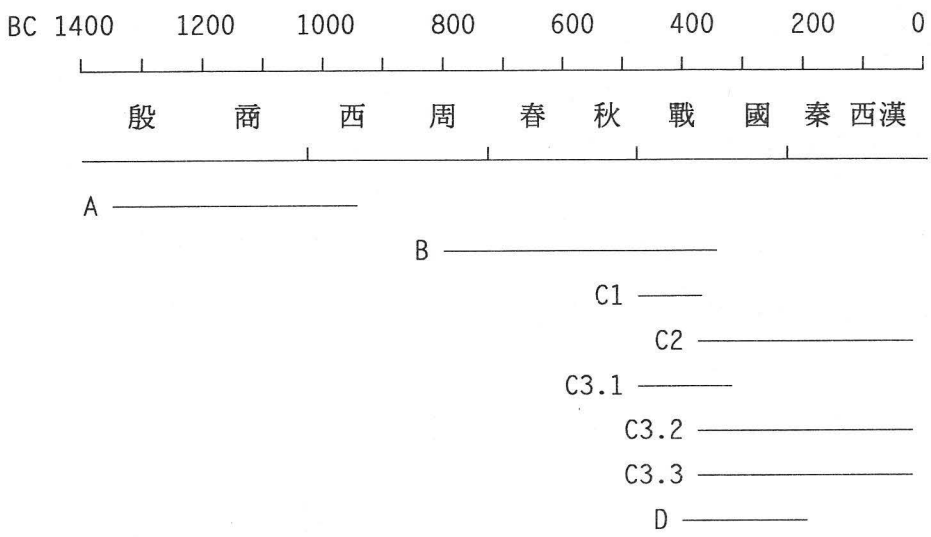
（《鄂爾多斯》）

第三類組(C)透雕飾牌，本文分作三類，第一類(C1)動物形體文飾，流行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以內蒙中部以東的燕山南北地帶比較常見。第二類(C2)帶框動物文飾，大概從戰國中期開始至漢武帝以後，約西元前350-50年，分布地區相當廣闊，東起遼寧，西至寧夏，第三類(C3)鬥獸博噬文飾，可以分作三式，第一式(C3.1)飾牌輪廓保持動物形狀的搏噬，流行時間和分布地區與第一類(C1)動物形體文飾大抵相同。第二式(C3.2)橫B字形飾牌和第三式(C3.3)長方形框之搏噬動物文飾，不論時間和地區，基本上與第二類(C2)帶框動物文飾重疊。

第四類組(D)圓雕動物，雖可能推溯到戰國早期，盛行時期則從戰國末到西漢初。

第一類組刀劍柄端裝飾圓雕獸頭與第二類組刀劍柄上裝飾獸形立雕或浮雕，這兩種動物文飾，就目前考古資料而論，時代不相連繫，風格亦截然有別。根據考古資料，前文所論北京昌平白浮周初墓M3出土的馬頭劍和鷹首劍（《考古》1976：4, p.253），獸頭與直柄呈直角接合，嚴格說，形制已不是第一類組的典型；類似情形亦見於遼寧建平石碴山M741出土的牛首刀，其柄上三角形陰文也許是後來浮雕動物文的前奏，此墓年代定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考古》1983：8, p.692）。但現在所知柄端立獸的標本，一般多定在春秋晚期，所以第二類組與第一類組的關係還是相當模糊的。

第二類組柄上獸形之武器或工具與第三類組第一類(C1)的飾牌有些同時同地並存，延慶軍都山、寧城南山根、宣化及附近的濮平都是明顯的例證。第二類組的「觸角式」短劍若包含發展形態的雙環或一字式，則與第三類組第二、三類及第四類組也同時，毛慶溝墓地的發掘即可證明。因爲動物形狀之飾牌較早，就形制而言，第三類第二式橫B字形也許比第三類第三式長方形框出現得早，不過參證西伯利亞和黑海北岸之飾牌，這兩種一般是並存的（參M. I. Artamonov 1973，第五章，英文摘要，pp.273-274）。現在將這四大類組動物文飾在中國北方流行的時間作成下列圖表，以醒眉目。



我們根據此表，參證各種動物文飾共生的文化相，可以推考古代北方民族的文化與社會之轉變。

三、動物文飾共生文化反映的北方民族與社會

江上波夫曾提出一個大理論來解釋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變動。他認爲新石器時代蒙古高原的沙漠草原地區和長城地帶的山岳盆地地區同時併存著兩種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民，前者是原始遊牧民，和西方乾燥地帶居住民有親緣關係；後者則以農業爲主牧業爲副，與南方濕潤地帶的人民連繫比較緊密。

江上氏認爲當進入青銅時代（按，當時他定在西元前1000-500年是不正確的），長城地帶的居民發生令人注目的變化，他們的產業不再是農主牧副，轉而爲牧主農副，而且是從事頻繁戰爭的武士。他們成爲山岳武士的牧人，主要使用弓矢，也愛用有孔槌斧、環狀斧等戰斧及平肩握柄之短劍。從這些「飛兵」（遠射）和短兵的使用看，他們顯然是步兵或騎兵，這點與當時南方黃河流域都市國家（城邦）的華夏民族以車戰兵士爲主，使用矛、戈、鉞、長劍者正是很好的對照。中間山岳地帶的牧人武士即是中國書傳所謂的混夷、玁狁、犬戎、諸狄和山戎等民族。

由於春秋時期前後，華夏民族開疆拓土，逼近中間山岳地帶，「都市國家」

的發達和富饒引起北方山岳地帶居住民的垂涎，而正當此時，長城地帶人民從西方引進鑄銅技術和步、騎兵之新銳武器——兩翼銅鏃的弓矢、戰斧、短劍等，於是頓然成爲能爭善戰的武士，侵略富裕的華夏民族。長城地帶居民之所以產生如此巨變，江上氏認爲是受亞利安（Aryans）東來的影響。西元前二千至一千五百年間，獨立不羈的亞利安人盤據在西亞的中間山岳地帶，即帕米爾西麓北伊朗和Karaksas，他們從近東之農商民族學得青銅武器，爲適應自己戰術的需要而加以改造，出人意料的，他們最愛用的弓矢、戰斧和短劍卻與東亞中間山岳地帶青銅時代人民的武器幾乎完全相同（江上波夫 1948, pp.7-10）。

以上江上波夫的理論有一部分已被近年來的新知識推翻或修正，尤其時間順序的錯亂。然而即使有這些缺點，他的宏觀理論體系猶不失醇厚的魅力，而其中涉及的問題，如混夷戎狄的文化，北方式青銅武器的來源等等，至今也還沒有定論。我們所以不厭其煩，詳述他的議論，理由亦在此。

誠如上文所論，北方民族的武器和文化與「動物文飾」密不可分，考古出土的動物文飾多有共出隨葬品，檢查這些共生文化相，當能推測使用者的生活文化，甚至是社會形態。現在以上章分析的動物文飾作基礎，來檢討各階段之民族文化和社會，和可能涉及的一些問題。

（一）獸頭文飾與使用短劍、戰斧的民族

有些殷商或西周的考古證據顯示獸頭刀（劍）和戰斧，或相同功能的武器，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關係，但共生文化相並不限於這兩類而已。

出土羊首曲柄劍和鹿首彎刀的河北青龍抄道溝，報告云村民在後山台地上掘土所得，可能是一處窖藏（《考古》1962：12, p.644），其共生物雖不如墓葬所具備的社會意義明確，仍有參考價值。這裡與獸頭刀劍同出的文物有環首刀、鈴首彎刀、銅戚和有銎啄戈，這些都應該屬於同一性質的文化。遼寧興城縣楊河也有類似的發現，出土環首刀、銅戚、有銎啄戈和銅鈎（《考古》1978：6，p.387，圖版玖：1、2）。除銅鈎外，其他三種兵器或工具的形制與抄道溝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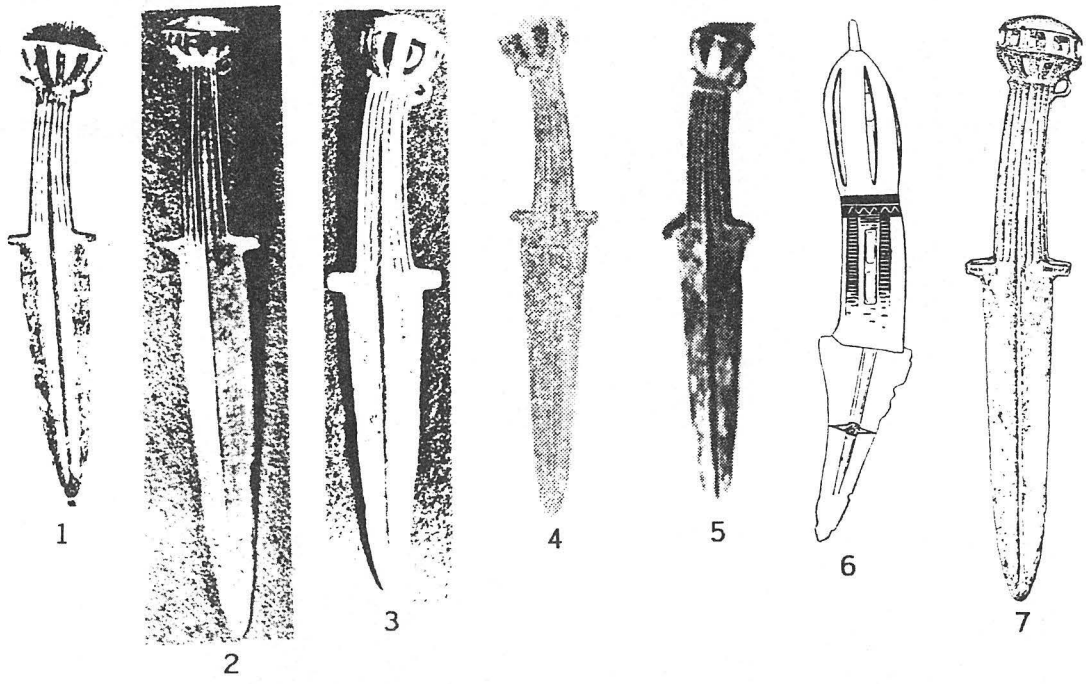
山西石樓褚家峪和曹家垣的兩處墓葬，與褚家峪蛇首匕同出的兵器有環首

刀、帶銘直內戈、帶銘銎內戈和弓形器；在曹家垣，與蛇首帶環勺同出的兵器則是長銎斧、鈴首劍和弓形器（《文物》1981：8, p.50）。靈石旌介村M2的兵器，除羊頭刀以外，還有銎內戈、直內戈、矛、鏃和弓形器（《文物》1986：11, p.13）。綏德墕頭村商墓的兵器，馬頭刀、蛇首匕之外有直內戈、夾內鉞和鏃（《文物》1975：2, p.82）。

從上述墓葬和窖藏來看，與獸頭刀劍共存的武器計有鈴首彎刀、鈴首劍、環首刀、有銎啄戈、銎內戈、管銎斧或戚，弓形器以及直內戈、夾內鉞和箭鏃。直內戈和夾內鉞是典型華夏民族的武器，但鈴首、環首、管銎與獸頭一樣，皆具有北方民族的色彩。值得注意的鈴首刀劍，通常不超過30公分，握柄微彎，除柄端獸頭改作爲鈴外，形制與獸頭刀劍基本一致。唯今日考古所見，獸頭者刀多於劍，鈴首則劍多於刀（參附表一）。

鈴首劍除上述曹家垣外，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吳振祿1972，《山西》No.39）、柳林高紅（楊紹舜1981），吉縣上東村（《考古》1985：9）和昌平白浮（《考古》1976：4, p.252）等地的墓葬皆有所見；陝西延川稍道河去頭村亦曾出土（《考文》1988：4, p.103），這裡也可能是一處墓葬。傳世著錄也有一些鈴首劍的標本(Loehr 1949)〔插圖三六〕，這些出土鈴首劍的墓葬多共出管銎斧，如林遮峪兩件，上東、去頭一件，可以作爲短劍戰斧論的佐證。不過如高紅便出一斧一鉞，鉞亦銎內，不是中原的款式。〔插圖三七〕

鈴首刀劍的形制既然與獸頭刀劍相似，考古墓葬也顯示獸頭與鈴首很少並出，可見功能上這兩類兵器可以互相取代。昌平白浮M3是高級將領的墓葬，武器內容複雜，不適合說明一般文化現象，但吉縣城關上東村發現的豎穴土坑墓似可透露一些訊息（參插圖四五：1）。該墓男性人骨一具，因南半部遭破壞，墓主下肢部分被毀，出土隨葬品今存四件，皆青銅器。頭骨左側一件管銎斧，斧刃向外，銎中猶留木柲殘跡；右側一把鈴首劍，劍鋒朝下；左腰兩件長圓形勺，接一長條柄，柄端作獸頭形。根據上章的論述，晉陝一帶的動物文飾有一種獸頭勺，此墓當屬動物文飾墓無疑，而劍斧組合的作風也可以當作使用獸頭刀劍民族的特色。關於劍斧在人體的位置，陝西延川縣文化館收藏的鈴首劍和長銎斧，是採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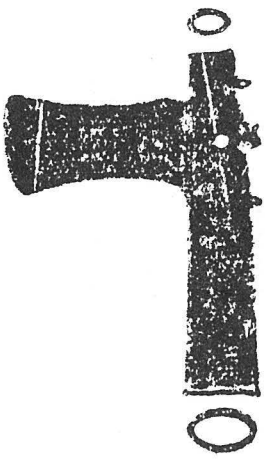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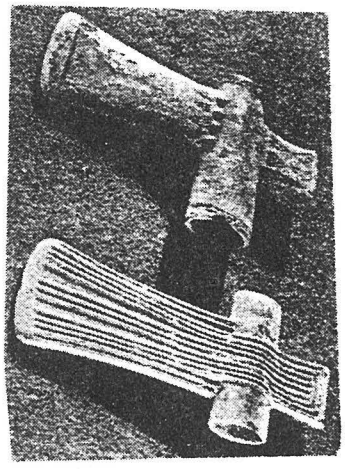
插圖三六　鈴首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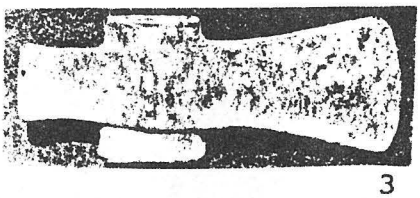
1.石樓曹家垣　2.保德林遮峪
3.柳林高紅　4.吉縣上東村
5.延川稍道河去頭村　6.昌平白浮M3
7.Max Loehr著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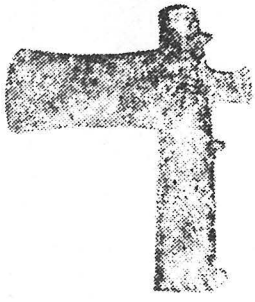
(1.《文物》1981:8　2.吳振祿1972　3.楊紹舜1981　4.《考古》1985:9
5.《考文》1988:4　6.《考古》1976:4　7.Loehr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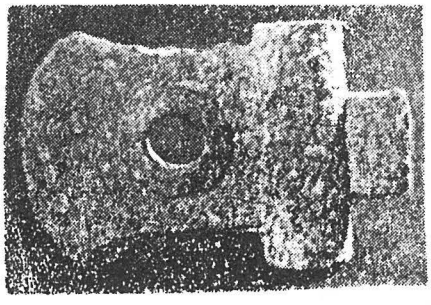
品，無法討論，曹家垣報告無說，其他例子亦甚含糊簡略。據云保德林遮峪的銅斧置于人骨架右側外，大概原來是裝木柲的武器，其餘右手邊的銅器零亂地放在足骨下端。柳林高紅銅盔在頭部，其餘的銅器都在腰部和下肢。根據這些描述，我們還是無從判斷短劍和銅斧與人體的正確關係位置。曹家垣的鈴首劍與長銎斧之形制和上東村所出者雷同，其功能應該一致，正確的放置位置可能也與之相似。晉陝一帶發現一種銎內戈，取中原戈援之形配合管銎的內，功能上大概與管銎斧相當。1967年石樓義牒曾發現管銎銅戈、銅斧及蛇首匕各一件（《考古》1972：4, p.29）；而出土羊頭刀的靈石旌介村M2和蛇首匕的石樓褚家峪商墓皆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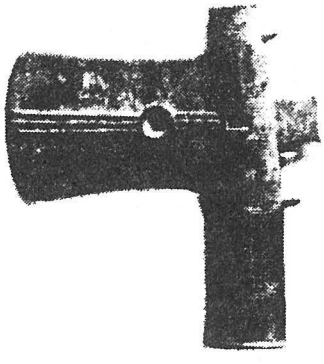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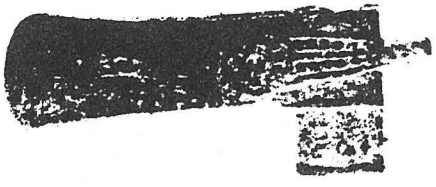

2


3


4


5


6


7

插圖三七　管銎兵器

1.石樓曹家垣　2.保德林遮峪
3.柳林高紅　4.吉縣上東村
5.石樓義牒　6.延川縝道河去頭村
7.興城楊河

(1.《文物》1981:8　2.吳振祿1972　3.楊紹舜1981　4.《考古》1985:9
5.《考古》1972:4　6.《考文》1988:4　7.《考古》1978:6)

出銎內戈，似乎也可以說是青銅短劍和戰斧的組合。以上這些考古證據是否正可說明中國北方山岳地帶普遍存在過如江上波夫所說的佩短劍、掄戰斧的民族呢？我想倒也未必。新資料顯示江上氏的論點宜從新修正，此一北方民族與文化的問題，還有很大的發展餘地。

帶銎兵器固然和中原傳統的夾內兵器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唯在中國北方（尤其是晉陝一帶），它們相關的內涵相當複雜，不能單一看待。就形制而言，斧的銎管有長短，一般分別稱作長管銎斧和短管銎斧；刃身有寬窄，窄的謂之斧，寬的謂之鉞；刃面呈半圓形者稱作半圓形管銎鉞；此外，還有以中原形制戈加管銎的銎內戈（參陳芳妹 1992）。即使我們把「戰斧」擴大解釋，包括所有帶銎的兵器，就兵器組合而言，「戰斧」並不一定必配短刀劍。山西石樓義牒圪垛坪發現兩件銅兵，一是有銎鉞，一是曲內戈（《文叢》3, p.202）。靈石旌介村 M1 出一件銎內戈（《文物》1986：11, p.6），M3 出銎內戈，有銎鉞各三件（戴尊德 1980），皆沒有青銅短刀或劍共出。陝西淳化縣夕陽鄉黑豆嘴 M2 出銅斧、半圓形管銎鉞和夾內鉞各一件，M3 出銅斧一件，M4 出銎內戈一件；潤鎮鄉西梁家 M1 出一件銎內戈，另外兩件銅器下落不明；秦河鄉北坡村採集得一件銅斧（姚生民 1986）。大體上這一帶發現的有銎兵器，雖然不少，皆未見有與青銅短刀、劍共出的情形。西安老牛坡商墓 M21 出土銎內戈，M7 出土銅斧（《文物》1988：6, p.11），岐山王家嘴商代窖藏坑出土長管銎和短管銎斧各一件（《陝銅》一，No.13），亦皆無短刀或短劍。寶雞強國墓地竹園溝 M7 的有銎鉞，M13 的有銎鉞與銎內戈雖皆與青銅短劍共出，但這裡的短劍呈柳葉狀，葉有一或二穿以固定夾合的木柄（盧連成、胡智生 1988，pp.115-117, 73-76），和通常所謂的北方式青銅短劍完全不類，似不宜與所謂的短劍戰斧民族相提並論。

總之，有銎兵器分佈相當遼闊（參附表一），從燕山以外的喀左到昌平，沿燕山山脈西南走向經晉北陝北南下，甚至遠及青海湟中下西河（《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 4, No.95）（參地圖一），但眞正使用戰斧配短劍者，大抵只從保德到吉縣，集中在山西北中部沿黃河地帶而已，尤其柳林石樓附近。不過，現有證據透露的歷史信息還更複雜，在獸頭刀劍、鈴首刀劍和各種有銎兵器分佈的地區，我們也發現大量中原式的兵器與禮器同時並存，這反映什麼樣的歷史情狀呢？

一種情況是北方式武器與中原式禮器並存，未見兵器，如保德林遮峪的二鼎二豆二瓿和一提梁卣。垂葉三角文鼎腹飾三組饕餮文，其下垂葉三角文；瓿肩飾夔文，腹飾饕餮文，雷文襯底，或飾方格雷乳文；卣蓋與圈足飾雷文，頸三角

文，肩夔文，器底有一動物形銘文，不論形制或花文都具備純正的中原風格，唯銅豆座內安置一丸（功能近似鈴首劍之鈴），帶點地方色彩而已（吳振祿 1972）。另一種情況是北方式武器只與中原式武器並存，沒有禮器，如石樓義牒圪垛坪所出的曲內雲雷文戈（《文叢》3, p.202）。不過，一般情形多兼具禮器和兵器。陝西綏德墕頭村與「馬頭刀」、蛇首匕並出之禮器有蟬文壺、饕餮文瓿、雲雷文觚、夔龍文鼎、簋、爵和斗，皆商式；中原式兵器則是夔龍文鉞和戈，銘文一作「鄉」，另一字不識（《文物》1975：2, pp.82-84）。綏德後任家溝的三銎多孔銅刀是北方式的，但鼎、觚、爵、戈卻是中原式，爵有族徽  （卬）（《考古學集刊》2, p.41，圖版拾：9）。石樓褚家峪的觚下半部飾弦文、乳釘雷文和饕餮文，是商式器；兩件直內戈之族徽銘文「𠂤鳥」、「」（《文物》1981：8, p.50），屬於殷商文字的系統。

中原禮、兵器與北方式銅器並存的現象，從河曲以南沿黃河兩岸的殷商周初遺址皆有所見。古人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禮器是統治的象徵，也是維持政治社會秩序的標識，作戰用的兵器則爲個人生死存亡和國家民族強弱關鍵之所繫。不同系統的銅器並存，反映不同文化，是值得深究的歷史現象。雖然如此，這一地帶不同系統之禮器與兵器在同一遺存中仍有主客之分。有人提出靈石旌介商墓禮兵器組合的情形與石樓到綏德的組合不同（李伯謙 1988）。旌介三座商墓，禮器方面三座墓幾乎全屬於中原式，只M1的圓餅文鼎屬於北方式。雖然圓餅文爲中原所罕見，但論其形制仍應歸入中原式。M1、M2甚至皆有殉狗的腰坑，也有殉人，呈現商代貴族墓葬的通相。但兵器所反映的文化現象則不同，除矛外，只M2的直內戈是中原式，其他的兵器皆屬於北方式。就考古遺存而言，這裡以中原式禮器維持統治，鞏固生存的手段卻採用北方式。所出銅器多鑄銘文，而以族徽  （丙）最多，有人認爲是商代丙國之所在（殷瑋璋、曹淑琴 1990）。

另一地區從石樓到綏德，以石樓爲中心，包括賀家坪、二郎坡、後蘭家溝、指南村、桃花莊、義牒、會坪、圪垛坪、曹家垣、褚家峪、趙家塌等地，往北是柳林高紅、保德林遮峪、忻縣牛子坪、羊圈坡，往南是永和下辛角、吉縣上東

村，往西渡黃河是綏德墕頭村、後任家溝和薛家渠，清澗解家溝和寺墕，以至淳化黑豆嘴。這一地帶禮器兵器的組合比旌介村複雜，一般而言，禮器中原式佔主導地位，但在某些地點亦可見其地方風格，如石樓桃花莊的龍文觥、三魚渦文盤、直線文簋，曹家垣的鐸形器，忻縣峙溝的雲文鼎（《山西》Nos.36、38、40、52、57），清澗張家圪的龜魚文盤、直線文簋，解家溝亦出龜魚文盤（戴應新1980，《陝銅》一，No.63）。晉陝黃河兩岸地帶雖然是動物文飾流行的地區，含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但中原式風格也顯然存在，而且佔居相當重的分量。

雖然這一帶的武器以獸頭刀、鈴首劍和有銎武器最具特色，但也存在不少中原式兵器，戈最普遍，如石樓賀家坪（《文物》1959：3, p.72）、二郎坡（《文參》1958：1, p.36）、後蘭家溝（《文物》1962：4/5, p.33）、郝家坪、圪垛坪（《文叢》3, p.202）、桃花莊（《文物》1960：7, p.52）、永和下辛角（《考古》1977：5, p.356）、綏德墕頭村和後任家溝，鉞則見於二郎坡。雖然兵器比禮器具備更濃厚的傳統性格，但在殷商時期，北方式銅器最集中的晉陝黃河兩岸地帶，他們仍無法擺脫中原的影響。

這些現象顯示江上波夫截然二分的理論過分簡化，模糊了當時歷史的實情，也可能誤導對以後歷史發展的認識。這裡的民族文化當然不是中原（或曰華夏）的，石樓地區有人認爲是殷商的土方（鄒衡1980，pp.279-281），清澗一帶乃鬼方所在之地（呂智榮1987）。估不論這些說法的準確度多高，保德石樓到綏德清澗地區的青銅文化與商王朝文化的確差異較大，二者的獨立性或敵對性自然較強（參李伯謙1988），但整體看來依然脫離不了商文化的影響。他們不但採用商式禮器，還使用商式兵器，即使具備獨特地方風格的禮器也是中原華夏國家統治理念下的產物，還是相信以貴重器物所象徵的「禮」來維持政治社會秩序，反映他們的意識形態與中原沒有太大的差別。相對的，禮器風格純中原式的靈石，若非中原移植，而是當地發展的成果（殷瑋璋、曹淑琴1990），則更可證明華夏文化對這一地帶影響力之深邃。所以本文第一類組動物文飾流行的時段和地區，使用獸頭刀劍、鈴首刀劍和有銎兵器的人們，絕不能簡單地化約作使用戰斧與短劍，與南方華夏城邦迥異，而受亞利安人影響的民族。

利用考古資料分析民族文化，日用的陶器當比青銅禮器更具說服力。不過山西陝西在商代以前的陶器系譜，近年剛剛起步嘗試建立（參王克林 1984 、許偉 1989 ），它和青銅器的對應關係尚不明確，鄒衡把山西及陝西靠黃河邊的條狀地帶統屬於「光社文化」（ 1980, pp.271-275 ），然而對獸頭刀、鈴首劍和有銎兵之使用者的來源仍難以說明。林遮峪的提梁卣、桃花莊和張家坵的直線文簋，後蘭家溝和解家溝的斜角文分襠鼎（《山西》No.45 ；《陝銅》一， No.71 ），都存有二里岡上層的作風。這裡發現的裝飾藝術，商式禮器主導者，佩飾全是中原風格，但除像靈石旌介村那類大型墓外，一般則很罕見；最具地方特性的裝飾品是金珥，見於二郎坡、桃花莊、後蘭家溝、下辛角村、寺墕、李家崖和黑豆嘴等地（參呂智榮 1988 ）。這種裝飾藝術即使貧乏，和獸頭刀劍、鈴首刀劍、各式有銎兵器卻具同質性，構成一個共同文化圈，盛行時代和分布範圍基本上與本文所謂第一類組動物文飾符合。此文化圈包含衆多民族與地區性文化，但若與南邊華夏文明或後世北方游牧文明對比，他們的共通特性還是很顯著的。

（二）獸形文飾與燕山南北長城內外地帶之畜牧化和游牧化

向來討論中國古史存在著一個大架構，即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和南方平原農耕民族的二分或對立，對於殷商以下晉陝的非華夏民族也往往認爲是游牧民。然而不論就中國個別的資料或歐亞草原宏觀的角度而論，北方游牧化是歷史發展的特殊過程，不是一開始這裡的經濟型態就以游牧爲主的；從考古資料來看，早期毋寧是農業更重要。以中國北方的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而論，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聚落遺址多有定居的屋宇，出土器物以石刀、石鐮等生產工具及陶器爲主，但也摻雜相當數量的細石器，顯示這時北方的生產事業以農業占主要地位，狩獵或畜養不過是輔助的角色而已（王明珂 1993 ），和後來的游牧經濟截然異趣。

歐亞草原地帶之形成游牧經濟有其歷史過程， Vladimir N. Basilov 認爲氣候改變是一項重大因素，他引述 P. I. Dolakkanov 的研究（ 1987 ），西元前第三個千年歐亞草原帶的氣候趨於乾燥，在第二個千年的中期一度轉濕潤，但西元前 1200-500 年之間又出現新的乾燥期，這時一些早期農業文明紛紛衰落，譬如黑海北岸

的 Tripole 和中亞的 Namazga ，隨著草原與半沙漠地區的增加，飼養牲口乃取代農業而成爲這地帶的主要經濟型態（ V. N. Basilov 1989, p.5 ）。根據中國學者的研究，距今 3500 年前起，整個中國北方的氣候趨於乾冷。以鄂爾多斯朱開溝遺址地層剖面所獲得的孢粉分析和各文化期的動物種屬資料來看，從早期到晚期的氣候顯示由暖濕逐漸乾冷的趨勢。孢粉分析，朱開溝時期第一段多灌木與草本植物，也有喬木，係森林草原景觀；第二、三段喬木減少，屬於灌叢草原景觀，第五段木本植物以耐寒的松杉，草本植物以耐旱的蒿藜居多數，接近典型的草原景觀。各期的動物骨骼，報告未詳細區分，據發掘者田廣金氏綜述，野生動物有獾、熊、豹、馬鹿、麅和青羊，家畜有羊、牛、豬、狗。熊、豹之類的野生動物說明這一地區存在著較大的山林和灌木叢，家畜之豬和羊（以綿羊爲主）比例相近，分別爲 34% 與 35% ，牛次之，只有 15.7% ，尚未具備游牧經濟的特色（田廣金、郭素新 1992 ，田廣金 1993 ）。研究游牧社會的學者指出，當氣候乾燥化，農業逐漸衰落時，雜食的豬會與人爭奪野生糧食資源，草食的羊則可提供人類另一種糧食原料，人們自然養羊而捨豬，所以從豬骨與羊骨的出現比例可以推測一地乾燥化的程度（參王明珂 1993 ）。根據朱開溝的發掘報告，第一至第四段墓葬皆發現殉葬豬下顎骨的習俗（《考古學報》 1988 ： 3 ），此地氣候之趨於乾燥當在第五段以後，按照報告的斷代，約當西元前第二個千年中期。

中國的考古資料與文獻都顯示當北方逐漸乾旱時，這裡出現了與南方農業城邦對峙的社群和文化。不過從殷商到西周，他們的家畜畜養業即使日占重要，基本的生產仍以鋤耕農業爲主，大概自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以後，中國北方民族的社會與經濟才發生極大的轉變，從農牧混合經濟轉爲專化游牧經濟，也就是從「畜牧」轉爲「游牧」。伴隨而來的是形成與南方農業國家有別的游牧文化。游牧和畜牧雖然同樣飼養牲口，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則截然不同，具有本質性的差異。當然，促成這箇轉變的因素不限於氣候，馬匹使用的方式也占極重要的因素，這問題下文還會討論。

中國北方早期農主牧副的混合經濟型態，上述朱開溝即是一個典型的遺址。這裡因文化堆積深厚，時代延續長久，可以說明即使是後世游牧化很深的地方，

在新石器時代卻是農耕的。朱開溝位於鄂爾多斯高原東部，先後發掘四次，發現居住房址87座，灰坑207個，墓葬329座，甕棺葬19座，可復原的陶器五百餘件，石、骨、銅器八百餘件。報告者將這裡的文化堆積分作五段，對應於歷史時期，第一段是龍山晚期遺存，第二段夏代早期，第三段夏代中期，第四段夏代晚期，第五段商代早期（《考古學報》1988：3）。這批材料雖然分類不同，斷年也略有差異，基本上皆屬於龍山文化晚期到殷商（參崔璿1991）。根據原報告，這五期主要出土物是陶器和石、骨生產工具，後者以石斧和石刀最具代表性，也有石鏟和石鐮，基本的文化面貌是鋤耕農業文化，和後世的草原游牧不同。類似的情形亦見於甘青地區的齊家文化和遼西內蒙東部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齊家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都以鋤耕農業爲主要的經濟型態，夏家店下層文化如赤峰英金河、陰河流域甚且發現四十餘座石城（徐光冀1986）。鋤耕農業的士卒應該是步兵，但江上波夫卻認爲使用短劍戰斧的山岳武士包含步兵和騎兵。所謂騎兵或游牧民的說法，至今中國一般考古報告也不經意地流露，故有檢討的必要。

誠如上述，自西元前1500年以降，中國北方日益乾旱，但仍維持農主牧副的基調，朱開溝之後，最有力的考古證據之一是清澗李家崖商代遺址。這裡發現一座土石結構的古城，南、西、北三面環水，東西建築城牆，南北利用無定河河道的懸崖峭壁作屏障，深及百米。古城平面呈不規整的長方形，東西約五百米，南北一、二百米不等。土石並用的城牆結構爲商周時代中原地區所未見，當與其地理環境有關。遺跡除城牆外，還發現成組房屋建築，分爲三類，一是有夯土圍牆的院落式建築，二是夯土圍牆的單間房子，三是半地穴式房子，另外還有窖穴以及墓葬，顯然是一種定居的城邑文明。城址中出土石斧、石刀、骨鏟等生產工具，以及種類繁多的陶質生活用器，報告認爲該文化的經濟生產農業占主導地位，但也出土馬、牛、羊、豬、狗、鹿等骨骼，說明畜牧和狩獵占有一定的比例（張映文、呂智榮1988）。但相對於朱開溝而言，農牧所占比重有沒有明顯的升降，目前發表的資料仍難獲得解答。如果李家崖確實是鬼方，結合西周早期小盂鼎（下詳）周鬼之戰的記載，周人的戰利品包含不少牛羊，也許可以說是牧業加重的旁證。不過到西周初年，晉陝黃土高原地區的經濟大概仍然維持農主牧副的基調，周的

殖民城邦晉國對戎狄民族採取「啓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政策（《左傳》定四），賦稅方式以「貢」爲主，恐怕是因爲畜牧和狩獵佔相當比重的緣故（參杜正勝 1992, pp.499-500）。

自朱開溝第五段到李家崖，這裡居民的文化屬於本文所論動物文飾第一類組，他們是以獸頭刀劍、鈴首刀劍、各式有銎兵器和金珥作裝飾品的文化圈的民族，從聚落型態與生產工具來看，他們過城居和農主牧副的生活。這種社會經濟形態表現在軍事上，當不可能以騎兵爲主導，因此，在晉陝黃土高原地區，殷商到西周晚期以前，使用「北方式」青銅兵器的民族並不是游牧化的騎兵，我們從卜辭和金文也可證明這個看法。

商王甲骨卜辭雖然有不少與北方或西北民族戰爭的記錄，但幾乎沒有涉及敵方軍備或其作戰方式，只五期卜辭有一條透露一些信息，其辭曰：

……小臣牆比伐，擒危美

人二十四人，四……，人五百七十，隻百……

……車二丙（輛），盾百八十三，函五十矢，

……白𡆥于大乙，用幵白卬……

□于且乙，用美于且丁，𣪘曰京易（《甲骨文合集》36481正）

危，按董作賓《殷曆譜》（卷九）「武丁日譜」，征伐土方卜辭有下危（董氏隸定作下旨），當在土方附近，甚至可能是其邑。伯卬之卬，原作  ，與陝西綏德後任家溝出土三銎多孔銅刀的商墓之卬爵，當係同一字。所以這條資料應係商末商王朝征伐北方民族的卜辭。此役，商王朝至少俘虜六百多個敵人，以幾個族長做犧牲祭祀先王，獲得戰利品有183副盾牌，50函箭和2輛車，可見晉陝北部使用獸頭鈴首刀劍的武士應是步兵，但據稍晚的金文資料，他們也有車兵。

小盂鼎記述西周早期鬼方之役，告廟報功曰：

……孟以□□

伐鬼方□□□𢦏（馘）〔執𠬜（酋）〕二人，隻（獲）馘四千八百□十二馘，孚（俘）

人萬三千八十一人，俘馬□□匹，俘車卅兩，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

羊。……執訊一人，俘馘，

二百卅七馘，俘人□□人。

第一次戰績，執敵酋2人，獲馘4812，俘人13081，馬若干匹，車30輛，牛355頭，羊38頭；第二次執敵酋1人，獲馘237，俘人若干，匹104匹，車百餘輛。從第一次戰役來看，北方民族的主力軍可能是步兵，但參證第二次戰役，車兵也有一定的分量。所俘之馬可能拉戰車用，不一定是坐騎，因爲騎兵的出現還需要其他條件配合。

但到西周晚期，出現在晉陝北方的民族，軍隊結構似乎與以前的民族不同。此時晉陝北邊的民族即是文獻的玁狁，今存西周銘文關於玁狁戰役有傳世的虢季子伯盤、不嬰簋和扶風斗門鎮出土的多友鼎三器，另外扶風黃堆下務子村出土的師同鼎可能也涉及對玁狁的戰事。虢季子伯盤曰：

博伐厰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三代》17.19）

不嬰簋曰：

馭方厰允，廣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余命女御追于畧（洛），女以我車容伐厰允于高陰（陵），女多折首執訊，戎大同追女，女伋（及）戎，大敦戰（《三代》9.48）

這兩件器只提到「折首」「執訊」，看不出嚴允的軍隊結構，唯多友鼎與師同鼎詳記車馬，略可推測。鼎銘曰：

嚴允敄興，廣伐京自，……

……武公命多友率公車羞追

于京自。癸未，戎伐筍，衣孚（俘），多友西

追。甲申之晨，搏于邻。多友右（有）折一

首執訊，凡以公車折首二百又□又

五人，執訊廿又三人，俘戎車百乘

一十又七乘，衣復筍人俘。或搏于

龔，折首卅又六人，執訊二人，俘車

十乘，從至。追搏于世，多友或有折

首執訊，乃轄（逋）追，至于楊冢，公車折
首百又十又五人，執訊三人。唯俘
車不克，以衣焚，唯馬毆盡，復
奪京自之俘。多友乃獻俘、馘、訊
于公，武公乃獻于王（參田醒農、雒忠如 1981，劉雨 1983，李學勤 1981，李仲操 1982）。

這次戰事共歷五役，首戰于筍，大俘獲，銘文未記內容；次戰于郛，斬首二百多人，執訊 23 人，俘車 117 乘；第三役戰于龔，斬首 36，執訊 2，俘車 10；第四役戰于世，頗有斬獲；最後一役戰于楊冢，斬首 115，執訊 3，不能俘車，乃毆傷其馬。扶風出土的師同鼎曰：

弭昇其井，師同從，
折首執訊，俘車馬
五乘、大車廿、羊百，剌
用徵王羞于龜。俘戎
金冑卅、戎鼎女、鋪
五十、鎰廿（《文物》1982：12, p.45）

五乘之車馬是戰爭，二十輛大車是輜重。

從這幾次戰役來看，周人作戰主力是車兵，嚴允也有戰車，師同鼎云戎人有「車馬」與「大車」，其制如周；但多友鼎那百餘乘的「戎車」和十乘「車」是否專指戰車仍不能明白，所以戰車在嚴允軍隊結構的地位仍難斷言。多友鼎說：「唯俘車不克，……唯馬毆盡」，馬似乎是脫離車的單位，也許就是坐騎了。多友鼎的武公見於禹鼎，約值夷王厲王，師同亦見於永盂和同簋，大概值孝王夷王，總之接近西周晚期，對照《竹書紀年》所載周夷王「命虢公率師伐大原之戎，至于兪泉，獲馬千匹」，此時中國北方民族在戰爭上已相當依賴馬了。當然大原之戎飼養大批戰馬，也有可能如非子爲周孝王「主馬于汧渭之間」（《史記・秦本紀》），不能說都是騎兵的馬匹，但配合本文對於動物文飾的研究，金文和文獻隱然也指出西周晚期中國北方游牧化的趨向。如果師同鼎的鋪是銅鍑（李

學勤 1983），鎛是短劍，那麼嚴允和後代蒙古草原之游牧民族文化關係就更密切了。

然而中國古代記載北方民族一般攏統稱作「戎」或「狄」，造成不少混淆。今宜個別分析，以確定認識。如《左傳》桓公六年曰：

> 北戎伐齊，齊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

所俘士卒稱作「甲首」，應是車兵（參杜正勝 1990, pp.346-348），則春秋初期北戎侵擾華夏是有戰車的。《管子・大匡》亦謂齊桓公率諸侯敗狄人，虜「其車甲與貨」，車可能是戎車，狄人也以戰車與華夏爭霸。不過，一般而言，晉陝黃土高原多谷地，不利車戰，這裡的軍隊在騎兵盛行之前係以步兵爲主，春秋時代分別華夏與戎狄，常說「彼徒我車」（《左傳》隱九、昭元），華夏不是沒有徒兵，戎狄也非無車兵，但構成軍隊的核心，作戰的主力的確有「徒」和「車」的明顯對照。春秋晚期晉國戰無終之戎和群狄于大原，魏絳臨陣建議改車兵爲徒兵，遂獲大勝（《左傳》昭元），這是「以夷制夷」的有名事例。晉齊鞌之戰，齊頃公三度出入于晉軍以營救逢丑父，晉的聯軍有狄卒，據說「狄卒皆抽戈楯冒之」（《左傳》成二），持戈執盾的武士也應是步兵吧。

這種步兵兼車兵的戎狄文化上秉承殷商以來晉陝北方民族的傳統，有城邑國家的政治組織，過著農主牧副的經濟生活，並非逐水草的游牧民。春秋後期魏絳說：「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左傳》襄四）。服虔、劉炫都把「荐居」解釋作「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左傳正義》引），如果理解成匈奴式的游牧，恐怕是不符合事實的；杜預解釋作聚居，比較可從。《國語・晉語一》謂獻公伐翟柤，郤叔虎將「升城」，「被羽先升，遂克之」。翟柤這個狄人國家是有城的。《呂氏春秋・愛士》曰：趙簡子「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兵」。「登」同「升」，登城也。同書〈愼大覽〉曰：趙襄子攻翟，勝老人、中人（《淮南子・道應》作尤人、終人），左右謂之「一朝而兩城下」。老人、中人城到漢朝猶存，在盧奴西山中（高誘註）。不但山西的戎狄築城，陝西也不例外，《後漢書・西羌傳》曰：

荀吳滅陸渾之戎（西元前541），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

《史記・匈奴列傳》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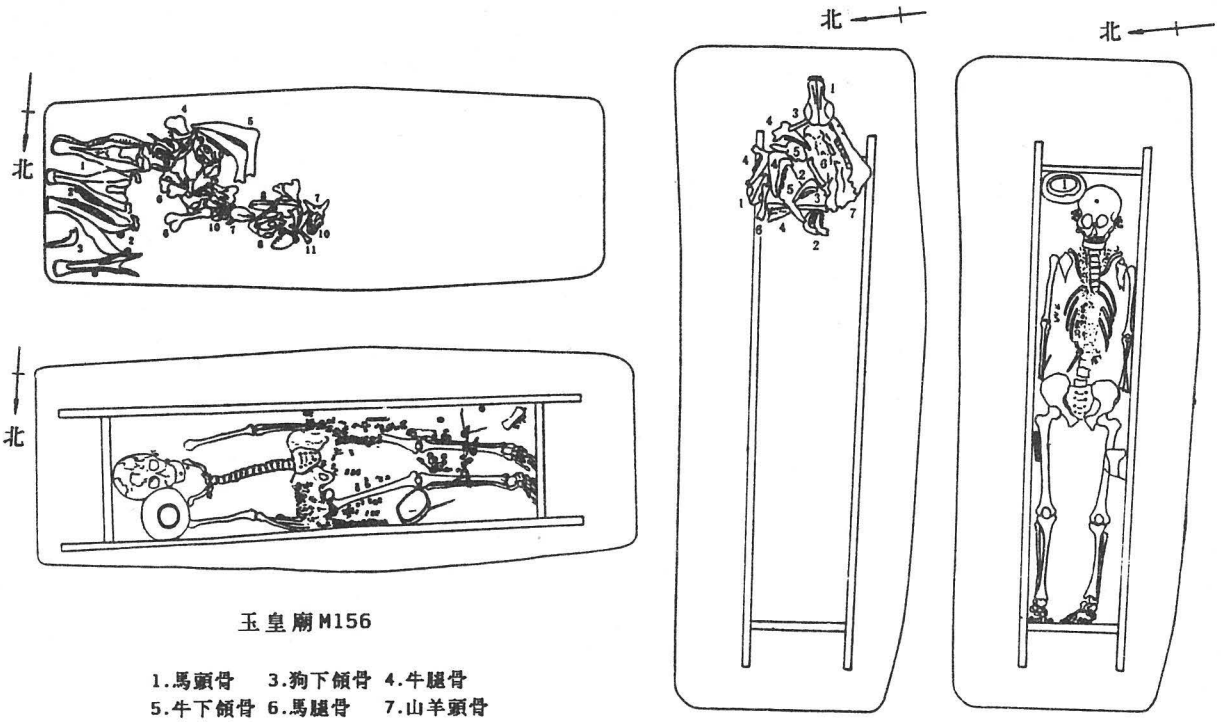
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

義渠之戎的國家是城邦，秦惠文君十年（315B.C.）伐之，取二十五城（《史記・秦本紀》）。這種以農業生產爲主要經濟型態的城邑國家如果愈往西往北推移，便是中原文化的發展，我們可以稱作「華夏化」。

殷商到西周晚期中國北方民族與文化的複雜性遠遠超出我們想像之外，不過大體上原來獸頭文飾流行的晉陝黃土高原逐步華夏化時，其北緣、西緣則逐漸畜牧化，從長城內外往東延伸，經燕山到內蒙東部和遼西，往西南經隴東、寧夏到甘青高原，構成一條農業與畜牧、游牧的分界帶。新石器時代南北共通的鋤耕農業文化遂一分爲二。這條東北西南走向地帶因個別條件不同，畜牧化過程容有先後，但大趨勢是一致的。西邊的齊家文化是鋤耕農業，到卡約文化便轉成畜牧經濟（俞偉超 1985, pp.207-209）；東邊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到上層文化也經歷類似的過程，二者並且進而游牧化。本文第二章所論刀劍柄上獸形及「觸角式」動物文飾的分佈範圍多數落在燕山以北、長城以外，從東北斜向西南走向的地帶正好是畜牧游牧帶的邊沿。尤其刀劍柄上獸形的文飾基本上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吻合，它的社會經濟型態，相較於先前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動物骨骼顯著增多，其品種除夏家店下層文化見過的牛羊豬狗鹿外，還有前所未見的馬。上層文化的陶器比下層文化質地粗疏，制作簡陋，火候低劣；生產工具只發現刈割用的雙孔半月形石刀，沒有鬆土的鋤鏟，農業經營技術有退化的傾向（劉觀民、徐光冀 1981）。這些現象說明鋤耕農業不再是這地區經濟的重心，然而本文所論畜牧化或游牧化還有其他證據，它與上文所述第二、三、四類組的動物文飾密不可分。

北京延慶葫蘆溝、西梁垙和玉皇廟三處東周墓地有殉牲的習俗，玉皇廟墓地約60%墓葬殉牲，葫蘆溝和西梁垙占25%。犧牲種類有狗、羊、牛、馬，以殉狗最普遍，數量最多，羊次之，牛又次之，馬最少，只規格較高的墓葬才殉馬。譬如玉皇廟M156是一位50-55歲的男性，馬牛羊狗四牲具全；M75是30歲左右的

女性，殉牛羊狗，無馬。一般而言，婦女罕見殉馬，兒童多殉狗（《文物》1989：8, pp.20-26）。河北宣化小白陽墓葬45座，殉牲者9座，占20%，以牛腿骨爲主，少數發現牛頭或馬頭（《文物》1987：5, pp.50-51）。延慶三處墓地和宣化小白陽皆出土柄上獸形青銅短劍和動物形體飾牌，可見殉牲習俗和獸形動物文飾流行的時期與地區有一定的關係。〔插圖三八〕



玉皇廟M156

1.馬頭骨　3.狗下頜骨　4.牛腿骨
5.牛下頜骨　6.馬腿骨　7.山羊頭骨
8.綿羊頭骨　9.羊腿骨　10.狗頭骨
11.狗腿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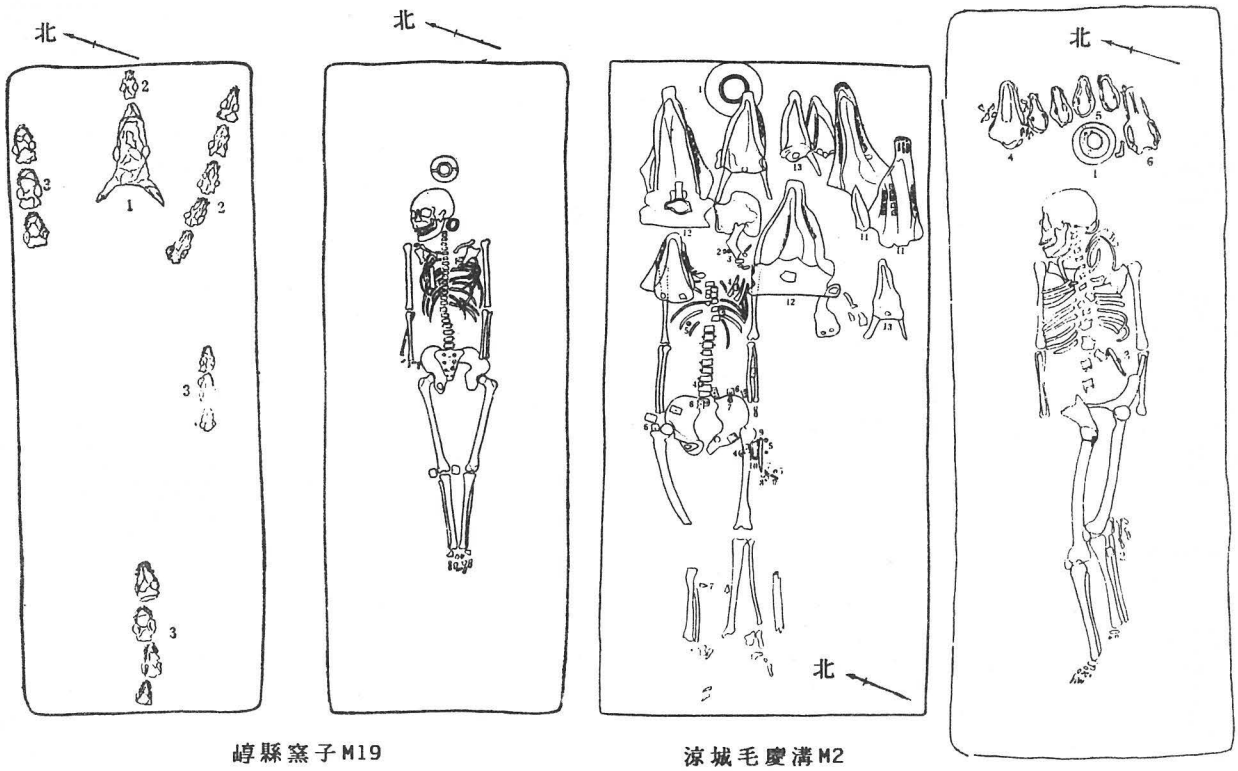
玉皇廟M75

1.狗頭骨　2.狗下頜骨　3.狗腿骨
4.羊下頜骨　5.山羊頭骨　6.羊腿骨
7.牛頭骨

插圖三八　殉牲墓葬之一（燕山地區）
（《文物》1989:8）

內蒙古涼城縣飲牛溝戰國晚期墓有的隨葬羊頭、豬頭、狐狸頭和羊肩胛骨（《內蒙文考》3, pp.27-28）。毛慶溝發掘81座墓葬，殉牲者23座，將近30%，以馬、牛、羊頭爲主，少數墓葬亦出羊肩胛骨（《鄂爾多斯》pp.306-311）。這裡出土雙鳥（獸）頭的「觸角式」青銅短劍，以及虎形和鳥形飾牌，是動物文飾牌流行的地區。杭錦旗桃紅巴拉M1不少馬、牛、羊頭骨，與透雕飾牌共出（同上，

p.203），准格爾旗玉隆太出土馬、羊骨及圓雕和透雕動物文飾（同上，pp.366-371）；出土鳥形透雕飾牌的涼縣崞縣窯子墓葬也發現羊下顎骨、馬、鹿、牛、豬和狗之頭骨（《考古學報》1989：1, pp.57-80）。〔插圖三九〕



崞縣窯子M19
1.牛頭骨 2.狗頭骨 3.豬頭骨

涼城毛慶溝M2
11.馬頭骨 12.牛頭骨 13.羊頭骨

涼城飲牛溝82EM9
4.羊頭骨 5.狸頭骨 6.豬頭骨

插圖三九　殉牲墓葬之二（鄂爾多斯）
（《鄂爾多斯》（左、中）　《內蒙文考》1984/3(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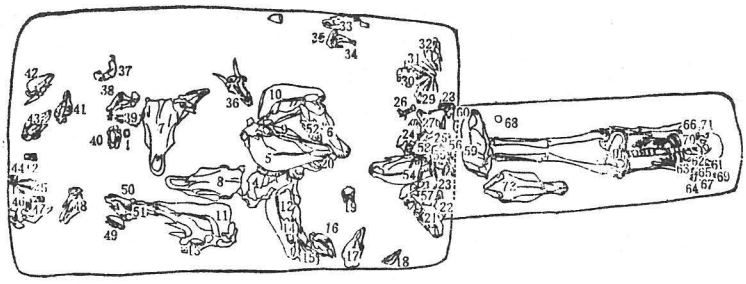
寧夏固原縣石喇村的青銅短劍，劍首獸頭，劍格兩個羊頭，同墓殉葬馬頭20個，牛頭4個，羊頭14個（《考古學集刊》3, pp.130-131）。呂坪村1988年發現出土動物飾牌及圓雕的墓葬，人骨架上有馬、牛、羊等牲畜頭骨層層疊壓，可辨認者羊頭骨20個、馬頭骨11、馬蹄骨12、牛頭骨4（《考古》1992：5, p.469）。截至目前考古發掘所知最多的殉牲墓葬群是在固原楊郎馬庄，東周墓49座，殉牲者21座，殉牲之種類與上述固原其他地區一致，都是羊、馬、牛，以頭、蹄代替全

牲。所殉之牲以羊最普遍，多者40具；其次是馬，多者10具。殉牲墓葬以IIIM3最多，54具，最少如IM8亦有4具。此一墓群也發現各式各樣的青銅動物文飾（《考古學報》1993：1）。另外西吉縣陳陽川村和固原大北山也有馬、牛、羊頭殉葬，同心縣倒墩子殉牛、羊頭，這些墓葬分別出土猛虎噬羊、豹，武士擒俘的飾牌（《考古》1990：5, pp.403-418；延世忠、李懷仁1991；《考古》1987：1, pp.33-37）。再往西南延伸，青海湟源大華中莊的卡約文化，也有殉牲的習俗（《考文》1985:5），這也是甘青地區游牧化以後才出現的現象。〔插圖四〇〕

上述各地墓葬殉祭的犧牲以牛羊居最多數，馬次之，狗除延慶之外，其他地區很少作爲殉葬動物。殉牲風氣的形成固然由於社會上存有大量牲畜，當時可能也以牲畜之多寡表示身分或財富；但更說明牲畜是人們生活的重要資源，衣食的憑藉，所殉之牲主要爲牛羊，正反映此一事實。這種盛行於春秋戰國的葬俗爲先前的考古文化（如夏家店下層或齊家、寺窪等文化）所未見，應當是這地區畜牧化加重，甚至轉爲游牧化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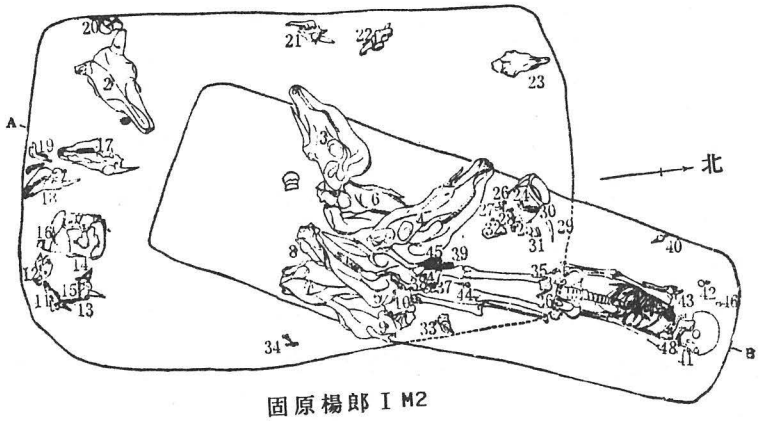
牧主農副的「游牧」和牧副農主的「畜牧」雖同以飼養牲畜作爲生產手段，二者的社會政治型態實有本質性的差別。《史記・匈奴列傳》說：春秋以前，北方西北諸戎狄，「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即是以畜牧經濟作基礎的社會政治型態。但像冒頓單于時代的匈奴，東接穢貉、朝鮮，西抵月氏、氐羌，橫亙東亞草原帶，凝聚成爲一個部落聯盟，絕不是畜牧能成就的事業，非游牧化到相當程度難竟其功。畜牧社會的武士仍是步兵，和農耕社會無大差別，但游牧社會的武士就變成騎兵了，游牧化的關鍵在於戰馬的訓練。

人類最早馴養馬匹大概在黑海北岸的草原，屬於紅銅時代的Srednij Stog文化，可以早到西元前第四個千年的上半。不過馴馬技術並未迅速推廣，即使Srednij Stog文化中，也要等到青銅時代中期才普遍，大約西元前2000年以後(Azzaroli 1985，pp.4-11)。不過，馬從家畜到拉車的牲口以至坐騎，每個階段都有一大距離，從坐騎到打仗用的戰馬也存在著相當寬廣的鴻溝。有人以爲馬與其說是「作戰」（fight）的動物，不如說是「逃跑」（flight）的動物，馬的眼光敏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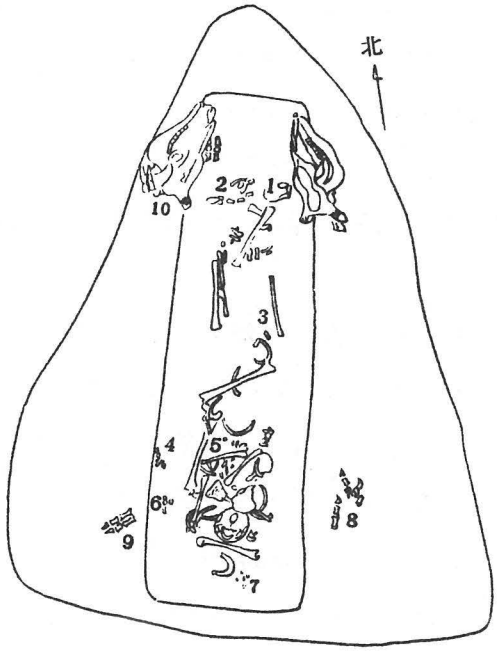
固原楊郎Ⅲ M3

5、7、12.牛頭　6、8-11、54-59、72.馬頭　13-52.羊頭



固原楊郎Ⅰ M2

1、2、5.牛頭 3、4、6-10.馬頭 11-23、33.羊頭



湟源大華中莊M39

8、9.牛蹄 10、11.牛頭

插圖四〇　殉牲墓葬之三（寧夏甘青）

（《考古學報》1993:1(上、中)　《考文》1985:5(下)）

聽覺清晰，嗅覺細膩，故反應特別靈敏，一有危險便逃逸（J. F. Downs 1961），所以掌握騎術，驅使作戰是高度的技術，戰馬的訓練與一般馬匹不可同日而語（H. G. Creel 1965）。即使同屬戰馬，戰車和騎射所具備的相關文化相也是截然不同的。

中國土生的馬種大概多屬於蒙古馬（Equus Prjevalskii），大頭，長臉，頭蓋強彎，縱剖面凸圓（ram-headed 或 Roman-nosed），眼睛位置較後，遠於鼻而近於耳，上唇垂在下唇上，頸、胸皆短，其前部外形稍凹而不凸，腿矮短（相對於其身長而言），蹄長而圓，踵狹窄，鬃毛散佈在雙耳與馬骨套（兩肩骨間隆起部分）之間，中間多、額毛少，尤其長尾是特徵，基部短毛、末稍長毛。蒙古馬的分佈區相當窄，從戈壁的準噶爾（Dzugaria）到科布多（Kobdo），北緯 48° 到 46°，東經 84° 到 90° — 91° 之間（參 Yetts 1934）。殷墟婦好墓所出玉馬的造型即屬於蒙古馬（《婦好墓》p.162，彩版三：2）。由於蒙古馬的染色體與家馬不同，多數學者不認爲蒙古野馬可以馴養成家馬（王明珂 1993），所以中國的家馬來源要從域外尋找，也就是說，中國與馬相關的文化很可能受到更早馴服馬的中亞或南俄的影響。

考古資料關於中國北方養馬的資料，新石器時代西安半坡遺址出土馬齒兩顆，趾骨一節，經鑑定不屬於家馬；龍山文化城子崖、湯陰白營等遺址的資料也不能肯定是家馬；齊家文化永靖秦魏家的馬骨遺存，年代較晚，可以不論。中原地區目前可以肯定無疑的家馬是在殷墟（周本雄 1983），東北則晚到夏家店上層文化（劉觀民、徐光冀 1981）。但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發掘統計，殷墟出土哺乳動物二十九種，估計總數，馬屬於 100 以下，比牛羊犬豬都少（楊鍾健、劉東生 1949），當時恐怕也不是普遍的動物。

殷墟的馬多與戰車共出，用於田獵、車戰，但是否用作騎射，長期以來爭議不休。小屯發現一個人馬合葬小墓（編號 M164），埋一人、一馬、一狗，另外一不知名動物和四件已殘陶器。馬骨大半腐朽，馬飾有羈、當盧和頷飾。報告者石璋如先生推測這匹馬似乎供騎射的成分多，而供駕車用的成分少。不過由於古書上沒有騎射的字樣，石先生對自己的推測比較保留（1947）。于省吾氏據此推測進一步闡述「先馬」卜辭，認爲「先馬」、「其先馬」、「馬其先」是騎馬前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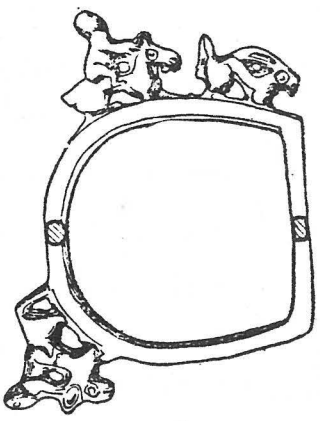
的意思，而「唯馬乎射，擒」即等於「惟令騎射，可以擒獲」，遂斷定殷代已經盛行單騎和騎射（1955）。後來有人解釋卜辭「貞象致三十馬，允其執羌」（《乙編》3381）也說，騎馬追捕逃亡奴隸（楊升南1982）。不過所謂「唯馬乎射」的馬是方國之名，卜辭有多馬方和多馬羌，故別辭作「唯多馬乎射，擒」（《殷契粹編》943），不能說是騎馬而射。于氏雖然推測多馬方係因多馬善射而得名，然而商王朝是否騎射，仍無證據。上文論述今日所見殷商和西周初期的戰爭資料，不論華夏民族或北方民族，皆只有步兵和車兵，此時即使已經以馬做爲載運之坐騎，騎射的出現恐怕還要更遲。

「騎射」和「車戰」是兩個異質性的文化階段，北方民族從車到騎的轉變與上論畜牧到游牧的過程是互爲表裡的，也經歷一段時間，而且各地步調並不一致。學者往往舉寧城南山根二道溝M3女性墓出土的騎士逐兔銅環，作爲夏家店上層文化在春秋以前已有騎射的證據（參《考古學報》1975：1, pp.136-139）。不過，根據同屬於夏家店上層文化，也同在寧城南山根的M102所出土的狩獵刻文骨板（《考古》1981：4, p.307），他們仍然駕車打獵，沿襲商周舊風。可見由車而騎非一蹴可幾。〔插圖四一〕大體上中國北方之騎射化大概在春秋時代完成，即西元前八至五世紀，這是從春秋晚期出現的殉葬家畜之墓可以獲得旁證的。譬如上述延慶玉皇廟M156和M76隨葬的馬、牛、羊和狗，以及屬於春秋晚期的桃紅巴拉M1。後者出土鐵刀、鶴嘴斧、箭鏃、透雕飾牌和馬銜、馬面飾，這是一位大約三十五歲左右的男子，隨葬九個馬頭、四個牛頭、兩個羊頭（《鄂爾多斯》p.205）。隨葬馬飾和馬頭可以確認是坐騎的象徵，箭鏃則表示主要武器是弓箭，一併構成騎射文化。誠如《史記・匈奴列傳》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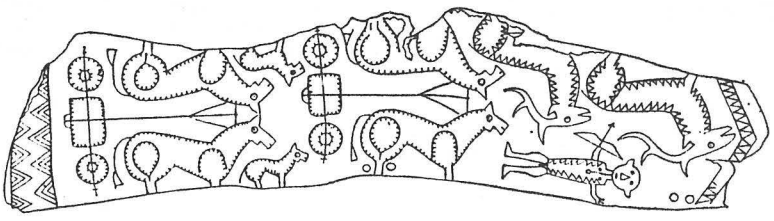
>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士力能毋（貫）弓，盡爲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

《集解》引韋昭曰：鋋形似矛，鐵柄。北方式青銅器雖也有矛伴隨出土，但作爲北方民族象徵的短兵則是短劍，稱作「徑路刀」（江上波夫1932）。最主要的戰備還是馬匹與弓箭。《鹽鐵論・論功》文學故曰：

> 匈奴雖無脩戟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貫弓上



1



2

插圖四一　夏家店上層文化的車騎

1.寧城南山根M3　　2.寧城南山根M102

（1.據《考古學報》1975:1　2.據《考古》1981:4）

馬也。

這才是眞正的騎射文化。

馬具也是考察騎射出現的憑藉。除上述桃紅巴拉M1外，河北灤平茜子溝M18出青銅短劍、鏃、節約、銅泡（《文物》1984：2, p.45）；宣化小白陽M2、20、31、3241出土透雕飾牌與銅泡（《文物》1987：5, pp.41-51）。內蒙土默特右旗水澗溝門透雕飾牌墓出馬銜（《鄂爾多斯》pp.306-313），涼城毛慶溝M59出馬銜、節約（《鄂爾多斯》p.249），准格爾旗西溝畔M2出土各種飾牌及馬銜、馬鑣

（《鄂爾多斯》pp.351-365）。寧夏中衛狼窩子坑M1、M3出土動物飾牌及多種馬飾（《考古》1989：11, p.976）。這些馬飾墓中，狼窩子坑報告者定在西周，可能失之過早，苘子溝約當春秋中晚期，其他皆從春秋晚期到戰國末葉。今日考古資料顯示，中國北方燕山長城以外開始騎射，大概不會早於春秋初期，但也不可能晚到春秋晚期以後。《管子・小匡》說齊桓公「救晉侯，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西元前八、九世紀，歐亞草原開始游牧化，到七世紀中葉，中國北方民族當然可能以騎射見長了。

進入春秋時期，中國北方開始游牧化後，新出現的藝術風格是刀劍柄上圓雕或浮雕全獸形的動物文飾，大體集中在河北北部、遼西和內蒙東部；流行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之單體動物形飾牌，使用地區從遼西經燕山南北到鄂爾多斯，然而偏於燕山和內蒙中部以東一帶；春秋晚期出現的雙鳥（獸）頭「觸角式」短劍則分布於張家口以西。從動物文飾來看，戰國中期以前，中國北方文化的區域性還很明顯，但到「觸角式」短劍及其變形一雙環首或單環首的青銅短劍出現時，伴隨各種帶框透雕動物文飾牌和圓雕動物，同一風格的藝術品分布地域遂大大拓廣，自東徂西，橫亙整個燕山長城一線之外，西南走向則達到寧夏、隴東或青海。也就是說，戰國中期以後，中國塞北逐漸出現相當一致的文化面貌，即是所謂的「匈奴文化」。

按《史記・匈奴列傳》的說法，頭曼之前，中國北方部族「時大時小，別散分離」。當戰國晚期，占據鄂爾多斯地區之部族，東有東胡，西有月氏，「東胡彊而月氏盛」，頭曼迫於秦將蒙恬，於是北徙。及秦末崩亂，乃得南下與中國爲界。冒頓射殺其父頭曼而自立，東滅東胡，西擊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於是東與穢貉、朝鮮接界，西與氐羌、月氏爲鄰，建立龐大的游牧國家。不過，北方草原政治的統一即使晚到秦漢之際，早在戰國中期就出現具有當地特色的文化通相。這是目前從動物文飾的時空分析得到的初步概念，恐怕與騎射在北方普及有關。總而言之，燕山長城內外地區的轉變，是中國北方游牧化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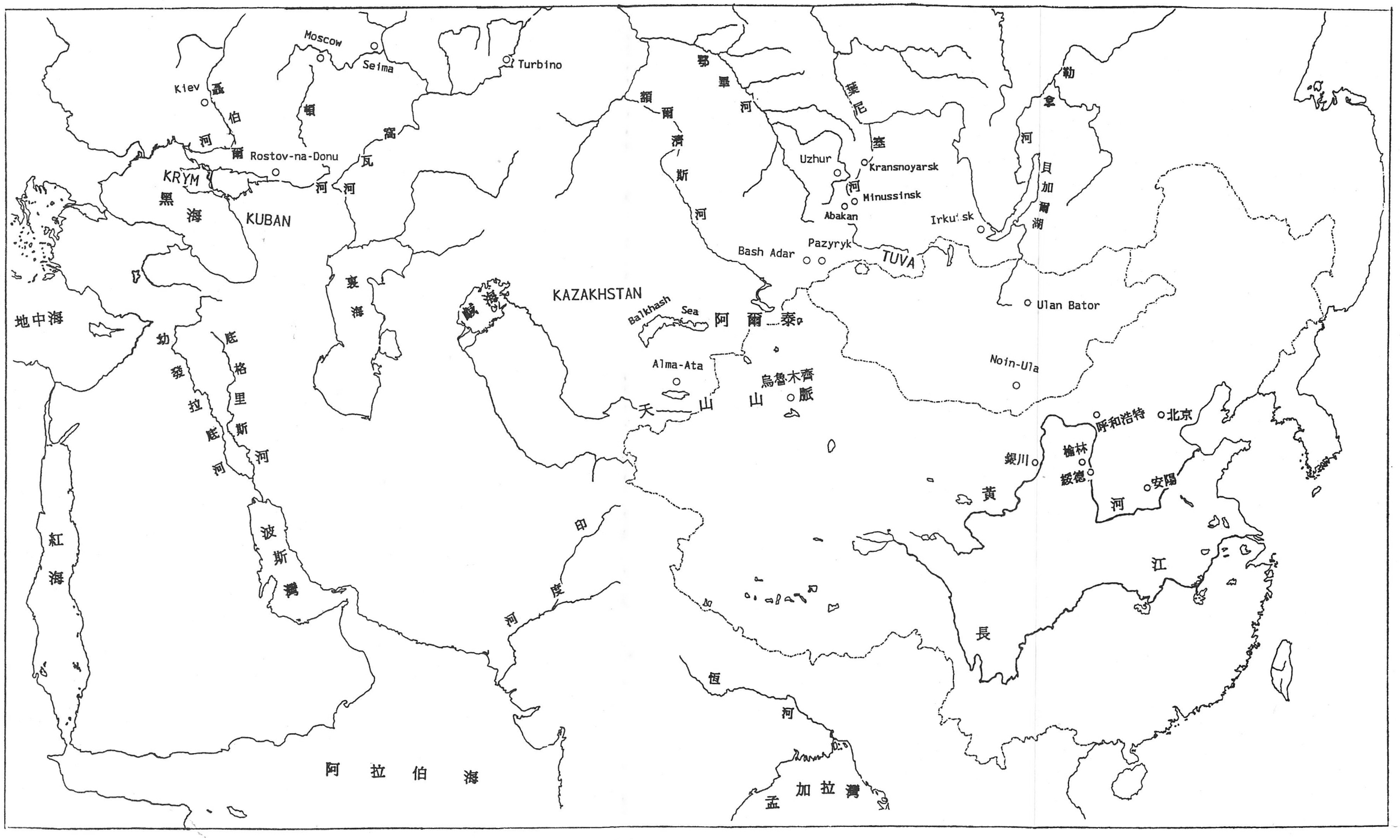
四、中國北方動物文飾是本土或是外來的問題

動物文飾所反映的北方民族文化或社會政治變遷，已如上章所論，唯歷來研究動物文飾的學者更關切的是此一藝術風格的始源地問題，焦點是：動物文飾的原鄉在南西伯利亞葉尼塞（Yenisei）河中游米奴辛斯克（Minusinsk）盆地的卡拉蘇克（Karasuk）文化，或是中國黃河中下游安陽的殷商？一般西方學界傾向原起於米奴辛斯克（Minns 1942），但也有不同的意見，正式討論見於本世紀中期歐美學者如高本漢（Karlgren 1945）、羅越（Loehr 1949a）和Karl Jettmar（1950、1967），遲至八十年代，中國學者如烏恩（1986、1984）、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pp.185-196）等與前蘇聯學者的商榷也不例外。〔地圖四〕

不過，分析中國北方動物文飾的起源，有的學者往往把本文所述第一類組和第二、三、四類組混合討論，也就是把殷商與戰國攏統放在一起。我們認爲應將文飾分門別類，才可能把握歷史實情，所以本章還是以上文的類組做基礎來論述。

（一）獸頭刀劍的故鄉

高本漢（Karlgren 1945）引述葉慈（W. P. Yetts 1925, pp.11-13；1939, p.31）和懷履光（White 1935）的意見，認爲動物文飾最早的資料在黃河流域，可以肯定中國對「動物文飾」的起源絕對有貢獻。他們兩人所謂的動物文飾包含青銅禮器而言，到高本漢才專就「斯基泰・西伯利亞式」的動物文飾提倡中國起源說；然而多數西方學者並不這樣看法，他們寧願把動物文飾的原鄉放在米奴辛斯克盆地。葉慈所謂黃河流域的資料係指安陽出土物，所以安陽的殷商文化與米奴辛斯克的卡拉蘇克文化孰先孰後，便成爲爭議的核心；論辯的手段是先解決這兩個地區文化的年代。高本漢定殷墟年代在西元前1300-1028，即十三至十一世紀，在他看來，A. M. Tallgren所承認西元前七世紀最盛行的斯基泰式動物文無法影響中國的商朝，不能做爲歐亞動物文飾（Eurasian animal style）的根源；即使S. A. Teploukhov所說大約始於西元前一千年的卡拉蘇克文化，相對於殷商也嫌晚，何況G. V. Merhart又放在一千年之後。倒是H. Kühn 遠推到西元前十三至十二世



地圖四　中國、南西伯利亞、阿爾泰、中亞、南俄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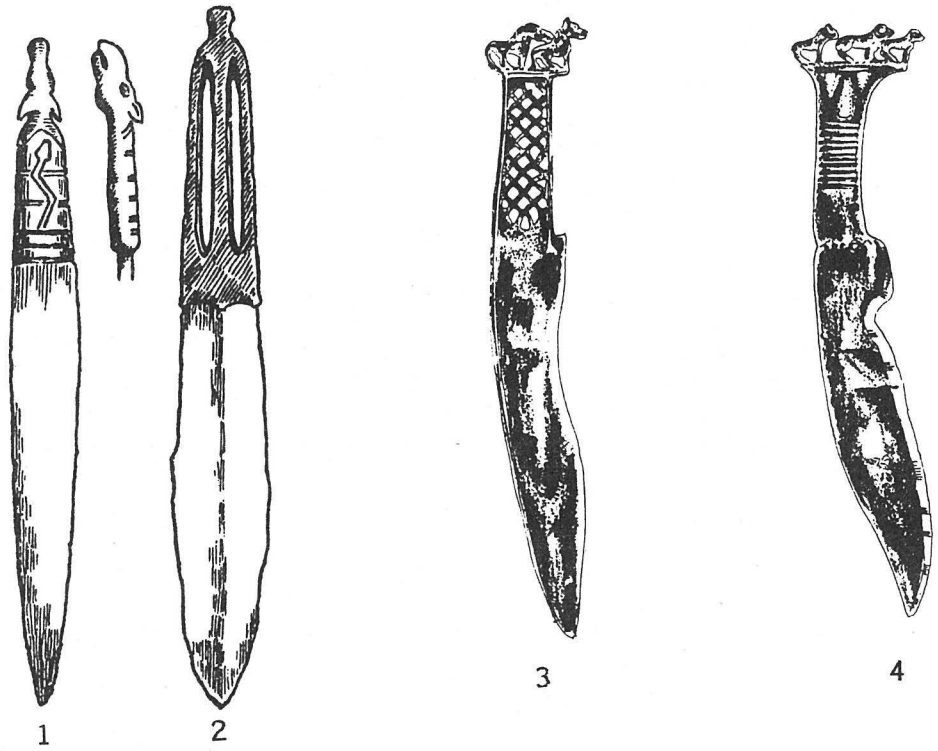
紀，似可與殷墟並駕齊趨。不過高本漢認爲卡拉蘇克文化的動物文飾多是採集品，單憑形制風格實難核定其絕對年代。

羅越（Loehr 1949a）反駁高本漢的論點，認爲高本漢引述前蘇聯學者的斷代不可靠，據V.A. Gorodzov，卡拉蘇克文化在西元前1500-1000年；Kühn以爲至少與安陽並時，在西元前1300年左右；Tallgren則把米奴辛斯克可與安陽比較的早期銅刀定在西元前1500年，再上推卡拉蘇克文化的前身，照羅越的編年，西元前2000年左右是Afanasieva（Afanasyevskaya）文化（在米奴辛斯克），1700年是塞伊馬(Seima)文化（在俄國中部），1600年是塞伊馬・安德羅諾夫(Seima-Andronovo)文化（在米奴辛斯克），1400年或稍後是卡拉蘇克文化，到1300年才是安陽。他說不論器物形制、年代學或石器時代層位（stone age substrata）都證明西伯利亞是動物文飾的老家，而這種文飾是構成安陽之成分的。

其實羅越估計南西伯利亞的年代偏早，據Mikhail P. Gryaznov的編年，安德羅諾夫（Andronovo）文化始於西元前第二個千年中葉，卡拉蘇克文化始於十三世紀（Gryaznov 1969, pp.89、97）；而他認定殷商的年代又取最晚的估算，以此推論米奴辛斯克影響安陽，說服力並不強。至於他所謂的石器時代層位大概指新石器時代（甚至早到中石器時代）骨、角或木器上的動物雕飾母題。Gregory Borovka發現北俄與芬蘭石製武器或木杓之一端裝飾有自然主義風格的雕刻（Borovka 1928, Pl.69）屬於石器時代；在烏拉山和Krasnoyarsk地區有骨角之動物形雕刻，其母題多是鹿、馬之頭，很可能屬於石器時代（同上，p.77，Pl.68）。雖然這類遺物保存到今日不多，但Borovka肯定它們與金屬品動物文飾有關聯（同上，p.278）。Minns即是此一論調的代表性學者之一，他相信動物文飾的原創者是住在北方麋鹿生存帶（Obi河北緯65°, Yenisei 60°，遠東50°）的人們，即使單純狩獵的麋鹿與游牧民豢養之牛、羊、馬不同，而雕刻質材木、骨、樺樹皮與金屬也不一樣，但Minns仍認爲當北方的游牧民（按，應作狩獵人）經過金屬工藝之部族地區，如Krasnoyarsk-Minusinsk，或Alta，他們把原來的骨木動物文飾藝術鑄爲金屬器，後來同樣地施用於中國人、伊朗人、其他西亞民族和希臘人。所以動物文飾的起源地既不在中國北疆或離伊朗不遠的中亞，以及高加索邊緣地帶，也不在南俄的

希臘殖民地（Minns 1942）。按，動物形象之雕塑是世界各地文化普遍的現象，北亞新石器時代之有動物雕刻藝術並非特例（參 Anatoly I. Martynov 1991, p.20, Pl.10、11），Borovka 所舉的證據，除出於芬蘭泥炭沼（peat bog）的木杓柄端裝飾之動物頭近似本文所論的動物裝飾外，其餘可以確定爲新石器時代的動物藝術只能認爲是一般動物造像而已。而且新石器時代的資料離青銅時代到底太遙遠，作爲青銅刀劍動物文飾的前驅，A. M. Tallgren 早就存疑 (Tallgren 1937, p.117, Note 2) 高本漢也認爲過於大膽（Karlgren 1945, p.140，Note 1），故這層暫且不論，現在只比較青銅器之動物文飾。

羅越引證 Tallgren 所舉較早的資料是四件塞伊馬文化的短劍和兩件短刀，定在西元前 2000 年稍後。〔插圖四二〕其中一把鹿頭（elk-headed）劍，雕刻象形鹿頭



插圖四二　塞伊馬（Seima）文化之短刀劍

1-2 Novgorod　　3.Seima, central Russia

4.Turbino, Kama河上游, Urals中段西部

(1-2 據Loehr1956　3-4 據Gimbutas1965)

（按，疑似馬），無環，短柄刻有五道橫淺線文（參 Loehr 1956, p.95）；刀則在柄端鑄有兩、三隻立馬，柄或交叉刻文，或橫刻文。吉列婼娃 (N. L. Chlenova) 就銅刀形制把塞伊馬文化斷在西元前九至八世紀，雖然引起批評 (Chernykh 1992, pp.268-269)，有人認爲最早可以早到西元前十六至十五世紀（同上，p.194），但也有人認爲約與殷虛同時，大概介乎西元前 1450/1400 和 1300/1250 之間 (Gimbutas 1965, pp.104-105)。總而言之，可以肯定羅越的斷年偏早太多。所謂塞伊馬・士比諾 (Seima-Turbino) 文化分佈甚廣 (Chernykh 1992, p.192)，今難詳論，但就這幾把銅刀來說，有人認爲以環之有無，柄的長短來判斷，塞伊馬文化不早於卡拉蘇克，根源來自烏拉山南、中部（Sulimirski 1970, pp.281-285），它的刀劍不能作爲卡拉蘇克文化的祖型；尤其柄端立獸的風格，根據本文排比第二類組的資料，不論在南西伯利亞（下詳）或中國，年代皆顯然偏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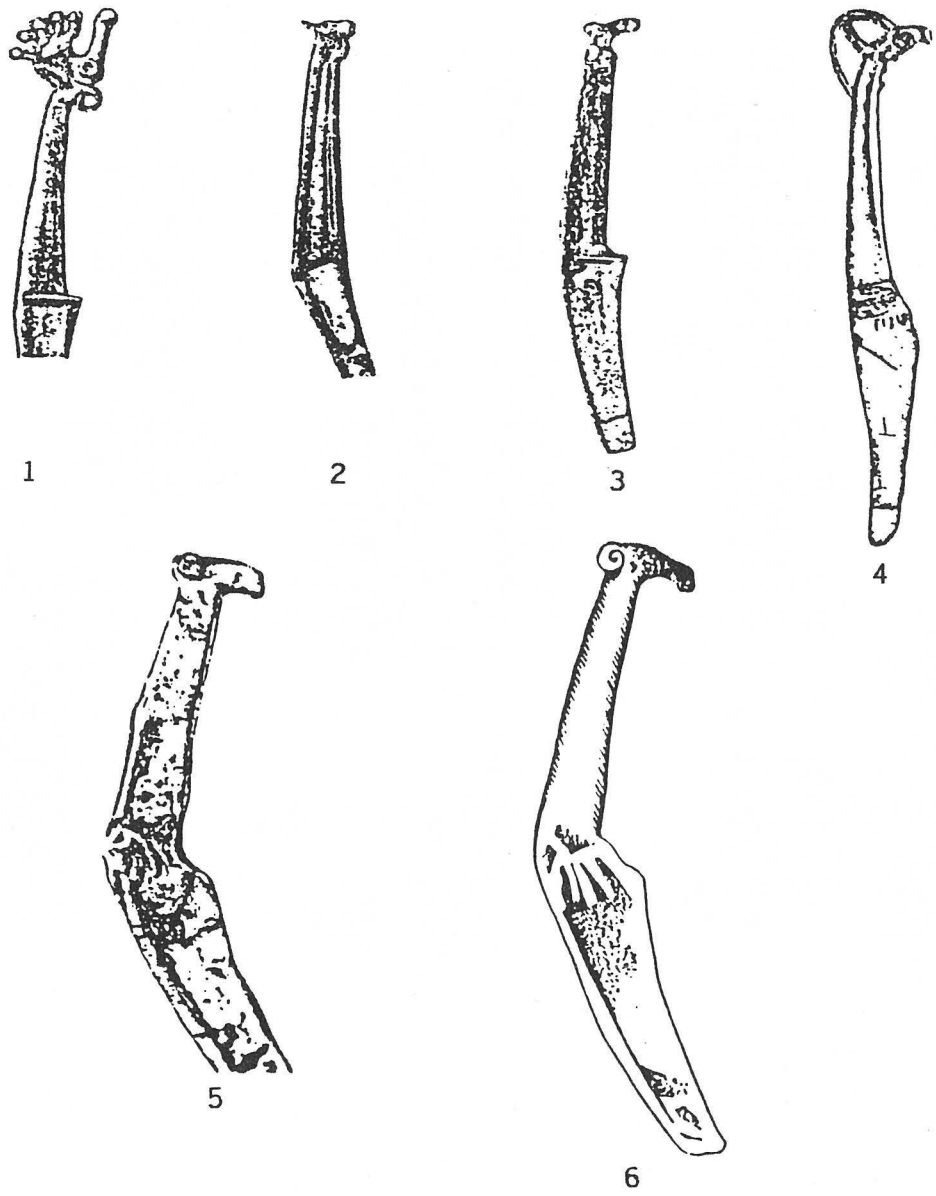
不過，這些歧見歸結在於南西伯利亞考古學年代尚無定論，各家對安多羅諾夫文化和卡拉蘇克文化推定的年代差距甚大。卡拉蘇克文化的上限有人提早到西元前 1500 年，也有晚到 1000 年左右之說，下限則在 1000 年和 700 年不等（Loehr 1956，p.93 引 Gorodzov、Teploukhov 與 Kiselev 之說）。據研究，繼安德羅諾夫文化之後，卡拉蘇克文化是一種外來文化，進入米努辛斯克盆地大概在西元前十二世紀（Sulimirski 1970，p.305）。我們雖然不像有些中國學者寧取極晚的意見（如烏恩 1984），不過一般而言，殷墟至少不晚於卡拉蘇克文化。吉謝列夫利用典型的格拉茲科沃白玉環和裝飾賽驢形象的銅刀，推斷西元前 14-13 世紀，內蒙的「卡拉蘇克」式銅器與安陽的銅器平行出現，而在西元前十二世紀初期北傳（吉謝列夫 1981，p.87），這種看法基本上可從。所以關於年代學的辯論，高本漢所謂安陽始於西元前 1300 年是最保守的估計，何況在中國地區出現的歐亞草原動物文飾，殷墟並非最早的，上文舉出藁城台西村的羊頭刀（第二章第一節）就比殷墟早，因此，羅越論述動物文飾起源的年代架構，壓晚殷墟而提早卡拉蘇克，從而證明南西伯利亞影響中國，是缺乏足夠說服力的。

另外就形制風格而論，吉謝列夫（S. V. Kiselev）說，卡拉蘇克文化的動物文沒有眼洞或鼻孔，耳朵輪廓線不夠清晰，也無內圈。據 Uzhursk 地區 Mariasovo 村

所出的鹿頭刀、Abakan 附近 Krasny Iar 村的小公牛折背刀、Irdinsk 地區 Bellyk 村的綿羊頭刀、Abakan 附近 Ulus Krasny Iar 的公羊頭刀和米奴辛斯克博物館收藏的羊頭折背刀（參 Jettmar 1950），以及其他米奴辛斯克盆地出土的獸頭刀（Karlgren 1945），這些動物文飾的風格與晉陝冀三省北部出土的獸頭刀有相當距離，而且失之簡陋草率，所以米努辛斯克盆地恐難作動物文飾的原生地。〔插圖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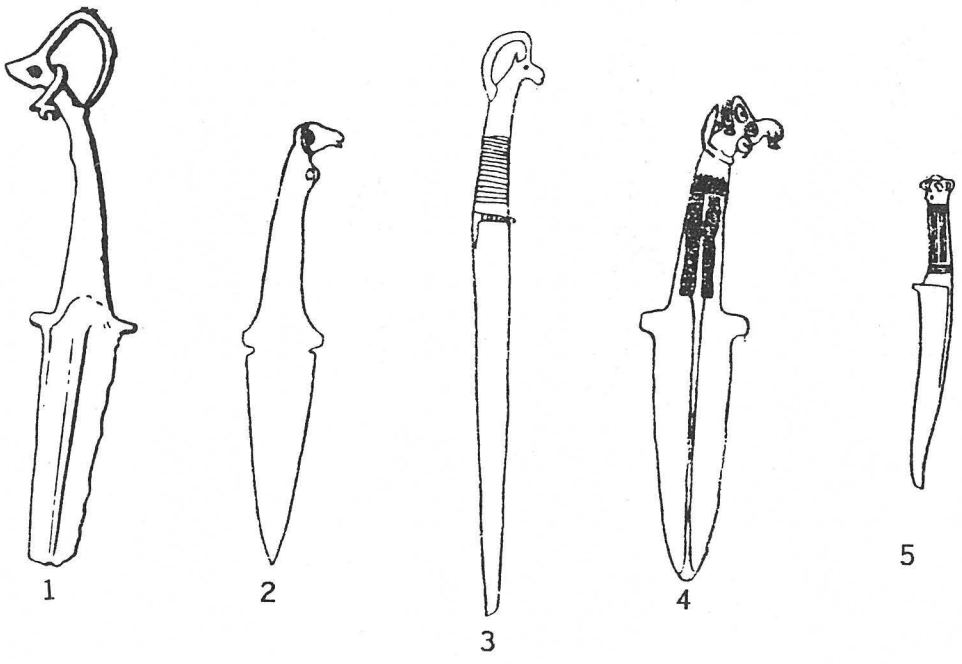
長期以來學界爭論動物文飾的起源地只在米奴辛斯克盆地和安陽之間選擇，故分別努力建立二地的考古年代學。大體上，安陽比較清楚，米奴辛斯克的說法就很分歧，直到最近依然停留在衆說紛紜的階段。其實，卡拉蘇克文化獸頭刀劍與習知的動物文飾頗有距離，安陽出土的獸頭刀劍也不「純正」。雖然目前所知北方動物文飾之武器和工具，以安陽出土的數量最多，但相對於殷商銅器風格而言，獸頭刀的動物文飾並非主流（陳芳妹 1992），這也是我們分判華夏與戎狄的一項標識。安陽的獸頭刀，刀身具備華夏傳統刀制的形式，柄端獸頭上下無環，馬耳或牛、羊角皆平貼，與北方所見帶環豎耳彎角的結構不同。也許數十年來所爭辯的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從今日考古證據來看，與中國燕山南北、長城內外地帶所出殷商周初獸頭刀劍最相似者，是在蒙古和外貝加爾湖附近，並不在米奴辛斯克盆地。烏恩舉證蒙古境內所發現的三把獸頭曲柄彎刀、一把鹿首劍與外貝加爾兩把獸頭劍和一把獸頭殘刀劍（？），〔插圖四四〕確定與中國北方的獸頭刀劍沒有二致，認爲南北這兩個地方青銅文化存在著極密切的關係，而且具有同步發展的趨勢（烏恩 1986）。

四十多年前 K. Jettmar 已試圖擺脫米努辛斯克與安陽動物文飾孰先孰後的問題，而提出外貝加爾地區（Transbaikalia）與中國北方、鄂爾多斯和葉尼塞河中上游存在著文化交流的關係，雖然它們之間可能是各自發展的。他又引用人類學家 Dcbets 的意見說，卡拉蘇克時期的人頭骨是 Sinid，不是 Europoid，於是推論在西元前第二個千年早段，中國北疆鄂爾多斯有一股移民潮進入米努辛斯克盆地，這批人跟製作像卡拉蘇克之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主人似有親緣關係，遂推測商代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是由中國北疆之人（Sinides）製造的（Jettmar 1950；1967,



插圖四三　卡拉蘇克（Karasuk）文化獸頭刀

1.Mariasovo（Uzhursk地區）2.Krasny Iar（Abakam地區）
3.Bellyk（Irdinsk地區）　4.Ulus Krasny Iar（Abakan地區）
5.Minusinsk Museum　6.Minusinsk Basin
(Jettmar1950)



插圖四四　貝加爾地區與蒙古的獸頭刀劍

1.Koto Köl　　2.外貝加爾赤塔州

3.蒙古境內　　4.蒙古南戈壁省伯彥塔拉鄉

5.蒙古境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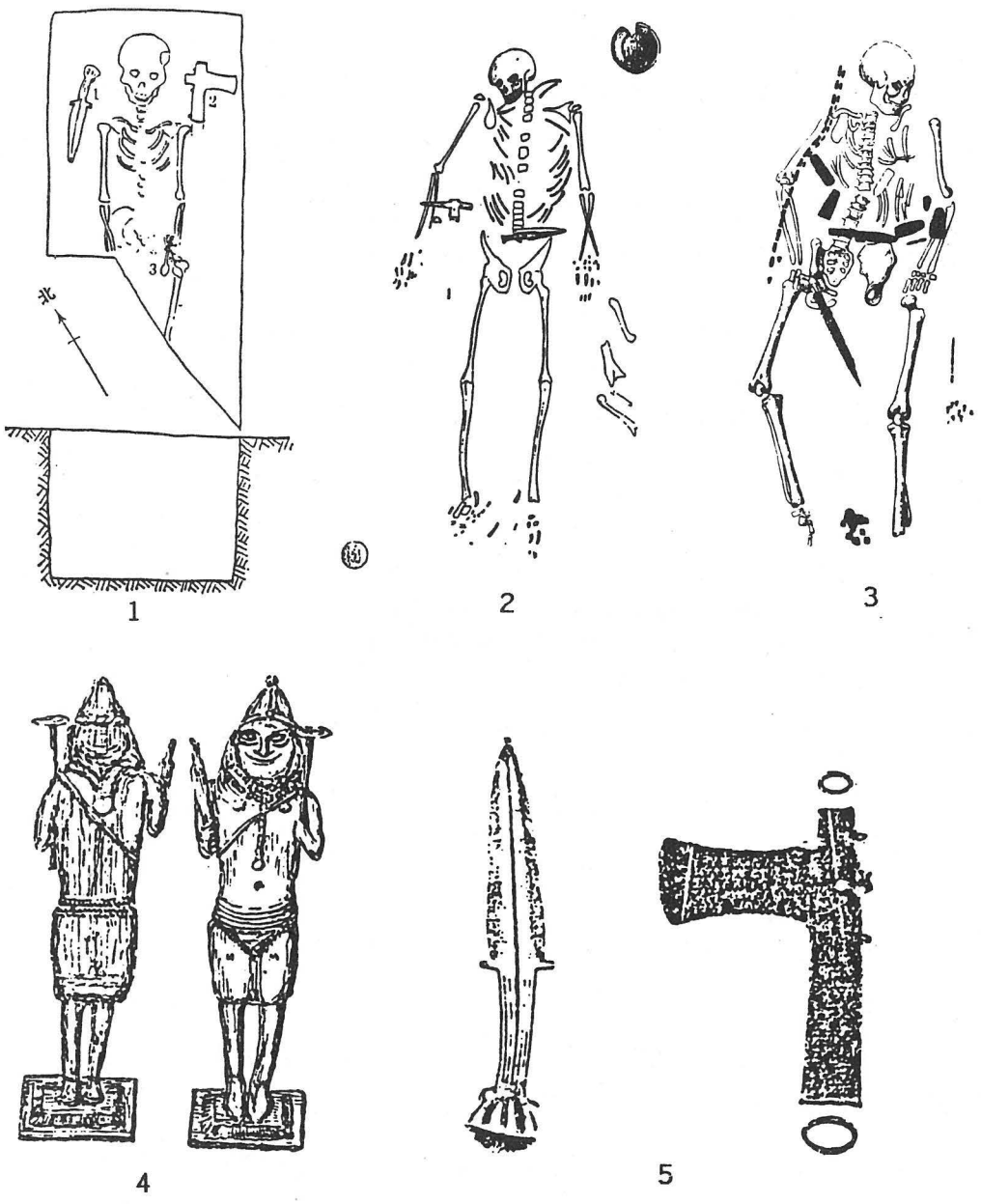
(1.據Jettmar1950　　2-5 據烏恩1986)

p.71 ）。吉謝列夫《南西伯利亞古代史》（ 1951 ，中譯本 1981, pp.57-58 ）引述捷別茨所論卡拉蘇克時期米努辛斯克盆地人種的理論，認爲大量滲入來自東南方的蒙古人種華北類型，與其以前的阿凡納謝沃・安德羅諾沃 (Afanasieva-Andronovo) 類型居民融爲一體，歐羅巴長顱型的人種要到塔加爾時期 (Tagarskii Period) 才在這裡出現。這些人種學的意見也可以佐證關於工藝文化源起或傳播的討論。

中國學者如烏恩（ 1984 ）、和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pp.193-195 ）傾向於從形制的發展及其精緻程度來論斷北方式青銅器源出於鄂爾多斯，後者近年還從內蒙古自然生態的乾旱化說明游牧化及獸頭刀劍等草原文化的誕生（田廣金、郭素新 1992 ）。他們都認爲自黃河流域經蒙古或內蒙古東部、外貝加爾湖、圖瓦（ Tuva ）至葉尼塞河中游，早在商周時期已打開一條通道（烏恩 1986 ，田廣金、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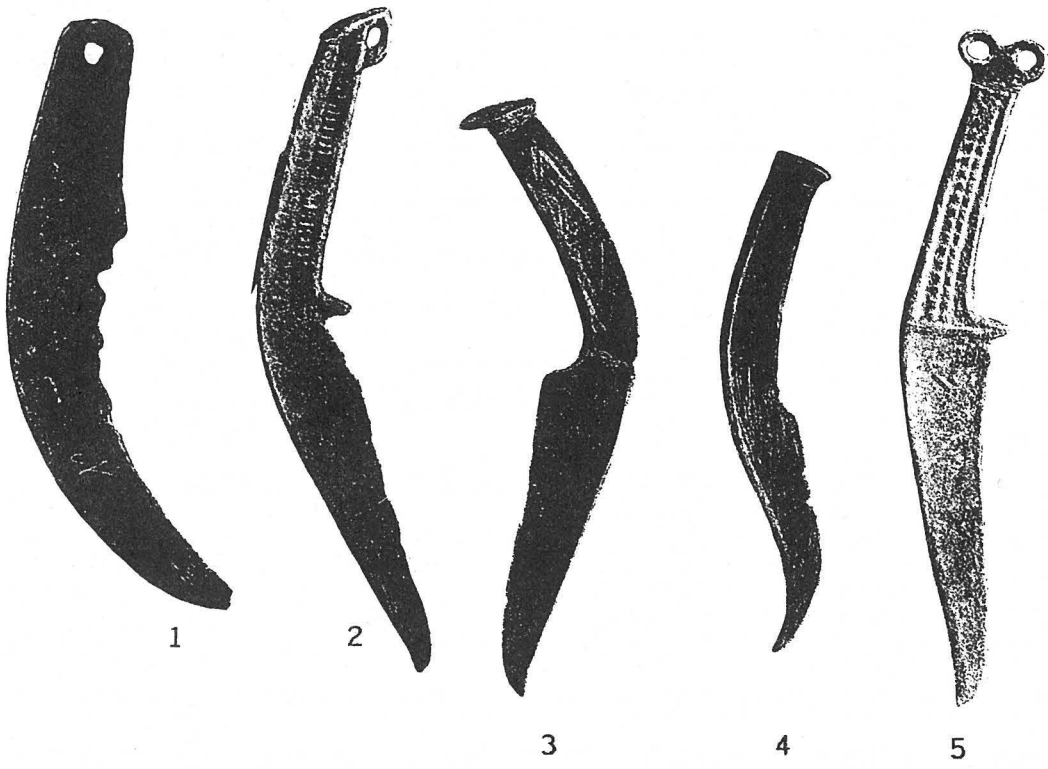
素新 1992 ）。這種看法與上述早年Jettmar的意見可謂異曲而同工。事實上不論中國北方與外貝加爾湖、米努辛斯克盆地，或更遠的西方，大概早有間接或直接的聯繫，即如本文第三章討論江上波夫所謂短劍戰斧民族，在這廣大地區內似亦有藕斷絲連的痕跡。有限的資料顯示南西伯利亞 Ujunjul 村西元前十至七世紀之墓葬，腰間放置一把青銅短刀，右側一件鶴嘴斧（參 W.Watson 1971, p.62 ）；貝加爾湖地區 Ponomarevo 第十二號墓隨葬一刀、一匕首、四斧及弓箭等物（參 *Avent les Scythes*）；E. H. Minns 引用 W. Radloff 《南西伯利亞》（ *Aus Sibirien* ）著錄阿爾泰出土的一件青銅鑄像，頭戴尖盔武士，右手持短劍，左手挾戰斧（ Minns 1913, p. 251 ）。這些例證和山西吉縣城關上東村的商後期短劍戰斧墓（《考古》1985：9, p. 848 ）極其相似，而第三章所述，晉陝黃河兩岸共出鈴首劍和管銎斧的墓葬也應從這個角度來解釋。〔插圖四五〕目前資料雖然少，但它們提示的歷史現象恐怕不宜輕易忽略。

隨著晉陝北部獸頭青銅兵器之出土，愈來愈多的中外學者逐漸把本文所分第一類組動物文飾的原鄉定在燕山南北長城內外一帶（ W. Watson 1971, pp.52-63 ；烏恩 1984 ；鄭紹宗 1984 ，林澐 1987 ；翟德芳 1988 ；陳芳妹 1992 ）。以這裡做中心，探索歐亞動物文飾的發展，以及和南方的安陽、北方的蒙古、外貝加爾與米努辛斯克的關係，可能是一個值得嘗試的研究方向。不過有兩點須納入考量。第一，上舉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蘇克文化的獸頭刀，折背彎刀佔極大的比重，此一形制亦多見於非獸頭的銅刀 (Martin 1893, Pl. 10-13)〔插圖四六〕，卻是中國北方所沒有的。第二，長城內外地帶與米努辛斯克盆地之間的聯繫地帶是否只有蒙古或其東部，由於外蒙與新疆關於這時期的考古工作極其有限，現在似不宜過早斷言。不過據新疆哈密花園公社採集的鹿頭銅刀（《新疆》No.59 ），屬於本文第一類組，歐亞草原的聯繫恐怕是多方向的。而且這個中國北方中心論的假設亦非毫無障礙，直到今日北方獸頭刀劍的動物文尚無足夠資料建構藝術風格發展的譜系，與它共出的文化也還不足以建立本身的年代發展序列。歸根結蒂，關於獸頭刀劍動物文的淵源，向來的討論仍嫌簡化，在歐亞草原帶考古年代學未精確化之前，獸頭刀劍原鄉的爭議，恐怕還不會停止。



插圖四五　短劍戰斧之組合

1.山西吉縣上東村　2.Ujunjul, south Siberia
3.Ponomarevo, Lake Baikal　4.Altai
5.山西石樓曹家垣
(1.《考古》1985:9　2.Watson1971　3.Avant les Scythes
4.Minns1913　5.《文物》1981:8)



插圖四六　米努辛斯克（Minusinsk）盆地之折背彎刀

1.Samodourowka　2.Gorodok　3.Nowosiélowo

4.Outy　5.Ouibat Steppe

（據Martin1893）

（二）北方動物文飾母題的域外成分

學者對米奴辛斯克與安陽孰先孰後的討論，基本上是以文化傳播論爲前提的，有人反對這種研究態度，認爲鄂爾多斯動物文飾藝術與米奴辛斯克裝飾之相似並不必然證明兩地孰主孰從的影響，也有可能是因爲相似的背景、信仰、習俗和傳統而造成的。它們之間固有地域和時代的差異，但「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群普遍的特色倒可以說是草原經濟和生活形態的結果（D. Carter 1957，pp.87-88）。雖然天下有許多「心同理同」的事，文化創造往往可以不謀而合，但我們也不宜輕忽草原地帶文化傳播的快速，尤其是游牧化以後，不同地區相互的影響遠遠超出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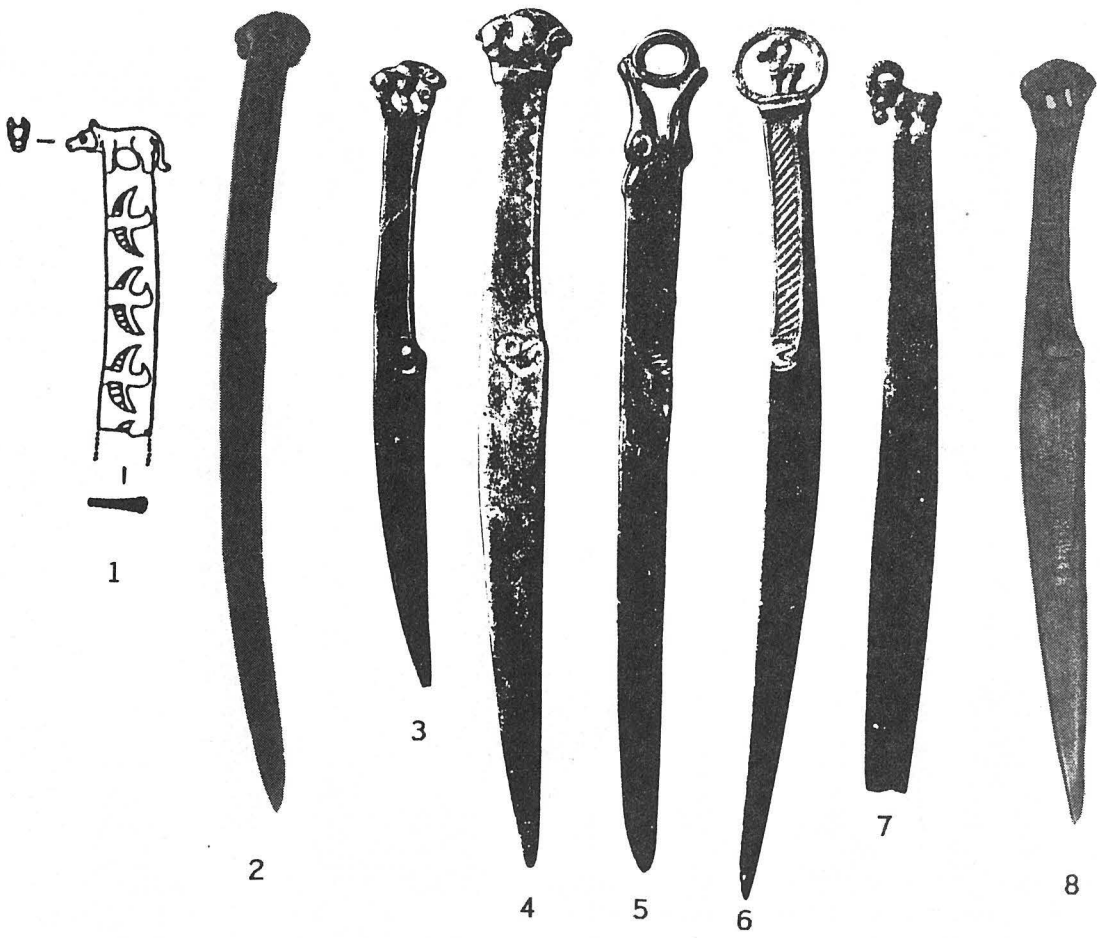
業社會，這是檢討本文動物文飾第二、三、四類組應該考慮的因素。（參地圖四）

如果早在殷商時期燕山長城地帶和遙遠的漠北或外貝加爾地區已有直接或間接的來往，春秋以下，北方逐漸游牧化後，此地帶與域外的交通必更頻繁，不同文化的融合當更容易。因爲歐亞草原文物的斷代往往須借助於南方文明古國，如中國、伊朗、兩河以及希臘，各家說法遂相當歧異，這裡對於第二、三、四類組的動物文飾不想推定其「源」與「流」，只提出它們所包含的域外成分，這恐怕也是歐亞草原帶在馬匹大量使用後的必然現象吧。

1. 武器與工具動物文之比較

先比較刀劍柄端、柄身之獸形文飾。建平採集的一件殘銅刀，在這兩個部位皆有動物文飾。此風格之刀劍，南西伯利亞亦有所發現，圖瓦共和國（Tuva）採到一把青銅短刀，柄端鑄一獸，大概是熊或野豬，柄身浮雕四隻長角麋鹿，屬於早期游牧文化（*SGH*，No.185）。E. H. Minns 著錄西伯利亞發現的一件，風格相近（1913，p.247，圖 165）。圖瓦採集的標本，四足獸之眼、鼻、蹄、尾皆作圓形凹圈，近似嵌窩。河北延慶玉皇廟、宣化小白陽、灤平茜子溝、唐縣釣魚台的動物形體飾牌，在這些部位都留有嵌窩或嵌孔（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一小節），意匠與圖瓦相同。至於柄身動物文的排列方法，見於河北平泉東南溝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所出之短劍（《考古》1977：1, p.53），唯後者筆法寫意，不如這件標本顯示寫實的風格。單是柄端獸形的標本比較普遍，中國方面出土地點明確者，如河北隆化三道營駱駝梁 M8、遼寧寧城南山根 1958 年清理的墓葬，以及北京延慶軍都山玉皇廟 M95 等標本。聖彼得堡冬宮（Hermitage）博物館收藏從西伯利亞 Krasnoyarsk 地區 Beiskoye 村與 Koryakovo 村採集的銅刀，柄首分別鑄山羊與野豬，屬於塔加爾文化（*SGH*, Nos. 166、168），還有其他類似標本，亦出於米努辛斯克（Borovka 1928, pp.44、101，Pl.39）。這種裝飾全形動物的風氣，西伯利亞發現的武器還有啄戈形的戰斧，其動物造形有猛獸，也有山羊（*SGH*，Nos. 165、175），唯皆採集品，屬於塔加爾文化。塔加爾文化約從西元前七世紀至西元後一世紀（M. P. Gryaznov 1969, p.213），上述諸件早者可到西元前七世紀，晚者五世紀（據 *SGH* 標定的年代），屬春秋時期，與中國北方所見同類型的刀劍並行。〔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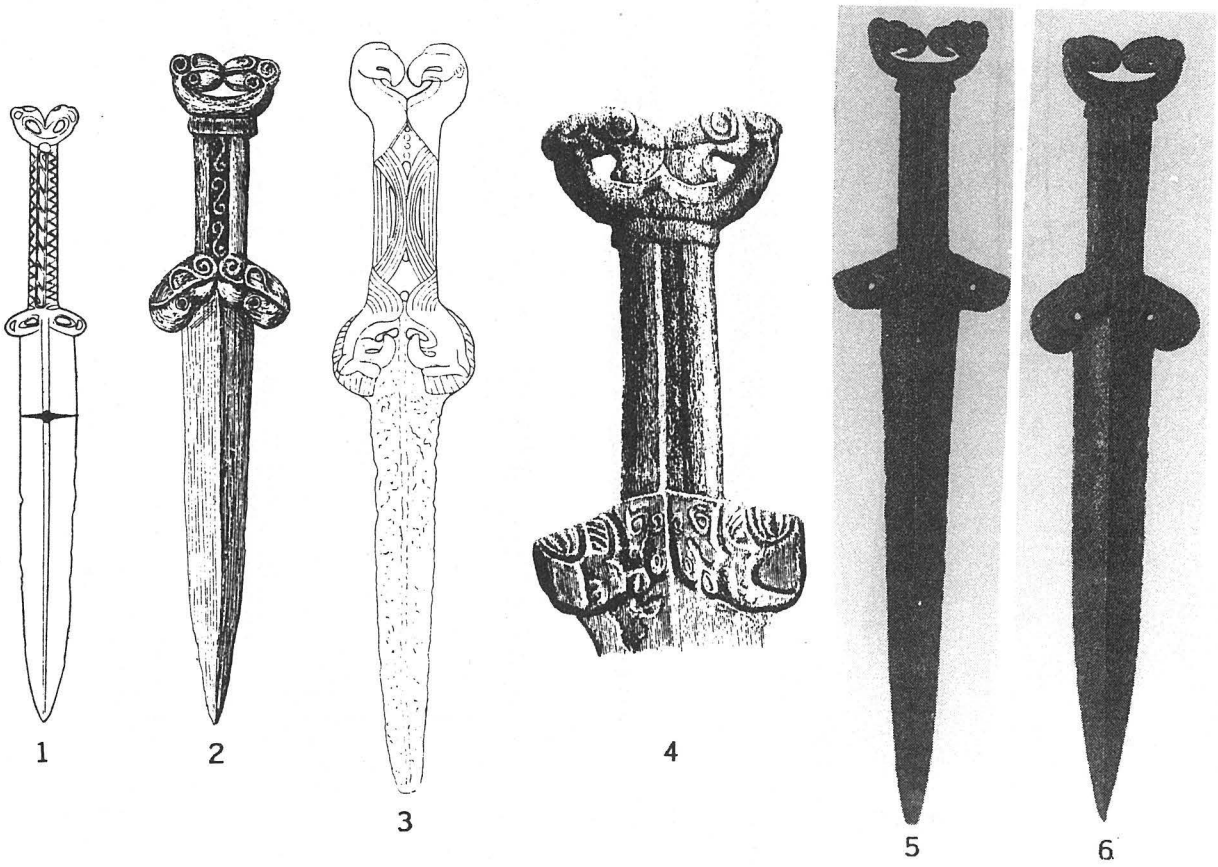
圖四七〕



插圖四七　刀劍柄上獸形文飾：內蒙古與西伯利亞
1.建平縣採集　2.Tuva採集　3-7 Minusinsk盆地
8.Koryakovo village, Krasnoyarsk
(1.《考古》1983:8　2、8 SGH　3-7 據Borovka1928)

其次是「觸角式」刀劍。中國這種形制較早的標本出於內蒙古毛慶溝墓地，典型者如M59、58、70，屬於毛慶溝第一期，報告者斷在春秋晚期或稍早（《鄂爾多斯》p.300）。附近公蘇圪M1所出亦定在春秋晚期（《考古學報》1976：1, p.134）。西伯利亞Krasnoyarsk附近Batoy與Kordachin兩個村莊分別發現「觸角式」青銅或鐵製的短劍（*SGH*, Nos.177、178），形制風格和毛慶溝基本一致，

定在西元前五或五至四世紀，值春秋末到戰國初期。A. M. Tallgren 著錄中西伯利亞出土的一種，屬於塔加爾文化二至三期，約當西元前四世紀（*ASA*, No. 52）。所以這種形式之獸頭劍大概流行於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中國北方與西伯利亞也是同步的。〔插圖四八〕



插圖四八　「觸角式」武器：內蒙古與西伯利亞
1.涼城毛慶溝M70　　2-4 西伯利亞出土
5.The Batoy village, Krasnoyarsk
6.Kordachin village, Krasnoyarsk
(1.據《鄂爾多斯》P.258　2-4 據Minns1913
5-6 SGH)

寧城甸子小黑石溝先後發現兩把直刃短劍，劍首、柄身、劍格及劍身中脊部位布滿文飾，每種動物主要以兩個重圈構成，相當幾何化（《文叢》9, p.36；成東、鍾少異 1990，4-139；項春松 1984）。這麼奇異的動物文飾，爲其他地方所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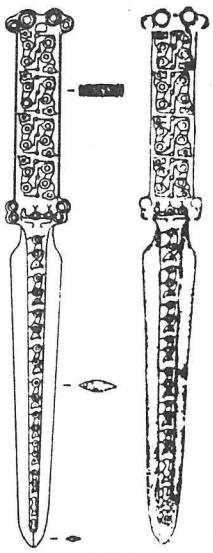
見，來龍去脈尚不清楚，不過和西方也許有點關連。S. J. Rudenko 分析怪鷹（Mythological eagle）造形，在 Zourovka 附近的斯基泰大墓屬於基輔（Kiev）群者，出土一種打製的金箔片、鹿形怪獸長角上的小鷹頭簡化，鷹頭變成兩個重圈（Jacobson 1984，Pl.6）；屬於 Taman 群之 Karagodeushkh 大墓之箭筒有類似的金箔出土（Rudenko 1958，Fig.3：b、c；Minns 1913, p.219，Fig.123）。它們的時代，前者在西元前六至五世紀、後者四至三世紀。屬於頓河 (the Don) 群 Elizavetovski 大墓所出劍鞘金箔飾片之鹿角的鳥頭也簡化成幾何形 (Rudenko 1958, Pl. III:3)，時代在西元前五世紀。南俄斯基泰黃金飾片怪獸角上之鳥頭亦同（《內蒙長城》pp. 129-130）。小黑石溝的短劍報告者以南山根 M101 來衡量，斷在春秋早期，即西元前八世紀，比烏克蘭所出者早，不過它的動物文構圖法在中國境內尚找不到其他佐證。〔插圖四九〕

2. 飾牌花文之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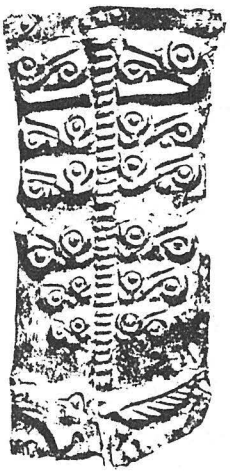
戰國以下最突出的動物文飾不在刀劍，而是帶扣和腰牌。本文第三類組的動物文透雕飾牌，不論雙獸對稱之和平構圖或搏鬥噬食，西伯利亞的標本多可以在中國找到對應。帶框銅牌如 Krasnoyarsk 地區 Kanterevaya 村附近採集的雙牛飾牌見於西岔溝，Oznachennaya 村採集的雙馬搏鬥飾牌見於內蒙古（Borovka 1928，Pl. 53；*SGH*, Nos.181、182；孫守道 1957；《內蒙長城》Fig.74：1）〔插圖五〇〕。

橫 B 字形銅牌，如冬宮博物館收藏的虎噬驢帶扣（Borovka 1928, p.57, Pl. 47），與相傳出自中國西北（*ACOB*, No.216）及寧夏固原楊郎出土者（《文物》1978：12, p.86）一模一樣。或疑冬宮藏品也有可能出自中國（Borovka 1928, p.103），但比較其造形，楊郎帶扣虎身繁密有力的線條與聖彼得堡西伯利亞所出虎噬蹄足動物銅牌（Borovka 1928，Pl.49B）及 Bash-Adar 二號墓棺飾虎文（Rudenko 1970，p.268）相似，當是西伯利亞的風格。〔插圖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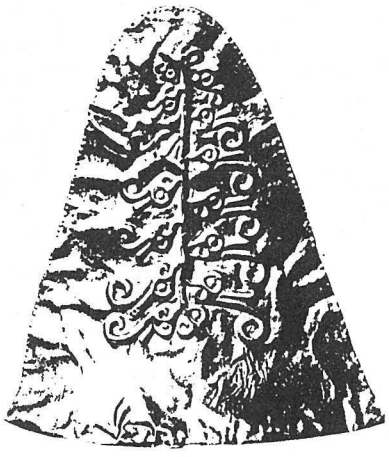
至於雄鷹、猛獸、馴畜或怪獸等群獸混戰之構圖的飾牌（Borovka 1928，Pls. 50、51），中國的考古資料，陝西銅川棗廟 M25 曾出一件（《考古》1986：2，參本文插圖三〇：7），與據傳西北所出者雷同（*ACOB*，No.217），但論構圖繁複，線條深刻有力，都不如西伯利亞出土的群獸混戰銅牌，其起源地也不可能在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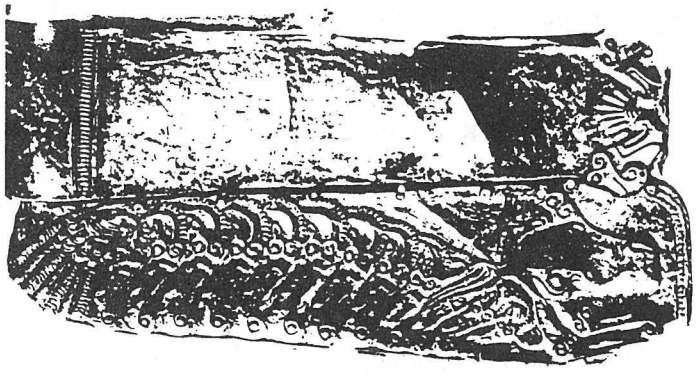
1



2



3



4



5

插圖四九　幾何化動物文：中國北方與黑海北岸

1.寧城小黑石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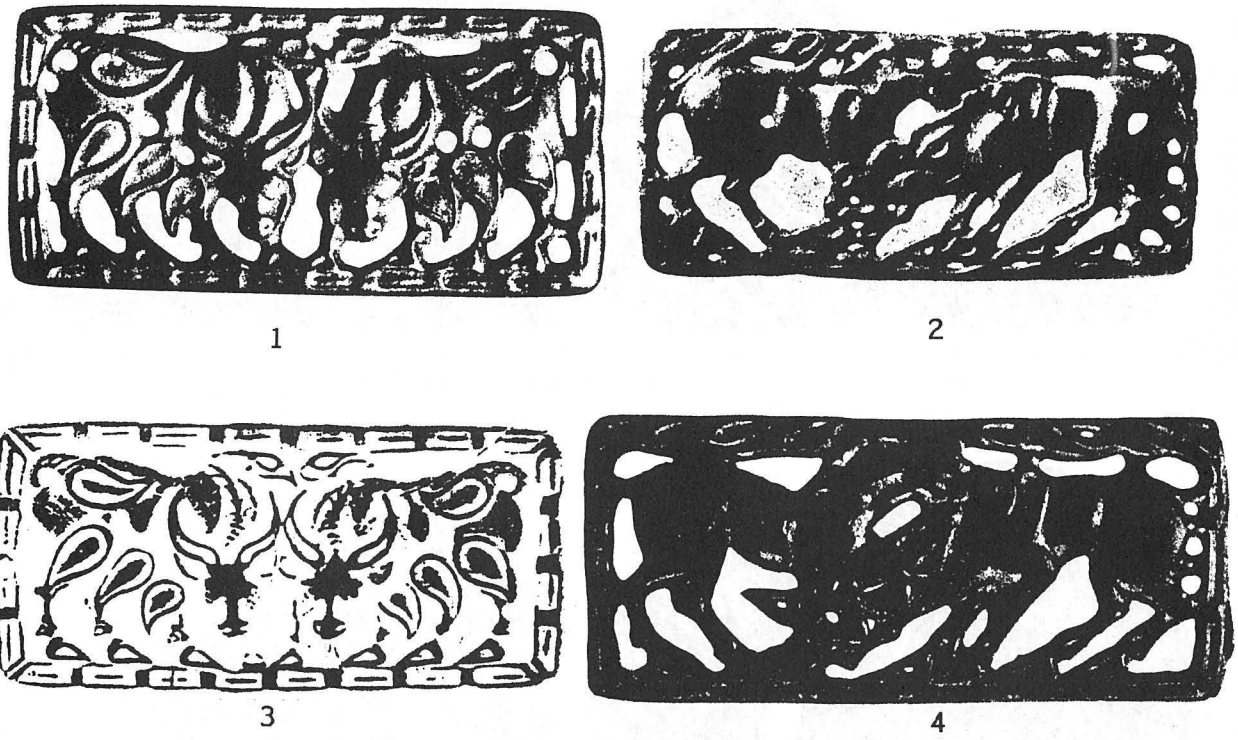
2.Zourovka附近斯基泰大墓之金飾片

3.Karagodeushkh斯基泰大墓之箭囊金飾片

4.Elizavetovski斯基泰大墓之劍鞘金飾片

5.西伯利亞

(1.據項春松1984　2-4 據Rudenko1958　5.《內蒙長城》)



插圖五〇　帶框飾牌之比較：西伯利亞與中國

1.Kanterevaya, Krasnoyarsk　2.Oznachennaya, Krasnoyars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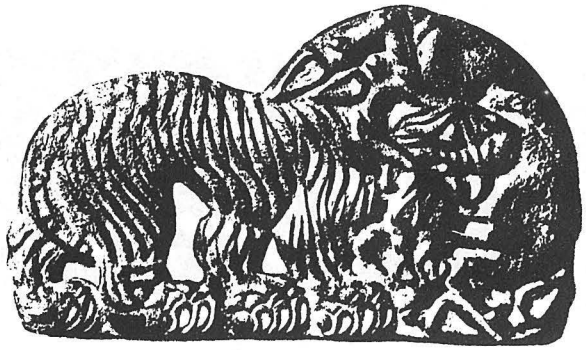
3.西豐縣西岔溝　4.綏遠（貴志彌三郎收集）

（1-2 Borovka1928　3.孫守道1957　4.《內蒙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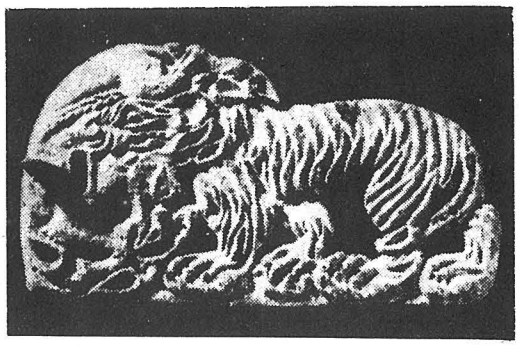
境內。〔插圖五二〕

此類飾牌的框沿和動物身體上常常加飾凹梨文，尖頭圓身如鴨蛋梨，中間凹下，原應鑲嵌有寶石，這是從Rostov州Chaltyr村Khapry墓地三號墓出土之黃金飾牌凹梨文所鑲珊瑚、石榴子石（garnet）和玻璃（*TNSR*，No.99）可以證明的。傳世銅牌的凹梨文，如上舉雙牛和雙馬搏鬥飾牌可能原來都鑲嵌有寶石的。同州一座遭盜擾大墓所出黃金飾牌上之動物，耳、目、蹄（同上，No.135）和Novocherkask村Khokhlach大墓之黃金頸圈，怪獸的耳目前肩後臀皆作凹梨文，鑲綠松石、珊瑚和玻璃（*SGH*，No.193，Rostovzeff 1929，Pl.XIV：1）也可以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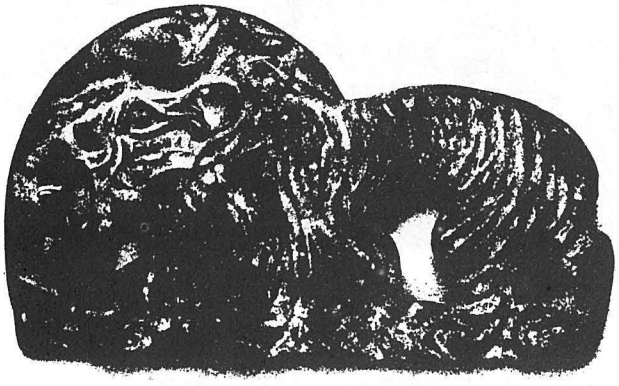
這種鑲嵌工藝適用範圍甚廣，陝西鳳翔南乾河村出土的短劍柄，兩端浮雕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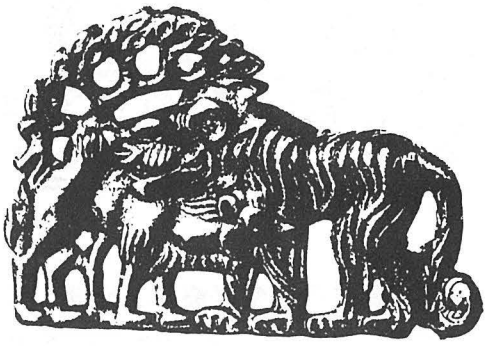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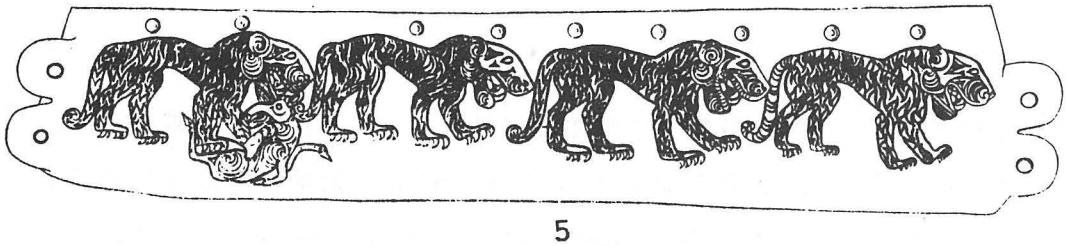
2



3



4



5

插圖五一　橫B字形飾牌之比較：西伯利亞與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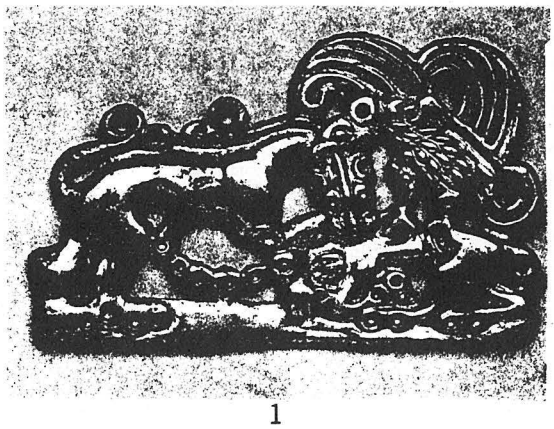
1.西伯利亞　2.固原楊郎蔣河

3.內蒙古　4.西伯利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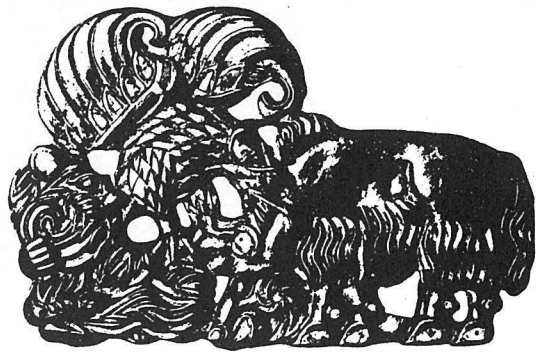
5.Bash-Adar棺壁木刻

(1.Borovka1928　2.《文物》1978:12　3.ACOB

4.Rostovtzeff1929　5.Rudenko1970)



1



2



3

插圖五二　群獸混戰飾牌

1.中國西北（鷹、怪獸、山羊）

2.西伯利亞（鷹、獅、山羊）

3.西伯利亞（鷹、虎、怪獸、野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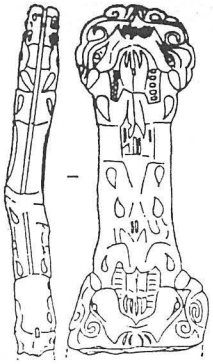
(1.ACOB　2、3 Borovka1928)

成兩個方向相背的獸頭，形象似虎，柄上分佈很多凹梨文（《考古》1989：11，p.1045，圖二：6），和Rostov州斯基泰一號大墓所出的短劍近似。後者鑄一雙峰駱駝，凹梨文填滿寶石（*TNSR*, No.108）。〔插圖五三〕

上文說過河北延慶玉皇廟、唐縣釣魚台等地動物形飾牌的圓形嵌窩或嵌孔鑲



1



4



2



5



3

插圖五三　凹梨文

1.Don河地區　2.Rostov　3.Chaltyr, Rostov

4.陝西鳳翔南乾河　　5.Dachi, Rost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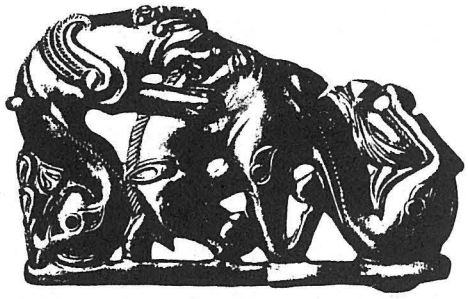
(1.Borovka1928　2、3、5 TRSR　4.《考古》1989：11)

有松綠石，雖然中國鑲嵌松綠石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偃師二里頭（《考古》1992：4，圖版壹），但未見裝飾珊瑚、石榴子石及玻璃，也不作梨形。據近代資料，中國北方遼寧錦縣、朝陽、宣化、綏遠東部和寧夏阿拉善旗均產瑪瑙及蛋白石，綏遠陶林產藍晶及黃玉（《中國礦業紀要》p.170），但古代北方並不以出產寶石馳名，推測中國北方出土凹梨文的動物飾牌及其他文物恐怕不是自創的。主張動物文飾起源於黃河沿岸居住民的葉慈教授早就指出斯基泰和薩馬汀（Sarmatian）的金器趣味刺激了中國人鑲嵌青銅器（Yetts 1925），這話廣義地解釋，與我們的分析可以符合。退而言之，在中國境內發現的飾牌，凹梨文如不鑲嵌寶石，這種「尸餐素位」的裝飾法也必有所本，因此，這一類裝飾手法外來成分相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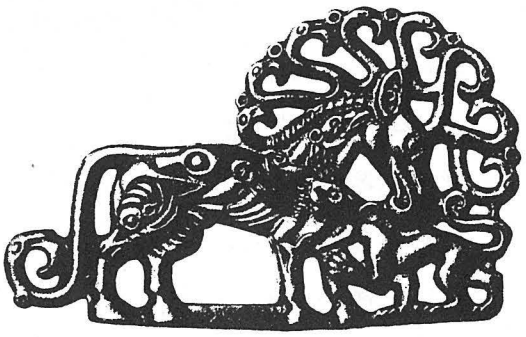
3. 怪獸母題

飾牌動物文之域外成分莫過於怪獸造形和動物後肢翻轉的構圖，二者往往密切關連，爲說明方便，先論怪獸母題。〔地圖五〕

M. Rostovzeff (1929) 劃分斯基泰式和薩馬汀式 (Sarmatian) 的藝術風格，前者的動物造型寫實，深具自然主義的風格，後者才出現「超自然」的想像動物，他稱作「新動物文飾」(New Animal Style)。所謂超自然之想像動物即是怪獸 (griffon、gryphon)，其獸，或獅身，雙翼，有的鷹喙；或馬身，頭至背脊戴一排鷹頭 (Borovka 1928, Pl.46A、49; Rudenko 1958)；或獸身鷹喙鹿角，角作鳥頭狀 (Borovka 1928，Pl.61；Rudenko 1970，圖版 140：E)。總之，包含魯金科所謂神話鷹 (mythological eagle)、怪獸 (gryphon) 和翼獅 (winged lion) (Rudenko 1958) 等分類。〔插圖五四〕這是歐亞草原地帶常見的藝術母題，從匈牙利經烏克蘭、土耳其、中亞、南西伯利亞到外貝加爾湖和內外蒙古，各地怪獸母題的構圖雖不盡相同，但大抵以鷹喙的四足獸最普遍，可以稱作猛禽與貓科的綜合體 (the raptor-feline base) (Horvath 1992)。表現在飾牌上的構圖，怪獸多與其他猛獸搏噬。有人從草原帶的神話傳說與薩滿教儀式推論怪獸母題象徵天神、薩滿與聖王的角色 (Horvath 1992)，也有人認爲那只是草原帶生存競爭的反映而已（喬曉勤 1992）。本文暫且不論其文化社會意義，只以怪獸母題作爲一種文化質素，探索中國與北西域外的關係。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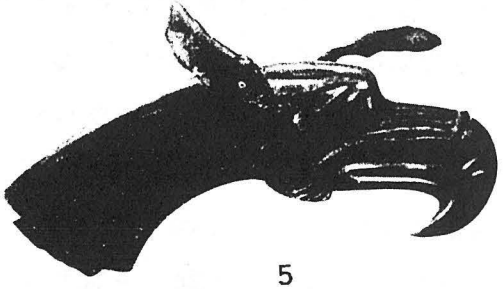
2



3



4



5



6

插圖五四　前蘇聯境內的怪獸母題

1.西伯利亞

2.Verkhneudinsk, Transbaikalia

3.Pazyryk M1, Altai

4.Tuektin

5.Biysk, Altai

6.Katanda, Altai

(1-2 Rostovzeff1929　3、5、6 Rudenko1970　4.Rudenko1958)

地圖五　中國出土怪獸與後肢翻轉藝術母題分布圖

烏魯木齊

杭錦旗

玉隆太

朔縣

易縣

神木

西溝畔

同心

彭陽

西吉

西安

雲夢

長沙

圖　例

怪獸母題●

後肢翻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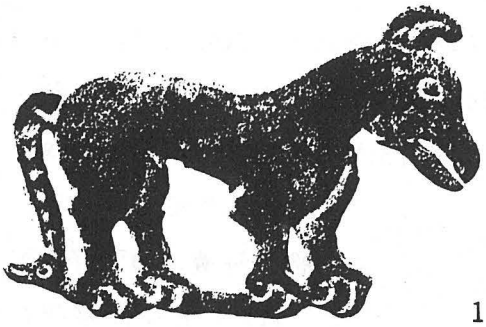
中國北方出現怪獸母題大抵在戰國晚期以後，按形式，可以分成三種，第一種「獸身鷹嘴」怪獸，盧氏舊藏一件單體動物形飾牌，長尾下垂末端一個鳥首，也有長方形帶扣作猛獅咬住馬身鷹嘴的怪獸，左右對稱，中間一個山羊頭（*SSA*, Pl.XIII：4、XXIII：2、3）。這種獸身鷹喙怪獸，近年河北易縣辛莊頭M30所出帶扣也發現非常類似的圖案，中間亦有一山羊頭，左右對稱，每邊是兩頭怪獸搏噬一跪地不起的馬(Emma Bunker 1992)。寧夏同心倒墩子M5出土一件殘帶扣（《考古學報》1988：3, p.344，圖九：7），構圖比較簡單。此圖之怪獸嘴吻尖銳上翹，准格爾旗西溝畔M2的搏噬金飾片（《鄂爾多斯》pp.356-357，圖四：4，圖五：2）也有這種造形，應當同屬於鷹喙的範疇，原報告只說三獸咬鬥或虎獸咬鬥，並不正確。西溝畔同墓出土一種比較簡單的帶扣，也作兩頭馬身鷹嘴怪獸相向伏臥的構圖（《鄂爾多斯》p.361，圖九：4）。辛莊頭和西溝畔墓葬屬於戰國晚期，倒墩子可能到西漢中晚期。

湖北雲夢睡虎地秦人墓M47出土木梳的浮雕花文有馬身鳥嘴怪獸（《考古學報》1986：4, p.515，圖三八：5），是今日所見這種怪獸流傳的南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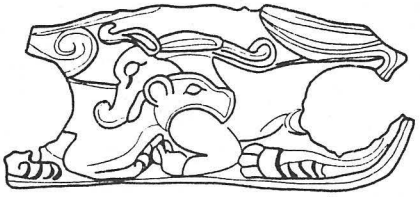
盧芹齋舊藏一件翼獅噬馬飾牌（*SSA*, Pl.XXIV：2），怪獸獅身，肩部鑄刻三根羽毛表示翼翅，與本文插圖五四：1（冬宮博物館收藏）的怪獸有異曲同工之妙。中國考古資料尚未發現帶翼怪獸，這種兩河流域的藝術作風雖然影響到阿爾泰山區，獅身、鷹喙、雙翼，如Pazyryk一號墓的鞍褥圖案（Rudenko 1970, p.236, Fig. 115; *SGH*, No.119）（參插圖五四：3），但在中國境內此一母題似乎沒有充分地發展。〔插圖五五〕

中國常見的第二種怪獸母題是「獸身鳥首」。寧夏彭陽縣新集鄉白楊林村墓葬出土的虎噬羊銅牌，虎背凸出一個鷹頭（羅豐、韓孔樂1990，圖一二：1）；西吉縣陳陽川戰國墓的虎噬鹿銅牌，虎的頭、項脊與尾都裝飾有鳥頭（延世忠、李懷江1992）。山西朔縣西漢前期墓6M50出土動物形鎏金飾牌，立獸銜物，脊背上一個鳥頭（《文物》1987：6，p.14，圖版參：5）。銜物，疑是搏噬之簡化。

傳世著錄飾牌或帶扣有一些搏噬弱小動物之猛獸，背脊鬃毛下端有鳥頭(*SSA*, Pl.XXIV：3、4、5; *ACOB*, Nos.207、208)，據說出自中國西北。俄國冬宮博物館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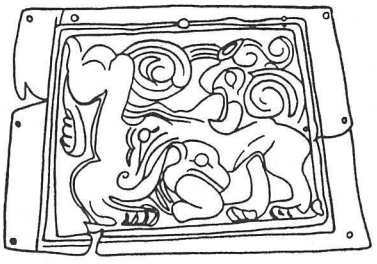
1



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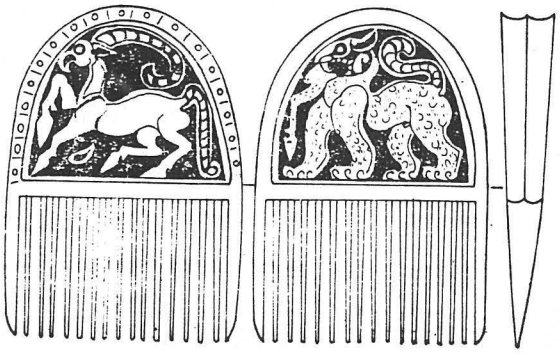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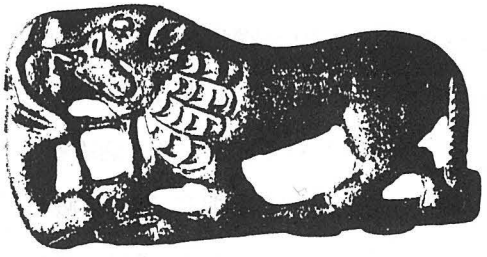
6



3



7



8

插圖五五　中國境內怪獸母題之一（獸身鷹嘴）

1-2、8 盧芹齋舊藏　3.易縣辛莊頭M30

4-6 西溝畔M2　7.雲夢睡虎地M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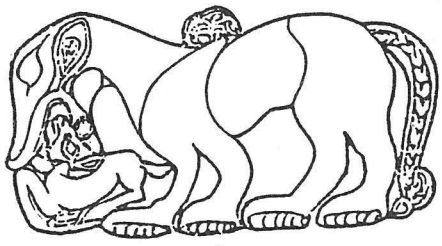
（1-2、8 SSA　3.Bunker1992　4-6《鄂爾多斯》　7.《考古學報》1986:4）

藏的銅件，怪獸背上四個獸頭，四蹄皆作鳥頭狀，大概是此一母題發展的極致，也許晚到波斯薩珊王朝後期（Borovka 1928, p.107, Pl.6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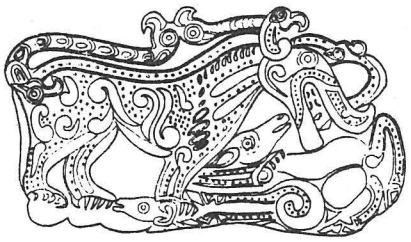
還有一種飾牌，主體花文是猛獸搏噬，周圍裝飾鳥頭，西安東郊三店村漢初王許墓出過一件（朱捷元、李域錚 1983）。內蒙玉隆太出土所謂的「虎鳥文金飾牌」，報告云虎身鑲嵌紅綠寶石七塊，上部及尾部有鳥八隻，鳥頭併列，鳥身簡化爲S形（《鄂爾多斯》p.343、圖版六九：4）。盧芹齋舊藏亦有類似資料（*SSA*, Pl.XXIV：6），邦克著錄，出自中國北方或內蒙古的鎏金蹄足異獸文帶飾牌，獸尾有四個鳥頭，一列排開（*ACOB*, No.224）可能都和「獸身鳥首」的怪獸母題有關。〔插圖五六〕

中國境內怪獸第三種母題是「鹿身鷹喙」（或加鳥頭），如西溝畔M2所出金飾片的怪獸造形，鹿身、鷹喙、長角，或立或臥；鐵劍劍鞘金飾片之怪獸枝角展開平置若樹葉狀（《鄂爾多斯》pp.356-357）。鹿身鷹喙鳥頭怪獸見於外貝加爾湖Verkhneu-dinsk的飾牌（Borovka 1928，p.103）（參插圖五四：2），與本文開篇所引馮雲鵬《金石索》的「馬幣」同類（參插圖一：1），後者，瑞典東方博物館和英國不列顛博物館皆有類似的藏品。西溝畔M2金飾片的鹿角已經簡化，中國考古所見最完美的資料是神木納林高兔的圓雕金鹿，大耳直立，眼球突出，鷹鈎喙，角分四叉，叉端各有一浮雕怪獸頭，亦立耳環眼鳥喙，與本獸之頭象相似；上捲的尾端也作怪獸頭形（戴應新、孫嘉祥 1983，圖版肆）。〔插圖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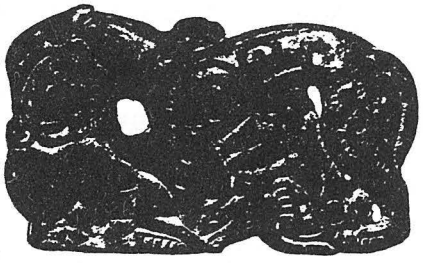
以上中國所見的怪獸母題多可在阿爾泰Pazyryk的墓葬群找到相似的例證。如一號墓鞍褥的怪獸搏鬥圖，獅身鷹頭帶翼怪獸撲啄翼獅（參插圖五四：3）。二號墓主人身上之刺青，尤其雙臂，幾乎是怪獸圖集粹。其中有虎背上尾端各有加一個「鳥頭」，也有鷹嘴之鹿，枝角、背脊與尾端都具有無數「鳥頭」的怪獸。同墓主人腿部和胸背也有怪獸刺青，「鳥頭」表現手法相同（Rudenko 1970, pp.111、247）。一號墓鞍褥織一頭獅子，脊背凸出一個圓點（同上，p.235），我疑心是「鳥頭」的簡化。在這個墓群，怪獸鳥頭之寫實與抽象是並存的，如二號墓的木製竿頭飾的鹿首怪獸，鷹喙，枝角滿佈寫實的帶冠雄雞頭（*SGH*, No.139）。〔插圖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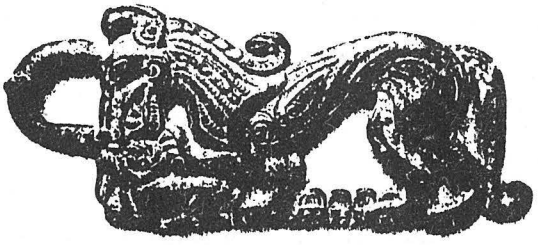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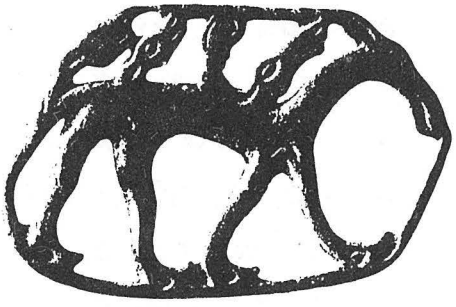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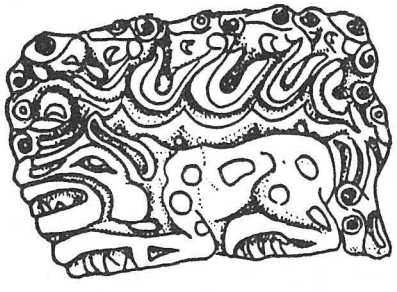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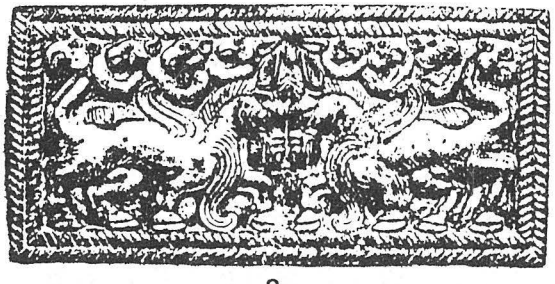
5



6



7



8

插圖五六　中國境內怪獸母題之二（獸身鳥頭）

1.彭陽白楊林　2.西吉陳陽川　3.盧芹齋舊藏　4.中國西北

5.Hermitage Museum（非中國所出，供參考比較）　6.西安三店村王許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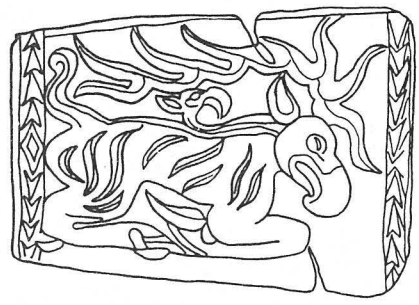
7.桃紅巴拉阿魯柴登　8.中國西北

（1.羅豐、韓孔樂1990　2.延世忠、李懷江1992　3.SSA　4、8 ACOB

5.Borovka1928　6.朱捷元、李域錚1983　7.《鄂爾多斯》）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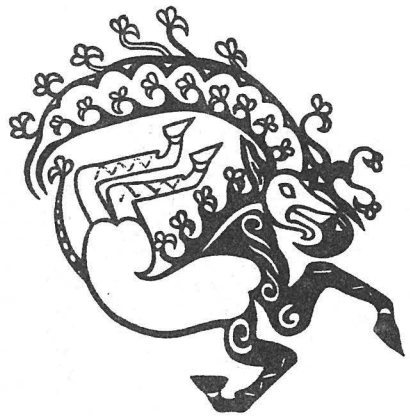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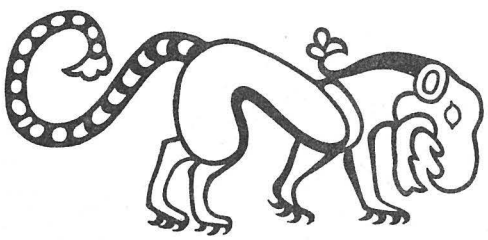
插圖五七　中國境內怪獸母題之三（鹿身鷹喙鳥頭）

1-3 西溝畔M2　4.神木納林高兔

（1-2《鄂爾多斯》3.戴應新、孫嘉祥1983　4.《文物》198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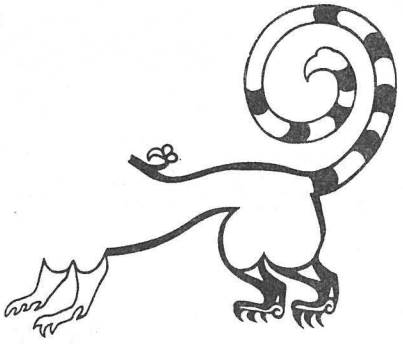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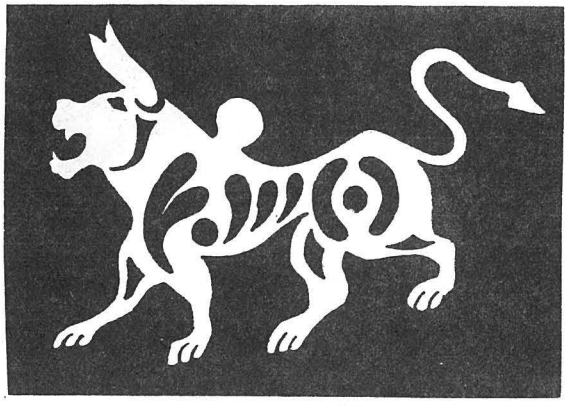
3



4



5



6

插圖五八　Pazyryk墓群之怪獸母題

1-2 M2主人右臂刺青　3.M2主人左臂刺青　4.M2主人胸、背刺青

5.M2主人右腿刺青　　6.M2鞍褥

(Rudenko1970)

Pazyryk 墓群的年代發掘者魯金科認爲不晚於西元前五世紀（ 1970 ，p.297 ，按原著俄文出版於 1953 ），即中國的春秋末到戰國初之間；墓群固延續一段時間，有人以爲約值西元前五至三世紀（ M. P. Gryaznov 1969, p.134 ）。總之，不會遲於戰國時代。

超自然的怪獸母題在歐亞草原動物文飾中出現比自然寫實作風爲晚。雖然早在第六世紀早期，Kuban 和 Dniepre 地區的斯基泰大墓已出現蹲伏猛獸、臥鹿和鳥喙獸頭的藝術，唯其象徵系統仍然淡薄，五世紀以後，雄鹿及叉角上鳥頭的怪獸文飾才出現（ Jacobson 1984 ）。克里米亞 AK-Mechet 灣附近斯基泰墓採集的金鹿箔片，自然寫實之鹿，叉角加飾兩個鳥頭（ *SGH*, No.45 ），已進入超自然的作風，時代斷在西元前五世紀前半（ Jacobson 1984 ）。Pazyryk 二號墓怪獸非寫實的「鳥頭」近似花朵，從藝術形式的風格來說，也許是「自然」進入「超自然」作風較早的階段，比克里米亞 Ak-Mechet 灣附近金箔片的怪獸還早。墓的時代與 Ak-Mechet 灣的墓同屬於西元前五世紀，而且此墓出土的竿頭飾怪鹿，已有具體化的鹿角雞頭，所以這種怪獸母題的根源還須再探究。

中國境內所見的獸身鳥首怪獸的鳥頭在 Pazyryk 二號墓的刺青圖亦抽象化，以刺青的怪獅來看，似乎是從黑海北岸的翼獅轉變來的，Tuektin 一號斯基泰大墓的木製翼獅與 Pazyryk 的圖案有很高相似性（ Rudenko 1958 ）。它進一步的發展就是喀札克共和國（ Kazakstan ） Alma-Ata 市 Issyk 之「金人」（ "gold man" ）斯基泰大墓腰帶飾牌的怪獸，翼端出現鳥頭（ *OSR*, No.134-1 ）。從上揚之翼到翼端鳥頭，再到中國所見無翼怪獸，鳥頭安在背脊上，可能是很自然的發展序列。〔插圖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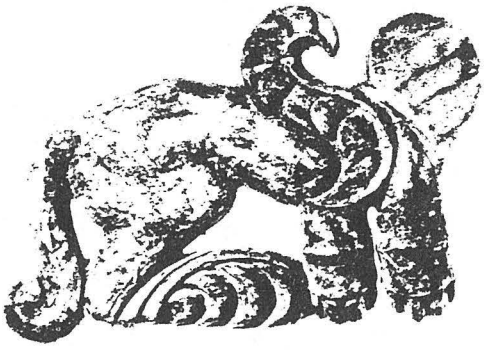
總之，中國北方文物的怪獸母題起源地當在黑海北岸到阿爾泰山之間，它們在中國難以追溯根源，而且出現的年代比黑海到阿爾泰晚，大多在戰國晚期以後。此時中國內地與阿爾泰之間至少已有間接貿易，故 Pazyryk 五號墓發現中國絲織品（ Rudenko 1970, p.174 ），所以中國北方的怪獸飾牌一定會受到阿爾泰地區的影響，至於中國和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的關係，則有待其他資料才能論證。

4. 後肢翻轉的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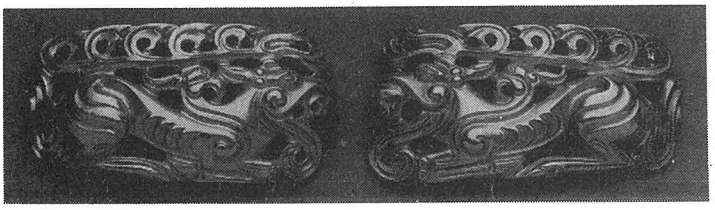
Pazyryk 二號墓主人雙臂刺青的怪獸，後肢往往和前半身的角度反轉 180°，形成非常不自然的體位，姑且稱作「後肢翻轉」。同墓其他自然動物的圖案也多採用這種表現手法，如右臂刺青盤羊與驢（Rudenko 1970, pp.251、253）。翻轉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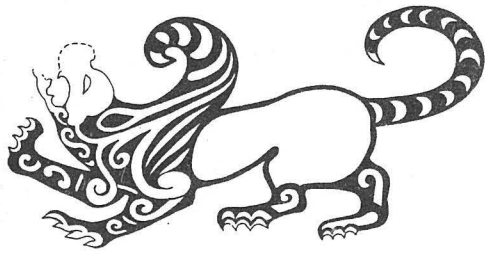
1



2



3



4

插圖五九　黑海到阿爾泰怪獸風格

1.Ak-Mechet灣，Crimea　　2.Tuektin斯基泰墓

3.Issyk斯基泰墓，Alma-Ata　　4.Pazyryk二號墓

(1.SGH　2.Rudenko1958　3.OSR134-1　4.Rudenko1970)

圖在鞍褥上鬥獸搏噬的場面尤其普遍使用，一號墓的怪獸撲羊，飛鷹搏鹿，猛虎攫鹿、猛虎咬噬山羊，二號墓老虎噬羊、噬鹿皆是。後肢翻轉者，一般都是弱小動物，只一號墓猛虎撲鹿圖，虎與鹿一齊翻轉。Pazyryk 以西直線距離約一百公里 Bash-Adar 二號墓長棺棺壁（參插圖五一：5）與棺蓋的木雕猛虎食羊圖，有的羊亦作後肢翻轉之形。〔插圖六〇〕

喀札克共和國 Alma-Ata 地區 Issyk 斯基泰墓葬所謂「金人」的帽飾有兩件金飾片作雪豹人立狀，後肢反身，墓主劍鞘金飾片，一馬、一鹿，皆反轉 180°，時代定在西元前五至四世紀（*OSR*, Nos.134-2、3、4）。

新疆烏魯木南山礦區阿拉溝 M30 出土對虎文金箔帶，二虎相對伏臥；虎文圓金牌，虎身蜷曲成圓形；和獅形金箔飾。這些老虎和獅子的後肢皆翻轉，時代定在戰國（《新疆》Nos.116、117）。阿接溝與上述 Pazyryk 與 Issyk 在西元前五世紀可以視爲一個大文化區。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收藏彼得大帝時代自西伯利亞採集的翼獅噬馬金飾牌（Borovka 1928，Pl. 46A；*SGH*, No.97），怪獸與馬目腰肢以下皆反轉（參插圖五四：1），定在西元前五至四世紀（*SGH*, p.170），可能亦出於此一地區。〔插圖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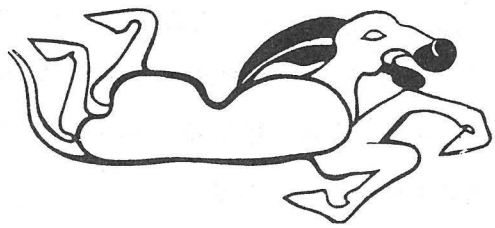
上文數度舉證的內蒙古西溝畔 M2，所出單馬文、雙馬文金飾片和虎豕咬鬥金牌（參插圖三二：3），都是後肢翻轉構圖的典型例子。寧夏同心縣倒墩子 M14 的二獸搏噬和 M19 雙馬伏臥飾牌（《考古學報》1988：3, p.344，圖九：12、13），獸、馬的後肢亦皆翻轉。此類構圖傳世品習見，盧芹齋舊藏（*SSA*, Pl.XXVI：4、XXVII：2、3、4），邦克著錄（*ACOB*, Nos.225、226），動物多作馬形，在臀部加飾鳥頭，算是怪獸，有的具體，有的簡化。

倒墩子 M1 出土一件長方形腰牌，中間一株樹，左右兩頭動物相對，似馬，框沿、樹葉和馬的耳、蹄、膝等部位皆佈置凹梨文（《考古》1987：1, p.37，圖版參：1）。俄國人早年在南西伯利亞也採集到相似的飾牌（Borovka 1928, Pl. 52B; Artamonov 1973, No.208, p.157），但製作得更精美。後者斷西元前四世紀，前者大約值西漢中晚期，即西元前一世紀。〔插圖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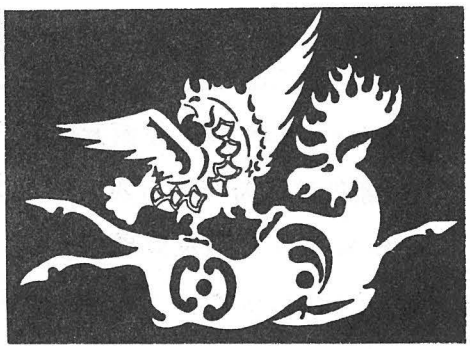
倒墩子 M1 腰牌的樹稱做生命樹，在斯基泰地區有比較悠久的傳統，兩旁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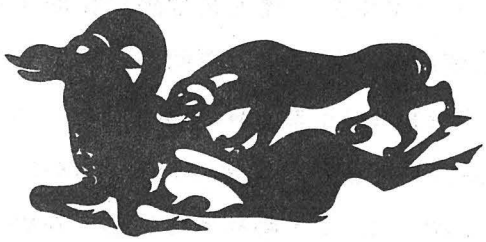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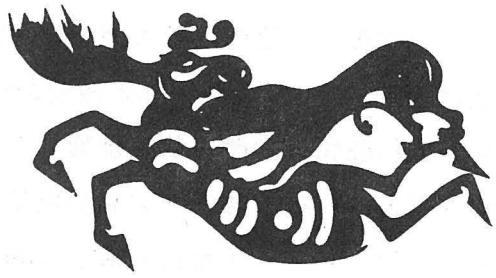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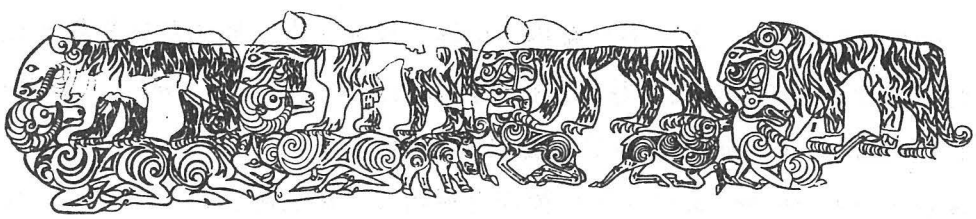
4



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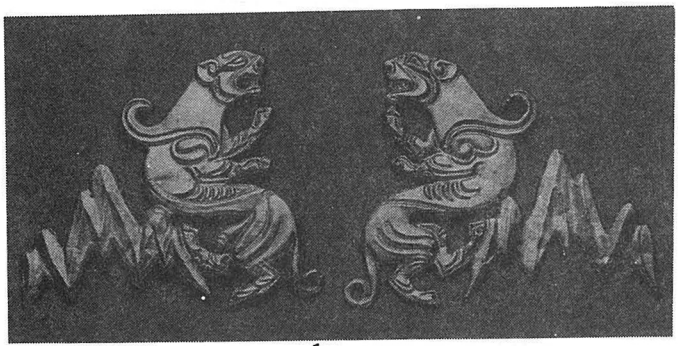
7

插圖六〇　動物後肢翻轉構圖之一（Pazyryk墓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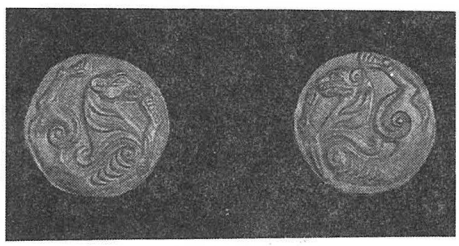
1-2 M2右臂刺青　　3-4 M1鞍褥

5-6 M2鞍褥　　7.Bash-Adar棺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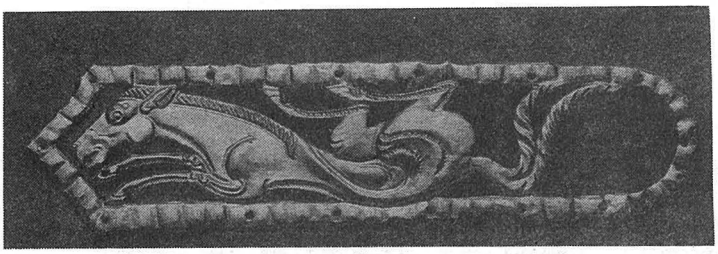
(Rudenko1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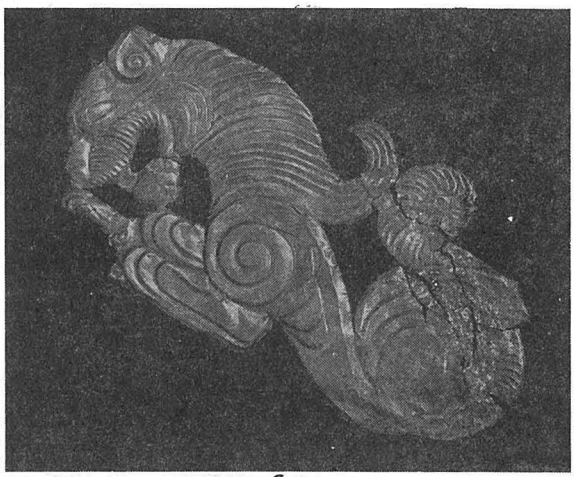
1



5



2



6



3



4

插圖六一　動物後肢翻轉構圖之二（阿爾泰及其附近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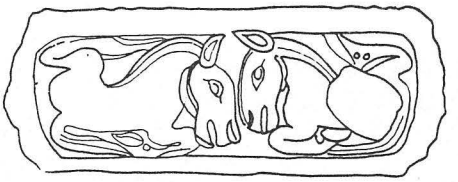
1-3 Alma-Ata地區Issyk「金人墓」

4-6 烏魯木齊阿拉溝M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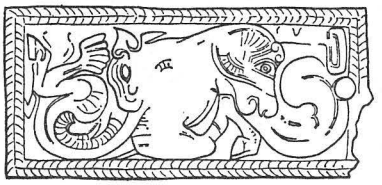
（1-3 OSR　4-6《新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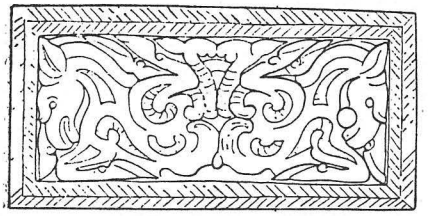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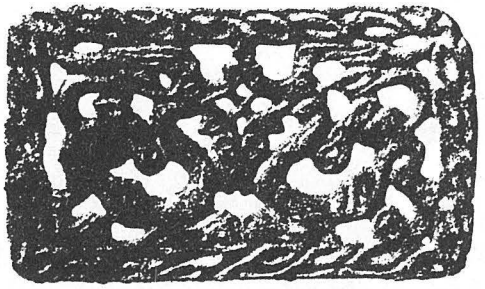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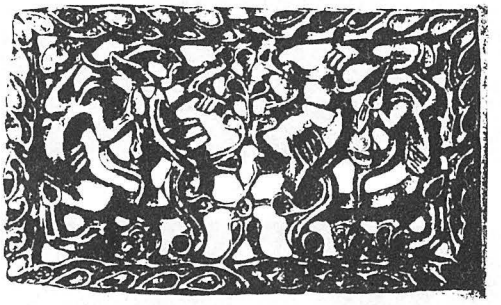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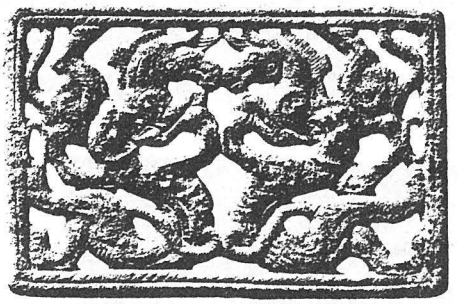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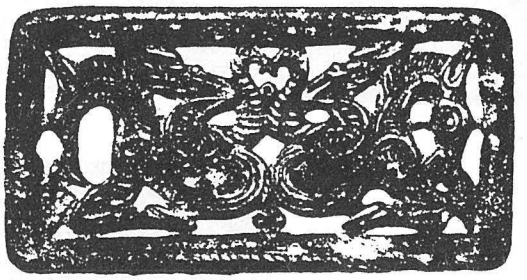
5



6



7



8

插圖六二　動物後肢翻轉構圖之三（中國北方）

1-2 西溝畔M2　　3-5 倒墩子M14、19、1

6.南西伯利亞（比較參考）　7-8 盧芹齋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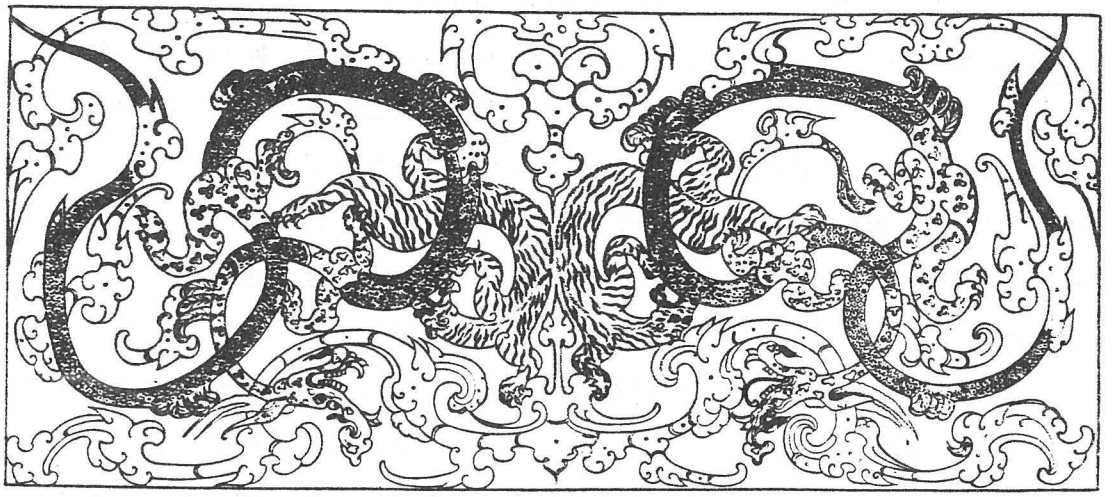
（1-2《鄂爾多斯》　3-4《考古學報》1988:3　5.《考古》1987:1

6.Borovka1928　　7-8 SSA）

護的動物一般多作羽翼獅子，據說係保護此樹及其居住者——人的精魂以免受邪魔（蛇）的傷害。塔什干中亞美術史教授L. Rempel謂之「雙獅守護聖樹」母題（引自加藤九祚1991）。他們認爲獅子是英雄或統治者的化身，樹若未加保護，則代表生命枯萎，人民離散，所以聖王是具有神力的生命保護者（Horvath 1992）。不過南西伯利亞和寧夏所出的守護聖樹飾牌的動物不是獅子，而是馬，離其原始創意稍遠，此間轉變尚待更多的資料才好說明。但總結上述阿爾泰地區出土的後肢翻轉的構圖，中國境內所見這類文飾當亦與怪獸母題一樣，也是外來文化影響下的產物。

後肢反轉的藝術風格不但影響到戰國晚期長城外的西溝畔與倒墩子，早在西漢初年，甚至也波及到長江以南的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朱地彩繪棺左側的蜷曲之馬即是典型的後肢反轉構圖，此棺蓋板龍虎爭鬥圖的虎、左側龍虎馬圖的馬，都作後肢翻轉之形（《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上集，圖二二、二五）。〔插圖六三〕中國人傳統畫龍，四肢、後肢也是反轉的，只是一般認爲龍是蛇身，不加細索，論其始源，至遲在西漢已表現得非常明顯，很可能含有北方藝術的成分。

北方草原地帶游牧化後，南北東西之間的交往更頻繁，藝術品的流傳與藝術風格之引進更方便，長期下來，相互影響，絕無只有接受的一方。西溝畔的虎豕搏噬金牌背面兩行刻字「故寺豕虎三」「一斤五兩四朱少半」，書法接近秦的小篆，報告者推測是在秦國製作（《鄂爾多斯》p.364）。中國北方，甚至長城以南自製草原動物文的裝飾品是不需懷疑的，但關於草原動物文，中國北方是不是原生地（至少其中之一），中外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中國學者認爲就目前所見考古資料而言，中國北方發現的動物文飾牌不下五十種，南西伯利亞只出十餘種，而且不如中國的清晰，遂判斷西伯利亞的飾牌是以中國北方爲藍本而仿造的（烏恩1984）。但魯金科舉Pazyryk M4所出渦形裝飾比蒙古和中國北部所見者複雜，斷定在這方面，中國顯然是受到阿爾泰部落的影響（Rudenko 1958）。就本文所論怪獸與後肢翻轉的母題，其爲外來成分是難以辯駁的。不過中國本部的觀念也逐漸影響到長城內外的北方民族，傳世的有長方形框龍虎鬥飾牌，龍虎很可能是漢人的文化，正如漢代西溝畔M4的耳墜，麋鹿金牌是草原的，但包金的蟠龍螭虎玉



1



2

插圖六三　動物後肢翻轉構圖之四（中國內地）

1-2 馬王堆M1朱地彩繪棺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

虎則是華夏的（《鄂爾多斯》pp.379-381）。同心縣倒墩子M14出土的雙龜一龍銅飾牌（《考古學報》1988：3, p.344），也很可能與玄武的觀念有關。同地M5怪獸噬馬帶扣，比較河北易縣辛莊頭所出者（參插圖五五：3），怪獸母題已較淡化。這些現象大概都是漢朝北方治邊「華夏化」的反映。

*　　*　　*

總之，春秋戰國以降，中國北方的動物文飾顯然接受很多外來成分，但應分別看待。根據本文的分類，第三類組透雕飾牌之第一類「動物形體文飾」時代較早，而且集中在燕山南北，原創性較大；至於第二類「帶框之動物文飾」一般晚到戰國中期以後，而且框沿的梨葉文係鑲嵌寶石之用，其製作手法可能是外來的。至於鷹喙四足怪獸和後肢翻轉獸之受到黑海北岸到阿爾泰地區藝術風格的影響，則至爲明白。魯金科強調這是草原民族一脈相傳，自成體系的藝術，大約在西元前第一個千年中葉（500 B.C. 左右），即春秋晚期，傳來中國（Rudenko 1958）。不過，中國至今考古所見這類文飾似乎還沒有這麼早的資料，這裡含藏許多古代北方民族交往的問題，尚待探索。

五、小　結

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族屬或族源是傳統史學及近代中外學者重視的課題，本文不能具論；現代考古家企圖以考古的文化結合文獻記載，核校以地理而定其族屬，本文也不願評論。這裡只取與考古文化有關的藝術部分，尤其是「動物文飾」來窺測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特色，以及政治社會的流變。

我們以考古出土文物作骨幹，參證傳世收藏品，分析殷商歷經西周、春秋到戰國秦漢這漫長的千餘年內，北方所見之動物文飾。就形制風格分成四大類組，可以反映三個階段、三種經濟社會生活與文化之典型。第一類組的獸頭刀劍文飾即是殷商至西周前期散布於晉陝高原以農耕爲主、畜牧爲副之民族的文化，北至長城內外，向東擴及燕山南北；第三、四類組的透雕和圓雕飾牌即是戰國中晚期以下至秦漢，橫亙北方草原的游牧國家的文化；中間的第二類組獸形刀劍與「觸

角式」動物文飾自春秋到戰國早期，主要偏於燕山南北地帶，雖然從畜牧化進一步游牧化，但政治領域尚小，故動物文飾的分佈也顯現局限的地域性。借用傳統文獻的術語說，第一階段是鬼方玁狁文化，第三階段是胡或匈奴文化，第二階段爲戎狄或東胡文化。但這只是方便說法，本文無意將目前所知的考古美術文物與傳統所記北方之民族劃上等號。第一階段作戰方式以步戰爲主，偶而也有車戰，無騎兵。到第二階段，騎兵才登上歷史舞台。由於游牧化的結果，騎射普及，不斷發展，到第三階段中國北方就出現統治領域廣袤的游牧國家——匈奴部落聯盟了。

燕山長城和晉陝地帶自有其獨特的文化，與南方黃河中下游的華夏國家不同，與北方米努辛斯克的卡拉蘇克文化亦異。這裡可能和南北分別文化交流，而不是南北的中介轉運者。第一類組之動物文飾的原鄉有可能在這裡，它與南方的安陽及北邊的蒙古、外貝加爾的關係相當密切，和米奴辛斯克的文化面貌差別較大，但這個論斷須適度保留，因爲這一帶考古譜系還不夠清楚。而後隨著游牧化的發展，草原地帶往來頻繁，尤其第三階段所見的動物文飾，三、四兩個類組都含有濃厚的域外成分。所以我們認爲殷周到戰國秦漢之北方文化隨時遷易，不可一概而論，但大體上可分出前後兩種政治、社會與文化迥異的階段，中間夾一個過渡期，游牧化是轉變的關鍵，而且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殷商時代流行動物文飾的北方民族已相當程度地吸收南方的華夏文明，採取商王朝的禮器系統，這必定影響他們的政治社會秩序和意識型態；他們也採用中原式武器，必定對傳統的戰爭文化有所修正。從殷商後期經西周到春秋，晉陝高原由南而北有逐漸「華夏化」的傾向，時代愈晚，波及範圍愈北，今日我們看到內蒙古淮格爾旗西溝畔西漢初期墓葬的「漢化」即是明證（《鄂爾多斯》pp.375-393）。該地M4出土不少玉石佩件，如龍虎文的玉耳墜、長袖細腰寬裙之舞人石佩，以及龍文石觿、雙龍文、螭虎文及龍虎文石佩都表現中原風格，和北方草原習見的動物文飾牌截然不同。這裡地處鄂爾多斯高原東緣，距離劉邦受圍的白登不遠，不論當時或往昔，都是游牧民族的故鄉，M4也隨葬明器銅馬四十九件，有游牧民殉牲的習俗。但所出「中原式」裝飾品正好說明中國古代北方不斷華夏

化的事實。

然而我們不能忽略濱臨北方民族的華夏國家，尤其是三晉、燕北與秦國（參杜正勝 1993），也不斷「戎狄化」。北方動物文飾甚至深入更遠的南方，本文提到湖北雲夢秦墓木梳的怪獸與鬥獸圖，以及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棺飾後肢反轉的虎馬圖皆是；至於雲南滇文化的鬥獸青銅器也有可能是沿甘肅青海四川西部而南下的。春秋晚期以後，北方「動物文飾」以各種不同形式紛紛滲入中原傳統藝術中，造成戰國秦漢有別於商周的「新藝術」風格。這是另外一個課題，不在本文探究之列。

附記：大學時期曾從芮師慕城（逸夫）學習中國民族誌，研究所從高師曉梅（去尋）學習殷商考古。爾後有機會來史語所任職，雖與芮師共事，但因致力於中國古代史之研究，頗少涉及民族史之課題。高師早年沈潛於北方民族文物，對歐亞草原文化之交流用力甚深，我來所十餘年，雖朝夕相處，時聆高論，但也很少想要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逮及高師逝後，重新比較全面地拜讀他老人家的著述，於是興起草就此文的念頭。而今雖然人天懸絕，但每當我一步步踏循高師走過的足跡，益覺高師彷彿猶在人間。今以歐亞草原動物文飾和北方民族爲題，寫成此文，用來紀念高、芮二師，並表示我的追念和孺慕之情，只是非但無法向二師請益，連讓他們知道我與他們有共同的興趣也不可能了，實在是莫大的遺憾。正勝謹誌。

民國八十一年壬申六月二十一日初稿　當年及翌年數度修訂

（本文於民國八十二年二月十八日通過刊登）

表一　獸頭文飾考古資料表

獸頭刀△　獸頭劍▲（含匕首）　獸頭杓○

出土地	獸頭							全長	共出文化相			出處	備註
	馬	牛	羊	鹿	駱駝	鷹	蛇	(公分)	禮器	兵器工具	裝飾品		
薦城台西 M12			▲					25.5	鼎、甗、觚、瓿	矛、直內戈鐵刃銅鉞、泡	玉器3件	《薦城台西》p.135、124、166	
小屯 YM20	△	△	△					32.0 31.4 30.1		弓形器、鏃、石鏃、戈、車馬器		《小屯・一・上》丙編 pp.16-155	
小屯 H181	△							29.0				《中國考古學報》四，p.12	灰坑
西北岡 HPK1311					△			31.9		直內戈、銎內戈、鏃、玉戈、弓形器	骨觿、骨圈、石針、長銅管	史語所檔案	銎內戈2件、直內戈1件
婦好墓	△							36.2				《殷墟婦好墓》p.103	禮器、兵器、工具、裝飾品無數、此略
殷墟西區 M1713	△							30.5	鼎、甗、簋、甑、爵、觚、卣、尊、盉、盤	直內戈、鉞、矛、有銎大刀、鑿、鋸、鑱、鈴、石斧		《考古》1986：8，pp.703-712	
綏德墕頭	△						▲	32.0 36.0	壺、瓿、觚、鼎、簋、爵、斗	直內戈、鉞、鏃、甲泡、鑿、鋸		《文物》1975：2，p.83	
清澗解家溝							▲	36.0	龜魚文盤	曲內戈、戚、鋸、金珥、鏃		《考古》1984：8，p.760	
靈石旌介M2			△					27.5	鼎、簋、鬲、卣、觚、尊	銎內戈、直內戈、矛、鏃、弓形器	玉佩13件	《文物》1986：11，pp.1-18	陶房
石樓義牒							▲			銎內戈、斧		《考古》1972：4,p.29	
石樓褚家峪							▲	32.5	觚	環首刀、直內戈、銎內戈、弓形器、鏃、鑿、、斤、鋸		《文物》1981：8，pp.49-53	

出土地	獸頭							全長	共出文化相			出處	備註
	馬	牛	羊	鹿	駱駝	鷹	蛇	(公分)	禮器	兵器工具	裝飾品		
石樓曹家垣							○			長銎斧、鈴首劍、弓形器		同上	
青龍抄道溝			△	▲				30.2 29.6		鈴首刀、環首刀、有銎戚、啄戈		《考古》1962：12，pp.644-645	
懷安獅子口				△				22.4				《考古》1988：10，p.941	採集
張家口市				▲				32.8				《河北》87	
張北縣				△				33.3				《文物》1984：2,p.37	採集
建平二十家子				△				19.2 (殘)		鋒形器		《考古》1983:8,p.683	採集
昌平白浮M3	▲					▲		34.0 25.0	鼎、簋	盔、戟、無胡直內戈、無胡直內帶翼戈、短胡一穿戈、鋁戈、柲冒、鈴首劍、鉞、弓形器、中泡、小銅泡多件、盾飾、斧、鑣、鑿		《考古》1976：4，pp.246-258	車馬器多件
奈曼白音昌東犁	△											《文叢》7，p.103，圖版柒：4	
興隆河南村		△										《文物》1990：11，p.58，圖二：2	窖藏
哈密花園公社				△				36				《新疆古代民族文物》No.59	採集

表二　柄上獸形文飾及「觸角式」考古資料表

劍◆　刀◇　觸角式劍✳

出土地	獸形											全長	裝飾	共出文化相					出處	備註
	虎	熊	鹿	狼	馬	牛	羊	獸	鳥	蛇	夔龍	(公分)	部位	兵器工具	禮器	陶器	車馬器	裝飾品		
寧城南山根M101	◆									◆	◆	34.3 27.2 26.2		劍（其他）、盾、鏃、盔、刀、斧、鑿、鎬、鋤	簋、簋鼎、鬲甑、杯豆、雙聯罐、杓			金環、雜器、石骨器等	《考古學報》1973：2,pp.32-33	IV刀柄首似為兩獸相鬥狀
寧城南山根		◆		◆犬 ◇犬				◆				26 27 24 15.7 (殘)							《考古》1959：6，pp.276-277	採集疑似熊戈 用具：匙、匕
寧城南山根M4					◆							25.7						聯珠形銅飾、鳥形銅飾、鈴形銅飾各種骨珠等	《考古學報》1975：1,p.135,圖版柒：1、2	
寧城甸子小黑石溝	◆豹					◆		◇	◆			28.5 13.0 (殘)							《內蒙古》3，p.120	三種動物在同一短劍上
寧城甸子小黑石溝					◆	◆		◆豬				28.1		曲刃銎柄式短劍					《文叢》9，p.37	
寧城天巨泉M7301									◆			26.9		刀			馬銜、銅泡	月牙形銅飾、牌飾、鏡形飾	《文叢》9，p.30	鳥文短劍共出兩把
寧城南山根東區石槨墓								◆人				31.7							《文叢》9，p.36	
寧城汐子北山嘴M7501												31.8		盔、短劍、雙聯劍鞘、鉞、鏃	簋			金環	《文叢》9，p.25	
建平石碰山M741						◆						23.45		曲刃銎柄式短劍、鏃、盔、骨鏃					《考古》1983：8，p.686	
建平					◆				◆			7.1 (殘)							《考古》1983：8，p.690	採集

出土地	獸形											全長	裝飾	共出文化相					出處	備註
	虎	熊	鹿	狼	馬	牛	羊	獸	鳥	蛇	夔龍	(公分)	部位	兵器工具	禮器	陶器	車馬器	裝飾品		
平泉東南溝M6					◆							24.3		直內戈、刀			銅泡	圓牌飾、鴨形飾、耳墜、骨珠、貝	《考古》1977：1，p.53	
延慶軍都山YYM95		◆										29.1							《文物》1989：8，p.27	
隆化下甸子墓												40.2							《文物》1984：2，pp.37-48	
隆化三道營駱駝梁M8		◆										36.3							同上	
承德市										◆		27.0							同上	
豐寧				◆								16.0（殘）							同上	
張家口市				◆								25.1							同上	
張家口市									◆			26.0							同上	
宣化小白陽M37			◆								◆	?		直柄刀、斧、鏃、骨鏃		陶罐	泡		《文物》1987：5，pp.43-49	柄端立獸，柄身鳥文，正反兩面圖案
宣化小白陽M44										◆		?							同上	
赤城龍關				◆								17.3（殘）							同上	
懷來大古城										◆		26.8							同上	
涼城毛慶溝M59									✳			27.3		鏃			銜、節約	釦飾、環、鳥形飾牌	《鄂》pp.257-258	
涼城毛慶溝M58									✳			30.0		戈		陶罐		帶鉤、掛鉤、	《鄂》pp.258-259、p.239	狗頭骨、羊頭骨、銅管狀
涼城毛慶溝M70									✳			27.8		鏃				雙鳥文飾牌、釦飾	《鄂》p.259、247	羊肩胛骨

出土地	獸形											全長	裝飾	共出文化相					出處	備註
	虎	熊	鹿	狼	馬	牛	羊	獸	鳥	蛇	夔龍	(公分)	部位	兵器工具	禮器	陶器	車馬器	裝飾品		
涼城毛慶溝M45									✳			24.8				陶罐		雙鳥文飾牌、釦飾、帶釦	《鄂》p.259、247	馬頭骨
准格爾旗西溝畔M3									✳			20.3		刀、鏃				鳥飾牌、鳥飾件	《鄂》p.359	
杭錦旗公蘇圪M1									✳			25.3		鶴嘴斧、斧、錐、刀、鑿、圓錐形器				鳥形飾牌、扣形、環	《考古學報》1976：1，p.134、135、143	觸角式
固原石喇村							◆	◆				26.0		直內戈、矛、削、鋸、鑿			馬銜、車轅、鈴	骨石珠	《考古學集刊》3，pp.130-131	馬頭、牛頭、羊頭
固原撒門村M3									✳					戈、矛、鏃、鑿				杆頭飾、牌飾管狀飾、聯珠狀飾、帶扣	《考古》1990：5，p.417	
固原楊郎馬庄IM4								✳				25.2		戈、矛、鑿		單耳罐	泡飾、馬鑣	帶扣、環	《考古學報》1993：1，p.53	馬頭
正寧后庄									✳					鋸			鑾鈴、當盧、轡		《考古》1988：5，p.415	
中寧倪丁									✳			18.3（殘）		管銎斧			泡、鈴	扣具	《考古》1987：9，p.774	徵集
鎮原廟集							◆							矛、刀、鋸、鑿			甲泡	環	《考古》1988：5，p.417	銅鎬
秦安王家									✳			21.0（殘）							《文物》1986：2，p.40	採集

表三　透雕與圓雕動物文飾考古資料表

透雕：動物形體● 鳥文牌飾■ 帶框動物文飾⊕ 鬥獸搏噬文飾×
圓雕＋

出土地	牲畜禽獸							鬥獸搏噬	共出文化相				殉牲	出處	備註
	馬	羊	虎	鹿	獸	鳥	怪獸		武器工具	容器	車馬器	裝飾品			
朝陽十二台營子					●二狼獸面 ●人面雙蛇				劍、斧、刀鑿、錐、鏃		節約	鏡		《考古學報》1960：1，pp.65-68	
凌源五道河子M8	●					●雞			直內戈、斧環首刀、劍、錐、鑿、鏃			松梁石、鎳、釦		《文物》1989：2，pp.52-61	銅鐘
凌源五道河子M9	●								環首刀、劍、鏃			環釦、帶鉤、松梁石、、白骨珠、瑪瑙珠		同上	
凌源五道河子M10	●											松梁石珠、白骨珠、釦環、帶鉤、瑪瑙珠		同上	
凌源五道河子M1	●				●牛（金）				直內戈、斧鑿		當盧、轡、銜節約、軛	環、釦、金璜形飾		同上	鐘
濼平尚子溝78M18				●				短劍、鏃雙環首刀、斧、錐			泡、節約	環、骨珠		《文物》1984：2，p.45	骨哨
濼平尚子溝76M16				●				短劍、鏃環首刀、鑿、斧、						《文物》1984：2，p.46	
延慶軍都山YYM129				●					雙環首短劍					《文物》1989：8 pp.17-35	其他共出物未詳
延慶軍都山YYM226	●													同上	同上
延慶軍都山YYM102					●									同上	同上
宣化小白陽M18	●		●						直柄刀	陶罐		耳環		《文物》1987：5，pp.41-51	
宣化小白陽M20			●			●			直柄刀		泡	帶鉤、耳環骨管飾		同上	

出土地	牲畜禽獸							厂獸灼痕	共出文化相				殉牲	出處	備註
	馬	羊	虎	鹿	獸	鳥	怪獸		武器工具	容器	車馬器	裝飾品			
宣化小白陽M41			●			●				陶罐	泡	鈴形飾、人面飾、齒形飾、舌形飾、聯珠飾、耳環、管形飾、骨珠、石珠		同上	首針
宣化小白陽M32			●	●		●			短劍、齒柄刀、斧、鑿、錐、鏃、骨鏃	陶罐	泡	管形飾、骨珠、石珠飾	牛腿馬頭	同上	鐵礦石
宣化小白陽M2	●								錐、鏃、骨鏃		泡	珠、耳環	牛腿	同上	鐵礦石
宣化小白陽M31	●					●			短劍、齒柄刀、斧、鑿、錐、鏃、骨鏃	陶罐	泡		牛腿馬頭	同上	鐵礦石
新樂中同			●						銅鐏	銅鼎、甑、勺、豆		鈕扣、金手鐲、金飾片瑪瑙環、玉石片、綠松石珠		《考古》1984：11，p.972	虎形飾片鎏金
唐縣釣魚台石槨墓			●(金)						斧、鉞	銅器、鼎、釜匜、洗敦、甑		金盤絲、鈕扣		《河北》p.46 No.169、170	
和林格爾范家窯子							+		四穿直內戈2、雙環首短劍、刀			銀飾、管狀飾		《文物》1959：6，p.79	
土默特右旗水磨溝門					+驢、+象				刀、異形戈		馬銜	筒形釦飾		《鄂》p.220	
杭錦旗桃紅巴拉M1						▌			鐵刀、銅錐鶴嘴斧、鏃	陶罐	馬銜、馬面飾	耳環、聯珠狀飾、釦飾圓管狀飾	馬9、牛4、羊頭2	《鄂》p.203	♂35+
杭錦旗桃紅巴拉M5	⊕											長方形管狀飾		《鄂》p.203	
桃紅巴拉阿魯柴登	●	●盤羊 ●盤羊 ●盤羊	●●●+ +●(銀)	●	●狼 +刺蝟	+鷹●●●		×四虎噬牛 ×虎背死鹿				金耳墜、金項圈、金串珠、金鎖鏈		《鄂》pp.343-350	冠帶飾、「虎」鳥文牌飾。二墓文物動物文未注明者皆金質。

出土地	牲畜禽獸							鬥獸搏噬	共出文化相				殉牲	出處	備註
	馬	羊	虎	鹿	獸	鳥	怪獸		武器工具	容器	車馬器	裝飾品			
烏拉特中後旗呼魯斯太M2				●					鶴嘴斧、鏃		轅飾、馬面飾、鈴	釦飾		《文物》1965：2，pp.50-51	
涼城毛慶溝M43						▌				陶罐		釦飾、帶扣	牛、羊頭	《鄂》pp.227-315	
涼城毛慶溝M5			⊕			▌				陶罐		釦飾、料珠、管狀飾		同上	
涼城毛慶溝M2						▌						釦飾、聯珠銅管	牛、羊頭、牛蹄、羊肩胛	同上	
涼城毛慶溝M55			●											同上	墓葬破壞
涼城毛慶溝M74			●											同上	墓葬破壞
涼城毛慶溝M31			⊕			▌								同上	
涼城毛慶溝M38			⊕			▌			鐵鶴嘴斧、鐵短劍	陶罐				同上	
涼城毛慶溝M27			⊕			▌			矛、鐵刀			釦飾	牛、羊頭	同上	
涼城崞縣窯子M12						▌		×猛虎噬羊		陶壺		帶扣、環管狀飾	羊下顎骨	《考古學報》1989：1，pp.57-80	
涼城崞縣窯子M2						▌			骨弓？	陶罐		管狀飾、環松梁石串飾		同上	
涼城崞縣窯子M1						▌			鶴嘴斧	陶罐		帶扣、管狀飾、骨環、環	羊下顎骨	同上	
涼城崞縣窯子M5						▌				陶壺、陶罐		帶扣、松梁石串飾		同上	
涼城崞縣窯子M8						▌			刀	陶罐	鈴	帶扣、耳環松梁石串飾	牛、豬、狗頭	同上	
准格爾旗西溝畔M2	⊕		⊕	⊕＋		●天鵝＋鶴頭	⊕金飾片●	×虎豕咬鬥×三怪獸咬鬥×虎與怪獸咬鬥	鏃、鑄形器、鐵劍、錐		銜、鑣	項圈、耳墜指套、釦飾鏡		《鄂》pp.351-365	金質

出土地	牲畜禽獸							鬥獸搏噬	共出文化相				殉牲	出處	備註
	馬	羊	虎	鹿	獸	鳥	怪獸		武器工具	容器	車馬器	裝飾品			
准格爾旗玉隆太	＋ ✓	＋盤羊 ＋羚羊				▌	＋		鏃、刀、錛、鑿、鐵鶴嘴斧		軸頭、鐵馬銜	帶扣、環、聯珠狀飾、圈釦飾		《鄂》pp.366-371	不能按本表歸類故以✓表示之
准格爾旗速機溝（瓦爾吐溝）	＋		＋	＋	＋獊猏 ＋狼	＋鶴 ＋長喙鶴		×猛虎噬羊						《鄂》pp.66、372-374	《鄂》圖版五五：1、2
准格爾旗西溝畔M4	✓	✓	✓ ✓	✓	✓龍 ✓龍 ✓							金貝殼、長條形金片、卷雲文金花片、金屬珠、耳墜、金串珠、各式玉珠、包金帶具、石佩		《鄂》pp.375-393	可能是女性，耳墜花文龍虎、鹿、龍文石觿龍虎文石佩。 不能按本表歸類故以✓表示之
東勝碾房渠								×虎狼咬鬥 ×雙龍纏鬥		陶罐		金耳墜、金管狀飾、金串珠、包金瑪瑙飾、獸頭形飾、金圓管狀飾、金環、簧形金絲		《考古》1991：5，pp.405-408	窖藏
伊金霍洛旗石灰溝		＋		＋	＋刺蹯	＋鶴		×虎咬鹿 ××雙虎互鬥						《內蒙古文物考古》1992：1/2，pp.91-93	疑是墓葬，鬥獸文、刺蹯形飾為銀器，其他青銅
神木納林高兔		●(銀)	＋(銀)●(金)●(銀)✓	＋	＋刺蹯		＋		劍柄			花卉、蝌斗柿蒂花文飾片、扣形飾		《文物》1983：12，pp.23-30	圓浮雕金虎、銀虎、銀羊 不能按本表歸類故以✓表示之
神木李家畔				＋兔								帶扣、扣形飾、圓管、鋸齒形飾、圓圈飾		同上	
神木中溝					＋狗						響、鑾鈴			同上	
中衛狼窩子坑M1		＋			㊉蛇、龍				銅柄鐵劍、斧、鏃		馬飾	聯珠狀飾、玉石珠		《考古》1989：11，pp.971-980	

出土地	牲畜禽獸							鬥獵博噬	共出文化相				殉牲	出處	備註
	馬	羊	虎	鹿	獸	鳥	怪獸		武器工具	容器	車馬器	裝飾品			
中衛狼窩子坑M3					⊕蛇人面				銎戈、鑿	單耳罐、石勺	馬銜、馬飾	釦飾、連珠銅泡		同上	五銎空心環、六孔空心骨環
彭陽白楊林村						▮		×猛虎噬羊	矛		泡飾	管狀飾		《考古》1990：5，pp.403-418	
彭陽姚河村			●(獅)											《考古》1990：5，pp.403-418	採集
西吉新營鄉陽川村						▮		××猛虎噬羊	鐵柄劍、鏃	陶罐	泡飾	釦飾	馬、牛、羊頭	同上	
西吉新營鄉陽川村						▮		×猛虎噬鹿			當盧、泡飾、馬纓、車轅飾、節約		馬頭3牛頭4羊頭8	《考古》1992：6，pp.573-575	竿頭飾、桃形牌飾、花瓣形牌飾、銀牌飾、小管飾、長方形管飾
西吉興坪村		+												同上	其他情況不明
固原彭堡鄧門村M1		+		+		▮ ▮			刀、鏃		軸飾、鈴、泡飾	鏤空牌飾、松梁石骨珠		《考古》1990：5，pp.403-418	
固原上台村					✓龍				鶴嘴斧		鈴			同上	不能按本表歸類故以✓表示之
固原郭莊村	+													同上	不明採集
固原彭堡鄧門村					+驢									同上	不明採集
固原河川上蘆正溝嘴	✓	✓		✓	✓駝									《考古》1990：8，p.745	不能按本表歸類故以✓表示之
固原楊郎大北山					●豹				刀、矛		轡		馬、牛羊頭	鍾侃等1985	
固原楊郎蔣河								×猛虎噬驢						《文物》1978：12 p.86	

出土地	牲畜禽獸							鬥獸搏噬	共出文化相				殉牲	出處	備註
	馬	羊	虎	鹿	獸	鳥	怪獸		武器工具	容器	車馬器	裝飾品			
固原楊郎馬庄 IIM3								×猛虎噬獸			車轄、車轅、杆頭飾、泡飾	耳環、石墜、串珠	羊頭40 馬頭10 牛頭4	《考古學報》1993：1 pp.13-55	
固原楊郎馬庄 IM7				+	●				刀		泡飾、車轡、杆頭飾	鐲、鏈珠透雕飾	羊頭、馬頭、牛頭	同上	
固原楊郎馬庄 IIM17				+	●	+			刀、錐			帶扣、帶飾		同上	鈴形飾、管飾、管狀飾
固原楊郎馬庄 IM12				+	●犬			×雄獅噬小獸	刀、劍		杆頭飾、轅、節約、馬鑣	帶扣、牌飾		同上	據墓葬登記表有B型（臥驢）動物牌飾
固原楊郎馬庄 IM14					● +狐	+					當盧、泡飾、馬鑣、節約	帶扣		同上	管飾
固原楊郎馬庄 IIM14				+					刀、鶴嘴斧、斧		轡、杆頭飾、轅、鈴泡、骨節約	飾牌		同上	
固原楊郎馬庄 IIM4		+ + +		●	+犬			×猛虎噬小獸	戈、斧、矛		轡、杆頭飾、轅、當盧、泡、鑣	帶扣、帶飾、耳環、石串珠	羊頭38 馬頭6 牛頭7	同上	首鈴舌
固原楊郎馬庄 IIM5				+					刀		節約、當盧、泡、馬銜	耳環、帶飾、鐲、石墜節、串珠、環	羊頭4 馬頭3 牛頭4	同上	管狀飾
固原楊郎馬庄 IM1								×二獸相搏	戈、刀、錐、骨鏃	單耳罐		耳環、環	羊頭19 馬頭4 牛頭1	同上	
固原楊郎馬庄 IIM3								×虎噬小獸			轡、轅、杆頭飾、泡	帶飾、銀耳環、石墜飾、串珠	羊頭40 馬頭10 牛頭4	同上	
頭營王家坪						++ +鷹 ●●			矛		鈴	小銅管		鍾侃等1985	
同心倒墩子M1					⊕龍 ⊕牛頭 ⊕駱駝					陶罐	鈴	環、珠飾		《考古學報》1988：3 pp.343-347	五銖錢

出土地	牲畜禽獸							鬥獸搏噬	共出文化相				殉牲	出處	備註
	馬	羊	虎	鹿	獸	鳥	怪獸		武器工具	容器	車馬器	裝飾品			
同心倒墩子M10	●							×武士擒俘	刀、鐵刀	陶罐	鈴	金耳環、珠飾海貝、管狀飾	牛頭2羊頭11	同上	五銖錢、漆器
同心倒墩子M19		⊕					⊕		鐵刀	陶罐		珠、石珠、海貝		同上	五銖錢
同心倒墩子M22					⊕駱駝							骨珠、石珠、海貝		同上	五銖錢
同心倒墩子M23					⊕駱駝					陶罐				同上	
同心倒墩子M5							⊕			陶罐		珠、石珠、海貝		同上	五銖錢
同心倒墩子M6								×雙馬互鬥		陶罐	鈴	珠、石珠、海貝	牛頭2羊頭13	同上	五銖錢
同心倒墩子M13								×虎食羊		陶罐		環珠、金耳環	牛頭羊頭7	同上	五銖錢
同心倒墩子M14		⊕					⊕玄武			陶罐		環、管狀飾、海貝		同上	五銖錢
永登榆樹溝				+	●犬	+鷹			矛鐏、鐵錐鐵鏃	形？陶片	轡	殘佩飾		《考古與文物》1981：4，pp.34-36	圓牌飾、鏃形牌飾
秦安		+			●狼									《文物》1986：2，p.41	採集
寧縣袁家村				+	⊕龍	⊕鳳			鐵矛、直內戈、短劍、鏃		鈴、轡鑾鈴、馬頭飾	銀耳墜、小管		《考古》1988：5，pp.413-424	夔龍雙鳳飾牌、殉馬坑
正寧后莊				+	⊕	⊕			直內戈、銅柄鐵劍、刀柄、？		鈴、轡鑾鈴、當盧			同上	夔龍雙鳳飾牌
鎮原吳家溝圈				+		+鴨頭		×猛虎噬羊			甲泡、？鈴			同上	
鎮原塬頭						⊕		×五蛇鬥虎						同上	
鎮原地區				+ +		+鵪鶉								同上	採集

引用書目

于省吾　1955　〈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馹傳制度〉，《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1955：2。

王克林　1984　〈晉國建立前晉地文化的發展〉，《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

王長啓　1991　〈西安市文管會藏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及其特徵〉，《考古與文物》1991：4。

王明珂　1993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未刊稿）

王　峰　1990　〈河北興隆縣發現商周青銅器窖藏〉，《文物》1990：11。

石璋如　1947　〈殷墟最近之重要發現－附論小屯地層〉，《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册。

石璋如　1959　《殷墟建築遺存》，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石璋如　1970　《殷墟墓葬之一，北組墓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田廣金　1976　〈桃紅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學報》1976：1，收入《鄂爾多斯》。

田廣金　1993　〈試析中國北方畜牧業起源問題〉（未刊稿）

田廣金、郭素新　1980　〈內蒙古阿魯柴登發現的匈奴遺器〉，《考古》1980：4，收入《鄂爾多斯》。

田廣金、郭素新　1986　《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

田廣金、郭素新　1992　〈再論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淵源〉，「中國古代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Ancient Nations*)，1992.8.11-18.

田醒農、雒忠如　1981　〈多友鼎的發現及其銘文試釋〉，《人文雜誌》1981：4。

吉謝列夫　1981　《南西伯利亞古代史》（莫潤先譯，俄文出版于1951），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S. V. Kiselev)

朱　貴　1960　〈遼寧朝陽十二台營子青銅短劍墓〉，《考古學報》1960：1。

朱捷元、李域錚　1983　〈西安東郊三店村西漢墓〉，《考古與文物》1983：2。

成　東、鍾少異　1990　《中國古代兵器圖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杜正勝　1990　《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杜正勝　1992　《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出版公司。

杜正勝　1993　〈周秦民族「文化戎狄性」的考察——兼論關中出土的「北方式」青銅器〉，《大陸雜誌》87卷5期。

李仲操　1982　〈也釋多友鼎銘文〉，《人文雜誌》1982：6。

李伯謙　1988　〈從靈石旌介商墓的發現看晉陝高原青銅文化的歸屬〉，《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1988：2。

李逸友　1957　〈內蒙古西部地區的匈奴和漢代文物〉，《文物參考資料》1957：4。

李逸友　1959a　〈內蒙昭烏達盟出土的銅器調查〉，《考古》1959：6。

李逸友　1959b　〈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出土的銅器〉，《文物》1959：6，收入《鄂爾多斯》。

李殿福　1978　〈北京市新徵集的商周青銅器〉，《文物資料叢刊》2。

李殿福　1983　〈吉林省庫倫、奈曼兩旗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分布與內涵〉，《文物資料叢刊》7。

李　濟　1949　〈記小屯出土之青銅器〉，《中國考古學報》四。

李　濟　1965　〈「北京人」的發現與研究及其所引起之問題〉，《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14期，收入《中國上古史》（待定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學勤　1981　〈論多友鼎的時代及其意義〉，《人文雜誌》1981：6。

李學勤　1983　〈師同鼎試探〉，《文物》1983：6。

吳振祿　1972　〈德保縣新發現的殷代青銅器〉，《文物》1972：4。

呂智榮　1987　〈試論陝晉北部黃河兩岸地區出土的商代青銅器及有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週年》，西安：三秦出版社。

呂智榮　1989　〈試論李家崖文化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1989：4。

呂智榮　1991　〈朱開溝古文化遺存與李家崖文化〉，《考古與文物》1991：6。

延世忠、李懷仁　1992　〈寧夏西吉發現一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1992：6。

林　澐　1987　〈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考古學文化論集》1，北京：文物出版社。

周本雄　1983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家畜〉，《新中國考古發現和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周興華　1989　〈寧夏中衛縣狼窩子坑的青銅短劍墓群〉，《考古》1989：11。

俞偉超　1985　《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姚生民　1986　〈陝西淳化縣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6：5。

徐光冀　1986　〈赤峰英金河、陰河流域的石城遺址〉，《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殷瑋璋、曹淑琴　1990　〈靈石商墓與丙國銅器〉，《考古》1990：7。

烏　恩　1981　〈我國北方古代動物文飾〉，《考古學報》1981：1。

烏　恩　1983　〈中國北方青銅透雕帶飾〉，《考古學報》1983：1。

烏　恩　1984　〈論我國北方古代動物文飾的淵源〉，《考古與文物》1984：4。

烏　恩　1986　〈中國北方青銅文化與卡拉蘇克文化的關係〉，《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高去尋　1967　〈刀斧葬中的銅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

高去尋　1973　〈西北岡出土的殷代弓形銅器〉，《私立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第2卷。

唐　蘭　1973　〈"弓形器"（銅弓秘）用途考〉，《考古》1973：3。

孫守道　1957　〈西岔溝古墓群被掘事件的教訓〉，《文物參考資料》1957：1。

孫守道　1960　〈"匈奴西岔溝文化"古墓群的發現〉，《文物》1960：8、9。

許　偉　1989　〈晉中地區西周以前古遺存的編年與譜系〉，《文物》1989：4。

張映文、呂智榮　1988　〈陝西清澗縣李家崖古城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1。

陳芳妹　1992　〈再論故宮所藏殷至周初的異形兵器及其所反映的文化關係問題〉，《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台北：故宮博物院。

郭　勇　1962　〈石樓後蘭家溝發現商代青銅器簡報〉，《文物》1962：4、5。

崔　璿　1991　〈朱開溝遺址陶器試析〉，《考古》1991：4。

項春松　1984　〈小黑石溝發現的青銅器〉，《內蒙古文物考古》1984：3。

鄒　衡　1980　《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程長新　1984　〈北京市揀選古代青銅器續志〉，《文物》1984：12。

黃曉芬、梁曉青　1985　〈甘肅省華池縣發現透雕金帶飾〉，《文物》1985：5。

喬曉勤　1992　〈鄂爾多斯青銅器裝飾的意義分析〉，「中國古代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Ancient Nations*) 論文，1992.8.11-18. 呼和浩特。

楊升南　1982　〈略論商代的軍隊〉，《甲骨探史錄》，北京：三聯書店。

楊紹舜　1981a　〈山西柳林縣高紅發現商代銅器〉，《考古》1981：3。

楊紹舜　1981b　〈山西石樓褚家峪、曹家垣發現商銅器〉，《文物》1981：8。

楊鍾健、劉東生　1949　〈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中國考古學報》四。

靳楓毅　1987　〈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族屬問題〉，《考古學報》1987：2。

塔　拉、梁京明　1980　〈呼魯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7，收入《鄂爾多斯》。

董作賓　1945　《殷曆譜》，南溪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蓋山林　1965　〈內蒙古自治區准格爾旗速機溝出土一批銅器〉，《文物》1965：2，收入《鄂爾多斯》。

翟德芳　1988　〈中國北方地區青銅短劍分群研究〉，《考古學報》1988：3。

鄭紹宗　1984　〈中國北方青銅短劍的分期及形制研究〉，《文物》1984：2。

魯金科　1957　〈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S. Rudenko，潘孟陶譯）《考古學報》1957：2。

盧桂蘭　1988　〈榆林地區收藏的部分匈奴文物〉，《文博》1988：6。

盧連成、胡智生　1988　《寶雞強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

劉　雨　1983　〈多友鼎銘的時代與地名考訂〉，《考古》1983：2。

劉建忠　1988　〈河北懷安獅子口發現商代鹿首刀〉，《考古》1988：10。

劉觀民、徐光冀　1981　〈內蒙古東部地區青銅時代的兩種文化〉，《內蒙古文物考古》創刊號。

戴尊德　1980　〈山西靈石縣旌介村商代墓與青銅器〉，《文物資料叢刊》3。

戴應新　1980　〈陝北清澗、米脂、佳縣出土古代銅器〉，《考古》1980：1。

戴應新、孫嘉祥　1983　〈陝西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12。

羅　豐　1983　〈寧夏固原石喇村發現一座戰國墓〉，《考古學集刊》3。

羅　豐　1990　〈固原青銅文化初論〉，《考古》1990：8。

羅　豐、韓孔樂　1990　〈寧夏固原近年發現的北方系青銅器〉，《考古》1990：5。

鍾　侃、韓孔樂　1983　〈寧夏南部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文化〉，《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

蘇秉琦主編　1987　《考古學文化論集》1，北京：文物出版社。

《文　　物》

1965 ： 2　〈大青山下發現一批銅器〉

1975 ： 2　〈陝西綏德墕頭村發現一批窖藏商代銅器〉

1976 ： 2　〈山西石樓新征集到旳幾件商代青銅器〉

1977 ： 12　〈遼寧省喀左縣山灣子出土殷周青銅器〉

1978 ： 12　〈寧夏固原出土文物〉

1980 ： 9　〈寶雞縣西高泉村春秋秦墓發掘記〉

1982 ： 12　〈周原發現師同鼎〉

1983 ： 12　〈陝西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

1986 ： 2　〈秦安縣歷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銅器〉

1986 ： 11　〈山西靈石旌介村商墓〉

1987 ： 5　〈河北宣化小白陽墓地發掘報告〉

1987 ： 6　〈山西朔縣秦漢墓發掘簡報〉

1988 ： 6　〈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發掘〉

1989 ： 2　〈遼寧凌源五道河子戰國墓發掘簡報〉

1989 ： 8　〈北京延慶軍都山東周山戎部落墓發掘紀略〉

《文物參考資料》

1958 ： 1　〈山西石樓縣二郎坡出土商周銅器〉

《文物資料叢刊》

2 （ 1978 ）　〈北京市新征集的商周青銅器〉

3 （ 1980 ）　〈山西石樓義牒又發現商代銅器〉

9 （ 1985 ）　〈寧城縣新發現的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及其相關遺物的研究〉

杜　正　勝

《內蒙古文物考古》

創刊號（1980）　〈西溝畔漢代匈奴墓地調查記〉，收入《鄂爾多斯》。

3（1984）　〈涼城飲牛溝墓葬清理簡報〉

1992：1/2　〈伊金霍洛旗石灰溝發現的鄂爾多斯式文物〉

《考　古》

1972：4　〈山西石樓義牒發現商代銅器〉

1976：4　〈北京地區又一重要考古收穫——昌平白浮西周木槨墓的新啓示〉

1977：1　〈河北平泉東南溝夏家店上層文化墓葬〉

1977：12　〈內蒙古准格爾旗玉隆太的匈奴墓〉，收入《鄂爾多斯》。

1978：6　〈遼寧興城縣楊河發現青銅器〉

1981：4　〈內蒙古寧城縣南山根102號石槨墓〉

1983：8　〈遼寧建平縣的青銅時代墓葬及相關遺物〉

1984：5　〈內蒙古敖漢旗周家地墓地發掘簡報〉

1984：8　〈陝西清澗縣又發現商代青銅器〉

1984：11　〈河北新樂中同村戰國墓〉

1985：9　〈山西吉縣出土商代青銅器〉

1986：8　〈安陽殷墟西區一七一三號墓的發掘〉

1987：1　〈寧夏同心縣倒墩子漢代匈奴墓地發掘簡報〉

1987：9　〈寧夏中寧縣青銅短劍墓清理簡報〉

1988：5　〈甘肅慶陽春秋戰國墓葬的清理〉

1989：11　〈寧夏中衛縣狼窩子坑的青銅短劍墓群〉

1989：11　〈陝西鳳翔南乾河出土戰國、漢代窖藏青銅器〉

1991：5　〈內蒙古東勝市碾房渠發現金銀器窖藏〉

1992：4　〈1987年偃師二里頭遺址墓葬發掘簡報〉

1992：5　〈寧夏固原呂坪村發現一座東周墓〉

《考古與文物》

1981：4　〈甘肅永登楡樹溝的河井墓葬〉

1985：5　〈青海湟源縣大華中莊卡約文化墓地發掘簡報〉

1986：2　〈陝西銅川棗廟秦墓發掘簡報〉

1988：4　〈陝西延川縣文化館收藏的幾件商代青銅器〉

1991：2　〈山西屯留縣上村出土商代青銅器〉

《考古學報》

1973：2　〈寧城縣南山根的石槨墓〉

1975：1　〈寧城南山根遺址發掘報告〉

1977：2　〈甘肅靈台白草坡西周墓〉

1986：4　〈1978年雲夢秦漢墓發掘報告〉

1988：3　〈內蒙古朱開溝遺址〉

1988：3　〈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

1989：1　〈涼城崞縣窯子墓地〉

1993：1　〈寧夏固原楊郎青銅文化墓地〉

《考古學集刊》

2（1982）　〈陝西綏德發現和收藏的商代青銅器〉

《山西出土文物》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1980。

《中國文物精華》　《中國文物精華》編輯委員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中國美術全集》　李學勤編，工藝美術編(4)青銅器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中國礦業紀要》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國立北平研究院地質學研究所印行，重慶北碚，1945。

《甲骨文合集》　胡厚宣主編，北京，中華書局，1978-82。

《內蒙古出土文物選集》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　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

《陝西省出土青銅器》一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博物館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新疆古代民族文物》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滿城漢墓發掘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藁城台西商代遺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殷墟婦好墓》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澧西發掘報告》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

江上波夫　1932　〈徑路刀考〉《東方學報》（東京）第三册。

江上波夫　1948　《エ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

江上波夫、水野清一　1935　《內蒙古・長城地帶：蒙古細石器文化、綏遠青銅器及支那北疆繩蓆文土器遺蹟》，東亞考古學會。

加藤九祚　1991　〈サルマタイの工藝とその周邊〉("Sarmatin Arts and Their Surroundings"), *The Treasures of Nomadic Tribes in South Russia*（《南ロシア騎馬民族の遺寶展圖錄》），朝日新聞社。

井上靖等　1988　《シルクロード・オアシスと草原の道》(The Oasis and Steppe Routes)，奈良縣立美術館。

J. G. Andersson

1932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Bulletin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FEA)* No.4.

J. G. Andersson

1933　"Selected Ordos Bronzes", *BFEA* No.5.

T. J. Arne

1993　"Die Funde von Luan Ping und Hsuan Hua", *BFEA* No.5.

M. I. Artamonov

1973　*Sokrovisha Sakov (The Art of Ancient Central and South Siberia)* (in Russian).

A. Azzaroli

1985　*An Early History of Horsemanship,* Leiden: E. J. Brill.

Vladimir N. Basilov (ed.)

1989　*Nomads of Eurasia*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Mary Fleming Zirin), Seattle and Lond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County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Gregory Borovka

1928　*Scythian Art,* London, Bouverie House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V. G. Childe).

Emma C. Bunker

1989　"Dangerous Scholarship: On Citing Unexcavated Artifacts from Inner Mongolia and China", *Orientations,* June 1989.

Emma C. Bunker

1992 "Sino-Nomadic Art: Eastern Zhou, Qin and Han Artifacts Made for Nomadic Taste", 《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器物下），臺北：故宮博物院。

Emma C. Bunker, C. Bruce Chatwin, & Ann R. Farkas

1970 *"Animal Style" Art*, New York: The Asian Society Inc.

Dagry Carter

1957 *The Symbol of the Beast--the Animal-style Art of Eurasia,*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Te-k'un Cheng

1963 "Animal Styles in Prehistoric and Shang China", *BFEA* No.35.

E. N. Chernykh

1992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Scrah Wr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 G. Creel

1965 "The Role of the Horse in Chinese History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LXX, No.3.

P. I. Dolukhanov

1987 "The Arid Zone of the Old World: Ecological Potential and the Trend in Culture-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raction of Nomadic Cultures and Ancient Civilizations: Reports of the Fransco Soviet Symposium on the Archaeology of Central Asia and Neighbouring Area* (in Russian), Alma-Ata.

James F. Downs

1961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Riding in the Near East and Central Asi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3.

Marija Gimbutas

1965 *Bronze Age Cultur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Hague, Maiton E. Co.

Mikhail P. Gryaznov

1969 *South Siberia*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James Hogarth), London, Barrie E. Rockliff: The Cresset Press.

Izabella Horvath

1992 "The Roles of the Griffin in the Art and Society of the Steppe-dwelling Peoples of Eurasia",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the Northern Chinese Ancient Nations,* 1992.8.11-18.

Esther Jacobson

1984 "The Stay with Bird-Headed Anther Times: A Study in Image Transformation and Meaning ", *BFEA* 56.

Esther Jacobson

1992 "Symbolic Structures as Indicators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the Early Nomads", Gary Seaman ed., *Foundations of Empire: Archaeology Art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Ethnographics Press,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Los Angeles.

Karl Jettmar

1950 "The Karasuk Culture And The South-Eastern Affinities ", *BFEA* No. 22.

Karl Jettmar

1967 *Art of the Steppes: The Eurasian Animal Style,* Methuen-London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64).

Bernhard Karlgren

1945 "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 ", *BFEA* No.17.

Max Loehr

1949a "Weapons and Tools from Anyang and Siberian Analogies",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LIII, No.2.

Max Loehr

1949b "Ordos Daggers and Knives — New Material, Classification and Chronology, First Part: Daggers", *Artibus Asiae* Vol.XII Nos. 1/2.

Max Loehr

1951 "Ordos Daggers and Knives — New Material, Classification and Chronology, Second Part: Knives", *Artibus Asiae Vol.* XIV Nos. 1/2.

Max Loehr

1956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 — The Werner Jannings Collec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Peking,*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F. R. Martin

1893 *L'Age du Bronze au Musée de Ninoussinsk,* Stockholm, Samson E Wallin.

Anatoly I. Martynov

1991 *The Ancient Art of Northern Asia*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and edited by Denitri B. Shimkin and Edith M. Shimki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E. H. Minns

1913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 H. Minns

1942 *The Art of the Northern Nomads,*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XXVIII, London: Humphrey Milford Amen House.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From the Lands of the Scythians — Ancient Treasures from the Museums of the U.S.S.R. 3000B.C.-100B.C. (No publisher nor date).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ed.

1991 *The Scythian Gold from the Hermitage* (in both Korean and English).

Boris Piotrovsky, Liudmila Galanina, & Norna Grach

1986 *Scythian Art — The Legacy of the Scythian World: Mid-7th to 3rd Century B. C.*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Viacheslav Sobolec), Aurora Art Publsihers, Leningrad.

Jessica Rawson

1987 *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Jessica Rawson & Emma Bunker

1990 *Ancient Chinese and Ordos Bronzes,*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kong.

M. I. Rostovzeff

1929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 I. Rostovzeff

1929 *Le Centre de L'asie, la russie, la chine et le style animal,* Semineriem Kondako-Vianum, Prague.

Sergei I. Rudenko

1958 "The Mythological Eagle, the Gryphon, the Winged Lion, and the Wolf in the Art of Northern Nomads", *Artibus Asiae* Vol. XXI, No.2.

Sergei I. Rudenko

1970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translated from Russian by M.W. Thomp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irst published in Russian in 1953).

A. Salmony

1933 *Sino-Siberian Art —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C. T. Loo, Publisher.

Gary Seaman (ed.)

1992 *Foundations of Empire: Archaeology and Art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Ethrographics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adevsz Sulimirski

1970 *Prehistoric Russia, an Outline,* London: John Baker.

A. M. Tallgren

1937 "Some North, Eurasian Sculptures", *Eurasia Septentrionalis Antoqua* XII.

William Watson

1971 *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W. C. White

1935 "The Tomb of the Elephant",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May 18th (quoted from B. Karlgren, *BFEA* No.17, p.114).

W. C. White

1956 *Bronze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W. Perceval Yetts

1925 *Chinese Bronze,* London.

W. Perceval Yetts

1934 "The Horse: A Factor in Early Chinese History" *Eurasia Septentrionalis Antoqua* IX (Minns Volumes)

W. Perceval Yetts

1939 *The Cull Chinese Bronzes,* Unviersity of London, 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

Avant les Scythes — préhistoire de l'art en U.R.S.S. Censervateur in Chef des galeries nationales d'exposition du Grand Palais, Reynold Arnould, 1979.

The Oasis and Steppe Routes (in both Japanese and English), Nara, 1988.

The Treasures of Nomadic Tribes in South Russia (in both Japanese and English), Toyko, The Asahi Shimbun, 1991.

An Examination of the Animal Style and Ancient Northern Chinese Tribes

(Summary)

Tu Cheng-sheng

I. Preface

Among the archaeological objects of the Shang, Chou, Ch'in, and Han dynasties excavated near Mt. Yen an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Great Wall, are several knife and dagger handles made of bronze in the shape of animal heads, as well as animal-shaped three-dimensional or openwork objects made of bronze, gold, or silver. These artifacts belong to the art category known as "animal style" because of the many animal motifs with which art is adorned. Because many objects of this type were discovered in Ordo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y are commonly called "Ordos-style bronz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the objects were scientifically excavated, the sites where these objects were discovered are scattered extensively throughout China. The majority of the sites, however, are concentrated in Inner Mongolia and the northern parts of Shansi, Shensi and Hopei provinces. These objects are therefore also called "Northern-style bronzes".

Research into the significance of Northern-style bronze cultures raises at least two issues. First, these cultures basically utilized the animal style of the east-west Eurasian steppes, and this suggest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cultures of its outer regions. Second, the people of these cultures are the northern or northwestern peoples mention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texts. Spanning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from the Shang to the Han, this broad stylistic category reflects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herited tradition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found among various cultures. Despite accumulated scholarship and several decades of debate, the first issue still lacks definite conclusions. The second issue remains in its early stages and merits continued investigation.

The steppe nomads began decorating weapons, tools, clothes, and riding equipment with naturalistic and modified animal forms during the Bronze Age. E. H. Minns was a pioneer who observed that the South-Russian Scythians used this type of style (1913). Extending this line of research, M. Rostovzeff compared the art of Southern Russia and China in searching for the origin of this animal style (1929). This question has continued to attract attention for over sixty years since Rostovzeff's research. In fact, this problem may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Chinese historical texts describing the peoples of its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regions. Spanning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from the Shang, the materials of the animal styl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etailed during the last few decades. Due to complexities involving time periods, regions, tribes, and cultures, the term "animal style" inevitably involves some generalizations and ambiguities. However, when viewed from a broad perspective that encompasses ancient civilizations of China, Southern Asia, Western Asia and the Greek peninsula, the animal style of the northern steppes definitely possesse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within the vinicity of this long east-west strip, common features also exist. Therefore, the term "animal style" can still be utilized when examining the peoples and cultures in this region.

The people of the many tribes which existed in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ancient China were most likely those who used Northern-style bronzes. Whether examining political systems, social organizations, economic structures or cultural features, these tribes all differed distinctly from the Chinese tribes of the Central Plain. Due to disparities in time and location, ancient texts refer to the Northern tribes by different names. Generally speaking, during the Shang, they were known as Kuei-fang; during the Western Chou, as Hsien-yu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s Jung and Ti; an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in, and Han dynasties, known as Hu or Hun.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these tribes were not only related, but that they also derived from the same origin. From Ssu-ma Ch'ien's *Shih Chi: Hsiung-nu Lieh-chuan* (*Records of History: the Chapter on the Huns*) to Wang Kuo-wei's *Kuei-fang K'un-yi Hsien-yün K'ao* (*A Study of the Kuei-fang, K'un-yi, and Hsien-yün Tribes*), most of texts maintain this view. However,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is century, many sinologists, using the philological evidence, not only doubt that the tribes inherited traditions, but also believe that the origin of these tribes lies in the Mongolian, Turkish, Tunguses, and Tibetan peoples. Scholars also believe that the tribes do not stem from one source as the *Shih Chi* implies by referring to them as "descendents of the Hsia".

In recent times, archaeologists have compared their field data from different periods and places with that related to the various ancient northern peoples, and have tried to establish a working genealogy. By doing so, they have also consciously or unconsiously provided scholars with new information on the old concept of the northern tribes.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seems to be enjoying a revival. Whether this type of perspective is correct or not warrants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is paper will use

archaeological artifacts to examine the features of the northern tribal cultures during and after the Shang, and analyz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m. Two main points will be presented: (1) Chronologically,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nimal style reflect a social transition from Shang to Han, especially at the end of Western Chou around the Chinese northern frontier; (2) After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presence of animal-style motifs similar to those of south Siberia or south Russia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s. This paper will first examine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establish a basic framework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nimal style. Subsequently various features of time and space will be examined. Finally, a more sophisticated explanation of the issues raised above will be presented.

II.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Northern Animal Style

The animal-style artifacts form both excavations and collections can be sorted into the four categories presented below.

A. Knives and Daggers Crowned with Animal-heads

B. Animal Figure and "Antennae-style" decorated Hilts

C. Openwork Plaques

C1. Animal-figure

C2. Animal-figure with Frame

C3. The Animal Combat Motif

D. Three-dimensional Animal Decoration

There are four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ategory A: (1) The features of the knife, and dagge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top of the handle, the handle, and the blade. The top is decorated with an animal head, the

handle is frequently decorated with geometric indentations, while the blade is never decorated except for the median ridge, and this was done to make it easier to pull the blade out of an enemy's body. (2) The handles of the knives are slightly curved and their dorsal curvatures continue along the back of the blades.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blades, various types of curvature styles are found. At the junction between handle and blade is a jutting out cross-section. As for the dagger, the curvatures of handle and blade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knives, but with a prominent median ridge and a cross-section protrud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blade. (3) The animal head is a three-dimensional casted decoration, with a realistic style. Some are inlaid with turquoises. (4) The total length of the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is around 30 cm, and the motifs are primarily of domestic animals.

Category A may have first appeared as early as the time of the upper stratum at Erligang (approx. 1500-1400 BC). However, more conservative estimates place the date closer to 1400 BC. (based on the theory that King Wu's campaign against the last Shang King Ch'ou dates to 1027 BC.) This category continued into the early Western Chou period, approximately the late 10th century BC. The area where Category A flourished extended from Liaohsi and along Mt. Yen and the Great Wall to the northern or even the central parts of Shansi, Shensi, and Hopei provinces. The farthest southern boundary probably may be sited in An-yang,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Honan provi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tegory B, animal figure and "antennae-style" decorated hilts, are: (1) The pommel of the knife or dagger is crowned by a three-dimensional animal figure in varied positions, including standing, squatting and crouching; (2) The handle is decorated with a row of animal figures in relief; (3) The guard is in the shape of two animal heads or

figures; (4) The whole handle is decorated with a pair of animals, with no separate decoration on the pommel; (5) On the "antennae style" weapons, the pommel is crowned with two animal-heads, usually crane-heads; (6) The total length is approximiately 30 cm, and the motifs are of both wild and domestic animals. Wild animals such as tigers, bears and wolves are rarely found in Category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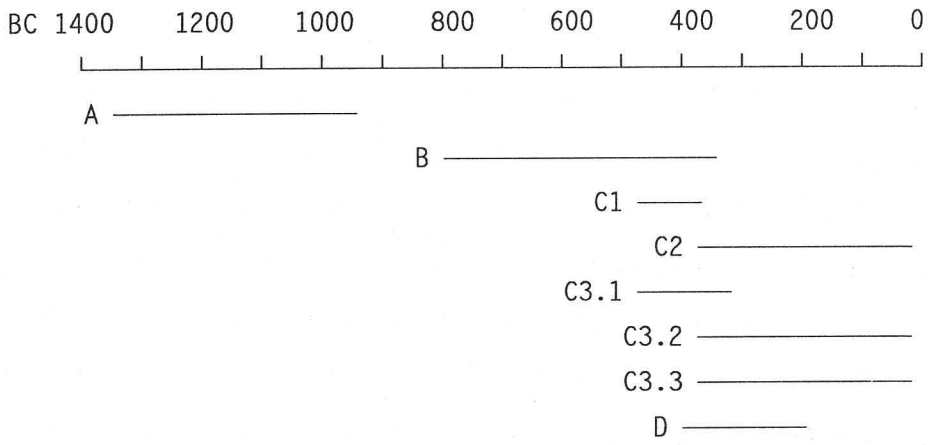
Category B appeared from the late Western Chou period to the mid-Warring States period (c.800 BC--350 BC), but flourish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 700 BC--450 BC). Generally speaking, the hilts decorated with animal forms are older than their "antennae-style" counterparts, and are most abundant in the area around and north of Mt. Yen. The antennae decoration probably did not appear until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is found in the area near Ordos.

Category C, openwork plaques, may be further separated into three subdivisions. The C1 type of animal-figure decoration was popular from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is commonly seen in the central part of Inner Mongolia and in the area east of Mt. Yen The C2 type of animal-figure decoration inside a frame probably arose in the mid-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lasted until after the reign of Han Wu-ti (c. 350 BC--AD 50). The range of its popularity was fairly broad, extending to Liaoning province in the east, and Ninghsia province in the west. The C3 type of the animal combat motif can b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hree styles. Style C3.1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outline of animals in combat. The time and location of its popularity are generally similar to the dates and regions mentioned with regard to C1., the animal-figure decoration in shape. Style C3.2, a horizontal B-shaped motif, and style C3.3, the animal combat style in a long, square-shaped frame, are basically similar to the

second category C2, animal-figure with frame, in terms of time and place.

Although the origin of Category D, three-dimensional animal decor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s period of peak papularity dates from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se four categories of the animal style, we can now make a chronology of their respective periods of popularity in northern China.



The above chart enables us to perceive similarities between various cultures, and can help us investigate changes in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of the ancient northern tribes.

III.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orthern Style Weapons in Archeaological Contexts

The famous Japanese scholar of Inner Asia, Namio Egami, proposed a theory to explain the changes in ancient Chinese Northern tribes. He believed that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two distinct peoples coexisted with

different living styles. One lived in the desert steppe of the Mongolian highlands and the other occupied the mountain basin region in the vicinity of the Great Wall. The former were the original steppe nomads, which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western drylands. The latter were a primarily agricultural tribe which also maintained a pastoral component in its culture; this group wa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ople of the southern wetlands. Arou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mountain people invaded the southern city-states and seized their property, wielding battle-axes and daggers which were introduced by the Western Aryans (Namio Egami 1948, pp.7-10).

Some of Egami's arguments, particularly his disordered chronology, have already been refuted or revised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his theory possesses some shortcomings, it still demonstrates his vast knowledge and the elegance of his arguments. To this day, his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K'un-yi, Jung and Ti cultures and the origin of the northern bronze style remain unsettled.

As mentioned above, the weaponry and cultures of the northern tribes and the animal style are closely related. Most archaeologically excavated pieces with the animal style are burial objects, and by examin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cultures, we can understand the lifestyles of those who utilized these objects and even make some inferences as to their social structure. By employing the above divisions as a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to the animal style, we can now discuss each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ribal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possibly provide insight into a few questions.

1. The Dagger and Battle-axe Wielding Tribes and the Animal-head Decorations

Today'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reveals several Shang dynasty or Western

Chou period animal-head knives, daggers, battle-axes or other similarly effective weapons. A definite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the various artifacts which remain, but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cultures from which they originate are by no means limited to these two types of weapons.

Burial objects and artifacts from Shansi and Shensi reveal many types of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curved knives and daggers crowned with bells, knives with ring-handles, socketed dagger-axes, socketed axes or straight-tang dagger-axes, tanged *yüeh* axes, and spearheads. Straight-tang dagger-axes and tanged *yüeh* axes are typical weapons of the Central Plain city-states, while the other weapons are similar to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All posse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ern tribes. The weapons which merit our attention are the knives and daggers crowned with bells. These objects normally do not exceed 30cm in length, are grasped in the hand, and are slightly bent. Besides the alteration of the hilt end from an animal-head to a bell, the form remains essentially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However,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most weapons with animal-heads are knives, while most weapons with bell-heads are daggers.

The area where weapons with sockets have been unearthed is rather extensive, from K'o-tso to Ch'ang-p'ing, southwestward along the Mt. Yen mountain ranges to northern Shansi and Shensi provinces, and as far as Huang-chung in Ch'ing-hai province. However, people who actually used battle-axes and daggers together generally lived between Po-te and Chi-hsien, concentrated mainly in the vicinity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Shansi province, particularly near Liu-lin and Shih-lou. More recent evidence reveals an even more complicated history. In scattered regions, archaeologists have unearthed the Northern style bel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and Central Plain weapons at the same site. What sort of historical situation does the coexistence of these two types of weapons reflec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e coexistence of Central Plain ritual vessels and weapons as well as Northern Style bronzes among Shang and early Western Chou remains from the south of Ho-ch'u along the valleys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its branches. The ancients said: "The great affairs of a state are ritual and warfare." (*Tso-chuan*) As a symbol of authority and a mark of support for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der, ritual vessels have a long tradition in the Central Plain. Weapons for warfare thus linked individual life and collective survival. Therefore the variations in bronze vessels and weapons found in this area reflect different cultures and i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worth examining.

According to Professor Tsou Heng, the Shih-lou region was Shang territory (1980, pp.279-281), and some believe that the Ch'ing-chien land belt was Kuei-fang territory. Regardless of how accurate these territorial estimates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ulture of the Shang kingdom and the cultures in the region from Po-te and Shih-lou to Sui-te and Ch'ing-chien remain significant. A tendency towards indepedence or opposition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in the outlying regions was naturally strong (see Li Po-ch'ien 1988), but Shang influence was still unavoidable. Such people not only adopted the style of Shang ritual vessels, but also used Shang-type weapons. Even their regional style vessels still reflect the concepts of the Central Plain Chinese rulers. One can see that thes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 "rituals" which ritual vessels symbolized supporte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order, and that this reflects a similar set of beliefs among the Shang and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Central Plains. Similarly, the fact that the unadulterated Central Plain ritual vessel style seen in the Ling-shih area was not transmitted from the

Shang kingdom, but was the result of indigenous development, further attests to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Central Plain culture. Therefore, the people who employed animal-head and bel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and had socketed weapons during the periods when and in the regions where the animal-style decoration was popular cannot simply be called tribes who used battle-axes and daggers.

2. Animal-figured Decoration and the Transition to Nomadic Life-style in the Mt. Yen and Great Wall Regi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has heretofore been discuss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wo components: the Northern steppe nomads and the Southern Plain sedentary peopl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non Hua-hsia people who lived in Shansi and Shensi provinces from Shang times were also nomadic. Whether discussing the structure of their economy based on Chinese data or from the wide perspective of the Eurasian steppe, the Northern nomadic culture is undeniably an unusual developmental stage in history. The economy of the tribes in the Shansi and Shensi regions was not primarily nomadic.

Employing the animal style Category A were people who used animal-head or bel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various socketed weapons, and gold earrings. Troops of warriors typically may have included infantry, cavalry or charioteers, but based on present information, mounted warriors did not yet exist during this period.

Although quite a lot records of warfare with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people can be found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re is almost no mention of enemy military equipment or methods of warfare. Only one late Shang inscription mentions the conquest of a northern tribe. During one battle the Shang captured over 600 prisoners and sacrificed several tribal chiefs to the

ancestral king. The booty included 183 shields, 50 suits of armor and 2 chariots (*Chia-ku-wen Ho-chi*, No. 36481). From this data we can infer that the animal-head or bell-head knife or dagger-wielding warriors of northern Shansi and Shensi were foot soldiers. Slightly later data reveals that charioteers had begun to play a role in warfare.

A victory over the Kuei-fang in the early Western Chou period was recorded on the Hsiao-yu *ting*. The first battle achievements included: 2 enemy chiefs and 4812 enemy troops killed, 13,081 prisoners of war taken, several horses, 30 chariots, 355 cattle, and 38 sheep captured. Achievements from the second batttle included: 1 enemy chief and 237 enemy troops killed, several prisoners of war taken, 104 horses, and over 100 chariots captured. On the basis of booty from the first military campaign, we can observe that the northern peoples' main source of power probably lay in their foot soldiers, but the booty of the second campaign also included a number of charioteers. The horses captured probably were used to pull the chariots and not ridden themselves.

The recently excavated Tuo-yu *ting* from Tou-men town, Ch'ang-an county records a battle consisting of five campaigns. In the first battle, at Hsun, many prisoners of war were captured, the details of which are absent from the inscription. During the second battle, at Tsai, over 200 people were beheaded and 23 people captured, while 117 chariots were taken. In the third battle, at Kuang, 36 people were beheaded, 2 people were captured, and 10 chariots were confiscated. In the fourth battle, at Shih, there were heavy enemy casualties, and in the last battle, at Yang-jung, there were 115 people beheaded and 3 people captured. The inscription states that the Shang forces were unable to capture any chariot, but managed to wound enemy horses. The function of the captured horses mentioned in this

inscription is probab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Hsiao-yu *ting* as they were probably ridden by mounted warriors. This is a new phenomenon at the end of Western Chou, around the end of the 9th century BC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8th century BC.

A Shang period city site at Li-chia-ya, Ch'ing-chien county, Shan-si, was excavated recently. The city wall was built with stone and earth. The remains inside the city suggest its economy was primarily agricultural, included some raising of domestic animals. Archaeologists believe it is a Kuei-fang site.

Even until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so-chuan,* none of the references to the Jung and Ti "barbarians" found in documents and inscriptions mentions any warriors other than foot soldiers and charioteers.

In short, the people of the Shansi and Shensi provinces and the loess highlands who used "Northern Style" bronzes from Shang times lived in city settlements and were not nomadic groups.

As the areas where animal-head decoration was popular, namely Shansi and Shensi provinces and the loess highlands, gradually became part of Hua-shia culture, people in its northern and western regions gradually shifted to a nomadic way of life. From the north of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Great Wall, that is Liao-hsi, south-westwards to the Kansu and Ch'ing-hai highlands, this crescent area became a border between two types of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to the south,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nd to the north, nomadic. The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culture became a nomadic culture in the 8th or 9th century BC, which is approximately the same time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animal-style category mentioned above. After this transition, the third and fourth animal-style categories appeared.

Although both nomadic and pastorial peoples raise livestock as a means

of production, a pastoral society's political structure is intrinsic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 nomadic people. The *Shih Chi: Hsiung-nu Lieh-chuan* state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re were various barbarian tribes in the north and northwest "which scattered to live in valleys and gorges. Each tribe had its own chief and toghther there were over one hundred tribes. Therefore, it was not possible for them to unite as one." These tribes employed raising livestock as a basic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However, between the Warring States and Han dynasty, the Hu and the Huns and other barbarian tribal settlements along the belt of the East Asian steppes joined together and formed a confederacy. Warriors in pastoral societies were foot soldiers, while in nomadic societies, they were mounted warriors. Consequently, the focal point of nomadic culture became the training of war horses.

The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frontier is also seen in recently excavated materials from along the crescent region at Yen-ch'ing, Liang-ch'eng, Liang-hsien and Kou-yün. Archaeologists discovered many burial sites containing sacrificial domestic animals, such as dogs, goats, cows, and horses. Here I will present the case of a tomb from T'ao-hung-pa-la, Hang-ch'in Banner, Ikjou League, Inner Mongolia. In the grave of one approximately 35 year-old male were found crane beak axes, arrowheads, openwork decoration, and horse bits decorated with the face of a horse. There were 9 horse heads, 4 cow heads, and 2 sheep heads (*Ordos-style Bronzes,* p.205). The horse decoration and horse heads indicate clearly that this warrior rode a horse, while the arrowheads presumably signify that his main weapon was the bow and arrow.

IV. The Northern Chinese Animal Style and Its Place of Origin

All that the animal style can reflect about the northern peoples' culture or social and political evolution has already been discussed above. Of greater concern to scholars is the question of its provenance. Did the animal style originate in the Karasuk culture in the Minussinsk basin near the Yenisei river of Southern Siberia or did it originate amony the Shang people in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such as Bernhard Karlgren (1945), Max Loehr (1949, 1949/51), and Karl Jettmar (1950) discussed this question, and the debate has continued into the 80's with Chinese scholars such as Wu En (1986,1984), Tien Kuang-chin and Kuo Su-hsin (1986, p.185-196).

1. The Location of the Place of Origin of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Based on the work of W. P. Yetts and W. C. White, Karlgren proposed that the earliest data on the Scythian and Siberian animal style lies in the Yellow River region (particularly at An-yang sites), which suggested that China contributed to the creation of the animal style. However, most Western scholars disagreed and placed the origin of the animal style in the Minussinsk basi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Shang culture at Anyang predates or antedates the Karasuk culture in Minussinsk is yet another subject of controversy. Karlgren estimates that Yin-hsu dates from the 13th to the 11th century BC (approximately 1300-1028 BC). According to Karlgren, the most popular Scythian style animal decoration of the 7th century BC could not have influenced China and cannot be considered the root of the

Eurasian animal style. Teploukhov's approximation of the animal style's origin in the Karasuk culture around 1000 BC should be rejected as a late estimate, not to mention G. Merhart's placement of its origin later than this period. On the other hand, by extending the date back to the 13th-12th centuries BC, H. Kühn is actually suggesting that Yin-hsü i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Karasuk culture. Karlgren believes that many objects with the animal style from the Karasuk culture were not scientifically excavated, so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set an absolute date for this culture based solely on design (Karlgren 1945).

Max Loehr rejected Karlgren's argument, deeming his dating and that of the Russian scholars to be unreliable. According to V.A. Gorodzov, the Karasuk culture dates from 1500 to 1000 BC. Kühn believes that Karasuk was at least contemporaneous with Anyang, approximating it to 1300 BC. Tallgren compared bronze knives from Minussinsk and Anyang and dated them both to 1500 BC. Loehr dates the Afanasieva culture (in Minussinsk) to approximately 2000 BC, the Seima culture (middle region of Russia) to 1700 BC, the Seima-Andronovo culture (in Minussinsk) to 1600 BC, the Karasuk culture to 1400 BC or slightly later, but Anyang to 1300 BC. He asserts that whether discussing designs of objects, questions of dating, or Stone Age substrata, all evidence supports the theory that Siberia is the area in which the animal style originated, although this type of decoration also constituted a component of the Anyang culture (Loeher 1949, 1956).

Speaking strictly of design and style, Kiselev points out that the animal decoration from the Karasuk culture is devoid of eye-sockets or nostrils, and that the lines outlining the ears are not distinct enough and are also missing an inner circle. Many animal-head knives found in southern Siberian sites (see Jettmar 1950) demonstrate notable differences in animal style decoration

from the style found on animal-head knives excavated from the northern parts of Shansi, Shensi, and Hopei provinces. Moreover, the Russian implements are also neither as crude nor as perfunctorily made. Therefore, this area could not have been the animal style's place of origin.

To resolve prolonged debate within academic circles as to whether the origin of the animal style lies in the Minussinsk basin or at Anyang, scholars have been striving to establish archaeological dating for the two sites. Of the two sites, information on Anyang is clearer, while there are discrepancies pertaining to data on Minussinsk, with scholars proposing different dates. As mentioned above, the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of the Karasuk culture are actually rather different from the familiar animal style. Moreover, the excavated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from Anyang also demonstrate noticeable external influence. Based on curre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hang and early Western Chou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from the Mt. Yen and Great Wall region most closely resemble implements from Mongolia and the Lake Baikal region. Examining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found in Mongolia and Transbaikalia, Wu En has suggested that these weapons are not different from the northern Chinese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He believes that the two bronze cultures which coexisted in the north and south were closely related, and moreover, underwent a trend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Wu En 1986).

Forty years ago, attempting to move away from the question debated by Loehr and Karlgren about the relative dating of the Minussinsk and the Anyang animal style, K. Jettmar brought 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baikalia region, northern China, Ordos, and the middle Yenisei river area cultures, even though they all probably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Jettmar also believed that not long after 1000 BC, on the northern border of

China, a group of people immigrated into the Minussinsk basin. This group of people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ople who produced objects resembling "Karasuk Ordos" style bronzes. Jettmar gradually deduced that the Ordos style bronzes of the Shang era were created by the Sinides people of China's northern border (Jettmar 1950).

After examining the animal-head bronze weapons excavated in northern Shansi and Shensi, more and more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placed the origin of the animal style of the first category (knives and daggers crowned with animal heads) in the belt encompassing Mt. Yen and the Great Wall. Taking this factor as central in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sian animal style, and includ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nyang, Mongolia, Transbaikalia and Minussinsk, these elements constitute a new direction for research. Of course, this new direction is not without obstacles. Until now there has not been enough data on northern Chinese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to establish a genealogy of stylistic development. As to its source and later developments, these still remain a mystery.

2. Similarity between Motifs from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the Eurasian Steppe

(1) Concave Leaf Border Decoration

(2) The Griffin Motif

If we assume that contact existed early in Shang times between the Mt. Yen and the Great Wall belt and the remote regions of Outer Mongolia or Transbailaika, then by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fter the cultures of the north gradually became nomadic,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is region and the outer area should have been even more frequent, and the fus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should have been easier. Because the dating of Eurasian

steppe objects usually relies on the use of data on ancient countries and civilizations of the south such as in China, Iran, the region of 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and Greece, many scholars differ in their opinions. This article will not address the "origin" or "later developments" of the animal style covered in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categories, but will only raise the question of what elements of the outlying regions they include. This process of cultural diffusion was a natural result of horses being employed in great numbers in the Eurasia steppe belt.

V. Conclusion

It would be nearly impossible to fully discuss so many important historical problems and complex issues of artistic analysis in the space of this brief summary. These are treated more fully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archaeological data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is paper. Some contemporary archaeologists examin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ogether with documents and written records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tribes. Again, this paper does not try to draw any definite conclusion as to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Northern tribes; it hopes only to bring attention to some aspects of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which demonstrate a connection with art history, especially by using the animal style to assess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ancient northern tribes' cultures, including developments of their political society.

We have been using archaeological relics as a framework, and have also been referring to objects in collec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o analyze the animal style seen in northern China spanning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covering the Shang dynasty, Western Chou,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and th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Simply speaking in terms of design, the animal styl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nd can reflect three stages and three kinds of economic societies, lifestyles and elements of culture.

The animal-head knives and daggers of the first category are weapons typical of the primarily agricultural societie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Shansi and Shensi loess highlands during the Shang and Chou dynasties. These societies were also pastoral cultures, and were located as far north as the Great Wall area, expanding east towards Mt. Yen. The openwork and three-dimensional design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categories existed from the middle to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rough the Ch'in and Han dynasties in the nomadic countries and cultures living throughout the northern steppe. The knives and daggers decorated with animal forms and the "antennae style" of the second category existed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primarily in the region around Mt. Yen. Although these peoples advanced from a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culture to a nomadic culture, changes in political structure were few. Because of this, it is apparent that the animal style was confined to certain territories. Borrowing technical terms from traditional records, the first stage refers to the time of Kuei-fang and Hsien-yün, while the second to the time when the Jung, Ti, and Hu tribes coexisted, which seems to be indicative of a transitional stage. The third refers to the time of the Hu or Hun people. During the first stage, foot soldiers were employed as the main tactic of warfare, with charioteers sometimes dispatched, but no mounted warriors. It was not until the second stage that mounted warriors entered the mainstream. As a result of the shift to nomadic culture,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became common activities which developed continuously. By the

third stage, the nomadic states appeared, ruling a vast area of northern China and forming an alliance with the Hun tribal settlements.

In both the Mt. Yen-Great Wall region and the provinces of Shansi and Shensi are unique cultures which differ from the Hua-hsia cul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south. These cultures are also distinct from the Karasuk culture further north in Minussinsk. Conta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culture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is probable, although the cultures in the middle region also probably possessed a unique identity and did not exist solely to facilitate transmission of elements between other cultures.

It is also probable that the animal style of the Category A originated in this area, since weapons from this region indicate a close connection with weapons from Mongolia and Transbailaika. Furthermore, when compared with weapons from the Minussinsk basin,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appear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stage, around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and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animanl style became common. These categories bear strong elements linking them to outlying regions, indicating the shift to a nomadic culture and frequent contact with the Eurasian steppe region.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is development was the adoption of horseback riding as a means of travel and warfare, allowing great distances to be covered in a much shorter space of time than had previously been possible.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the northern cultures from the Shang to Han dynasties cannot be discussed as a single unit. This transitional stage during which the shift to a nomadic culture began w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evolutionary period which greatly influenced subsequent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 region.